

Cover: Political Epistemology: An Introduction, Written by Michael Hannon and Elise Woodard, published by Routledge Classics, Taylor and Francis Group

“这是一部全面而均衡的政治认识论导论，其涵盖范围之广、作者重构论辩之精妙，令人印象深刻。它将成为学生与学者 alike 的绝佳资源。”——肖恩·英格汉姆（Sean Ingham），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

“汉农与伍德沃德撰写了一部真正出色的导论，引领读者进入政治认识论这一崭新而令人振奋的领域。是否存在政治真理？政治上的党派立场是否理性？政治知识与良好公民身份之间有何关联？民主制度（如何）才能发挥群体智慧？如果你曾对这些问题产生过好奇，那么本书正是为你而写。本书行文简洁明了、通俗易懂，非常适合作为哲学或政治学本科生课程的教材。同时，专业哲学家也能从中获益良多，因为

它为该领域若干富有前景的后续研究方向奠定了基础。”——赫里希凯什·乔希（Hrishikesh Joshi），美国亚利桑那大学

政治认识论

《新科学家》最近宣称：“知识论哲学家们，你们的时代到来了。”就连巴拉克·奥巴马也警告存在一场“认识论危机”。在唐纳德·特朗普第二次当选、民粹主义兴起，以及错误信息和阴谋论泛滥之后，认识论问题如今已处于我们政治生活的最前沿。认识论能否解释“后真相”所带来的挑战？选民的无知是否威胁民主？政治分歧在认识论上是有价值的还是有害的？

这本极具时效性的政治认识论导论探讨了上述问题以及更多议题。迈克尔·汉农（Michael Hannon）与艾莉丝·伍德沃德（Elise Woodard）以清晰而引人入胜的风格，考察了以下关键主题：真理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包括柏拉图、密尔和罗尔斯的相关论点；

民主的认识论，包括民主制度如何做到公平与代表性，同时又能作出良好决策的问题；政治无知如何可能削弱民主；非理性与党派偏见；政治信念与群体忠诚；政治分歧与极化；以及民主与专家权威之间潜在的冲突。

《政治认识论导论》包含章节摘要和延伸阅读，是任何研究这一引人入胜且迅速发展主题之人的理想入门读物，无论其研究领域是认识论、政治哲学还是应用伦理学。本书也将引起政治学、法学和公共政策等相关领域学生与研究者的兴趣。

迈克尔·汉农（Michael Hannon）是英国诺丁汉大学哲学副教授，以及亚里士多德学会（The Aristotelian Society）的主任。

Elise Woodard 是英国伦敦国王学院迪克森·庞法学院法律与政治哲学讲师。

政治认识论：导论

迈克尔·汉农 和 艾莉丝·伍德沃德

Logo: Published by Routledge,
Taylor and Francis Group,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is an imprint
of Taylor and Francis Group, an In-
forma business, Humanity and So-
cial Sciences Publishers Book

封面图片设计: gremlin / Getty Im-
ages

首次出版于2025年

由劳特利奇出版社出版

英国牛津郡阿宾登米尔顿公园4号公
园广场，邮编：OX14 4RN

并由劳特利奇出版社出版

纽约州纽约市第三大道605号，邮
编：10158

Routledge 是 Taylor & Francis 集团
旗下的出版品牌，而 Taylor & Fran-
cis 集团隶属于 Informa 商业集团。

©2025 迈克尔·汉农和艾莉丝·伍德沃德

迈克尔·汉农 (Michael Hannon) 和艾莉丝·伍德沃德 (Elise Woodard) 依据1988年《版权、设计与专利法》第77条和第78条，主张其作为本作品作者的身份权利。

版权所有。未经出版商事先书面许可，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任何形式或任何电子、机械或以其他方式（包括影印和录音）进行重印、复制或利用，亦不得将其用于任何信息存储或检索系统，无论该等技术是目前已知或将来发明的。

商标声明：产品或公司名称可能是商标或注册商标，仅用于识别和说明，无意侵犯其权利。

英国国家图书馆在版编目数据

本书的目录记录可从大英图书馆获取。

国会图书馆在版编目数据

姓名：汉农，迈克尔（迈克尔·J.），作者。| 伍达德，艾莉丝，作者。

标题：政治认识论：导论 / 迈克尔·汉农 与 艾莉丝·伍德沃德。

描述：英国牛津郡阿宾登；美国纽约州纽约市：劳特利奇出版社，2025年。| 含参考文献和索引。

标识符：LCCN 2024057586（印刷版）| LCCN 2024057587（电子书）| ISBN 9780367544911（精装）| ISBN 9780367544898（平装）| ISBN 9781003089483（电子书）

主题：LCSH：知识论—政治方面。

分类号：LCC BD175 .H345 2025（印刷版）| LCC BD175（电子书）| DDC 121—dc23/eng/20250205

LC 记录可于 <https://lccn.loc.gov/2024057586> 获取

LC 电子书记录可于 <https://lccn.loc.gov/2024057587> 获取

ISBN: 978-0-367-54491-1（精装）

ISBN: 978-0-367-54489-8 (平装)

ISBN: 978-1-003-08948-3 (电子书)

DOI:10.4324/9781003089483

采用 Joanna 字体排版

作者: codeMantra

纪念德里克·汉农

目录

- [致谢](#)
- [引言](#)
- 1 真理与政治
- 2 认识论民主
- 3 重新审视认识论民主
- 4 政治无知
- 5 非理性与偏见
- 6 政治信仰
- 7 政治分歧
- 8 极化与党派之争
- 9 信任与专业能力

- 10 重新思考民主
- [参考文献](#)
- 索引

致谢

我们很幸运地得到了许多慷慨的对话者，他们激发了新的想法，挑战了我们的思考，并在本项目的各个阶段给予了我们支持。这些人士包括：亚历克斯·格雷罗（Alex Guerrero）、亚历克斯·沃斯尼普（Alex Worsnip）、阿尔·普雷斯科特-考奇（Al Prescott-Couch）、本·卡尔德科特（Ben Caldecott）、本·塔平（Ben Tappin）、卡罗琳娜·弗洛雷斯（Carolina Flores）、丹·威廉姆斯（Dan Williams）、大卫·埃斯特隆德（David Estlund）、大卫·奥布莱恩（David O'Brien）、丹尼斯·惠特科姆（Dennis Whitcomb）、伊丽莎白·埃登伯格（Elizabeth Edenberg）、埃里克·贝尔博姆（Eric Beerbohm）、法比安·彼得（Fabienne Peter）、加雷斯·内利斯（Gareth

Nellis)、埃莱娜·兰德莫尔 (Hélène Landemore)、伊利亚·索明 (Ilya Somin)、杰弗里·弗里德曼 (Jeffrey Friedman)、耶罗恩·德里德 (Jeroen de Ridder)、杰丝·邝 (Jess Kwong)、乔什·迪保罗 (Josh DiPaolo)、凯特·埃尔金 (Kate Elgin)、凯文·罗伯茨 (Kevin Roberts)、克里斯托弗·阿尔斯特罗姆-维杰 (Kristoffer Ahlstrom-Vij)、露易丝·汉森 (Louise Hanson)、马克斯·海沃德 (Max Hayward)、马克西姆·勒普特 (Maxime Lepoutre)、迈克尔·林奇 (Michael Lynch)、尼尔·利维 (Neil

以下活动的听众也在本书写作的不同阶段提供了有益的反馈：维也纳中欧大学 (CEU) 的“危机中的知识”项目；罗得岛的Episteme研讨会；新奥尔良的PPE学会会议；克罗地亚的“政治认识论的欧洲面孔”会议；伦敦国王学院的治理与社会研究中心及狄克逊·庞法学院；布莱德认识论会议；美国哲学协会东部年会 (Eastern APA) 的政治认识论网络；以及康涅狄格大学、哈佛大学、密歇根大学、杜兰大

学、华威大学和伦敦哲学研究所举办的各类活动。经相关方善意许可，我们在本书中引用了先前已发表的部分成果。第一章借鉴了《后真相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Post-Truth”），载于《批判评论：政治与社会期刊》（Critical Review: A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Society）第35卷第1期（2023年），第40–62页。第三章纳入了即将发表于《Episteme》的《以认识论赌注民主》

（“Betting Democracy on Epistemology”）一文的部分内容。第五章包含了《知识渊博的选民是否是更好的选民？》（“Are Knowledgeable Voters Better Voters?”）一文的内容，载于《政治、哲学与经济学》

（Politics, Philosophy and Economics）第21卷第1期（2022年），第29–54页。第六章部分基于与耶罗恩·德里德（Jeroen de Ridder）合著的章节《政治信念的意义》（“The Point of Political Belief”），收录于迈克尔·汉农（Michael Hannon）与耶罗恩·德里德主编的《劳特利奇政治认识论手册》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Political Epistemology），劳特利奇出版社，2021年。第七章借鉴了《分歧与当代政治哲学》（“Disagreement and Contemporary Political Philosophy”）一文，该文将收录于玛丽亚·巴格拉米安（Maria Baghramian）、J·亚当·卡特（J. Adam Carter）与拉赫·科斯克-罗兰（Rach Cosker-Rowland）主编的《劳特利奇分歧哲学手册》（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Philosophy of Disagreement），劳特利奇出版社，2025年。我们谨向上述各文的编辑和出版方致以诚挚谢意，感谢他们允许我们引用这些作品。

迈克尔·汉农对哈佛大学埃德蒙与莉莉·萨弗拉伦理中心深表感谢，他在该中心担任驻院研究员（2022-2023年），度过了充实而富有成效的一年，期间致力于本书及相关项目的研究工作。他特别感谢其研究员导师埃里克·比尔博姆（Eric Beerbohm）以及中心主任丹妮尔·艾伦（Danielle Allen），同时也感谢众多访问研究员，他们的洞见极大地丰富了他的研究。他还非常感谢杜兰大学的墨菲研

究所及伦理与公共事务中心，正是在那里，他作为教员研究员（2021–2022年）首次开始撰写本书。此外，他也感谢诺丁汉大学允许他开设并讲授一门新课程——“知识、无知与民主”，该课程为本书的许多内容提供了重要启发。

迈克尔还要感谢人道研究协会（Institute for Humane Studies）授予的“话语倡议奖”（Discourse Initiative Award），该奖项资助了他对不真诚政治话语的研究。此外，他还要感谢耶罗恩·德里德（Jeroen de Ridder），后者在荷兰科学研究组织

（NWO）Vidi项目“知识型民主：一项社会认识论探究”（Knowledgeable Democracy: A Social-Epistemological Inquiry）框架下，于2018至2021年间邀请迈克尔担任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VU Amsterdam）的访问研究员。与耶罗恩在这三年间的合作激发了本书中的诸多思想。最后，迈克尔尤其感谢伊莉丝·伍达德（Elise Woodard），感谢她的爱、善良与支持，也感谢她让本书变得比没有她参与时要好得多。

Elise Woodard 感谢麻省理工学院（MIT）在2022至2023年期间作为博士后研究员对其研究工作的支持，也感谢密歇根大学提供的资源，使她得以探索并组织有关政治认识论的活动。她还感谢哲学研究所（Institute of Philosophy）在2023年夏季慷慨资助她担任合作研究研究员，并感谢伦敦国王学院迪克森·普恩法学院

（Dickson Poon School of Law at King's College London）所提供的学术与制度支持，这些支持极大地丰富了她在政治认识论领域的教学、写作与研究。最后，她要感谢2023年参加她在麻省理工学院开设的应用认识论研究生研讨课的学生们，他们就本书中的诸多主题展开了富有启发性的讨论；同时也要感谢她在伦敦国王学院讲授“法律与政治认识论”课程的学生们，他们充满活力的对话激发了她对这些议题的新视角。此外，她还要感谢Michael Hannon——作为一位充满爱心、支持且耐心的伴侣与合著者，他让她得以使这本书变得比没有她参与时更好。

我们还要感谢巴里·史密斯（Barry Smith）以及哲学研究所的全体同仁，感谢他们为本项目的顺利完成所提供的宝贵支持，以及在伦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充实而富有协作精神的工作空间。能在如此鼓舞人心的环境中工作，是我们的一大乐事与荣幸。同时，我们也感谢我们的编辑托尼·布鲁斯（Tony Bruce），感谢他鼓励我们撰写本书；并感谢劳特利奇出版社（Routledge）的亚当·约翰逊（Adam Johnson）在整个过程中给予我们的指导与耐心。

我们最深切的感激献给我们的家人，感谢他们始终如一的支持。衷心感谢汉农一家——德里克、琳达、马特和杰夫，以及伍德沃德一家——莱斯利、吉姆和詹姆斯，感谢他们的鼓励与包容。我们将本书献给德里克·汉农的在天之灵，他向来对政客及其不愿直截了当回答问题的做法缺乏耐心。

真理与政治之间的冲突故事，是一个古老而复杂的故事。——汉娜·阿伦特

引言

DOI:10.4324/9781003089483-1

2017年,《新科学家》(New Scientist)刊登了一篇头条文章,宣称:“知识哲学家们,你们的时代到来了。”¹ 该文坚称,认识论“从未像现在这样重要”。尽管如此,“认识论”(epistemology)一词对许多人来说仍然晦涩难懂。人们听到这个词时,常见的反应是一脸困惑地问道:“episte……什么?!”

自那以后,“认识论的”(epistemic)和“知识论的”(epistemological)等术语已渗入公众话语之中。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和《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戴维·布鲁克斯(David Brooks)等知名人士警告称存在一场“知识论危机”(epistemological crisis),而《Vox》等媒体则报道了“一次深刻的认识论断裂”(a deep epistemic breach)。² 这场危机据称有多个来源和罪魁祸首。假新闻、宣传和阴谋论模糊了真相与谎言、现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如今,

我们的政治分歧已不仅限于价值观的差异，更延伸至一些根本性问题：该信任谁、该相信什么，以及如何寻求知识。社会诸多领域对媒体、科学和政治人物的信任度急剧下降，与此同时，民粹主义情绪却在不断上升。政治极化和信息茧房（echo chambers）加深了政治分歧，并加剧了民众的封闭心态。如今，我们许多人将他人——通常是我们的政治对手——视为“脱离现实”。³

这一认识论危机本质上是政治性的。如果没有对现实的共同认知和相互信任，民主制度就难以正常运作。如果党派对手生活在截然不同的世界里，他们又怎能合作应对紧迫的社会与经济问题？正如奥巴马所警示的：“如果我们丧失了区分真假的能力，那么思想市场就无法运转；而我们的民主制度也就无法运转。”⁴

特朗普及其他政界人士被指控加剧并放大了这场认识论危机，即便他们并非始作俑者。批评者指责他们播撒对主流机构的不信任，并助长了对真相的漠视。然而，政治中的认识论问题有着悠久而复杂的历史，尽管“认识

论”（epistemic）一词直到特朗普和英国脱欧出现后才开始渗透进公共话语。关于真相的作用、对专家的信任、公众无知等处于政治与认识论交汇点上的议题，至少可追溯至柏拉图时代。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警告说，大众过于无知，不宜被赋予权力。他主张由睿智的“哲人王”来统治。在《论自由》中，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强调了公民审议所带来的认知益处，预示了协商民主理念的发展。在《论美国的民主》中，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指出了民主承诺与对专家服从之间的张力。如今，对专业知识和政治真理的怀疑常常与特定政治群体相关联，但米歇尔·福柯、约翰·罗尔斯和汉娜·阿伦特等学者已对真理与专家在政治中的角色提出了重要的哲学与政治挑战。例如，在《政治自由主义》中，罗尔斯聚焦于深刻而持久的分歧问题，主张合作要求我们搁置关于特定道德或哲学学说真理性的争论。他建议采取一种不可知论的认识论立场，即避免将政治论证建立在关于终极真

理的争议性信念之上，而应专注于所有人都能合理接受的原则。

继罗尔斯之后，政治哲学家们一直在探讨真理、证成以及决策的认知质量在确立民主及其他政治制度合法性方面应扮演何种角色。尽管至少自柏拉图以来，学者们便对政治哲学与认识论交叉领域的问题抱有兴趣，但近年来，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大量涌现。例如，已有新著述探讨了宣传、假新闻、政治分歧、阴谋论、选民无知、气候变化怀疑论、回音室所造成的认知危害、政治中的理智恶习，以及民主制度在认知层面的优点与缺陷。

认识论如今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政治相关性。现代发展，包括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兴起，已使政治中的认识论关切呈现出独特的形态与紧迫性。我们的政治话语如今充斥着诸如“假新闻”、“后真相”、“认知泡沫”、“真相衰变”和“另类事实”等认识论概念。认识论在公众视野中的突出地位，与该领域新近发展起来、如今被称为“政治认识论”的研究工作不谋而合——这绝非巧合。

但政治认识论究竟具体指什么？如果政治认识论有着悠久的渊源，为何直到最近才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

什么是政治认识论？

政治认识论，广义而言，是政治哲学与认识论交叉领域中的一个哲学分支。然而，这一定义既缺乏信息量，又过于狭隘。事实上，政治认识论是一个内容丰富、跨学科领域，吸引了来自诸多学科的学者，包括政治理论、政治学、心理学、批判理论和媒介研究等。将这些多元视角统一起来的，是一种共同的关注：认识论问题如何塑造我们的政治生活，以及反过来，政治力量又如何影响我们对知识与真理的理解。

我们认为，从两个宽泛的方面来构想政治认识论是很有帮助的：

政治即认识论 这一方法探讨认识论问题如何处于政治的核心位置。它强调知识、真理与信念等问题如何塑造政治话语与决策。例如，围绕假新闻、宣传、后真

相、阴谋论以及对专家的不信任等近期争论，凸显了认识论问题已步入当代政治的中心舞台。这些讨论揭示出，政治现象如何呼唤认识论层面的评估与介入。

认识论即政治 这一视角探讨认识论的概念、标准与制度本身如何本质上具有政治性。一些理论家认为，真理与知识的观念反映的是权力关系，而非中立、永恒的标准。例如，福柯提出，每个社会都有其自身的“真理体制”，这些体制规定了何为合法的知识，以及谁有权就某些议题发言。这一观点强调，我们的认识论框架与政治及社会结构密不可分。

本书主要聚焦于第一种路径，考察政治现象与制度的认识论维度。然而，我们并未完全忽视第二种视角。例如，“真理与政治”和“信任与专业知识”两章就探讨了关于“真理”的压迫性功能以及专业知识的社会维度等问题。考察这两种视角对于全面把握政治认识论的范围与意义，以及真理、政治与知识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

我们主要关注第一个研究项目，原因有二。首先，它代表了分析哲学领域内政治认识论的主要焦点，而分析哲学正是我们的专长所在。相比之下，第二种进路则更多地由分析传统之外的学者（如批判理论家）加以深入探讨，而我们对这些学者的著作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其次，任何导论性文本都必须对内容有所取舍。尽管有些人可能会认为我们的关注点过于狭隘，但我们援引密尔（Mill）的话来申辩：“对于独眼之人，只要其目光敏锐，就应给予充分的宽容：倘若他们看得更多，恐怕反而不会如此敏锐，也不会如此热切地专注于某一探究路径。”⁷

政治在哪些具体方面具有认识论性质？我们可以识别出若干关键领域，在这些领域中，认识论与政治理论及实践相互交汇。

首先，政治认识论学者考察合法的政治权威是否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认识论权威。这一观点可追溯至柏拉图，他曾批评民主制度依赖于无知民众的意见，并主张政治权力应交由具备知识的专家掌握。与此相关，政治

认识论与民主的认识论理论密切相关，后者关注民主的权威性或合法性是否植根于认识论方面的考量。持此观点者认为，政治制度可以根据其认识论上的优劣加以评价和证成。这与那些基于非认识论考量（如公平与平等）来证成民主的观点形成鲜明对比。

“认识论具有政治性”这一观点还有更广泛的体现方式。例如，错误信息的传播、日益加剧的两极分化以及公众对专家信任度的下降，都亟需认识论层面的分析。政治认识论学者考察这些现象在认识论上是否合理，以及它们如何塑造公众对真理的理解。他们还探讨公民所承担的认识论责任，例如有义务成为知情的选民，以及在面对合理分歧时，有必要适度调整自己对政治观点的确信程度。

这些不同的探究共享一条共同主线：它们从认识论的视角来评估我们的政治世界和态度。这些研究假定，我们可以运用认识论标准来评估民主、两极分化和党派性等政治制度与现象。例如，我们可以追问民主制度是否能够追踪真理，政治信念是否具有真值

适切性（truth-apt），以及两极分化在认识论上是否合理。本质上，这些问题凸显了认识论在理解和塑造我们对政治发展的回应中所能发挥的关键作用。

理解政治认识论主题的另一种方式是识别政治认识论学者所研究的具体问题。这些问题包括：

- 真理在政治中的恰当角色是什么？
- 民主能否利用公众的集体智慧？
- 合法的政治权威是否取决于认识论上的考量？
- 选民是否有道德或认知上的责任去负责任地投票？
- 无知是否会削弱集体决策的合法性？
- 选民普遍缺乏政治知识是理性的吗？
- 政治是否会让理性的人变得非理性？
- 政治分歧是否需要理智上的谦逊？
- 何时可以合理地忽略专家判断而相信自己的判断？

- 是否存在所谓的政治专长？

这些及其他相关问题构成了本书的基础。政治认识论学者认为，通过探讨政治议题中的认识论维度，我们能够在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和当代问题上取得进展。即便是那些否认认识论考量在政治中具有相关性的人，实际上也通过在这些问题上表明立场而参与了政治认识论的讨论。

为何是现在？

正如普通大众越来越熟悉“认识论”这一术语一样，哲学家们自己也只是最近才开始认识到并使用“政治认识论”这一术语。几年前，人们或许还会听到他们困惑地反问：“政治……什么？”

尽管政治哲学与认识论的交汇长期以来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主题，但近年来这一领域已成为尤为活跃的研究方向。早期对“政治认识论”（political epistemology）的提及主要将其等同于认知民主理论（epistemic democracy），该理论聚焦于决策的认知质

量应如何为民主提供正当性依据。⁹然而，哲学家们日益关注更广泛的政治现象所蕴含的认识论维度。

尽管这种兴趣日益增长，政治哲学与认识论这两个领域传统上却各自独立发展，彼此之间鲜有交流，也缺乏对问题的共同框架。例如，政治哲学家长期以来一直在讨论合理的分歧；然而，他们很大程度上并未借鉴关于分歧认识论的研究。同样，认识论学者在探讨分歧时，也未汲取政治哲学领域关于政治分歧的丰富文献，尽管这一议题在政治哲学中数十年来始终处于核心地位。

近来，学者们开始系统地探讨认识论的分析与概念工具如何作用于政治哲学，反之亦然。这种日益增长的关注揭示了若干富有价值的新研究领域，在这些领域中，认识论看似抽象的概念可被运用于紧迫的政治议题。因此，过去几年见证了大量致力于加强这两个领域之间联系的研究成果的涌现。

为何这些领域如今被如此明确地联系在一起？我们推测有三个促成因素。

第一，这反映了哲学中的一种更广泛的趋势，即将认识论与其他规范性和评价性领域（包括伦理学和社会哲学）联系起来。第二，经典的认识论问题如今在政治世界中有了具体且可识别的表现形式，适合在媒体和学术场合展开讨论。例如，围绕阴谋论和深度伪造（deepfakes）的争论，为探讨有关怀疑论的传统问题提供了理想的背景。第三，鉴于所谓“认识论危机”的出现，将认识论工具应用于政治现象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或许正是出于这些原因，当代哲学家们响应了《新科学家》（New Scientist）的呼吁，要“走出……阴影”。¹¹

我们的目标是为这一蓬勃发展的领域提供一份全面的指南。尽管《劳特利奇政治认识论手册》（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Political Epistemology）和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政治认识论》（Political Epistemology）一书涵盖了广泛的主题和前沿研究（我们强烈推荐这两部著作，其中一部正是由我们中的一位担任编辑！），但二者均未能提供一幅

连贯的地图，以呈现政治认识论这一广阔而复杂的领域。本书旨在通过提供对该领域的全面概述来满足这一需求，使读者能够从一个统一的视角把握整个领域的全貌。

随着人们对认识论与政治之间关系的日益重视，认识论学者可能会忽视对政治理论所负有的思想债务。我们深切意识到，这一交叉领域中的许多议题都有着深厚而丰富的历史。我们的目的并非将这些问题视为全新的议题，而是要在这一悠久传统的基础上继续推进。通过在当代挑战的语境下探讨这些永恒的关切，我们力求拓展柏拉图、阿伦特、罗尔斯以及众多其他思想家所奠定的基础。

同时，我们认为这一悠久的传统可以通过当代认识论的工具得到丰富。杰拉尔德·高斯（Gerald Gaus）在其1996年出版的《证成自由主义》

（Justificatory Liberalism）一书中曾感叹道：“认识论学者和认知心理学家的的工作几乎完全被当代政治哲学家所忽视。”他将此视为“一个严重的错误。”¹² 我们的目标是弥合这一鸿

沟，并展示加强这些研究领域之间对话所能带来的互惠益处。

我们编写本书时，力求使其对本科生、研究生、大学教授以及（我们希望）任何对政治的认知维度感兴趣的人都易于理解。虽然具备一些哲学背景可能会提升您的阅读体验，但这并非绝对必要。我们的目标是吸引广泛的读者群体，包括心理学家、社会科学家，以及其他对知识与政治交汇领域感兴趣的人士。此外，我们设想本书在学术环境中可服务于多种用途；例如，它既可作为相关专题课程的核心教材，也可作为政治哲学、认识论或政治理论课程的补充读物。在课堂之外，我们希望本书能激发人们就如何理解当代政治议题展开深入而富有思考的讨论。

章节概览

本书共十章，每章聚焦政治认识论的一个关键领域。尽管并非面面俱到，但各章旨在涵盖广泛的主题，包括真理在政治中的作用、民主的认识论、

政治上的无知与非理性、政治信念的本质、分歧与极化，以及专家在民主制度中的角色。每章均为独立成篇，读者可按任意顺序阅读。同时，本书的结构也使各章内容循序渐进，后一章建立在前一章的基础之上。此外，各章还在不同主题之间建立联系，凸显出政治认识论领域所涉及的问题与挑战彼此交织、相互关联的本质。

第一章《真理与政治》探讨了政治与真理之间紧张而复杂的关系。该章强调了真实信念对民主社会至关重要的若干原因，例如使公民能够获得充分信息、促使领导人承担责任，以及防止暴政。然而，它同时也揭示了真理主张如何被用作政治支配的武器。本章审视了政治领域中针对真理的诸多哲学挑战，包括对客观政治真理是否存在、人类是否有能力认识这些真理，以及如何识别真正专家等问题的质疑。最后，本章对“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后真相’时代”这一说法进行了批判性考察，并得出结论：真理对民主依然至关重要。

第二章《认知民主》探讨民主制度是否必须做出明智的选择才能具备正当

性。该章将“民主必须公平且具有代表性”这一观点与“民主必须做出良好决策”这一观念进行对比。本章讨论了各种认知民主理论，这些理论认为，投票和审议等民主程序能够汇聚公民的集体智慧，从而带来更优的结果。最后，本章强调了一个核心挑战：如何构建一种对民主正当性的证成，使其在良好决策所具有的认知价值与公平性和包容性的重要性之间取得平衡。

第三章《重新审视认知民主》探讨了对民主的认知理论所提出的重大批评。本章开篇提出一个两难困境，指出通过认识论来证成民主可能适得其反。随后，本章考察了多种回应方式，包括直接尝试化解这一困境，以及认知民主的替代理论。此外，本章还探讨了基于超越真理的认知目标

（如合理信念、反思性认可和理解）对民主的证成。尽管承认认知因素在理论上或许能够证成民主，但本章最后指出，选民的无知与非理性等现实问题可能会削弱民主所声称的认知价值。

第四章《政治无知》探讨了选民中普遍存在的政治知识匮乏现象。本章区

分了知情公民、不知情公民和错误知情公民，认为错误知情的公民比单纯的无知公民对民主更具危害性。随后，本章考察了人们对政治无知的担忧是否被夸大，以及选民是否有权保持无知。此外，本章还探讨了政治无知是否具有理性，尤其是在任何一票产生实际影响的概率极低的情况下。接着，本章进一步思考，相较于理性无知，策略性无知或许更能解释为何许多选民处于错误认知状态。最后，本章得出结论：选民普遍的无知对民主制度的正常运作构成了根本性挑战，并简要勾勒了缓解这一问题的若干途径。

第五章《非理性与偏见》探讨了政治如何损害我们理性思考的能力。本章考察了党派偏见，揭示了我们的政治身份如何扭曲我们收集和解读信息的方式，以偏向我们希望得出的结论。或许令人意外的是，更高的政治知识水平和智力往往加剧而非减轻这种偏见，通常情况下，信息最充分的党派人士反而最为固执己见、立场极端。本章还探讨了党派偏见是否可能是一种“理性非理性”（rational irrational-

ity) 的表现，并直面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非理性是否在政治光谱上分布不均。最后，本章提醒人们，在政治讨论中应谨慎将他人贴上“非理性”的标签，因为这种做法可能加剧政治极化和政治功能失调。

第六章《政治信念》挑战了有关人们如何形成政治信念的传统假设。该章认为，许多政治信念的主要目的并非追求真理，而是作为对群体忠诚的社会信号。本章探讨了人们是否经常佯装持有某种政治信念以彰显对政党的忠诚，并指出政治分歧可能并不如表面看来那般深刻。此外，该章还提出，许多选民缺乏连贯的意识形态，而是在当下临时拼凑出政治观点。这些见解对民主制度的基础提出了质疑，尤其是对“政府应当回应公民偏好”这一观念构成了挑战。最后，本章呼吁根据政治思维的这些复杂现实，重新构想民主进程。

第七章《政治分歧》探讨了政治分歧的成因与意义。该章将这些分歧描述为普遍存在、持续不断、充满对抗性，并且围绕着看似互不相关的议题聚集。本章挑战了“分歧源于价值观或

事实信念差异”的观点，转而提出党派忠诚往往塑造了这些信念。本章还探讨了涉及互不相容的规范性框架的“深层分歧”，并反对那种认为我们应放弃理性辩论而诉诸非理性说服的观点。此外，本章思考了应如何对待与同侪之间的分歧，指出党派人士很少将对手视为认知上的对等者，同时警告不要轻易否定他人。

第八章《极化与党派主义》探讨了政治极化的本质、成因、后果及其认识论地位。本章区分了意识形态极化、情感极化、群体极化和信念极化，并考察了党派媒体、政治领袖和地理分群等关键驱动因素。本章评估了极化是否可能具有认识论上的合理性，结论是：在现实政治中，极化往往是非理性的。本章还讨论了极化带来的种种危害，从不容忍与暴力，到政治僵局与民主衰退。然而，本章也指出，极化可能是某些群体在不公正体制下争取平等过程中所产生的副产品，这一观点挑战了将当前政治问题归咎于极化的主流叙事。

第九章《信任与专业知识》探讨了专业知识、信任与民主之间错综复杂的

关系。本章论述了公众对专家信任的所谓危机，以及民主原则与专家权威之间潜在的冲突。文中考虑了一些解决方案，例如将角色分工：由公民确定社会目标，而由专家寻找实现这些目标的途径；同时也指出，要将事实与价值截然分开存在困难。本章审视了对专业知识的不同理解及其对民主理论的影响，讨论了如何识别专家，并区分了人们对政治专业知识持怀疑态度的各种根源。此外，本章还阐释了事实与价值相互交织的情形如何可能为带有党派色彩的信任与不信任模式提供正当性。最后，本章强调了“自己动手做研究”和独立思考这类呼吁所蕴含的希望与陷阱。

第十章《重思民主》对比了两种应对民主制度认知缺陷的路径：一是将政治影响力限于最具能力者（即“认知精英统治”，epistocracy），二是通过随机抽选赋权普通公民（即“抽签制”，sortition）。本章探讨了五种认知精英统治模式：限制选举权、复数投票制、选举权抽签、认知精英否决权以及“开明偏好投票”。随后，本章考察了针对认知精英统治的一般性批

评，例如不公平地排斥弱势群体成员以及权力滥用的风险。本章还讨论了一些乐观的提案，如“抽签民主”

（lottocracy）和“开放民主”（open democracy），这些提案旨在提升公民在自治中的参与度。尽管承认这些提案在认知层面的益处，本章也提出了对其的若干担忧，包括立法缺乏连贯性、精英俘获、问责缺失以及盲目顺从等问题。最后，本章强调，若我们希望充分发挥民主的认知潜力，就有必要认真考虑替代性的政治安排。

未选择的路

尽管我们已尽力涵盖政治认识论中的各种主题，但许多内容不可避免地被遗漏了。我们将通过强调几个未能深入探讨、却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领域来结束本文。

首先，我们尚未深入探讨知识、权力与压迫之间的关系，包括关于立场理论（standpoint theory）、认知不正义（epistemic injustice）以及无知认识论（epistemologies of ignor-

ance) 的相关研究。这些主题虽然与政治认识论密切相关且意义重大，但出于两个原因被省略了。其一是因为它们主要阐明了认识论概念本质上具有政治性，而这超出了我们关注的“政治如何具有认识论性”这一焦点。此外，目前已有大量关于这些主题的综述和导论性文献。

其次，尽管我们认识到虚假新闻和社会媒体认识论等问题的重要性，但本书并未对这些议题进行深入探讨。我们做出这一决定主要基于三个因素：篇幅有限、我们聚焦于基础理论问题，以及这些问题本身正在快速演变。虽然这些话题偶尔会有所涉及——尤其是在我们讨论选民无知和政治极化时——但要进行全面论述，则需要大幅增加篇幅，且由于媒体与技术环境日新月异，相关内容可能很快就会过时。因此，我们选择专注于那些具有持久价值的原则，这些原则能够为分析政治认识论中的历史与新兴挑战提供一个坚实框架。我们相信，这种做法将为读者提供必要的理论工具，使其能够批判性地应对各种议

题，包括由我们快速变化的信息生态系统所带来的挑战。

出于类似的原因，我们有意避免将我们的分析过于紧密地锚定于近期的政治事件，例如唐纳德·特朗普的（连任）当选和英国脱欧。我们的目标是探讨持久性的问题和深层现象，而非其短暂的当代表现形式。尽管我们偶尔会援引当前的政治事例来阐明关键概念，但我们的主要关注点仍在于哲学分析和基础性问题。

政治认识论领域充满着进一步探索与研究的机遇。尽管本书力求涵盖重要议题，但我们未能涉猎若干令人振奋的领域，而这些领域为未来学术研究提供了富有前景的方向。这些方向包括：探究认识论德性与恶习在政治中的影响、市场在知识生成与分配中的作用、非理想理论与理想理论之间的互动，以及揭示经典认识论问题与其政治意涵之间更深层次的关联。例如，未来的研究可以考察认识论中的内在论或外在论何者能为政治语境中的证成提供更合适的理论；政治信念如何契合经典的知识标准与利益敏感型知识标准；以及个体信念持有者应

如何在一个充满敌意的认识论环境中调整其信念形成实践。这些探究代表了政治认识论的新拓展，将传统认识论争论与紧迫的政治关切带入对话之中。

这份清单仅初步触及了认识论工具如何应用于政治现象。我们希望本书能激励读者更深入地探究我们所选择探讨的主题，以及那些我们未能详尽论述的内容。

注释

1. 新科学家2017年。
2. Brooks 2020; Nyce 2020; Roberts 2017。
3. Brooks2020。
4. Nyce2020。
5. Roberts2017。
6. Edenberg 和 Hannon 2021; Hannon 和 de Ridder 2021。
7. Mill1838。
8. 萨马尔日亚和卡萨姆，2023年。
9. 弗里德曼2014年。

10. 以诺2017。

11. NewScientist2017。

12. Gaus1996: vii。

1 真理与政治

DOI:10.4324/9781003089483-2

在我们丧失对真理价值之感知的程度上，我们无疑会失去某些东西，甚至很可能失去一切。——伯纳德·威廉姆斯，《真理与真诚》

引言

在《21世纪的21堂课》中，尤瓦尔·赫拉利写道：

1905年，一位名叫金吉基蒂勒·恩瓜莱（Kinjikitile Ngwale）的东非灵媒声称自己被蛇灵洪戈（Hongo）附体。这位新先知向德属东非殖民地的人民传达了一条革命性的信息：团结起来，驱

逐德国人。为了使这一信息更具吸引力，恩瓜莱向追随者提供了一种据说能将德国子弹变成水（斯瓦希里语中“水”为maji）的魔法药物。由此，马及马及起义（Maji Maji Rebellion）爆发了。然而起义失败了，因为在战场上，德国人的子弹并未化为水，反而无情地撕裂了装备简陋的起义者们的身躯。

马吉马吉起义提供了若干重要教训，但其中或许最为关键的一点是：真实的信念至关重要。扭曲的现实认知会危及我们的生存、繁荣能力，以及几乎所有人类事业的追求。

真实信念对人类生活至关重要；然而，公共领域却充斥着虚假信息和宣传。政客们将谎言当作事实兜售，又将事实斥为谎言。社交媒体用户传播假新闻的速度之快、范围之广，前所未有。党派记者有选择性地报道事实。公民在信息茧房中被思想禁锢，无法超越自身信念。阴谋论者侵蚀人们对科学的信任，而民粹主义领导人则在关键民主制度中播撒怀疑。我们的信息环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敌

意。我们似乎正生活在一个“后真相”世界中。

我们都听过这个说法。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主导叙事是：民主正面临一场认识论危机。《纽约时报》的戴维·布鲁克斯（David Brooks）称：“我们生活在一个处于认识论危机中的国家。”²《波士顿评论》（Boston Review）的迈克尔·P·林奇（Michael P. Lynch）表示，我们正“经历一场认识论危机。”³最引人注目的是，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在接受《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采访时说：“我们正在步入一场认识论危机。”⁴这不仅是一种美国现象。全球范围内，人们日益担忧真相的消解、错误信息的蔓延以及政治信念的极化。我们是否正面临一场根深蒂固的认识论危机？许多人确实如此表述。然而，我们应当记住，政治与真理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就充满纠葛。正如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提醒我们的那样：“真理与政治之间的冲突故事，由来已久且错综复杂。”⁵

真理与政治之间这种充满张力的关系，在整个政治思想史中显而易见。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因其煽动性的歪曲再现而将诗人及其他艺术家逐出他的理想社会。然而，他也认为，唯有借助一个宏大而崇高的谎言将真理加以遮蔽，真理才能引导我们。对柏拉图而言，理想的政治领袖拥有通达真理的终极途径，但为了维护社会秩序，他们有理由传播一种神话。在《君主论》中，尼科洛·马基雅维利声称，统治者为了实现目标并维持国家稳定，常常有必要欺骗他人并操纵真相。在《真理与政治》一文中，阿伦特指出：“据我所知，从未有人将诚实列为政治美德之一。”⁶ 在2005年诺贝尔奖演讲中，英国剧作家哈罗德·品特宣称：“大多数政治家……关心的并非真理，而是权力以及对这种权力的维系。”⁷ 而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则有力地提醒我们：真理乃是极权政体的主要牺牲品之一。

在本章中，我们探讨政治与真理之间复杂的关系。尽管关于真理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的讨论与政治哲学本身一样历史悠久，但我们的目的并非对该问题及其历史渊源进行全面概述。相反，我们将着重阐述一些关于真理在

政治中应有作用的持久哲学关切与观点。

1 什么是真理？

在《新约》的《约翰福音》中，耶稣宣称自己是“真理的见证人。”⁸ 彼拉多则 famously 反问道：“真理是什么？”

彼拉多这句话的含义存在争议。一些人认为，这句话是出于戏谑，暗示这场审判是一场闹剧。另一些人则认为，他是在评论辨别真相之难。无论其本意如何，哲学家们都曾认真尝试通过分析“真理究竟是什么”来回答他的问题。

关于真理的本质，存在各种哲学观点。最常见的解释是**符合论**（correspondence theory），它简单地认为，真理就是与现实相符合的东西。相比之下，**融贯论**（coherence theory）强调内在一致性和逻辑融贯性作为真理的基础：一个陈述或命题若能与特定框架内的其他陈述和谐一致，就被视为真。根据**紧缩论**

(deflationism)，真理并非一种实质性的属性或深刻的哲学概念，而只是语言中一种琐碎或冗余的特征。断言某个陈述“为真”，只不过是断言该陈述本身，并未增添任何实质内容。最后，**实用主义理论** (pragmatist theories) 主张，真理是一种帮助我们应对和驾驭世界的工具：“真”的观点是那些经得起集体检验的观点。真理并非一种抽象或静态的属性，而是一种用于行动、解决问题和协调合作的实践指南。

尽管这些观点存在争议，但采纳某种关于真理本质的特定哲学理论，不太可能解决有关真理的政治关切。这是因为政治争端并不取决于对真理的抽象理解，而是源于在证据、权威和信任方面的更深层次分歧。在政治领域，即便我们在真理理论上达成一致，仍可能就如何确立真理、由谁来判断真理，以及哪些知识来源是可靠的等问题产生分歧。因此，要应对有关真理的政治关切，仅承诺接受某一种哲学理论是远远不够的。归根结底，解决有关真理的政治争端，需要处理在证据、权威和信任方面的根本

冲突，而非仅仅依赖抽象的真理哲学理论。基于这一原因，我们将采用一个简单的定义，借用伏尔泰的话：“让我们暂且这样定义真理——在等待更好的定义出现之前……真理就是对事实本来面目的陈述。”⁹

2 为何真相对民主至关重要

真相在政治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任何政治体制中，获取真相都能使公民理解政治决策、追究领导人的责任，并抵制暴政。然而，真相在民主环境中可能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当权力分散且公民参与决策时，对真相的需求就变得更加突出。民主依赖于能够做出知情决策的选民，正因如此，它尤其容易受到真相被侵蚀的影响。因此，在民主环境中，真相与真诚尤为珍贵。

尽管真理在民主社会中至关重要，但民主的理想与对真理的追求之间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一些人认为，民主若要具备合法性，就必须以真理为目

标；而另一些人则主张，民主理想与我们的认知目标（例如求真）存在冲突。我们稍后将回到这一争论。目前，我们希望强调几个相互关联的原因，以说明真理在任何民主制度中都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1. 知情选民的必要性 一个运作良好的民主制度需要具备知情权的公民。获取真相使公民能够就政府及其代表作出明智的决定，从而更好地参与民主进程。如果无法获取真相，公民就无法就如何投票或支持哪些政策作出有充分依据的判断。信息匮乏的公民甚至可能投票支持违背自身利益的政策或政客。
2. 问责的必要性 政治领导人经选举产生，旨在服务公共利益。为确保他们切实履行职责，我们必须监督其行为，评估其政策成效，并对其失职行为追究责任。这要求选民能够获取准确的信息。新闻自由、透明度以及监督机构在揭露不当行为和政策低效方面至关重要，以

确保领导人始终对其所服务的公众负责。

3. 防止暴政的必要性 公众对真相的忠诚是对抗暴政的保障。政府常常从事错误或无能的行为，并有动机加以隐瞒。公民必须能够监督和监察这些行为。要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能够获得准确的信息。如果我们了解政府正在做什么，它们就更难以逍遥法外、施行腐败与暴政。因此，诚实求真是约束暴君、防止腐败所必需的。

10

4. 有意义的公共讨论之必要性 公民要进行有意义的公共讨论，离不开真理与真诚，而许多人将这种讨论视为民主社会的基石。民主包含开放的论坛、热烈的辩论以及公开的言论，这体现了一种协商式民主的理念（参见第二章）。真理与真诚之所以是公共讨论中不可或缺的要害，是因为它们确保了所交流的思想与信息准确可靠。
5. 自由之必要 真理乃自由之所必需。正如伯纳德·威廉姆斯

(Bernard Williams) 所言：“信息的伪造或压制本身就是对自由的一种重要限制，并且会阻碍自由在诸多领域的行使。”¹¹ 首先，剥夺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直接侵犯了自由，例如侵犯了人们的信息权。其次，这种行为还会削弱其他领域的自由，因为有效的行动必须以准确的信息为基础。第三，虚假和扭曲的信息曾被用来为那些损害个人自由的政策辩护。例如，在冷战期间，苏联利用宣传鼓吹社会主义乌托邦的理念，并将西方描绘成腐败堕落的象征。此类宣传被用来为审查制度、政治压迫以及压制异议提供正当理由。

6. 政治合法性之必要 缺乏真相会削弱政治体系的合法性。政治合法性指的是公众对政治权威的认可与接受，视其为正当有效。当政治领导人和机构以透明、诚实和正直的方式运作时，他们更有可能赢得公众的信任与支持。相反，当政治领导人撒谎或歪曲事实时，其合

法性便会受到质疑。如果公民无法相信其领导人会讲真话，他们可能会变得愤世嫉俗，并疏离于政治进程之外。

上述考量表明，公众拥有“知情权”并有权获取相关信息。¹² 这项权利基于若干核心理念，包括：需要作出知情决策、使政府官员承担责任、促进有意义的公共讨论、防止权力滥用、增进公众信任以及保护自由。知情权并不意味着政府有义务将其所做的一切都告知公民。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存在正当理由对特定信息保密，例如为了保护国家安全或个人隐私。然而，政府确实有责任向公民提供与其生活及民主制度运作相关的信息。

3 对真理的攻击

一个蓬勃发展的民主制度需要获得真相的渠道以及崇尚真实的文化。然而，近年来，对真相的忠诚正遭受攻击。这种攻击来自两个方向。其一是对真相的哲学性攻击，该观点认为，政治真相这一概念即便不是完全多

余，充其量也是不必要的，而往最坏处说，则是政治支配的工具。其二是对真相的政治性攻击，即当公共领域充斥着错误信息和虚假叙事，以压制真相之时。¹³ 我们将依次讨论这两种攻击。

3.1 政治中无需真相

在《政治自由主义》中，约翰·罗尔斯认为，当涉及他所谓的“整全性学说”（comprehensive doctrines）所引发的深刻争议性问题时，“真理”这一概念并不适合作为解决政治决策的范畴。这些整全性学说包括道德、宗教和政治的世界观。罗尔斯指出，在一个多元社会中，公民对于这些整全性问题总会持有相互竞争但又合理的不同观点。为了避免偏袒某一种观点而压制其他观点，他主张政治决策不应依赖于这些存在争议的“真理”。基于这一理由，他（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误导性地）声称自己所倡导的政治哲学“无需诉诸真理概念”。¹⁴

在《真理与政治》一文中，阿伦特预见到了罗尔斯对在政治中诉诸所谓“真

理”的担忧。¹⁵ 在政治领域，人们通常接受道德与政治价值的多元性。我们预期价值观和观点会有所不同，而理性的公民也明白，善意之人完全可能在道德与政治问题上存在分歧。¹⁶ 因此，若带着在道德、宗教和政治问题上达成理性共识的期望进入政治领域，将是不合理的。事实上，诉诸自己所偏好的学说之“真理”，可能与自由主义立场不相容。阿伦特认为，对此类事务的合理分歧并非与政治相悖，反而是政治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

我们如何能在不诉诸真理的情况下评估道德与政治主张？罗尔斯旨在构建一个民主审议的框架，以容纳多元主义，并避免任何特定的道德、宗教或哲学学说占据主导地位。他认为，公民应通过识别那些不预设任何特定真理观的共享价值与原则，来寻求在政治事务上达成合理且公平的共识。例如，人们不能以某一特定宗教教义的真理性来证成某项政治政策，因为其他人可能有充分理由拒绝这些宗教信念。支配我们共同生活的道德或政治规则，必须能够向所有受其约束的理

性之人证明其正当性。这就要求使用“公共理由”——这些理由对任何特定的争议性学说之真理性持不可知态度。

人们争论罗尔斯是否成功地为民主决策提供了一个可靠的基础，同时避免诉诸有争议的真理。许多批评者认为，这种做法存在严重缺陷，甚至自相矛盾。¹⁷ 他们主张，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实际上需要对真理作出承诺，而排除真理概念会导致不连贯。一些人为罗尔斯辩护以回应这一批评，另一些人则辩护了诉诸有争议的宗教、道德和哲学学说的可容许性。¹⁸ 尽管存在这些批评，罗尔斯对公共理性的辩护仍持续影响着当代政治哲学，并塑造着关于民主理论、政治合法性以及真理在政治中所扮演角色的讨论。

3.2 真理作为政治支配的工具

许多暴行都是以真理之名犯下的。正因如此，罗尔斯也担忧那种常常伴随人们对真理之信念而出现的危险“狂热”，这种狂热导致人们“不懈地奋

斗，试图让全世界接受全部真理。”¹⁹ 纵观历史，我们处处可见围绕真理展开的斗争。那些手握权力且信念坚定之人，曾利用对真理的宣称，为人类历史上一些最令人憎恶、邪恶且压迫性的行径提供合法性。

所谓白人至上的“真理”为奴隶制、吉姆·克劳法和帝国主义提供了道德辩护。20世纪30年代，许多德国人相信雅利安种族的优越性。大屠杀、苏联古拉格劳改营以及柬埔寨的杀戮场都令人不寒而栗地提醒我们：对“真理”的宣称甚至可能“超越宗教信仰所造成的破坏”，包括以基督教真理之名实施的暴力、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和神圣十字军东征。对“真理”的宣称，已成为我们历史上最危险、最强大的武器之一。正如米歇尔·福柯所言：

回溯我们人类行为最深远的源头，“真实言语”是一种鲜有人能抗拒的力量。从最初之时起，真理便是人类最强大的语言武器之一、最丰沛的权力源泉之一，以及最稳固的制度基石之一。²¹

尽管对真理的诉求有时可能会不恰当地限制各种声音和观点的范围，但完全放弃对真理的追求却是危险的。正如奥威尔所强调的，真理对于维护个人自由、捍卫民主价值观，以及防止他在有生之年所目睹的那种压迫与暴政至关重要。奥威尔亲眼目睹了政府及其他强势机构如何操纵信息、欺骗公众。若缺乏对真理的坚守，人们便更容易遭受操控与压迫。因此，奥威尔认为，记者和活动人士有责任揭露谎言，向权势讲出真相。

3.3 真相的承诺与风险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探讨了两种关于政治中真理的忧虑。第一种忧虑是，诉诸真理对于政治目的而言可能过于分裂且极易引发激烈争议。正如罗尔斯所言：“将一种政治观念视为真理，并仅凭这一点就将其作为公共理性的唯一适当基础，这种做法具有排他性，甚至带有宗派色彩，因而很可能加剧政治分裂。”²² 第二种忧虑则认为，真理会扼杀争论、分歧与审议，而这些恰恰是政治生活的本质。需要注意这两种论点之间的区别：第

一种观点认为诉诸真理会引发过多的辩论与争议，而第二种观点则认为它会压制辩论与争议。²³

不可否认，真理主张常常被用作政治支配的工具。那些自认为独占真理、并将持不同意见者视为正义障碍的人，可能会试图将某种特定的生活方式强加于他人，并赋予那些被认为拥有特殊真理渠道的人以特权。然而，我们至少有两点理由坚持在政治中追求真理的承诺。

首先，我们不必将真理视为“一位帝国征服者，以烧杀抢掠的方式横扫一切，直至彻底支配眼前所有事物。”²⁴ 那些批评政治话语中谈论真理的人，似乎预设了一种非常特定的观念，即真理必须扮演一种绝对知识的角色，以此为依据告诉人们应当如何行事。然而，我们对真理可以抱持更为谦逊的态度。此外，我们不应将借真理之名所犯下的暴行归咎于真理本身，而应归咎于教条主义、偏执与不宽容。因为真理曾被用于邪恶目的就抛弃真理，就如同因为艺术曾被用于宣传 propaganda 就抛弃艺术一样。如果我们放弃对真理的集体承诺，后果可

能是深远而灾难性的。没有真理，历史就会沦为纯粹的神话。

其次，我们需要政治中的真相，以挑战现状、揭露不公，并让权力承担责任。在古希腊，雅典民主的一项基本要素是“parrhesia”，大致可译为“自由直言”或“大胆言说”。像阿里斯托芬这样的剧作家可以自由行使权利，讽刺他们想讽刺的任何人。然而，这种所谓的无限制言论自由也伴随着一定风险，包括可能被指控为不敬神。这正是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被处死的借口——他被控亵渎神明和败坏青年。

正如苏格拉底的案例所表明的那样，那些向权势讲真话的人往往因此而遭受惩罚。纵观历史，许多敢于质疑既有的“真理体制”（借用福柯的术语）的直言者，都付出了生命的终极代价。古埃及著名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和哲学家希帕提娅（Hypatia of Alexandria），因其异教信仰以及与亚历山大城政治对手的密切关系，被一群基督徒暴徒残忍杀害。15世纪，年轻的法国农家少女贞德（Joan of Arc）在百年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却因

被控异端而遭火刑处死。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因和平抗议种族不平等而入狱，后来更因其观点遭到暗杀。这些仅仅是众多求真者与直言者中的几个例子，他们的故事充斥于我们的历史典籍之中。柏拉图的“洞穴寓言”同样揭示了向权势讲真话的危险。柏拉图指出，当那位求真者在目睹真理之光后重返洞穴时，“如果他们能抓住[这样一个人]……他们定会将他杀死。”²⁵

4 对真理的政治攻击

我们现在转向对政治中真相的另一种攻击：错误信息的传播、大量无稽之谈的泛滥，以及利用宣传手段操纵和塑造公众舆论。近年来，国内外的党派宣传者成功制造了虚假的公共叙事，压制了真相。例如，有大量证据表明，俄罗斯政府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利用宣传手段操纵公众舆论，制造混乱与不信任。²⁶ 类似的担忧也出现在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竞选期间，当时虚假言论和夸大的统计

数据被广泛传播，尤其是在欧盟成员资格的财政影响、移民和主权等问题上。这些策略很可能影响了公众认知，并左右了一些人的投票决定。因此，现代政治话语充斥着关于“假新闻”、错误信息和“另类事实”的讨论，也就不足为奇了。

对事实的操纵和错误信息的传播对任何民主制度都构成严重威胁。在一个多元社会中，人们预期公民会持有不同的价值观和偏好。然而，党派分歧已从政治价值观扩展至对显而易见的事实问题的争执。²⁷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对事实真相的分歧比对价值观的分歧更令人担忧，也对民主构成更大的威胁。如果我们无法就事实达成共识，选民将无法追究其代表的责任，无法与他人进行富有成效的商议，也无法达成妥协。这些争端很可能源于对事实的操纵和蓄意散布虚假信息。

这种对真理的政治攻击与前文所述的对真理的哲学攻击有着重要的区别。根据哲学批判的观点，我们应当放弃在政治中诉诸真理。如果真理是不必要的（第3.1节），或是政治支配的

工具（第3.2节），那么我们在政治中停止谈论“真理”便是合理的。然而，对真理的政治攻击却不应导致我们放弃关于真理的言说，而应促使我们更加坚持其重要性。这正是奥威尔的观点所在：当真理遭到操纵性政治行为者的攻击时，捍卫客观真理的理念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至关重要。

4.1 真相的犬儒主义

这种对真相的政治攻击会带来哪些后果？要取得成功，这类大规模欺骗行为并不需要建立一个虚假被普遍接受的“反现实”。相反，政治欺骗可能会首先削弱我们相信真相的意愿。阿伦特写道：

人们早已多次注意到，洗脑最可靠的长期后果是一种奇特的犬儒主义——即绝对拒绝相信任何事物的真实性，无论这一真实性已被多么充分地证实。换言之，持续而彻底地以谎言取代事实真相所带来的结果，并非谎言被当作真理接受、而真理被污蔑为谎

言，而是我们赖以在现实世界中辨别方向的感知能力——其中“真与假”的范畴正是实现这一目的的精神手段之一——正遭到摧毁。

28

这种策略的一个例子是“谎言喷射”

(firehose of falsehood) 宣传手法。该手法通过新闻和社交媒体等各种渠道，以快速、重复且持续的方式大量传播信息，而几乎不考虑信息的准确性或一致性。²⁹ 这一策略最初是作为一种苏联宣传技巧而发展起来的，但在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执政期间，已演变为俄罗斯现代宣传的一种模式。这种方法的目的未必是让人们相信某个特定的谎言，而是让他们对真实报道产生怀疑。事实上，这可能是一种对公民实施“煤气灯效应”

(gaslighting) 的形式，通过操纵使他们质疑自身对现实的主观体验。³⁰

如果我们再也无法确定什么是真实的，那么我们可能会对“真理”本身变得愤世嫉俗。真理怀疑论者认为，我们无法分辨真假，要么是因为“持续的谎言……抽走了我们脚下的根基，又未提供任何其他立足之地”，要么是因

为对“存在一个我们可以认知和理解的客观现实”这一观念感到幻灭。³¹ 真理怀疑论的一个后果是，我们不再信任传统的信息来源，例如新闻业、媒体、科学或政府。当对真理的怀疑情绪扎根之后，它便会削弱我们对那些曾经赖以获取真相的公共机构的信任。

4.2 事实真理与理性真理

真理究竟是对政治构成威胁，还是受到政治的威胁，可能取决于我们所谈论的是哪种类型的真理。阿伦特区分了两种真理：事实真理与理性真理。尽管还可以作出许多其他区分——例如数学真理、科学真理、哲学真理、道德真理、历史真理、分析真理以及日常真理——但阿伦特聚焦于事实真理与理性真理之间的划分，因为这一区分对于评估真理在政治中应有的作用至关重要。

事实真理（factual truth）是指与世界上实际发生的事件或现实相符的陈述。它指的是独立于观点或解释而存在的事实，例如历史事件或科学数

据。阿伦特（Arendt）关于事实真理的主要例子是：“德国于1914年8月入侵比利时。”这是一个事实真理，因为它反映了一个可验证的历史时刻。它并非源自我们的头脑，而是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世界中。“事实真理”的证据通常以某种形式的证言

（testimony）呈现，例如目击者证词、记录、文件、纪念碑等。这类证据旨在证明所发生之事确实真实发生过。

相比之下，理性真理是那些“由人类心灵所产生”的真理。³³ 阿伦特举出的主要例子包括数学证明、哲学原理以及其他先验思维的发现。阿伦特还将科学理论（如相对论和进化论）以及规范性和道德真理（例如苏格拉底的原则：“遭受不义胜于施行不义”）纳入理性真理的范畴。理性真理基于理性与逻辑，而非经验观察。它们源于思维与演绎的原则，通常具有普遍性。

这一区分为何重要？它使阿伦特能够识别出真理与政治之间的两种不同张力。第一种是政治与事实真理之间的

张力，第二种是政治与理性真理之间的张力。

基于这一区分，阿伦特警示了两种特定的危险。³⁴ 第一种危险是否认真相，这可能发生在极权政体中，通过操纵信息和篡改历史来实现；甚至在民主社会中也会出现，当知识被简化为单纯的“意见”时（例如，否认气候变化被辩称为仅仅是“观点不同”）。第二种危险是压制辩论，当理性真理的主张被视为不容置疑时，便会扼杀道德与政治上的审议。换言之，阿伦特认为，某些真理（即事实真理）更容易受到政治的威胁，而另一些真理（即理性真理）则更容易对政治构成威胁。

阿伦特还指出，事实真相极其“脆弱”：它们仅在被记忆、记录或讨论的范围内才能存续。由于这种脆弱性，事实真相远比理性真理更容易遭到操纵和抹除。正如阿伦特所言：“事实真相在权力的猛烈攻击下得以幸存的机会确实微乎其微。”³⁵

为了说明事实真相的脆弱性，阿伦特举了列昂·托洛茨基的例子。托洛茨基

是一位俄国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在组织1905年俄国革命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弗拉基米尔·列宁去世、约瑟夫·斯大林掌权之后，托洛茨基被驱逐出苏联，他的名字也被系统性地从苏联历史教科书中抹去。这表明，事实真相可以被操纵甚至彻底删除，从而篡改历史。权力使个人和政府能够为了自身议程而改写或省略事实。对此，阿伦特说道：

事实与事件远比公理、发现、理论——即便是人类心智所构想出的最为天马行空的理论——更加脆弱；它们〔事实真相〕发生于人类事务不断变迁的领域之中，在这一变动不居的洪流里，唯一称得上恒久的，不过是人类心智结构所具有的那种公认相对的恒久性。一旦这些事实与事件失落，任何理性的努力都无法再将其复原。36

相比之下，她指出：“人类心智始终能够重现诸如毕达哥拉斯定理这样的公理化命题。” 即使所有几何学书籍都被毁掉，这些真理也不会被永久抹除，因为它们可以被重新发现和再

现。同样，像欧几里得几何、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或柏拉图的理念论这样深刻的发现，即便其作者“未能将其传之后世”或根本未曾存在过，也仍有“无限更大”的机会重新出现。37

阿伦特的观点并非认为，即使没有爱因斯坦，我们也能保证甚至很可能发现相对论。相反，她强调的是，发现（或重新发现）此类理论的可能性，远大于恢复那些已被谎言掩盖或抹除的事实真相。事实真相“不仅可能暂时被操纵出这个世界，甚至可能永远消失”。这一点尤其令人担忧，因为阿伦特断言：“在政治上最具相关性的真理就是事实性真理。” 这类真理对于维系共同现实、确保问责制以及抵制意识形态支配至关重要。38

5 有政治真理吗？

所有这些关于真理的讨论可能会让一些读者感到恼火。他们可能会争辩道：“在政治上应当做什么，并不存在客观真理；关于何为公共利益，也不存在确定的事实。”哲学家玛格丽特·

麦克唐纳（Margaret MacDonald）精辟地表达了这种担忧：“断言‘自由优于奴役’或‘人人生而平等’并非在陈述一个事实，而是在选择立场。它宣告的是：这就是我的立场。”³⁹

请考虑以下一系列主张，并问问自己：它们是否真的属于那种可以为真或为假的陈述？

- “平权行动是解决历史不公在道德上最佳的方式。”
- “我们应该开放国界，允许人员自由流动。”
- “英国脱离欧盟是最好的选择。”
- “应允许跨性别女性参加女子体育比赛。”
- “封锁是应对新冠疫情最有效的方式。”

许多人认为，这类陈述并非那种可以客观地判定为真或假的命题。当某人说“英国退出欧盟是最好的选择”时，这一主张可能并不具备普遍、客观的真值，因为人们是否同意它，最终取决于他们如何权衡各种成本与收益。

这是关于真理与政治的争论中一个常见的关切。政治学家约翰·基恩（John Keane）警告人们不要不加批判地诉诸“真理”，并批评那种认为真理“就在那里”，作为一种超越地域、时代和主观性的存在。⁴⁰ 基恩认为，政治中并不存在客观或绝对的真理。他反对一种有时被称为“大写的真理”（Truth with a capital T）的观点。持这种反对立场的人往往认为，政治判断无所谓真假；它们不过是个人的偏好的表达，就像选择草莓冰淇淋而非巧克力冰淇淋一样。

这被称为政治非认知主义（political non-cognitivism）。该观点的支持者认为，政治判断并不具有客观的真值。当我们同意或不同意诸如“我们应当开放国界”这类陈述时，我们并非在做出事实性主张；而只是在表达赞成或反对的态度。这类似于为某支运动队欢呼或喝倒彩，或者宣称自己更喜欢草莓味而非巧克力味的冰淇淋。从这一视角来看，当我们就平等或正义等议题发表政治主张时，实际上是在表达诸如“平等万岁！”或“不公可耻！”之类的情感。根据这种观点，政

治陈述并非客观事实，而是情感、偏好或个人承诺的表达。

如果政治非认知主义是正确的，那么就不存在一个凌驾于政治过程之上的独立真理标准。我们无法合法地诉诸于“好”或“正确”的结果，因为据称根本不存在这类东西。那么，我们应当诉诸什么呢？许多人建议，我们必须诉诸政治体系的程序性价值，例如平等或公平。在第二章中，我们将考察仅凭程序性价值是否足以奠定一种规范性的政治观。根据纯粹程序主义者，政治决策的正当性取决于作出这些决策所采用的程序，而与其所产生的结果是否真实或准确无关。

然而，那些倾向于政治非认知主义的人可能会试图以某种方式挽救“政治陈述在某种意义上可以为真或为假”这一观点。要为“真”的谈论进行辩护，并不需要承诺一种强形式的道德或政治实在论——后者主张价值独立于人类主观性而存在。相反，我们可以提供一种更为极简主义的“真”之解释，使之与非认知主义相容。例如，西蒙·布莱克本（Simon Blackburn）主张，道德陈述并不表达与客观道德事实相

对应的命题，但他仍认为道德陈述可以被评价为真或假。⁴¹ 我们所说的“正确”或“恰当”的决定，或“真理”，可以涵盖多种含义，从客观真理到更具主体间性、文化依赖性且暂时性的建构皆可。如今，很少有哲学家坚持认为我们完全不能以“真理”的术语来谈论道德或政治话语。⁴²

但即使我们认为政治主张本身无所谓真假，它们仍可能基于一些可判定真假的主张。例如，假设你基于对希拉里·克林顿在具体案例中行为的描述性陈述，而赞同“希拉里·克林顿是个腐败的政客”这一评价性判断。这些描述性陈述本身仍可被评估其真假，而且只有当它们为真时，你的评价才是恰当的。正如埃里克·奥尔松（Erik Olsson）所指出的：

一般来说，我们之所以认为某些事物是好是坏，是因为我们对这些事物持有某些信念。因此，我们可能会认为某件事物是好的，因为我们相信它会增加我们的财富或使我们更快乐。如果经过更仔细的审视，发现这些信念原来

是错误的，我们往往会收回对该事物最初的积极态度。43

因此，真理在道德和政治判断中仍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否合理地支持此类判断，取决于事实陈述的准确性，而事实陈述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

6 政治真理可知吗？

区分政治非认知主义（一种形而上学论题）与政治怀疑论（一种认识论论题）十分重要。与政治非认知主义不同，政治怀疑论并不否认政治真理的存在；相反，它否认我们有能力认识这些真理。政治怀疑论者认为，由于我们的认识局限，我们无法获得对道德或政治世界之事实的认知通达。

有两种方式可以解释这一主张：44

弱政治怀疑主义 在政治问题上，很难知道正确的答案。

强烈的政治怀疑主义 在政治问题上，不可能知道正确的答案。

许多人会接受一种较弱的政治怀疑论。政治问题往往十分复杂，可获得的证据常常不完整或模棱两可，而且在评估相互竞争的主张时需要考虑诸多因素。然而，强形式的怀疑论则更具争议性。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曾著名地为这一观点辩护，他认为：

我论证的基本前提是：除非你一旦获得某物便能认出它，否则你就无法以它为目标，也无法努力去获得它。真理与证成之间的一个区别，就在于不可识别之物与可识别之物之间的区别。我们永远无法确知某个信念是否为真，但我们能够确知的是，目前没有人能再提出任何剩余的异议，所有人都同意应当持有这一信念……因此，我认为真理这一话题无法与民主政治相关联，致力于民主政治的哲学家应当专注于证成问题。45

罗蒂声称“我们永远无法确定某个特定信念是否为真”，这表明他捍卫的是政治怀疑论的强版本。

在《政治自由主义》中，罗尔斯似乎捍卫了一种弱版本的政治怀疑论。他主张，由于“判断的负担”（the burdens of judgment），我们无法就谁掌握了真理达成一致。⁴⁶ 这些负担是一系列认知和实践上的局限，阻碍人们在道德与政治问题的真理上达成共识。这些负担包括：

- 证据的复杂性；
- 分配证据时相对权重的差异；
- 关键概念固有的模糊性；
- 不同生活经历对证据评估的影响；
- 一个问题正反两方面的各种规范性考量；
- 在相互冲突的珍视价值观之间进行选择的困难。

罗尔斯并未断言不存在真理（即政治非认知主义），也未声称无人能够认识这些真理（即强政治怀疑论）。相反，他认为，作为会犯错的生物，我们在判断负担下极易产生认识上的错误，而这些错误在给定条件下完全是合理的。

6.1 我们能认识认识者吗？

或许存在一些政治真理，而且有些人知道这些真理。然而，我们仍可能担忧无法知道谁掌握了这些真理。这种观点比起怀疑政治知识是否存在而言，争议要小得多。正如埃斯特隆德（Estlund）所指出的：“说我们无法知道谁是知者，肯定比说我们无法知道任何事情争议要小。”⁴⁷

对识别“认知者”（knowers）的怀疑存在于多个层面。即使有些人具备识别政治专家的能力，我们仍需弄清楚这些人究竟是谁。这是一个认识论问题，因为正如埃斯特伦德（Estlund）所言：“没有任何认知者是如此可知，以至于能被所有理性之人所公认。”⁴⁸ 问题并非在于认知者完全无法被识别，而在于理性之人不可避免地会对谁是认知者产生分歧。即使某些人确实在政治事务上更为睿智或知识更丰富，我们仍可能怀疑是否存在一种公开可及的标准来识别这类人。⁴⁹

假设我们都能就“谁最了解情况”达成一致，那么智者是否就拥有特殊的统治权利呢？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认为确

实如此。柏拉图曾著名地主张，“哲人王”具备必要的知识，因此应当统治。

（我们将在第10章讨论这一观点。）相比之下，苏格拉底并非专制主义者：他否认任何人真正拥有所需意义上的智慧。尽管他并未否认政治相关真理的存在，但他质疑是否有人实际上掌握了这些真理。简言之，他对政治知识持怀疑态度。然而，我们现在可以看出，苏格拉底其实还有另一种回应方式：与其说“不存在真正知道的人”，他本可以主张“我们无法识别出谁是真正知道的人”。

总之，有必要区分两种主张。第一种主张认为，我们无法获知政治真理，至少无法轻易获知。第二种主张则认为，我们无法就“谁是知者”达成共识。认识到第二种主张非常重要：它不仅比第一种主张争议更小，而且还能解释人们为何对承认政治专家的存在心存抵触——尤其是当这种承认被视为意味着专家拥有统治权时。如果我们无法就谁是知者达成一致，那么他们显然就不能对我们拥有合法的权威。埃斯特隆德（Estlund）的观点（我们将在第二章中再次讨论）是：

“任何人都不能在缺乏一种所有合格观点都能接受的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对他人拥有权威或合法的强制权力。”⁵¹ 因此，承认政治真理或知者的存在，并不一定意味着认可他们拥有统治的权威。

7A 对政治中真理的谦逊辩护

尽管某些政治真理的存在性与可知性尚存争议，但至少有两种方式可以捍卫真理在政治中的重要性。首先，我们无法合理地否认那些具有政治相关性的纯粹事实性事项的存在性与可知性。⁵² 这些事实包括：

- 疫苗在预防许多传染病方面是安全且有效的。
- 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有显著影响。
- 在美国，非法移民实施暴力犯罪的比率并不显著高于合法公民。
- 饮用家用消毒剂并不能使人对 COVID-19 产生免疫力。

这类事实真相在塑造政治决策和政策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否认或忽视这些事实，会破坏知情治理的根本基础。

第二，尽管在政治中识别正确答案可能颇具挑战性，但我们肯定可以排除那些明显错误的答案。与其问“政治中是否存在正确答案？”，不如重新表述这个问题：“是否存在错误或糟糕的答案？” 假设复杂的政治理论问题存在唯一“正确”的答案，并且我们能够明确地识别出这些答案，这或许颇具争议。然而，承认某些答案明显优于或劣于其他答案，则争议要小得多。⁵³

这一主张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第一种解释是形而上学的，认为可能并不存在唯一正确的答案，而是存在多种可能的真理。第二种解释是认识论的，主张我们通常更擅长识别错误的答案，而非明确地确定正确的答案。这两种解释都将焦点从在政治中寻求“真理”转向排除明显错误或有害的立场。我们将这一观点称为“弱认知主义”。

如果民主具有某种认识论目标，弱认知主义者会说，这一目标在于减少错误，或避免埃斯特伦德（Estlund）所称的“首要之恶”（primary bads），例如战争、饥荒和种族灭绝。⁵⁴ 对于那些怀疑政治应追求真理的人来说，这种观点或许提供了一种颇具吸引力的替代方案。毕竟，很少有人会否认在政治中犯下严重错误是可能的。

如前所述，谈论真理并不需要我们将真理视为绝对的、永恒的、独立于心灵的、普遍的或必然的。即使没有柏拉图式的永恒真理观念，政治真理仍然是可能的。例如，我们可以将某些政治判断视为历史性的、依赖于具体情境的，并植根于人际关系与共同体之中。这类真理或许已足以支撑政治领域中真理的概念。我们无需承诺一种强实在论立场，也能挽救政治真理这一观念。一项政治决策的真理性或正当性，可以在多种框架内加以理解，包括实在论（认为真理与客观事实相符）、建构主义（认为真理与某种由人类理性所建构的共同善观念相关），以及表达主义（认为真理主张最好被理解为态度、意图或承诺的表

达，而非对世界的客观描述）。政治真理这一概念与各种哲学立场都是相容的。

如果我们放弃政治真理这一概念，就会使自己陷入一种信念之中，即不存在对与错、不存在更好或更坏的行为，也不存在对待他人更好或更坏的方式。正如伊利亚·索明（Ilya Som-in）所言：“如果没有任何价值观优于其他价值观，那么就没有理由相信自由民主所倡导的价值观比希特勒和斯大林政权所宣扬的价值观更好。”⁵⁵无论主张政治与道德追求真理会带来何种风险，否认这一点所带来的风险则更为严重。

8 后真相政治

2017年4月，《时代》杂志刊登了一期发人深省的封面，提出疑问：“真相已死？”这一问题是对“后真相政治”兴起的回应。但所谓政治进入“后真相”时代，究竟意味着什么？

一些评论人士认为，“后真相”标志着一种文化，在这种文化中，真理这一

概念本身已然消亡或正在消亡。正如谢尔盖·普罗佐罗夫（Sergei Prozorov）所言：“后真相政治否认真理的存在。”⁵⁶ 按照这种解读，许多人要么已经放弃了对真与假的区分，要么对真理这一观念本身感到绝望，仿佛这一概念不过是往昔时代的遗物。

57

但彻底抛弃“真理”这一概念本身是极不可信的。人们并非真的放弃了真与假之间的区分。即便是地平论者，也认为“地球是平的”这一说法是真实的。（他们并非相信“真理”本身，但他们相信存在“真理”。）同样，疫苗怀疑论者或许对疫苗的有效性持有错误的看法，但他们仍然与主流科学家一样，承认关于疫苗有效性存在一个“真相”。事实上，人们可能犯错，或者我们的认知可能与现实不符，这一事实本身就预设了我们并未抛弃“真理”这一概念。⁵⁸ 正如布莱克本

（Blackburn）所言：“这……并非……一场关于‘真理’概念本身的危机。它不可能是……‘真理’的概念永远不会消亡……‘真理’的概念是一个幸存者。”⁵⁹

尽管我们无法扼杀真理这一观念，但或许我们对真诚的尊重正在消逝。在《真理与真诚》一书中，威廉姆斯指出了真诚的两种美德：准确性与诚挚性。“准确性”要求我们追求真理，这需要采用有助于发现真理的探究方法，同时抵制让自身欲望扭曲判断的诱惑。“诚挚性”则意味着以合作的方式陈述我们所相信为真的内容。人们很容易认为，我们的政治文化日益表现出缺乏准确性、缺乏诚挚性，或两者兼而有之。然而，我们认为这两种解释都不太可能成立。

在第四章中，我们将探讨公众是否在很大程度上对政治议题一无所知。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公众的无知是政治中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而非一种新近出现的现象。因此，当今的公民不太可能比前几代人更加无知。如果“后真相政治”确实是一种新现象，那么它就不能归因于准确性突然下降。同样，认为选民并不关心自己的信念是否准确，这种说法也颇具争议。尽管许多人持有错误的信念，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关心真相。毕竟，一个人若明知自己的观点是错误的，却仍真

诚地持守它，即便这种观点可能令人感到宽慰，也是困难的，甚至可以说是不可能的。

但为了论证起见，我们不妨假设选民并不关心准确性。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呢？公众为何会对政治中的真相如此漠不关心？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他们认为政治言论几乎从不具备客观的真值。另一种可能是，他们认为确实存在与政治相关的真相，但却没有可靠的方法来确定这些真相究竟是什么。如前所述，第一种说法是一种关于政治真理的形而上学论题，而第二种说法则是一种关于我们认知真相能力的认识论论题。

我们认为这两种论点都站不住脚。许多公民认为自己的政治观点显然是正确的，当别人与他们意见相左时，他们感到困惑。正如戴安娜·穆茨（Diana Mutz）所指出的，公众舆论的一个关键特征就是对政治分歧本身的存在感到困惑不解。每位公民都会说：“答案显而易见，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到底怎么了？”⁶⁰

在《论扯淡》（On Bullshit）一书中，哈里·法兰克福（Harry Frankfurt）指出，我们的文化日益缺乏真诚这一美德。“我们文化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他写道，“就是充斥着如此之多的扯淡。”⁶¹ 扯淡者“并不关心自己所说的话是否准确地描述了现实。”⁶² 他并不倾向于说出自己认为真实的话；其言论的真假对他而言毫无意义。他并非旨在表达自己经过思考的观点，而是试图将自己伪装成比实际知道得更多的人。

许多记者、学者和政治评论员都借鉴了法兰克福（Frankfurt）的研究来分析后真相政治的本质及其危险。⁶³ 然而，我们认为“胡扯”（bullshit）这一概念对于理解近期的政治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并无助益。尽管某些政治行为者可能尤其倾向于胡扯，但绝大多数选民似乎真诚地相信自己的政治观点，并且所表达的也正是他们所相信的内容。如上所述，他们往往认为自己的观点显然正确，并对他人持不同意见感到困惑。诉诸“胡扯”这一概念，无法解释为何许多人在他们深信

不疑且真诚持有的政治观点上产生激烈分歧。

也许后真相问题出在政客身上，而非公民。约翰·科纳（John Corner）警告称：“在公共言论中，公然使用谎言作为一种工具，已呈现出一种新的随意性。”⁶⁴ 尽管政治谎言、操纵性宣传和 propaganda 并非新鲜事，但如今公众人物似乎对被证实为骗子或说谎者不再感到羞耻。出于这一原因，布莱克本（Blackburn）提出，“后羞耻”（post-shame）和“后信任”

（post-trust）比“后真相”（post-truth）更能准确描述当前状况。⁶⁵

“后羞耻”是一个道德问题，而“后信任”则是一个认识论问题。前者可能导致后者：如果公众人物不再因不诚实而感到羞耻，他们就会更多地撒谎和胡扯。公众对不诚实行为的反应也可能因此在至少两个方面发生深刻转变。首先，公民可能对不诚实行为产生道德上的麻木。当撒谎或胡扯成为常态时，我们就不再觉得不诚实令人震惊或可耻。其次，公民不再知道该信任谁。当我们认为他人对不诚实毫无羞耻感时，减少对他们的信任就是

理性的选择。如果我们无法分辨该信任谁，就可能会放弃对真相的追寻。

我们是否已进入一个政治话语新近失序的时代，这一点尚存争议。据 Michiko Kakutani 所言，当前的公共话语充斥着“谎言”、“宣传”、“胡扯”、“假新闻”、“政治操纵”、“回音室”、“对真相的漠视”、“情感取代理性”以及“对事实的无视”。⁶⁶ 然而，从这一视角来看，现代民主国家所面临的认识论问题或许与过去并无根本不同。政治领域从未存在过清晰且权威的真理标准。谎言、胡扯、粉饰、宣传、偏见、不确定性以及对真相的争议，并非政治中的异常现象，而是常态。

9摘要

真理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历来复杂且充满争议。一方面，真实的信念对于制定负责任的政策、代表公众意愿以及问责掌权者至关重要。另一方面，对真理的诉求也可能被武器化，用以正当化反民主行为，甚至为威权主义辩

护。近期的虚假信息和宣传运动加剧了这些担忧，导致一些人声称我们如今正生活在一个“后真相”时代。

真理与政治之间的张力，因真理本身常常存在争议而进一步加剧。何为真理，在不同文化、意识形态及个人视角下可能各不相同。这可能导致人们对基本事实和价值观产生分歧，从而难以就重要的政治议题达成共识。此外，各种认知偏见和心理因素可能扭曲我们的感知与判断，从而阻碍对真理的追求。

社交媒体的兴起和错误信息的迅速传播进一步复杂化了真相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虚假信息在线上极易传播，这会削弱公众对机构和专家的信任。这使得区分事实与虚构变得更加困难，并可能导致人们对现实的理解逐渐瓦解。在此背景下，制定策略以促进批判性思维、媒体素养和事实核查，以及加强能够抵御虚假信息传播的民主制度，或许至关重要。

假定真理在政治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一些人认为政治体系的核心目标在于作出正确的决策并实施认知上

可靠 (epistemically sound) 的政策。在下一章中，我们将特别探讨认识论与民主之间的关系。我们将比较对民主的程序主义辩护与认识论辩护：前者主张民主的正当性源于其程序的公平与平等，后者则认为民主之所以具有正当性（至少部分地）在于它倾向于产生良好或正确的决策。正如你所预料的那样，认识论在政治理论中的重要性将成为贯穿全书的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

注释

1. Harari2018: 278。
2. Brooks2020。
3. Lynch2021。
4. Nyce2020。
5. 阿伦特 [1968] 1977: 229。
6. 阿伦特 [1968] 1977: 227。
7. Pinter2005。
8. 约翰福音18:37。
9. 伏尔泰 [1766] 1929年版: 第305页。

10. Williams 2002: 207。
11. Williams 2002: 211。
1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11 年。
13. Elkins 2012。
14. 罗尔斯 1993: 94。
15. 阿伦特 [1968] 1977 年。
16. 罗尔斯 1993 年。
17. Cohen 2009; Estlund
1998; Raz 1990。
18. Schaefer 和 Siscoe 2020。
19. 罗尔斯 1997: 766。
20. Harcourt 2021: 153。
21. 福柯 [1981] 2014: 28。
22. 罗尔斯 1993: 129。
23. Estlund 2008: 2。
24. Elkins 2012: 46。
25. 《理想国》7.517a (见柏拉图, 2004 年版)。
26. Rini 2021。
27. Alesina 等, 2020。
28. 阿伦特 [1968] 1977:
257。
29. Paul and Matthews 2016。
30. Beerbohm 和 Davis, 2021
年。
31. 阿伦特 [1968] 1977:
258。

32. 阿伦特 [1968] 1977: 231。
33. 阿伦特 [1968] 1977: 231。
34. Landemore 2012a: 224–225。
35. 阿伦特 [1968] 1977: 231。
36. 阿伦特 [1968] 1977: 231。
37. 阿伦特 [1968] 1977: 232。
38. 阿伦特 [1968] 1977: 232。
39. 麦克唐纳1946年: 244页。
40. Keane2018。
41. 布莱克本1984年。
42. 埃斯特伦德和兰德莫尔, 2018年。
43. Olsson2008: 95。
44. Min2016: 410。
45. 罗蒂2000: 2。
46. 罗尔斯1993: 54–57。
47. 埃斯特伦德1993年: 第86页。
48. 埃斯特伦德1993年: 第88页。

49. McGrath2008。
50. Estlund 2008: 30。
51. 埃斯特伦德2008年: 第33页。
52. 古丁与斯皮克曼2018: 305。
53. Landemore 2012a: 210。
54. Estlund 2008; Landemore 2012a。
55. Somin2016: 11。
56. Prozorov2019: 29。
57. Haack2019: 261。
58. Lynch2005。
59. 布莱克本2018: 911。
60. Mutz2006: 32。
61. 法兰克福2005: 1。
62. 法兰克福2005: 56。
63. Ball 2018; Davies 2017。
64. Corner2017: 1101。
65. Blackburn2019。
66. Kakutani2019: 3。

更多资源

- 阿伦特, 汉娜 编。 ([1968] 1977) 。 《真理与政治》。 载于《过去与未来之间: 政治思

想的八次练习》。企鹅出版社，第227-264页。

- 埃尔金斯，扎卡里与皮帕·诺里斯（编）（2012）。《真相与民主》。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
- 埃斯特伦德，大卫（1993）。《使真理对民主安全》。载于《民主的理念》，大卫·科普等编。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第71-100页。
- 汉农，迈克尔（2023）。《后真相的政治》。《批判评论》35卷，第1-2期，第40-62页。
- 兰德莫尔，埃莱娜·埃德。（2013）。“政治认知主义：一种辩护。”《民主理性：政治、集体智慧与多数统治》。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第208-231页。
- 林奇，迈克尔（2025）。《政治中的真理：为何民主需要它》。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 麦克马伦，伊恩（2020）。《何为“后事实”政治？》，

《政治哲学杂志》28.1，第97–116页。

- 米萨克，谢丽尔（2002）。《真理、政治与道德：实用主义与审议》。伦敦：劳特利奇出版社。
- 罗森菲尔德，索菲娅（2019）。《民主与真理：一部简史》。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

2 认识论民主

DOI:10.4324/9781003089483-3

众人，其中每一个单独来看并非卓越之人，然而当他们聚集在一起时，却可能胜过少数最优秀的人。——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引言

民主与认识论有何关联？在许多思想家看来，关联不大。民主旨在成为一个自由平等公民组成的共同体。无论个人意见在智识上是否严谨，每个人都被赋予同等份额的正式政治权力。在此制度下，每个人在塑造规范其共同政治生活的法律方面拥有平等的发言权。

然而，我们也希望政治制度能够促进良好的结果。我们的目标是做出正确的政治决策——这些决策应以知识和智慧为基础，而非出于无知或偏见。基于错误信息或偏见的决策往往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挑战不仅在于维护尊重公民自由与平等的程序，还在于确保这些程序能够产生惠及整个社会的明智决策。

这两个标准可能会相互冲突。¹ 正如杰拉尔德·高斯（Gerald Gaus）所言，民主涉及“公平与愚蠢之间一种令人不安的平衡。”² 如果我们坚持通过公平且包容的程序来做出政治决策，就有可能陷入约翰·斯图尔特·密尔

(John Stuart Mill) 所说的公众“集体平庸”之治。³ 为说明这种张力，不妨比较两个虚构的社会：

愚民民主制 设想一个社会，其公民极度无知且充满偏见。我们称之为“愚民民主制”（Dumbocracy）。该社会遵循民主程序；例如，每位成年公民都有平等的机会参与政治进程。然而，由于愚民民主制的公民信息匮乏且缺乏能力，他们的民主选择常常导致不良后果，从而阻碍自身目标的实现。例如，当他们希望减少犯罪时，却选出了一些领导人并通过了一些实际上反而增加犯罪的政策。尽管他们的选择是通过民主方式形成的，却往往产生糟糕的结果。

智能乌托邦 现在，想象一个由一位（或多位）睿智而仁慈的领导者所治理的截然不同的社会。我们称之为“智能乌托邦”（Intelitopia）。在这个社会中，政治决策并非通过民主方式作出；例如，公民没有权利在自由公正的选举中投票，领导者也无需对民

众负责。相反，智能乌托邦的公民必须服从其睿智而仁慈的统治者所制定的法律和决策。幸运的是，这些统治者知识渊博、道德高尚，因此他们所选择的规则和政策能够最好地服务于全体人民的利益。

你更愿意住在愚民国（Dumbocracy）还是智士邦（Intellitopia）？

如果你倾向于选择“愚民民主”

（Dumbocracy），很可能是因为你认为民主程序本身具有独立于其结果的价值。而如果你被“智识乌托邦”

（Intellitopia）所吸引，则可能是因为你认为做出正确（准确、恰当）的决策最为重要；因此，我们应当采用任何能够产生最佳结果的程序。

尽管这两个社会是虚构的，但它们阐明了一个重要观点：原则上，一种完全非民主的程序可能比民主程序产生更好的决策。因此，追求民主决策的目标可能与追求良好决策的目标发生冲突，此处的“良好”是就结果的正确性或认知质量而言的。既然这些标准

可能发生冲突，我们应当如何权衡二者的重要性？

在本章中，我们探讨政治合法性的两种基本观点：程序主义与工具主义。程序主义者认为，民主的合法性在于其所遵循的程序及其所体现的原则，而非其所产生的结果。根据这一观点，民主之所以受到重视，并非因为它能可靠地作出正确决策，而是因为它肯定了公民的平等地位，或促进了其他内在价值，例如个人自主性。越来越多的理论家认为，对民主的纯粹程序性辩护是不充分的。对此，工具主义者主张，良好的结果而不仅仅是良好的程序，才能证成政治制度。民主的工具主义理论主张：第一，我们应当采纳能够产生最佳后果的政府形式；第二，民主正是最有可能实现这些结果的制度。

许多工具主义者捍卫民主所特有的认识论益处。这被称为民主理论中的“认识论转向”。⁵ 尽管这一观点近来日益受到关注，但正如我们将在下文所见，认识论与民主正当性之间的关联最早可追溯至古希腊人。

1 古希腊的民主与知识

古希腊常被视为民主的发源地，大约兴起于公元前六世纪。当时，伯里克利等人物盛赞民主制度，称其促进了平等参与，并将权力“置于全体人民而非少数人之手。”⁶ 然而，并非所有古希腊思想家都推崇民主。事实上，许多人从认识论的角度对其持批判态度。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将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公元前415–413年）雅典决定入侵西西里归咎于公民的无知，这一决策导致了雅典历史上最惨重的失败。⁷ 更广为人知的是，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抨击了民主制度在认识论上的缺陷。他警告说，尽管民主最初因其赋予所有人自由与平等而颇具吸引力，但它却成问题地“将某种平等同时赋予平等者与不平等者。”⁸

1.1 柏拉图的悲观主义

根据柏拉图的观点，民主制的根本缺陷在于它将权力赋予无知的大众，却忽视了少数智者。他通过一艘船的隐喻生动地阐明了这一观点。这艘船交由一群争吵不休的水手掌控——他们

象征着蛊惑民心的政客和演说家——彼此争夺控制权，却全然不懂如何真正掌舵。这些水手通过奉承和劝说操纵船主，每个人都声称自己知道最佳航线，却无一人具备真正的航海技能。结果，船只陷入持续的混乱之中，面临沉没的危险，缺少一位技艺娴熟的船长来稳稳掌舵。同样，柏拉图认为，民主社会的公民往往会被情感和修辞所左右，而非依据理性和知识行事，从而导致决策失误和政治动荡。

柏拉图主张的并非民主制，而是知识精英统治（epistocracy）——即由“知者”来统治。他认为公民自身太过无能，无法自治，因此政治决策应交由专家来制定。本质上，他希望我们生活在一个类似“智识乌托邦”（Intellitopia）的社会中。

柏拉图的挑战激发了当代对民主的诸多批评。在后续章节中，我们将探讨选民的无知（第四章）与非理性（第五章）、专家在民主中的作用（第九章），以及知识精英统治（epistocracy）的优点（第十章）。在本章中，我们试图通过探究民主在

认识论层面的优势来回应柏拉图的挑战。由于亚里士多德是首位质疑柏拉图“民主在认识论上存在缺陷”这一主张的人，我们首先考察他的观点。

1.2 亚里士多德的乐观主义

亚里士多德对普通民众的集体智慧比柏拉图更为乐观。尽管亚里士多德并非民主制度的拥护者，但他认为，一大群人集体行动时，可能比一群专家表现得更好。他在《政治学》中写道：

认为应由多数人而非少数优秀者掌权的观点，似乎表述得颇为恰当，尽管其中或许包含一些谜题，但也可能蕴含某些真理。因为众多普通人，虽各自单独而言并非卓越之士，但当他们聚集在一起时，其集体智慧却可能胜过那少数最优秀者——并非在个体层面，而是在整体层面。

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是，在适当的条件下，一群普通人可能比一小群专家作出更明智的判断。

这一观点可能看似违反直觉。一大群非专家如何能比一小群专家做出更明智的决策呢？对亚里士多德的这一主张，我们可以有两种理解方式。一方面，我们可以将亚里士多德视为现代“协商民主”形式的先驱，在这种民主形式中，公民在民主语境下通过交换理由来作出知情判断。另一方面，他可能只是在倡导一种简单的聚合程序，例如投票。¹¹ 这两种解读暗示了民主的两种不同“认知机制”，我们将在第4节和第5节中加以探讨。

1.3 两种民主愿景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两种相互竞争的民主观。对柏拉图而言，民主在认识论上是适得其反的：它以牺牲真知灼见与健全决策为代价，优先考虑公民的自由与平等。因此，柏拉图主张一种非民主的替代方案，即根据知识与能力分配政治权力——这是一种认识论上的威权主义。相比之下，亚里士多德则更为乐观地认为，民主能够发挥公民的智慧，使“多数人”比少数有德之士更为可靠。通过这一观

点，亚里士多德为民主的认识论辩护奠定了基础。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论证都是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m）的不同版本。如前所述，工具主义认为，政治权力的分配方式应当有助于促成良好的结果。重要的是，工具主义既有认识论的（epistemic）形式，也有非认识论的（non-epistemic）形式。例如，威廉·赖克（William Riker）就为民主提出了一种非认识论的工具主义解释，主张只要一个政治制度能够确保社会稳定与秩序，它就是正当的。¹² 然而，本书的关注点仅限于工具主义的认识论版本，即认为政治制度与程序应当促进认识论意义上良好的决策。为简便起见，我们将用“工具主义”一词特指工具主义的认识论版本，而将非认识论版本的工具主义搁置不论。

正如存在非认识论形式的工具主义一样，也存在非工具主义的认识论民主论证。这些观点认为，民主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能够培养负责任的认识论能动性，而不论其结果如何。¹³ 我们将把对非工具主义认识论观点的

讨论留到下一章，本章则聚焦于工具主义观点。

回想一下，工具主义的主要替代方案是程序主义。程序主义与工具主义之间的关键区别在于，前者强调过程，而后者强调结果。我们依次考察二者。

2 程序主义

什么为民主提供了正当性？程序主义者认为，民主决策的正当性在于其形成方式。程序主义的核心论点是：政治决策的合法性源于达成这些决策所采用的程序，而非源于决策结果的正确性或质量。

尽管支持民主的程序性论点有多种形式，但它们通常强调民主程序如何体现公平、平等和尊重等核心道德价值。例如，托马斯·克里斯蒂亚诺

（Thomas Christiano）认为，民主具有内在价值，因为它将所有公民视为平等者，赋予他们平等的机会去影响政治决策并塑造自身的政治生活。

¹⁴ 其他人则主张，民主之所以有价

值，是因为它能防止支配、促进集体自治，或有助于实现一个包容且自由的社会。¹⁵ 这些观点均以非工具性的方式界定民主的权威性、合法性或价值，聚焦于民主程序本身所具有的道德意义。

让我们更详细地考察一种程序性观点。一种流行的看法是，民主制度之所以具有价值，是因为它们对参与者而言在程序上是公平的。¹⁶ 在民主制度中，受法律约束的人被视为通过投票授权了这些法律——他们要么直接对法律本身进行投票，更常见的是通过选举代表来制定这些法律。当人们意见不一时，投票被视为一种公平的决策程序。根据这种观点，只要结果是公平程序所产生的，该结果就是正当的。大卫·埃斯特伦德（David Estlund）将这种观点称为“公平程序主义”（fair proceduralism）。¹⁷

这一观点的一个卖点在于，人们无需就某些政治结果是否“正确”或“最佳”做出任何有争议的假设——这种判断原本需要依赖某种与程序无关的标准。例如，设想两个人在堕胎的道德性问题上存在根本分歧。尽管他们可

能永远无法就有关堕胎的法律在实质上是否良善或公正达成一致，但他们或许会认同用于决定该问题的立法程序是公平的。通过这种方式，公平程序主义有助于避开那些关于哪些有争议的观点才是正确观点的棘手问题。

这种方法假设我们通常能够就一项公平的程序达成共识。幸运的是，公平的程序似乎符合这一标准。研究表明，持有截然不同的社会价值观和政治意识形态的个体，往往在判断某一程序是否公平方面达成一致。¹⁸此外，大量实证文献证实，公平感有助于增强政府的合法性。¹⁹合理地推断，人们更可能就民主程序（例如自由和公正的选举）达成共识，而非就实质性结果（例如堕胎的道德性）达成一致。

日常生活证实了这一点。当我们无法就该做什么达成一致时，常常会转而决定如何做出决定。例如，如果你和朋友无法就去哪里吃晚饭达成一致，一个公平的程序——比如每周轮流由一人选择——可能就是解决方案。同样，如果在纸牌游戏中对谁先出牌存

在分歧，我们可以采用一个广为人知的程序：抽到最大牌的人先出。

人们或许会承认，理想情况下，我们希望自己的政治决策是良好的。正如埃斯特伦德（Estlund）所言：“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倘若人人都公认何为正确决策，那么公平程序这一观念根本就不会出现。”²⁰ 然而，由于政治领域的认知境况复杂，存在大量合理的分歧，我们往往难以判断哪些结果才是最佳的。因此，我们不再依赖一种独立于程序的标准来确定何为正确行动，而是转而寻求一种公平且相对无争议的决策程序。

2.1 为什么不抛硬币呢？

如果我们所追求的只是制定政治决策的公平程序，那为什么不抛硬币呢？

21 毕竟，抛硬币无疑是公平的——它不偏袒任何个人，并平等地对待所有参与者。如果公平与平等是我们唯一关心的问题，那么抛硬币（以及其他随机选择方法）似乎与多数决一样可接受。

我们并非建议用抛硬币来取代民主选举。相反，我们的观点是，公平性或许是一个过于薄弱的标准，不足以使民主决策优于其他替代方案。程序主义者面临的挑战在于：既然民主与抛硬币似乎都体现了相同的程序价值，那么该如何解释为何民主更可取？

程序主义者通过诉诸公平之外的其他价值来回应这一挑战，以此捍卫民主的优越性。例如，娜迪亚·乌尔比纳蒂（Nadia Urbinati）主张，健全的程序性民主能够保障公民的“平等政治自由”。它不仅平等地分配政治权力，还使个人能够通过自由表达观点来参与政治。抛硬币的方式无法提供这一点。同样，多数决规则之所以可被视为公平，是因为它对所有已表达的偏好给予同等考量。因此，程序主义者可以诉诸公平之外的价值——例如自由与包容——来解释为何民主程序在政治上优于其他方法。

硬币抛掷的类比在其他方面也站不住脚。正如克里斯蒂亚诺所指出的，硬币抛掷的选项通常是预先确定的，而在民主制度中，公民的偏好会塑造议程。²³此外，民主制度会回应公民通

过投票所做出的选择，而硬币抛掷则对这些选择无动于衷。

最后，抛硬币式的比较凸显了公共证成的必要性。在民主制度中，我们希望政策能够获得公共证成。²⁴ 抛硬币及其他随机选择程序之所以会受到批评，是因为它们并未促使公民对自己的观点进行证成或展开审议。正如高斯（Gaus）所言，这些程序“诱使公民忽视民主的根本要义：即达成经由公共证成的决策。”²⁵

公共证成的概念蕴含了一种协商民主观。正如我们将要讨论的，既有程序主义的论点，也有工具主义的论点支持优先考虑协商。在下一节中，我们将聚焦于协商民主的程序主义版本。

2.2 程序性协商民主

政治理论中一种日益具有影响力的观点是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它强调公共协商对于合法的政治决策至关重要。尽管协商民主存在各种不同版本，但它们都共享一个核心原则：政治决策的合法性要求自由且平等的公民之间就理由与论点进

行公开交流。²⁶ 这一观点与纯粹聚合式（非协商式）的民主观形成对照，后者将通过投票聚合个人偏好视为民主的关键特征。

为什么公共决策应当源于这样一个过程：人们聚集在一起提出观点、就这些观点展开辩论，并试图相互学习或彼此说服？一些程序主义者认为，民主审议之所以具有价值，是因为它体现了公平、平等和尊重等道德价值。例如，西蒙娜·钱伯斯（Simone Chambers）声称，审议是“一种尊重对话者、承认其作为具有判断资格的自主个体的方式。”²⁷ 赛拉·本哈比卜（Seyla Benhabib）和乔舒亚·科恩（Joshua Cohen）认为，通过政治审议过程所作出的决策本身就具有正当性。²⁸ 艾米·古特曼（Amy Gutmann）和丹尼斯·汤普森（Dennis Thompson）则主张，审议程序之所以能使政治决策获得合法性，是因为它们有助于维护公民的尊严。²⁹

即使公共审议并未带来更明智的决策，它是否仍然具有价值？许多理论家认为确实如此。克里斯蒂亚诺（Christiano）指出：

在特定条件下进行的民主讨论、审议和决策，正是使结果对每个人而言都具有合法性的原因……[W]无论讨论、审议和决策的结果如何……它们都是合法的。结果之所以合法，是因为它们是该程序所产生的结果。30

同样，杰里米·沃尔德伦（Jeremy Waldron）认为，公平要求我们听取每个人的观点，无论审议在认识论上是否带来益处。³¹ 通过允许每个人公开表达其关切，我们表达了对那些存在深刻分歧的公民的尊重与平等。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也以非认识论的术语来阐述他对民主的辩护。³² 这些理论家均主张，公共证成之所以具有价值，是因为它尊重人们作为自由且平等的个体。我们将这些关于审议民主的非工具性论述称为“审议程序主义”（deliberative proceduralism）。

2.3 对审议程序主义的异议

两个突出的反对意见对以下观点提出了质疑：协商民主可以纯粹基于非工具性（或程序性）的理由得到证成：

1. 为什么要费心交换理由呢？如果我们不相信政治问题中存在有待厘清的答案，公共审议又有什么意义？正如埃莱娜·朗德莫尔（Hélène Landemore）所言：“如果政治问题不存在‘更好’或‘更差’的答案，那么‘对政治进行理性探讨就毫无意义’。”³³ 其他知识论民主主义者也持类似关切。埃斯特伦德（Estlund）指出，除非我们诉诸良好的结果，否则审议民主的任务就会变成“一种奇怪的解释：既要阐明实质性公共讨论在评估政治决策的程序无关优劣方面具有核心重要性，却又始终否认实际上存在任何程序无关的标准。”³⁴ 同样，法比耶娜·彼得（Fabienne Peter）主张，“非知识论的民主理论无法真正说明为何理由的交换至关

重要。”³⁵ 罗伯特·塔利斯

(Robert Talisse) 更进一步，声称所有审议民主理论本质上都是知识论的，因为它们对给出理由和证成的强调，本身就预设了我们旨在探求真理。³⁶ 总体而言，我们之所以与他人进行审议，是因为我们相信：在做出良好的政治选择时，存在着可被认知的、独立于程序之外的标准。

2. 我们冒着使不道德的决定合法化的风险。假设存在一场关于是否应允许父母对子女实施身体虐待的辩论。现在设想，在经过民主审议程序之后，多数人投票赞成允许此类虐待。结果，将不存在法律依据来阻止人们伤害自己的子女。这是否意味着虐待子女是被允许的或合法的？程序主义者可能被迫回答“是”，仅仅因为这一决定源自一个合法的民主程序。然而，这一结论令人深感违背直觉。一项政策虽经民主程序自由选择，似乎并不足以使其具有合法性。我们通常认为，存

在独立的道德标准可用于评估决策的结果。但如果一项决定的合法性完全不取决于其结果的质量，我们就有可能使不道德的决定合法化。³⁷

这是对纯粹程序性审议民主辩护的两个常见挑战。然而，我们认为这些挑战是可以应对的。

针对第一个反对意见，程序主义者可以区分审议的“目标”（aim）与“目的”（purpose）。尽管个体在审议时可能以发现真理为目标，但公共审议更广泛的目的却可能截然不同，例如确保参与者之间的公平、平等与相互尊重。类比而言，一支足球队的目标可能是进球得分，而这项运动更广泛的目的则可能是促进乐趣、身体健康或团队合作。这一区分使审议程序主义的支持者能够在承认审议似乎所发挥的认识论作用的同时，又不必将其重要性与结果的正确性绑定在一起。正如C. Thi Nguyen所指出的，我们在某项活动中所追求的目标，并不一定等同于该活动所服务的更广泛目的。³⁸ 此外，使一项活动获得正当性

的，也未必总是其目标；相反，该活动的目的才可能是其正当性的基础。

为回应第二种反对意见，人们可以主张：并非所有民主程序的结果都必然具有正当性——尤其是在涉及严重不公的情况下。以奴隶制为例，一项通过民主程序作出的奴役少数群体的决定显然是不正当的。为什么？根据克里斯蒂亚诺（Christiano）的观点，其原因在于民主权威的根本依据：民主之所以正当，是因为它尊重公共平等。³⁹ 由于奴隶制从根本上违反了平等原则，任何奴役少数群体的决定都将与民主的正当性基础相冲突，因而缺乏正当性。对于其他严重不公的情形，我们也可以作同样判断。例如，如果民主多数决定剥夺少数群体的选举权，或煽动针对他人的暴力行为，这显然违背了对平等的尊重。正如克里斯蒂亚诺所言：“民主集会无权剥夺民主集会中任何一部分成员的民主权利。”⁴⁰ 这种做法将破坏民主程序本身的权威性，从而使相关结果丧失正当性。

然而，纯粹的程序主义者必须承认，某些政治上合法的结果可能仍然是道

德上不公正的。对他们而言，合法性并非源自结果本身的正义性，而是源于产生这些结果的程序。例如，一个公平的民主程序可能会导致某些政策，这些政策对特定群体施加了沉重负担，或未能充分纠正系统性不公，但仍然满足了合法性所要求的程序标准。正如克里斯蒂亚诺

（Christiano）所言，民主决策“通过其源于公平程序这一事实，使这些结果获得合法性。因此，即使总体而言我们可以说民主产生了总体上不公正的结果，这些结果仍然是合法的。”⁴¹

伊尼戈·冈萨雷斯-里科伊（Iñigo González-Ricoy）将这一观点推向了更进一步。他主张：“在一个民主社会中，无法诉诸任何与程序无关的道德标准来判定何种行使投票权的行为属于有害的、不公正的或道德上不正当的。”⁴² 对许多人而言，这种立场的强化似乎显得回避问题或不够充分。大多数人认为，至少某些政治结果可以独立于这些决策是如何作出的，而被评价为好或坏、对或错、公正或不公正。因此，要对民主作出充分的证

成，似乎必须诉诸程序价值之外的某些东西。这就促使我们引入一种认知（epistemic）维度，以解释为何民主的结果具有正当性。接下来，我们将转向这类认知性解释。

3 民主的认识论理论

越来越多的思想家从认识论的角度为民主辩护。这些“认识论民主主义者”认为，民主程序（如审议和投票）之所以具有价值，是因为它们能带来认识论上的益处。他们声称，民主能够通过汇总选票、促进审议，或两者兼而有之，引导我们做出正确的决策。

历史上，民主的认识论价值曾得到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孔多塞侯爵（Marquis de Condorcet）、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和约翰·杜威（John Dewey）等著名人物的辩护。当代认识论民主的支持者包括伊丽莎白·安德森（Elizabeth Anderson）、约书亚·科恩（Joshua Cohen）、谢丽尔·米萨克（Cheryl Mi-

sak)、大卫·埃斯特伦德 (David Estlund)、埃莱娜·兰德莫尔 (Hélène Landemore)、罗伯特·塔利斯

(Robert Talisse)、罗伯特·古丁 (Robert Goodin) 和凯·施皮克曼 (Kai Spiekermann)。⁴³ 尽管这些理论家的观点存在显著差异，但他们共享一个核心理念：除非民主具有认识论价值，否则就无法充分证成其合法性。这正是认识论民主的核心论题。

为何认为民主具有认识论价值？密尔 (Mill) 主张，公开审议使公民有机会“以错误换取真理”，并获得对真理“更鲜活的印象”。⁴⁴ 杜威 (Dewey) 则强调，将公民聚集在一起以识别并解决公共利益问题的重要性。⁴⁵ 更近一些，埃斯特伦德 (Estlund) 认为，民主之所以具有正当性，是因为公共审议提升了我们追踪真理的能力。⁴⁶ 兰德莫尔 (Landemore) 进一步发展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即民主具有认识论优势，因为它能利用认知多样性来解决集体性问题。⁴⁷ 按照认识论的解释，一个健康的民主制度使我们能够汇集分散在广大公民中的信息，提

升我们意见的质量，并作出更加明智的决策。

广义而言，认知价值（epistemic value）是指与认知成功相关联的那种价值。然而，我们可能追求的认知成就有多种，包括真理、知识、证成（justification）、理解、可靠性、准确性以及智慧。我们应如何理解民主的认知价值？它追求的是真理、知识，还是其他东西？

民主的认识论理论通常被描述为以追求真理为目标。请看以下具有代表性的引述：

对于认识论民主主义者而言，民主的目标在于“追踪真理”。在他们看来，民主之所以比其他决策形式更可取，正是因为它能够做到这一点。⁴⁸

根据标准观点，我将指称任何以民主决策过程的真理追踪潜能为核心，并且其中“真理”指的是一个独立于程序的正确性标准的认识论民主理论。⁴⁹

正如这些引文所示，民主的认识论观念通常以“追踪真理”（tracking truth）的方式来刻画。这意味着一种****真理主义****（veritistic）的认识论价值理论。真理主义认为，真理或准确的信念是唯一根本的认识论价值。根据这一观点，制度与实践的认识论价值取决于它们在多大程度上促进真理或准确性。

正如第一章所讨论的，声称政治制度能够确定“真理”或许过于雄心勃勃。相反，我们或许可以将其认识论价值描述为促进“更好”的决策。与此类似，詹姆斯·博曼（James Bohman）认为，民主的主要认识论目标在于避免错误。⁵¹杜威（Dewey）则主张，成功的决策并不在于“追踪”或“符合”政治真理，而在于我们对实践结果所产生的反思性满足感。⁵²高斯

（Gaus）主张一种能够产生正当信念的认识论策略。⁵³兰德莫尔（Landemore）则从民主的知识生产潜力角度来刻画其认识论价值。⁵⁴另有学者认为，共情理解（empathetic understanding）是一种宝贵的认识论目

标，其价值并不仅仅在于真理或知识本身。⁵⁵

这些关于民主认知特性的理论并不严格聚焦于真理。然而，为简便起见，本章集中讨论标准的真值论（veritist）民主认知观。我们将在下一章探讨其他替代表述。

任何对民主的认识论辩护都依赖于两个论题：

规范性命题：民主程序若要具有正当性或获得证成，就必须具备认知价值。

描述性命题 民主程序确实具有认知价值；例如，它们倾向于追踪真理。

这两个论点是可分离的。你可能同时接受描述性论点和规范性论点，也可能同时拒绝这两个论点，或者接受其中一个而拒绝另一个。更详细地说，选项如下：

1. 选项一——两者皆接受：如果你同时接受这两个论点，你就是一位认识论民主主义者。你

认为：“民主之所以具有合法性或权威性，是因为它具有认识论价值。”

1. 选项二——两者皆拒：如果你同时拒绝这两个论点，你可能是一位程序主义者。你会认为：“民主程序并不具有认识论上的价值，但这无关紧要！”
（或者，你也可能是一位非认识论的工具主义者。）
1. 选项3——接受规范性主张，拒绝描述性主张：如果你接受规范性论点但拒绝描述性论点，你可能会支持知识精英统治（epistocracy）。你会认为：“民主是有问题的，因为它将政治权力赋予了认知能力不足的个体。应当以一种更可靠的制度取而代之，例如由知识渊博者进行统治。”
1. 选项4——接受描述性，拒斥规范性：如果你接受描述性命题但拒斥规范性命题，你可能会倾向于程序主义，但仍承认民主的认识论优势。你会这样

想：“没错，民主在认识论上优于其他政治安排，但这并不重要！”

程序主义者与工具主义者之间的核心争论围绕着规范性论题展开。（请注意，我们关注的是工具主义的认识论版本。）工具主义者主张，民主程序应根据其结果（例如对真理的追踪能力）来加以评价，而程序主义者则否认这一点。这一规范性争论的关键问题在于：我们在评价民主时，应如何权衡认识论考量与非认识论考量。

那么描述性论题又如何呢？民主是否是一种在认识论上可靠的政府体制？这一问题属于关于民主程序实际结果的更广泛的实证争论的一部分。认识论民主主义者主张，诸如公共审议和投票之类的民主程序能够产生认识论上良好的结果。然而，许多人对此主张提出质疑。例如，杰森·布伦南

（Jason Brennan）认为，政治参与会使我们变得更加偏颇、充满偏见且更加两极分化。⁵⁶伊利娅·索明（Ilya Somin）则主张，民主公民过于无知，以至于民主无法产生认识论上良好的结果。⁵⁷在本章余下的部分，我

们将探讨若干关于民主制度应满足何种认识论标准——以及它们是否确实满足这些标准——的提议。

广义而言，捍卫民主的认识论价值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聚合式路径（aggregative approach），主张民主制度通过汇集选民的集体智慧来接近真理。第二种是协商式路径（deliberative approach），认为民主过程中理由的交流能够提高作出正确判断的可能性。兰德莫尔（Landemore）将这两派分别称为“计数派”（the “counters”）和“对话派”（the “talkers”）。58

在下一节中，我们将聚焦于认识论民主的聚合式进路。第5节将探讨认识论民主的协商式辩护。

4 公民的集体智慧

20世纪初，科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爵士在英国普利茅斯参加一个农夫集市时，有了一个非凡的发现。他观察到一场竞赛，参赛者需猜测一头公牛的重量。大约800人参加了比赛，每

人将自己的猜测写在一张票上，最接近公牛实际重量的人将赢得奖品。比赛结束后，高尔顿收集了这些票，并计算了所有猜测值的平均数，结果为1,197磅。令人惊讶的是，这头公牛的实际重量是1,198磅。高尔顿发现，群体的平均猜测不仅优于比赛的实际获胜者，而且几乎完全准确。59

至少自柏拉图以来，就存在着一种贬低普通人智力的悠久传统。然而，正如本例所示，群体有时能做出比个体更佳的判断，即便没有经过审议、辩论或交流。⁶⁰ 我们不妨将这一现象称为“群体的智慧”。所谓群体具有智慧，大致是指：个体虽不甚聪慧，但集体却能表现出胜任力。这正是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见第1节）；他认为，胜任力是集体决策过程中涌现出的一种特性。

许多政治理论家赞同这一观点，认为通过平等加权的投票方式汇总个人偏好能够带来更优的认知结果。为了解释公民的集体智慧，理论家们通常援引以下三个数学定理之一：“聚合的奇迹”、孔多塞陪审团定理，以及“多样

性胜过能力”定理。我们将在下文逐一探讨这些定理。

4.1 定理1：聚合的奇迹

聚合的奇迹认为，即使只有少数选民知情，大型民主政体的表现仍可与全体选民都充分知情的民主政体一样好。其核心观点在于，错误会随机分布，从而相互抵消。⁶¹ 请看以下示例：

艾莉和比尔 即将到来的选举中有两位候选人：艾莉和比尔。艾莉是更优秀的候选人，但98%的选民对政治完全无知。当这些选民投票时，他们会随机选择，没有特别的理由偏好艾莉而非比尔。因此，这些不知情的选民中大约有一半会投票给艾莉，另一半则投票给比尔，彼此相互抵消。现在，假设剩下的2%选民是消息灵通的，并且知道艾莉是更优秀的候选人。他们会投票给艾莉。结果，艾莉将获得总票数的51%

（全部知情选民的票加上一半不知情选民的票），而比尔将获得

49%（没有获得任何知情选民的票，但获得了一半不知情选民的票）。在这种情况下，更优秀的候选人获胜。

根据这一论点，如果错误在真相周围随机分布，那么即使选民群体几乎完全由无知的选民组成，只要有一小部分选民具备足够的信息，整体仍能表现良好。值得注意的是，一个98%选民无知的民主制度，其表现可能与全体选民都高度知情的民主制度同样出色。

然而，这一论点存在一个问题：在现实世界的民主制度中，错误不太可能是随机的。选民在形成自己对政治议题的看法时，不可避免地会依赖记者、所谓的专家以及同胞公民。此外，人们越来越倾向于与那些拥有相似背景信念、阅读相同报纸、收听相同播客的人交往、共事并居住在邻近区域。⁶³互联网进一步加剧了这一现象，搜索引擎和社交媒体公司会根据用户的位置、浏览历史和偏好来组织内容。布莱恩·卡普兰（Bryan Caplan）认为，人们很可能在同一个方向上系统性地产生偏见，这使得错误

呈对称分布的假设显得不可信。⁶⁴因此，选民所犯的误差不太可能是随机且相互抵消的。

4.2 定理2：孔多塞陪审团定理

在18世纪，孔多塞侯爵（Marquis de Condorcet）发现了“陪审团定理”

（jury theorem），该定理被称作“认识论民主主义者王冠上的明珠”。⁶⁵

该定理表明，如果一个集体决策中个体的平均可靠性大于0.5（即高于随机概率），且个体投票相互独立，那么随着投票人数的增加，群体选出正确答案的概率将趋近于1（即达到无谬性）。换言之，在一个大规模社会中，通过多数投票所达成的决策几乎可以肯定为正确，至少在特定条件下如此。

请考虑以下图示：

近乎无误的选民群体 假设有两个选项，每位选民平均有51%的概率选择正确选项（49%的概率选择错误选项）；那么，在一万名选民组成的群体中，多数人投票支持正确选项的概率超过97%。

因此，即使在规模适中的城镇选民群体中，只要每位选民在二选一的情况下仅比随机选择略胜一筹，多数人几乎肯定会选择正确选项。在大型国家中，多数人的选择几乎无懈可击。66

这从认识论的角度支持民主。如果一个相当大规模的选民群体在集体判断上优于任何特定专家（或一小群专家），那么政治决策过程就应尽可能纳入更多公民，而这正是民主的目标所在。67

孔多塞陪审团定理在数学上是严谨的，这一点毫无争议。存在争议的是，该定理是否与现实世界中的民主制度有任何相关性。该定理依赖于若干关键假设，包括：

1. 能力要求：普通选民投出“正确”一票的可能性大于投出“错误”一票的可能性。
2. 独立性要求：选民彼此独立地做出决策。

有若干理由质疑这些条件在实际的民主环境中是否成立。

首先，我们或许会怀疑选民总体上是否真的比无能者更有能力。现代社会和经济问题极其复杂，而选民在政治议题上大多无知（见第四章）或带有偏见（见第五章）。此外，在日益两极分化的环境中，许多人更关心自己一方获胜，而非客观理性地思考问题（见第六章）。鉴于这些因素，我们或许不应指望选民能做出可靠的政治选择。事实上，如果选民选择错误答案的概率哪怕仅略高于随机水平，那么陪审团定理将证明，大规模选民群体几乎必然会选出错误的选项。⁶⁸

第二，认为个体公民彼此独立地投票是不合理的。独立性要求选民不依赖相同的意见领袖或信息线索，不共享意识形态或偏见，也不基于相同的证据或背景信息进行判断。很难想象选民能够维持这种独立性。实际上，公民的政治判断往往深受其所属社会群体观点的强烈影响。此外，认知茧房（epistemic bubbles）和回音室（echo chambers）的普遍存在，意味着选民接触到的信息经过高度筛选，只会强化其既有信念。⁶⁹ 当这种

情况发生时，独立性要求便遭到了违背。

古丁（Goodin）与斯皮克曼

（Spiekermann）认为，我们可以在不牺牲陪审团定理核心结论的前提下放宽独立性假设。⁷⁰ 具体而言，他们指出选民之间不必完全相互独立。即使许多选民盲目追随意见领袖，只要这些领袖持有对立观点、对立群体规模大致相当，并且有足够数量的独立选民未受这些影响所左右，该定理依然成立。尽管认识到这些条件十分重要，我们仍可能质疑：即便这些较弱的要求，在现实政治情境中是否真正得到满足。⁷¹

第三，独立性要求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公共讨论与相互影响是“民主的构成性特征，而非偶然特征。”⁷² 为确保独立性，选民之间不能过度相互影响。然而，民主在很大程度上关乎集体推理、审议与讨论——而不仅仅是投票。正如安德森（Anderson）所指出的，民主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汇总个人偏好，而在于汇聚集体智慧，并将其导向解决社会问题。⁷³ 因此，坚持独立性要求会割裂民主所特有的两

种信息汇聚形式：投票与公共审议。正如协商民主理论家所主张的，选民必须相互交流，才能制定并讨论他们将要投票表决的提案。若无公共讨论，投票就只能反映私人偏好，而非公共利益。

对此，古丁（Goodin）和斯皮克曼（Spiekermann）声称：“在投票之前，存在着相当大的讨论与审议空间——并且有多种方式可以将这一点纳入我们的政治过程，从而改善最终基于孔多塞陪审团定理（Condorcet's Jury Theorem, CJT）投票所产生的结果。”⁷⁴ 换言之，审议与聚合并非相互排斥，尽管它们提出了民主产生良好决策的不同机制。然而，我们可能会担心，利用审议来提高个体能力会负面影响投票的独立性。若果真如此，那么能力要求与独立性要求之间就会产生冲突。

第四，陪审团定理并未涉及哪些选项会出现在投票议程上。迈克尔·费尔斯泰因（Michael Fuerstein）将此称为“议程设定问题”。⁷⁵ 要使陪审团定理成立，普通选民必须更有可能投票支持“正确”的选项。然而，“正确”的选

项可能根本不在所提供的选项之中。充其量，孔多塞定理（Condorcet's theorem）只能保证选民会选择现有选项中最好的那个，而这个选项未必是真正正确的，甚至可能根本不是一个好的选项。为确保选民拥有良好的选择，民主制度在认知层面的大部分负担必须在投票之前、即议程设定阶段就加以完成。这需要讨论、辩论和审议。

第五，陪审团定理的结论过于夸张。它预测，在适当条件下，选民几乎永远不会犯错。这一过于自信的结论似乎难以令人信服。⁷⁶ 试问：在任何民主社会中，选民群体在做出正确决策方面看起来近乎不会出错吗？如果陪审团定理适用于现实中的民主选举，我们就不得不认为选民极其可靠。这还将意味着，任何与多数意见相左的人，在理性上都有义务服从多数人的政治判断，因为多数人将成为一个高度可靠的认知权威。然而，仅仅因为自己属于少数派，就在理性上必须接受多数人的判断而放弃自己的判断，这似乎并不合理。

对此，埃斯特伦德（Estlund）区分了“认为一个可靠的认知权威的判断‘很可能正确’”与完全“接受”该判断这两种态度。他主张，一个人可以相信多数意见几乎肯定是正确的，同时仍可拒绝在个人层面接受这一观点。⁷⁷ 这一区分旨在驳斥“少数派成员必须理性地采纳多数派判断”的主张。然而，正如肖恩·英格汉姆（Sean Ingham）所指出的，尽管这种区分或许能避免得出“个人必须用自己的判断取代多数派判断”的结论，但它仍然意味着少数派成员在理性上被要求承认多数派的观点“很可能正确”。⁷⁸ 对许多人而言，仅此一项让步就可能使陪审团定理的结论显得不可信。

最后，陪审团定理可以用来证明将那些低于能力门槛的人排除在政治决策之外是合理的。如果太多选民更有可能做出错误的选择，他们可能会削弱集体实现良好结果的能力。因此，陪审团定理非但不能支持普遍包容，反而可能被用来倡导“知识精英统治”

（epistocracy），即只允许具备能力的人拥有投票权。

4.3 定理3：多样性胜过能力

兰德莫尔推崇一个被称为“多样性胜过能力”的定理。⁷⁹ 尽管该定理在技术上相当复杂，但可以用简单的语言加以描述。该定理指出，由于认知多样性的优势，一个随机挑选的问题解决者群体通常会胜过由最优秀个体问题解决者组成的群体。这是因为较大的群体能够整合其多样化的知识与能力，而这些知识与能力在整体上超越了规模较小的专家群体。因此，一个拥有多种视角的较大群体通常会比一个观点较单一的小型专家群体做出更明智的决策。

该定理专门适用于审议式问题解决，而非单纯的投票。为了发挥公民的认知潜能，必须采用包容性的审议。然而，在一个大规模社会中，审议不太可能达成完全共识；因此，我们最终必须通过投票来汇总个人偏好。通过这种方式，兰德莫尔融合了聚合性理论与审议性理论的洞见，表明多数决规则与审议是互补的程序。

兰德莫尔（Landemore）运用“多样性胜过能力定理”（diversity trumps

ability theorem) 为民主制度提供了一种认识论上的论证。她主张，在一个规模庞大且多元化的社会中，一组随机挑选的问题解决者将胜过任何单个最优秀的问题解决者。此外，她还认为，至少在能够促进“适当审议”

(proper deliberation) 的条件下，包容性的民主程序在认识论上很可能优于任何非民主程序。⁸⁰ 这是一个大胆的论点。兰德莫尔所主张的并不仅仅是民主制度善于追踪真理，而是认为民主制度在这方面优于任何其他政治安排。

然而，该定理仅在满足某些条件时才成立：（1）参与者必须对世界拥有真正多样化的思维方式；（2）这些视角必须具有足够的复杂性；（3）参与者必须就问题的性质以及何为解决方案达成共识；（4）他们必须共同聚焦于解决同一个问题；以及

（5）他们必须愿意向他人学习，并善于利用彼此的知识。⁸¹ 在现实世界的民主制度中，这些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与陪审团定理一样，我们或许会质疑这些条件的适用性。

首先，问题解决者必须以恰当的方式具备多样性。并非任何形式的多样性都有效；他们必须具备认知多样性。认知多样性指的是人们在思考问题时所采用的不同方式。然而，人们可能会质疑选民是否真正拥有（且足够复杂）的世界模型，如条件（1）和

（2）所要求的那样。如前所述，人们在形成政治信念时通常依赖他人。党派人士还表现出系统性偏见，这些偏见根植于社会身份，并过度受到魅力型领袖的影响，而这些领袖的观点往往并不准确。此外，问题解决者必须具备与手头任务相关的知识和技能。正如斯科特·佩奇（Scott Page）所言：“我们不能指望往一个医学研究团队中加入一位诗人，就能让他们找到治疗普通感冒的方法。”⁸²

其次，公民必须足够“聪明”，以便在各种选项中出现正确答案时能够识别出来。然而，我们可能会怀疑公民是否满足这一能力标准。政治上的对立者甚至很少就问题本身是什么、或者什么样的方案才算解决问题达成一致。因此，他们往往并非在共同解决同一个问题，这违反了该定理的条件

(3) 和 (4) 。这些条件假定决策者已经识别出一个共同的问题，就何为解决方案达成共识，并正在协作解决该问题。

在《民主理性》一书中，兰德莫尔将选民比作一群试图共同走出迷宫的人，但这一类比并不十分恰当。在迷宫情境中，所有人都认同目标——走出迷宫——并且当目标达成时，他们会一致认可并达成共识。尽管大多数选民都希望促进公共利益，但他们很少就“公共利益”究竟为何达成一致。

⁸³此外，迷宫解谜者大概愿意相互学习、倾听他人，并以理性且无偏见的方式共同推理。然而，大多数政治审议并非如此运作。

第三，该定理要求认知多样性，但不要求价值多样性。所有参与者必须共享同一套价值体系，即他们对结果从优到劣的排序方式完全一致。尽管这一假设在某些情境下或许成立，但在政治情境中却远非适用，因为选民的价值观各不相同。⁸⁴ 正如罗尔斯所指出的，在自由社会中，道德、政治和宗教上的分歧源于理性运用的正常结果，而这些分歧会导致人们对不同解

决方案的优劣产生截然不同的看法。在政治领域，参与者几乎不可能仅具有认知多样性而不同时持有不同的价值观。

最后，该定理可能并未证明兰德莫尔（Landemore）所声称的内容，即民主在认识论上优于所有其他政治制度。若要在认识论基础上为民主辩护，就必须证明全体民众的审议优于其任何子集成员的审议。然而，认知精英制（epistocratic）机构有可能吸纳认知多样性的优点。正如布伦南（Brennan）所指出的，一种温和的认知精英制——仅排除最不具备能力的5%潜在选民——可能比实行普选的民主制度更具能力。⁸⁵ 兰德莫尔至多只能说明，普选民主在认识论上优于仁慈的独裁者或一小群专家组成的委员会。这并不能为纳入所有公民的声音提供依据；事实上，它反而可能为排除大量公民提供理由。⁸⁶

针对最后这一点，兰德莫尔（Landemore）认为：“我们根本无法事先判断，正确的想法究竟会来自民众

（demos）的哪个部分。”例如，我们无法预测，是一位华尔街的白人经

纪人，还是一位有色人种的单身母亲，会在一系列尚未确定的议题上对审议结果的质量做出更大贡献。因此，“试图事先人为设计认知多样性并没有太大意义。”⁸⁷ 相反，最佳做法是尽可能做到包容。兰德莫尔指出，这种包容性正是认识论属性与民主审议之间的联结所在：要创造足够的认知多样性，就必须将民众（demos）的所有成员都纳入其中。

我们考察了三种颇具影响力的利用集体智慧的尝试：聚合的奇迹、陪审团定理以及多样性胜过能力定理。尽管每个定理在塑造民主的认识论理论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它们都面临着严重的批评。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尚不清楚这些定理所设定的条件是否适用于任何现实世界中的民主制度。这些数学定理表明，如果满足各种特定条件，民主将会是有效的；然而，这些条件在实际政治环境中是否成立，却并不明确。

5 审议的认识论价值

我们或许不应仅仅汇总公民的判断，而应让他们在投票前共同审议，以提升其意见的质量。在此观点看来，审议是投票及其他形式政治活动在认识论上的重要前提。

我们现在将考察协商民主过程的认识论证成。这一证成基于这样一种观点：这些过程往往能使公民变得更明智，提升其意见的质量，或以其他某种重要方式具有认识论价值。我们将这一观点称为“协商认识论民主”，以区别于那些仅聚焦于程序的协商民主辩护（参见第2节）。

自由民主政体常被视为在促进审议方面具有独特优势，能够营造诸如言论自由、多元视角、平等的参与机会、自由探究以及开放论坛等条件。这些条件被认为能带来认知上的益处。例如，兰德莫尔（Landemore）指出，包容性的议事团体更有可能具备认知多样性，从而做出更明智的决策。当人们对复杂且动态变化的政治议题所掌握的知识有限时，实现认知多样性

的“最廉价”（即最简便、最经济）方式便是将所有人纳入该群体之中。⁸⁸因此，民主制度能够创造条件，从而获得审议所带来的认知益处。

在审议民主的标准真理追踪（truth-tracking）解释中，人们认为理由的交换能够提高公民达成真理的可能性。例如，密尔（Mill）指出，公共审议对民主有益，因为它为公民提供了学习或更充分地理解重要真理的机会。密尔认为，审议是一种至关重要的机制，个体借此改进和发展其政治观念；若无此机制，他们的“心智发展就会受到束缚。”⁸⁹许多政治理论家都呼应了这一观点。艾里斯·玛丽恩·杨

（Iris Marion Young）主张，审议“更能使[公民]就集体问题找到明智的解决方案。”⁹⁰安德森（Anderson）则认为，不同的社会群体“必须共同努力，分享他们各自所拥有的不对称知识”，因为“某些至关重要的知识形式无法由孤立的群体独自掌握，而本质上是来自不同群体的人们共同协作的产物。”⁹¹这些理论家一致认为，审议对于使公民更加知情、强化其观点的理由基础，并引导其偏好朝向有利于

发现真理的方向，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借鉴何塞·路易斯·马丁（José Luis Martí）的观点，我们可以将政治审议所声称的认识论益处概括如下：

1. 它增进了相关知识。与正式的聚合性方法不同，审议促进了信息的交流，包括有关所有可能受该决策影响者利益的信息。⁹³
2. 它使我们能够察觉推理和事实中的错误。人们常常对世界及其自身偏好做出事实性和逻辑性的错误判断。信息流动的增加使我们能够将自身信念与新数据进行比对，从而提升我们识别错误信念或思维不一致性的能力。⁹⁴
3. 它减少了偏见。当我们与他人共同审议时，会接触到多种视角，这有助于减少认知偏见和社会偏见，例如群体思维和确认偏误。正如扬（Young）所言：“在民主讨论中纳入并关注社会上差异化的位置，往往能够纠正偏见，并将辩论参与者

所持的局部视角置于更恰当的位置。”⁹⁵

4. 它为我们提供了更全面的世界图景。审议与讨论使我们接触到多元的视角，从而拓宽了我们对世界的理解。这种接触还能促使我们重新审视自身的论点、理由、利益和价值观。⁹⁶
5. 它降低了政治操纵的可能性。审议有助于我们避免信息不平等，而信息不平等往往是操纵的根源。若无审议，由于我们无法比较观点与信息，操纵的风险便会增加。⁹⁷

这份清单并非详尽无遗，但它突出了若干关键理由，使人相信公民之间扎实的政治审议可以作为一种重要的认知资源。换言之，包容性与认知质量未必相互冲突。

5.1 对审议性认识论民主的异议

很容易设想在某些理想条件下，审议能够顺利进行，例如：

- 充分的审议时间；

- 一个由拥有不同观点和经历的参与者组成的多元化群体；
- 愿意倾听、表示尊重，并以诚意进行审议；
- 被有力论据说服的能力。

当这些条件得到满足时，审议便具有显著的认识论潜力。但正如埃斯特伦德（Estlund）所称的这种“理想的审议情境”，在很大程度上是虚构的。⁹⁸在现实中，政治辩论很少呈现出我们所期望的那种冷静、理性的交流。相反，现实世界中的政治审议往往受到非理想条件的影响。例如：

- 参与者是无知的或非理性的；
- 他们不信任自己的政治对手，也不听他们的意见；
- 他们在回音室中深思熟虑；
- 证据几乎无法改变人们的想法；
- 情感诉求往往比基于事实的论点更具影响力；
- 参与者受到党派偏见和群体思维的影响；
- 媒体偏见和选择性报道塑造了人们的认知与讨论。

鉴于这些现实情况，我们或许可以质疑：协商民主的认识论辩护是否依赖于对协商者理性及其协商条件的过度理想化假设。正如迈克尔·休梅尔

（Michael Huemer）所指出的：“如果说在阅读哲学家对协商民主的描述时有什么特别突出之处，那就是这些描述与现实相去甚远。”⁹⁹

是否存在关于审议（deliberation）认知价值的经验证据？研究结果喜忧参半。一方面，理论家们已记录了大量实验情境，在这些情境中，审议无论在道德层面还是认知层面都取得了成功，既带来了认知上的益处，又增进了对对话者的尊重。¹⁰⁰ 另一方面，这些实验通常发生在高度受控的环境中，难以推广扩大，也无法反映典型的审议情境。¹⁰¹ 此外，当所讨论的问题涉及清晰、客观的真理（例如易于验证的事实或统计数据）时，审议往往最为有效；而当公民就道德、正义或复杂社会议题进行审议时，其成效则更值得怀疑。因此，这些实验仅表明，审议在那些与日常政治现实相去甚远的人为情境中可能有用。

更令人担忧的是，有证据表明，对政治问题的审议反而可能使我们的认知状况变得更糟。¹⁰² 我们通常在观点相似的群体中进行审议，这可能会强化既有的信念并加剧两极分化。¹⁰³ 甚至与“另一方”的人展开讨论也可能激化分歧，导致更加严重的极化现象。¹⁰⁴

一般来说，当涉及政治事务时，我们尤其容易陷入动机性推理、确认偏误、选择性回忆以及其他扭曲思维的认知偏差（参见第5章）。这是因为政治议题与我们最珍视的价值观紧密相连，而这些价值观可能会干扰我们进行逻辑且公正推理的能力。

当政治审议既未腐败也未使人愚钝时，它往往会使公民对政治变得冷漠和不可知，从而抑制他们参与和行动的意愿。事实上，那些最接近审议型公民理想的人——即拥有多样化社会网络、因而接触到不同政治观点的人——恰恰是最不可能参与政治的人。

¹⁰⁵ 这是因为接触相左的观点往往会促使公民退出政治，减少其公民参与。如果在理想条件下进行审议反而导致冷漠，那么是否应大力鼓励这种审议就值得怀疑了。

我们还面临着公众无知的问题。我们将在第四章更详细地探讨公众无知的程度、深度及其影响。目前需要指出的是，无知对认识论民主的协商模式构成了严峻挑战。¹⁰⁶ 如果参与投票的公众对其所协商的问题普遍缺乏了解，这可能会使协商民主沦为“一种几乎不值得认真对待之人的关注的空中楼阁。”¹⁰⁷

6 政治是关于解决问题的吗？

在本节中，我们探讨对任何知识论式民主观所提出的一项重要挑战。知识论式理论的核心在于这样一种观点：民主决策在解决集体问题以及对道德或政治问题得出正确答案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当我们将政治视为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时，这种表述最为自然。尽管这一类比看似颇具吸引力，但它却有可能掩盖罗素·缪尔黑德（Russell Muirhead）所称的“民主政治所具有的创造性、开放性、不确定性，

以及最终的争议性本质。”¹⁰⁸ 缪尔黑德对这一挑战的阐述如下：

解决问题，就是当我的电脑无法连接网络时，电脑技术支持人员所做的工作；也是当我把那辆旧车拖到修车厂时，我的机修工所做的工作。“问题解决了！”他可能会一边满意地“砰”一声关上引擎盖，一边宣布：“是电池没电了。”国会委员会的成员却很少有这样的一刻——能合上他们的三孔活页夹，然后宣布：“问题解决了！”民主政治并非如此……民主政治比单纯地解决问题更加困难，也更具创造性。¹⁰⁹

为了解决问题，我们必须就待修物品的用途达成一致。当我把车送到修理工那里时，我们对汽车应有的功能有着共同的理解，并且就什么才算问题的解决方案达成了一致。

但政治从根本上是不同的。在政治领域，我们对于社会问题的本质以及何为“解决”这些问题，本身就缺乏共识。这并非民主政治的缺陷，而是其本质特征。正如缪尔黑德（Muir-

head) 所言：“民主政治不仅仅是一种‘把事情做对’的工具；它本身就是一场关于‘何为把事情做对’的争论。”¹¹⁰ 知识论民主主义者将政治仅仅视为一种解决问题的工具，却忽视了正义往往涉及对相互竞争的诉求进行权衡。他们将政治问题当作预先确定好的——固定不变、只待正确解答——而实际上，无论是问题的界定还是其解决方案，都充满争议，并且本质上是政治性的。

认识论民主理论所面临的挑战在于其对政治的视野过于狭隘。这些理论将民主简化为一种认知或技术性操练，却忽视了民主的核心功能：应对并协商关于集体生活之目的与价值的深刻分歧。诸如选举领导人或决定是否发动战争这类开放性的决策，无法等同于估算一头牛的重量或预测明年的销售额。为阐明这一点，不妨思考一下，即便是地方政府所面对的日常问题，也往往交织着许多看似不同类型的问题。利亚姆·科菲·布莱特（Liam Kofi Bright）给出了以下一个颇具启发性的例子：

要知道垃圾箱必须以多高的频率清运，我们必须了解一系列关于机会成本的复杂事实，并与相关各方协商如何权衡取舍。我们必须了解垃圾箱未及时清运对公共健康的影响，同时还要具备一定的审美意识，以判断在不同政策方案下我们的社区将呈现何种面貌。我们还必须考虑如何评估噪音和车辆污染所带来的影响，等等。对于是否应将回答所有这些问题并权衡其各自重要性的过程，最好理解为“追踪某种真理”或“探寻一个认识论上正确的答案”，这一点完全可以合理地存疑。而这还仅仅是针对垃圾箱的问题而已！

正如本案例所示，民主决策并不总是（或通常）存在一个理应达成的正确答案。民主政治并非寻求预先确定的解决方案，而是一场持续的博弈，涉及对问题的界定、对何为问题解决标准的确定，以及对谁有权作出这些抉择的判定。忽视政治的这一根本特征，便会错失民主之所以既具挑战性又不可或缺的真谛。

7摘要

民主是否能够促成明智的决策，在经验上是有争议的。但民主的目的甚至在于此吗？程序主义者与工具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分歧。程序主义者认为，民主决策之所以具有正当性，并非因为它所带来的好处，而是因为它所体现的程序性价值。而工具主义者则认为，民主程序之所以具有正当性，至少部分原因在于它能够产生良好的结果。

程序主义者与工具主义者都面临着相互对立的挑战。一方面，纯粹程序性的解释被认为不够具有认识论意义。我们希望政治决策是好的决策，而不仅仅是公平程序的结果。这就需要一种独立于程序的标准来评价政治决策。另一方面，纯粹认识论的解释又可能过于强调认识论。如果我们试图从认识论的角度为民主辩护，那么就有可能面临这样的风险：一旦发现威权主义能产生更好的政策决策，便可能放弃民主。在被迫做出选择时，我们中的许多人宁愿不以牺牲公平、平等和自主性为代价去换取认识论上的

威权主义。这正是困扰民主理论的“斯库拉与卡律布狄斯”（Scylla and Charybdis）困境。挑战在于，我们需要构建一种关于民主合法性的理论，它既不能在认识论上过于薄弱，也不能过分聚焦于认识论收益，以至于危及民主本身。

在下一章中，我们将探讨可能的前进路径。我们不会仅仅聚焦于纯粹工具主义或纯粹程序主义的民主观，而是考察那些试图在程序价值与作出良好决策的目标之间取得平衡的混合型理论。我们还将探讨非标准的认识论民主理论，这些理论的特点在于其非工具主义、实用主义或非真值导向

（non-veritistic）的性质。这些替代理论旨在规避传统认识论民主理论所面临的一些常见挑战。此外，下一章还将讨论若干针对认识论民主理论的一般性反驳，这些反驳对新旧理论均适用。

注释

1. 埃斯特伦德2008年。

2. Gaus2011: 271。
3. 密尔 [1859] 1977年版: 第268页。
4. 阿内森2009年: 197页。
5. Landemore 2017。
6. 修昔底德1974年版: 第二卷, 第34节。
7. Somin2009: 588。
8. 柏拉图2004年版: 558c5。
9. 柏拉图2004年版: 488a。
10. 亚里士多德2017年版:
1281a40–1281b3。
11. Lane2013。
12. Riker1982。
13. Peter2013。
14. Christiano 2008; 另见 Cohen 1996; Griffin 2003;
Kolodny 2014; Lafont
2020; Viehoff 2014。
15. Anderson 2008; Pettit
2012; Young 2002。
16. Christiano 2008; Gaus
1996; Waldron 1999。
17. 埃斯特伦德2008年: 第65
页。
18. Tyler2000。
19. Tyler1994。

20. 埃斯特伦德2008年：第71页。
21. Anderson 2006：10；Estlund 2008：6。
22. 乌尔比纳蒂2014：19-20。
23. Christiano2008：198。
24. 罗尔斯1993年。
25. Gaus2003：172。
26. Benhabib 1996；Cohen 1989；Gaus 1996；Gutmann 和 Thompson 1996；Habermas 1996；Manin 1987；Nino 1996；Rawls 1993。
27. Chambers2017：268。
28. Benhabib 1996；Cohen 1989。
29. 古特曼和汤普森，1996年。
30. Christiano1996：35。
31. Waldron1999。
32. 罗尔斯1993年。
33. Landemore 2017：284。
34. 埃斯特伦德2008年：第30页。
35. Peter2009：116。
36. Talisse2009a。

37. Beerbohm 2012: 36; Brennan 2016a: 12; Estlund 2008: 110。
38. Nguyen2020b。
39. Christiano2008: 260。
40. Christiano 2008: 260; 另见 Dahl 1989: 170–171。
41. Christiano2008: 299。
42. González-Ricoy 2012: 50。
43. Anderson 2006; Cohen 1986; Dewey [1927] 2012; Estlund 2008; Goodin and Spiekermann 2018; Landemore 2012a; Mill [1859] 1977; Misak 2002; Talisse 2009a。
44. 密尔 [1859] 2001: 19。
45. 杜威 [1927] 2012年。
46. 埃斯特伦德2008年。
47. Landemore 2012a。
48. List 和 Goodin 2001: 277。
49. Peter2008: 33。
50. Goldman1986。
51. Bohman2007。
52. Fuerstein2021。
53. Gaus1996。
54. Landemore 2012a。

55. Hannon2020。
56. Brennan2016a。
57. Somin2016。
58. Landemore 2012a。
59. 苏罗维茨基2004年。
60. 埃斯特伦德2008年：第223页。
61. Converse 1990；Page 和 Shapiro 1992。
62. 本例改编自Brennan 2016a：176。
63. Bishop 2008；Mason 和 Wronski 2018。
64. Caplan2007。
65. List and Goodin 2001：283。
66. 本例改编自埃斯特伦德（Estlund）2008年著作第223页。
67. 参见SeeList和Goodin（2001）对孔多塞陪审团定理的经典辩护；参见Goodin和Spiekermann（2018）对该陪审团定理及其对民主前景的详细论述。
68. Somin2016：133。
69. Nguyen2020a。

70. 古丁与斯皮克曼 2018。
71. Pamuk2020。
72. Anderson2006: 11。
73. Anderson2006: 11。
74. 古丁与斯皮克曼2018: 132。
75. Fuerstein2008。
76. 英格汉姆2013年。
77. 埃斯特伦德2008年: 第105页。
78. 英格汉姆2012: 143–144。
79. Landemore 2012b; 有关数学细节, 参见 Hong 和 Page 2004。
80. Landemore2012a: 3。
81. Brennan 2016a: 181;
Landemore 2012a: 112。
82. 第2008页: xxix。
83. Brennan2016a: 185。
84. 布伦南与兰德莫尔, 2022年:
第252–253页。
85. Brennan2016a: 182–184。
86. Ancell2017。
87. Landemore 2012a: 112。
88. Landemore 2012b。
89. 密尔 [1859] 2001: 32。
90. Young1997: 404。
91. 安德森2010: 109。

92. Martí2006。
93. Manin 1987; Cohen 1996;
Dryzek 1990; Nino 1996;
Bohman 1996; Fearon
1998。
94. Nino1996; Fearon 1998;
Estlund 2008。
95. Young 2002: 116; 另见
Christiano 2008: 200; Mer-
cier and Sperber 2017; Min
2016。
96. Young 2002; Anderson
2006; Min 2016; Min 和
Wong 2018。
97. Fearon1998。
98. 埃斯特伦德2008年：第18
页。
99. Huemer 2013: 62。
100. Fishkin 2009; Goodin
2008; Himmelroos 2017;
Mercier 和 Landemore
2012。
101. Brennan2016a: 59–61。
102. Brennan2016a: 62–65。
103. Sunstein 2002。
104. 皮尤研究中心 2016年。
105. Mutz2006。

106. Ahlstrom-Vij 2012; Somin 2016。
107. 波斯纳2003年：第163页。
108. 缪尔黑德2014：119。
109. 缪尔黑德2014年：119页。
110. 缪尔黑德2014：119。
111. Bright2019：4。

更多资源

- 安德森，伊丽莎白（2006）。《民主的认识论》。《认识》3.1，第8-22页。
- 布伦南，杰森 与 埃莱娜·朗德莫尔（2022）。《民主之辩：我们需要更多还是更少？》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
- 克里斯蒂亚诺，托马斯（2004）。《民主的权威》。《政治哲学杂志》12.3，第266-290页。
- 埃斯特伦德，大卫（2008）。《民主权威：一种哲学框架》。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 古丁，罗伯特·E. 与凯·施皮克曼（2018）。《民主的认识论理论》。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
- 兰德莫尔，埃莱娜（2012）。《民主理性：政治、集体智慧与多数统治》。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 彼得，法比耶娜（2009）。《民主合法性》。伦敦：劳特利奇出版社。
- 施瓦茨伯格，梅丽莎（2015）。《认识论民主及其挑战》。《政治学年度评论》第18卷，第187–203页。
- 乌尔比纳蒂，纳迪亚（2014）。《民主的扭曲：舆论、真理与人民》。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

3 重新审视认知民主

民主是一种自由的政体，而非知识的政体。——娜迪亚·乌尔比纳蒂，《被扭曲的民主》

引言

如果真理与民主有一种关系状态，那将是：“情况复杂。”一方面，鉴于许多公民的无知与偏见，对民主的承诺似乎与我们的认知目标相冲突。这正是柏拉图的观点。他认为，民主有让平庸的多数人掌权的风险。另一方面，民主或许会促进而非阻碍我们的认知目标。通过在决策过程中纳入多元视角，我们或许能汇聚众人的智慧。

在本章中，我们探讨了认识论民主理论所面临的一些基础性挑战，以及对这些挑战的回应尝试。在第一节中，我们考察了认识论民主的一个核心难题：在不对哪些结果是“正确”的做出有争议的假设的前提下，我们如何能够知道民主决策程序是否可靠？如果我们已经知道哪些标准或结果是正确的，那么诉诸民主程序似乎就显得多

余，甚至鲁莽。然而，如果我们无法获知正确的标准，我们就失去了从认识论角度证成民主的能力。因此，认识论民主主义者似乎陷入了一个两难困境。

这一困境构成了本章其余部分的框架。我们考察了对这一基本挑战的多种回应。在第2节中，我们简要概述了四种替代认识论工具主义民主观的方案：知识精英统治（epistocracy）、非认识论工具主义、认识论程序主义和纯粹程序主义。在第3节中，我们探讨认识论民主主义者是否能在不放弃认识论工具主义的前提下解决这一困境。在第4节中，我们主张，即使认识论民主主义者能够避免这一困境，他们仍面临另一项挑战：他们有可能将民主不合理地押注于认识论之上。

鉴于这些关切，我们探讨民主的替代性认识论路径。在第5节中，我们讨论大卫·埃斯特伦德（David Estlund）对认知程序主义（epistemic proceduralism）的辩护，该立场融合了认知性与程序性要素。在第6节中，我们考察法比耶娜·彼得（Fabi-

enne Peter) 对纯粹认知程序主义 (pure epistemic proceduralism) 的辩护，该立场不依赖于独立于程序之外的良善结果标准，而是基于一种纯粹程序主义的认识论。在第7节中，我们审视一种支持认知民主 (epistemic democracy) 的实用主义论证。最后，在第8节中，我们探讨非标准的工具主义观点，这些观点将真理去中心化，转而强调其他认知目标。最终，我们认为认知民主面临的主要挑战并非理论性的，而是经验性的。正如本书后续章节所阐明的那样，当代社会面临着一系列问题——从无知与非理性，到分歧与极化——这些问题似乎威胁着民主的认知承诺。

1. 认识论民主是否自我削弱？

在此，我们探讨一个对认识论工具主义民主理论而言的根本性难题。（回顾第二章，认识论工具主义者主张，政治制度与程序的正当性在于它们能

在多大程度上促进认识论上良好的结果。)彼得将这一难题称为“权威困境”，并将其概括如下：

权威困境 在那些存在第三人称认知权威的决策领域中，我们要么听从那些知道何为正确决策之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决策过程就不是民主的；要么坚持民主决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无法从认知角度为民主的正当性进行辩护。¹

让我们来剖析一下。为什么彼得认为民主无法基于工具性的认识论理由得到辩护？

她的论证如下：要使认知民主 (epistemic democracy) 成立，就必须存在一种独立于程序的标准，用以判定结果的正确性。然而，若要在认知基础上为民主提供正当性，我们首先必须能够确定适当的认知判断标准。这意味着必须存在某个个人或群体，拥有权威来判定哪些民主决策是正确的。如果政治制度的正当性取决于其结果的质量，那么就必须有人处于能够评估这些结果的位置。否则，我们

将无法验证这些制度是否真正具有正当性。

然而，这造成了一种两难困境。一方面，如果我们听从那些知道正确决策为何的人，那么民主程序就变得多余了，因为我们只需遵从专家意见，而非进行真正的民主决策。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坚持保留民主决策程序，我们就无法再从认识论的角度为其提供正当性，因为我们不再依赖那些掌握正确答案之人的权威。

为了说明这一困境，彼得举了以下例子：

镇上的桥 假设一个镇正在考虑修建一座横跨流经该镇的河流的新桥。是否修建这座桥的决定仅取决于一个因素，即所规划桥梁的稳定性。再假设该镇的工程师具备评估所规划桥梁是否稳定的专长，并得出结论认为该桥是稳定的。

在这种情况下，诉诸民主决策将是错误的。该镇的工程师是一位公认的专家，因此他的判断足以使建造桥梁的决定具有正当性。就桥梁是否稳固的

问题寻求民主决策，既毫无意义又十分危险。因此，在此类情形下，民主程序并无认识论上的正当理由。正如彼得所说：“如果存在一个正确的决定，并且有人拥有合法的认识论权威来断言何为正确决定，那么支持民主的认识论依据就会土崩瓦解。”⁴

其他批评者将此视为民主的认识论理论所面临的一个认识论难题。⁵ 其基本困惑在于：若缺乏对该标准的独立把握，我们如何能够判断某一程序是否可能依据某种标准表现良好？如果民主的正当性取决于其认识论表现，那就必须存在一个有能力评估这些结果的权威。然而，在一个多元且多元主义的社会中，就谁有资格成为政治事务上的合法认识论权威达成共识，乃是一个难以实现的目标。既不存在一个无可争议且可公开证成的识别专长的标准，也不存在关于哪些政治决策是“正确”决策的广泛共识。⁶ 若无法获得此类标准，我们将别无选择，只能依赖那些我们试图确认其认识论价值的民主决策本身。

这一认识论挑战或许是针对民主的认识论理论最常见的反对意见。对此，

有人可能会坚持认为，存在着独立于程序的标准，并且我们有时能够接触到这些标准。换言之，政治的认识论情境并非总是以无法化解的合理分歧为特征。⁷ 然而，这又使我们回到了权威困境：越是可能存在公认的标准，民主决策的必要性就越低。正如汉斯·凯尔森所言：

认为民主以如下信念为前提的学说是错误的：即存在一种客观上可确定的共同善，人们能够认识它，从而使其成为自身意志的内容。如果这一观点是正确的，民主就不可能存在。⁸

因此，对民主的某种认识论辩护似乎具有自我削弱的性质。它要么预设了与民主不相容的有利认识论条件，要么预设了与认识论工具主义不相容的不利认识论条件。这构成了对民主的认识论理论的一种理论性（而非经验性）挑战。它表明，要为民主提供一种真正基于认识论的证成，或许是不可能的。

2 避免困境

要应对这一挑战，我们需要一种方式，能够基于民主制度作出良好决策的能力来为其辩护，同时又不陷入权威困境，也不依赖于关于哪些决策是“正确”决策的争议性假设。但这可能吗？

人们最初可能会认为，权威困境并不适用于某些聚合式的民主观念，例如那些依赖孔多塞陪审团定理（Condorcet's Jury Theorem，简称CJT）的观念（参见第二章）。根据CJT，如果每位选民做出正确决策的概率高于随机猜测（即大于50%），那么随着选民人数的增加，多数人得出正确结果的可能性也随之提高。按照这种观点，我们无需事先知道何为正确结果；我们只需确认CJT的条件得到满足，便可相信民主决策在认知上是可靠的，而无需事先确定何为正确决策。

然而，权威困境的一个变体仍然出现在孔多塞陪审团定理（CJT）中。要应用该定理，我们需要评估选民在相

关议题上是否比随机猜测更可靠。这就要求我们对选民的能力作出判断，而这种判断又预设了我们已知正确结果为何。若缺乏此类知识，我们就无法验证选民实际上是否比随机猜测更可靠。因此，即使借助CJT，我们仍需要一个独立的标准来评估选民的能力，这又使我们陷入同样的困境：要么预设某种认知权威，从而削弱民主程序的必要性；要么依赖民主程序，却无法为其认知价值提供正当性依据。⁹

因此，彼得认为我们必须拒斥民主的工具性认识论理论。她总结道：“试图以认识论工具主义为基础为民主辩护，这种做法是自我削弱的。”¹⁰ 其他理论家也持相同看法。例如，肖恩·英格汉姆（Sean Ingham）指出：“任何令人信服的、为民主程序辩护的认识论论证，都必须预设对那些具有争议性的政治问题的答案。”¹¹

如果这些主张是正确的，那么我们至少面临四种选择，每一种都要求我们放弃民主、认识论的相关性，或纯粹工具性的政治合法性路径。这些选项是：

精英统治 (Epistocracy) 我们或许可以坚持认识论工具主义，但放弃民主制度。“精英统治论者”主张，我们应当采用任何能够促成明智且知情决策的政治程序。因此，参与政治决策的权利应仅限于具备必要知识或能力的个体。我们将在第10章探讨精英统治。目前，我们的关注点仍集中在民主理论之上。

非认知性工具主义 另一种选择是，我们可以在拒斥民主的认知性证成的同时，继续支持工具主义。非认知性工具主义者认为，民主之所以具有合法性或权威性，是因为它带来了非认知性的好处，例如政治稳定或社会福利。我们在第二章中曾简要提及这些观点，但在此仍将它们搁置一旁，因为我们的关注点在于政治合法性的认知性理论。

认识论程序主义 另一种选择是拒斥纯粹的工具主义，转而采纳一种混合观点，将民主的工具性证成与程序性证成结合起来。以埃斯特伦德 (Estlund) 为代表的认

识论程序主义者，试图在民主的公平与平等理想与做出明智决策的现实需求之间取得平衡。根据这一观点，无论是纯粹的程序性价值，还是单纯的工具性认识论价值，都无法单独为合法的政治决策提供充分证成。相反，我们必须确保政治决策是通过公平、包容且有利于作出准确判断的程序而产生的。

纯粹程序主义 最后，我们或许可以彻底放弃工具主义，转而拥抱程序主义，甚至可能带有某种认识论的转向。这一进路由纯粹程序主义者所倡导，他们主张政治决策的正当性源于决策的形成方式，而非其所产生的结果。决策程序所产生的结果之所以具有正当性，是因为它们是以恰当的方式（例如民主投票或公开辩论）产生的。传统上，纯粹程序主义观点是非认识论的，侧重于平等或公平等内在道德价值（参见第二章）。然而，近年来一些学者为纯粹程序主义的认识论版本进

行了辩护，彼得称之为“纯粹认识论程序主义”。

我们将在第5节探讨埃斯特隆德（Estlund）对认知程序主义的辩护，以及将在第6节探讨彼得（Peter）对纯粹认知程序主义的辩护。这些观点被提出作为对纯粹工具主义的认知民主理论的替代方案。与认知精英统治（epistocracy）和非认知工具主义不同，这些观点在保留对认识论相关性与民主价值双重承诺的同时，提供了对认知工具主义的另一种替代路径。在转向这些混合观点之前，我们将首先探讨认知民主主义者是否能在不诉诸程序要素的情况下回应权威困境（authority dilemma）。

3 重审这一困境

让我们回到标准民主认识论所面临的基本困境。我们将聚焦于这一挑战的认识论版本，其可概括如下：

认识论民主的认识论挑战 对民主的认识论辩护要求证明民主程序倾向于产生正确的决策。然而，

人们对于哪些决策是正确的，存在着广泛而持久的合理分歧。这一挑战在于：在不对哪些结果是“正确”的做出任何有争议的假设的前提下，证明民主程序是可靠的。

认识论民主主义者可能会如何回应这一挑战？

3.1 解决认知难题

应对这一挑战的一个颇具前景的策略是指出民主决策程序的一些普遍特征——例如包容性的审议和多数决投票——这些特征合理地使我们能够追踪真理。例如，约翰·斯图尔特·密尔

(John Stuart Mill) 认为，公共审议和言论自由能够提升我们在认知上取得进步的能力。如果我们认真考虑相互对立的观点，这将促进形成推理更为严谨、论据更为充分的意见。因此，社会将作出更加知情且平衡的决策。¹²

基于这一观点，认识论民主主义者主张，通过民主程序作出的决策具有推定的认识论优势。公开交换理由据称

能够使公民更好地了解政治议题，扩大思想与信息的来源，剔除错误论证和事实谬误，让我们意识到他人的观点，并增进我们对政治提案可能如何影响社会中不同群体的理解。¹³ 这种视角的多样性还有助于减少认知偏见和社会偏见，从而形成对社会世界更为客观的认识。¹⁴ 这凸显了公共讨论与辩论的重要性。

埃斯特伦德（Estlund）通过区分“实质性的”与“形式性的”认知价值，采取了类似的推理路径。一种实质性的认知解释提出某种关于正义或公共善的观念，并主张民主程序很可能依据该标准得出正确结果。相比之下，一种形式性的认知解释则旨在表明，无论对正义或公共善的最佳理解为何，民主程序都倾向于从正义或公共善的立场出发得出正确结果。¹⁵ 形式性进路并不对民主程序应产生的结果作出任何预设。

然而，怀疑论者可能会觉得这一论点缺乏说服力。他们或许会问：若不依赖于有争议的真理与正确性标准，我们如何评估民主程序的认识论质量？我们又如何确信审议能够带来认识论

上的改进？对此，我们认为传统的认识论民主主义者至少拥有三种策略可供运用。

策略1：校准

政治制度可以通过观察其在那些绩效相对无争议的案例中的决策表现来进行校准；然后，我们便可将这一结论推广至那些若直接评估绩效会引发过多争议的案例。埃斯特伦德（Estlund）提出了这一策略。他说，要检验民主程序是否能做出良好决策，我们应考察它们是否普遍避免了“首要之恶”（primary bads）。这些“首要之恶”包括任何合理观点都不会否认其重要性、必须加以避免的灾难，例如“战争、饥荒、经济崩溃、政治崩溃、流行病和种族灭绝。”¹⁶ 我们可以对各种政治制度在避免这些灾难方面的表现进行经验检验。如果民主制度在这些问题上表现尚可，这就表明其决策程序在更具争议性的问题上也倾向于做出良好决策。

此外，我们可以诉诸于一些非政治性案例，在这些案例中，正确答案更为

明确或广受共识。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在特定领域确立某些程序在认知上的可靠性，然后将这些发现外推至那些在最佳结果上存在合理分歧的领域。原则上，参与者在某一领域能够辨别真相的基本特质，也应适用于那些正确性标准更具争议的问题。这种方法有助于我们识别并验证某些程序所具有的认知美德，即使其所涉主题本身尚存争议。

这种方法的一个例证可见于雨果·梅西耶（Hugo Mercier）和丹·斯珀伯（Dan Sperber）的研究。他们提出了有力的证据，表明人们在共同推理时更为可靠。他们最引人注目的例子之一是沃森四卡选择任务（Wason four-card selection task）——一种旨在测试条件推理能力的逻辑谜题。在此任务中，参与者面前有四张卡片，每张卡片的一面显示一个字母或数字。随后，他们被要求检验一条规则的有效性，例如：“如果一张卡片的一面是元音字母，那么它的另一面就是一个偶数。”尽管个体在该任务中的表现通常较差，仅有约15%的参与者能正确作答，但小组讨论却显著提高

了成功率，高达80%的参与者能够得出正确答案。梅西耶和斯珀伯强调：“当不涉及论证时，群体表现令人失望”，这凸显了审议本身在提升认知可靠性方面的关键作用。这一发现有力地支持了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的理念，该理念强调包容性、理性讨论在集体决策中的重要性。沃森任务只是众多例证之一，表明在各种情境下，包容性的审议往往能提高群体找到某一问题正确答案的可能性。

诚然，诉诸校准（calibration）会引发关于外部效度的担忧。我们如何能够确信，在某一领域中可靠地导向真理的程序，也能推广到其他情境中，尤其是推广到混乱且充满争议的政治领域？这是一个重要的挑战。要推断民主程序是可靠的，我们就必须假定：某一领域（其中正确性的标准是清晰的）中程序所具有的认识论属性，可以暗示这些程序在另一领域

（其中正确性的标准存在争议）中的认识论价值。这一假定是可以被质疑的。¹⁷ 然而，这并不表明此类理论是“自我削弱的”或在概念上混乱的。相

反，它提醒我们在探讨政治制度如何促成良好结果时，应保持谨慎与谦逊。¹⁸

策略2：微型公众

民主审议的认知优势也在微型公众（mini-publics）的背景下得到了广泛研究。¹⁹微型公众是由少量、多元且随机选出的公民组成的小组，聚集在一起就政策议题进行审议。这些群体旨在代表更广泛的人口，并促进参与者之间开展知情且理性的讨论。

对微型公众（mini-publics）的研究一贯表明，当公民在有主持人协助的结构化环境中获得审议机会时，他们对所讨论议题的了解会变得更加充分。参与者通常能更深入地理解政策问题的复杂性，并接触到更广泛的观点与论据。这种接触有助于形成更加细致且经过深思熟虑的意见，同时也能更充分地认识到不同观点的正当性。²⁰

关于微型公众（mini-publics）研究的一个优势在于，它并不依赖于对何为“正确”政策结果的预设。相反，研

究人员通过审议前后的调查来衡量参与者对所讨论议题的了解程度。这些调查侧重于事实性信息，而非规范性判断，并基于这样一种假设：随着人们掌握更多信息，其观点更有可能接近真相。²¹ 除了衡量知识增长外，研究人员还通过要求参与者在审议前后分别阐述支持与反对相关政策的论点，来评估他们对多元观点的理解程度。这使得研究人员能够追踪接触不同观点如何拓宽参与者对该议题的理解。

当然，微型公众（mini-publics）的认识论价值并不能自动推广到所有形式的民主审议。微型公众讨论所具有的结构化和受引导的特性，在更为非正式或对抗性的环境中可能难以复制。然而，来自微型公众的经验证据为民主审议所蕴含的认识论潜力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的概念验证。在第十章中，我们还将探讨一些提案，主张将微型公众作为一种新型民主制度加以广泛运用。随着研究人员持续对微型公众及其他审议论坛展开研究，他们将有助于识别出最有利于实现认识

论成功的具体制度设计特征和话语规范。

策略3：改善现状

我们还可以评估某项特定决策是否优于现状，同时暂且搁置“哪种解决方案在综合考虑所有因素后最佳”这一问题。²² 这种做法转变了视角：我们不再问“这是正确的结果吗？”，而是问“我们是否摆脱了某种特定的不良状态？”

不难想到一些这种策略可能奏效的例子。例如，即使我们不知道促进经济增长的最佳方式，我们或许也知道，当前任何一种可行方案都比现状有所改进。²³ 同样，这一思路也适用于应对饥荒、贫困、高失业率、无家可归和暴力犯罪等问题。通常，我们并不清楚哪种解决方案最为有效，有时甚至无法确定某种方案在特定情境下是否有效。然而，即便如此，我们有时仍能达成共识，认为已经出现了针对具体情境的改善，即使“落败”的一方仍会坚持认为他们提出的方案本会好得多。

此处涉及“弱”与“强”政治认知主义之间的区分（参见第一章第七节）。弱政治认知主义将正确性的标准界定为避免重大伤害或错误，而强政治认知主义则更明确地将其界定为对真理的把握。²⁴ 因此，我们可以以两种方式之一来构建民主的证成性（epistemic）理由。首先，我们或许可以雄心勃勃地主张：民主在最大化真理方面具有证成性价值。或者，我们也可以更为谦逊地主张：民主在减少错误或避免灾难方面具有证成性价值。较弱的策略争议更小：知道不该做什么，总比知道什么才是最佳做法更容易。此外，这一较弱的策略或许仍能为民主提供足够有力的证成性基础。

总结迄今为止的讨论，我们探讨了认识论民主理论面临的一个核心挑战：需要证明民主程序倾向于产生正确的决策，而又不能预先假定哪些结果是“正确的”。我们提出了若干应对这一挑战的策略，包括利用无争议的案例来校准民主程序、从认识论可靠性更容易确立的非政治领域进行外推，以及借鉴关于微型公众（mini-pub-

lics) 的实证研究。这些方法旨在表明，原则上可以在不依赖有争议的正确性标准的情况下，确立民主的认识论价值。

然而，即使这一概念性挑战能够得到解决，认识论理论仍面临另一重大障碍：它们必须证明现实中的民主制度实际上在认识论上是成功的。这引出了这些理论所面临的第二个主要挑战。如果民主未能兑现其所承诺的认识论益处，那么对认识论工具主义的承诺将迫使我们放弃民主，转而采用在认识论上更为可靠的制度。就此而言，民主的认识论理论可能蕴含着自身潜在消亡的种子，因为它们将民主的正当性置于其相对于其他政体在认识论表现上的优劣之上。这一担忧构成了下一节的讨论方向。

4 我们应该将民主押注于认识论吗？

认识论工具主义者将政治制度与程序的合法性奠基于其结果的认识论质量

之上。因此，一个持续做出糟糕决策的政治体系缺乏合法性。

但我们是否应该将民主的正当性建立在其所谓的认知能力（epistemic competence）之上？如果我们在政治中引入认知维度，那么即便是民主最坚定的拥护者，一旦面对确凿的证据，也必须承诺放弃民主。认知理论家们意识到了这一担忧。埃斯特伦德（Estlund）写道：“引入认知维度的最大反对意见在于，它可能倾向于证成由‘知者’统治——我们可以称之为‘认知精英统治’（epistocracy）。”²⁵ 假设事实证明民主并非认知上最优的制度；或许一位仁慈的独裁者能够取得比人民统治更好的结果。那么，基于认知的考量就会将我们推向一种精英主义且威权的政府形式。一些哲学家愿意接受这一结论。²⁶ 但更多人则不愿如此。事实上，许多人恰恰为了避免放弃民主的风险，而拒绝以认知理由来证成民主。

因此，认识论民主主义者正在进行一种认识论上的赌博，可以表述如下：

认识论的赌注 将认识论维度引入政治，我们所冒的风险可能是损害而非支持民主的正当性。鉴于公众无知、认知偏见和错误信息等问题，民主的认识论能力备受争议。当认识论民主的支持者断言民主的正当性取决于其认识论能力时，他们实际上是将民主的正当性押注于其假定的认识论可靠性之上。

这是一场值得冒险吗？还是说，将民主的合法性建立在如此脆弱的认识论基础上太过鲁莽？

为了捍卫民主，有人可能会认为，认识论方面的考量并非决定性的。尽管民主制度倾向于产生正确决策这一特点，可能为我们提供了理由，使其优于其他政治制度，但这未必是唯一或决定性的因素。正如罗伯特·古丁

（Robert Goodin）和凯·施皮克曼（Kai Spiekermann）所言：“民主程序具有相当显著的认识论优势，但这并非支持民主程序的唯一理由，甚至可能并非主要理由。尽管如此，这无疑是民主的一项重要优点。”²⁷ 按照这种理解，即便威权主义在认识论上

更为胜任，我们也不必因此放弃民主。

然而，这种辩护很可能行不通。首先，即使认知美德并非民主的“唯一”或“主要”优势，大多数认知民主论者仍坚持认为，它是合法性的必要标准。因此，一个系统性地“犯错”的政治体制将缺乏合法权威。例如，埃斯特伦德（Estlund）主张，如果民主未能达到最低的认知标准——他将其设定为“优于随机”——那么民主就没有任何规范性权威，即无权要求人们服从其决定。同样，古丁（Goodin）和斯皮克曼（Spiekermann）也声称，“无能”会削弱民主的权威。²⁸ 因此，在对民主的证成中引入任何认知要素，本质上都是有风险的。

对此，有人或许会辩护一个较弱的论点，即追踪真理仅仅是民主的一个“增益性”特征，而非其合法权威的必要特征。然而，这一立场过于薄弱，不足以构成对民主的真正认识论辩护。

此外，关于认识论考量是否具有决定性，存在着显著分歧。兰德莫尔似乎认为它们确实具有决定性，因为她主

张我们应当偏好民主，因为民主是认识论上最优的政府形式。²⁹ 然而，埃斯特伦德则认为，仅凭认识论考量并不足以证成民主；相反，还需要其他程序性特征。不过，他的提议并未完全避免承担认识论上的风险。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认识论理论家将民主的合法性建立在一些更具争议性的假设之上：他们假定存在着规范性的政治真理，并且我们能够认知这些真理。这也是一种赌博。如果并不存在此类真理，或者我们无法认知它们，那么政治合法性就无法建立在任何此类事实基础之上。正如第一章所讨论的，我们认为至少在“弱”意义上存在一些可知的政治真理——即某些政治选择可以做得好或坏——这一观点是合理的。³⁰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会被这一主张所说服。

回顾一下，我们已探讨了对认知民主（epistemic democracy）提出的两项挑战。第一，它面临“权威困境”（authority dilemma）：诉诸认识论来证成民主决策，要么是多余的，要么就不是真正基于认识论的。第二，它有将民主不合理地押注于认识论之

上的风险。这些担忧已足够严重，且针对它们的回应又颇具争议，因此有必要考虑标准认知民主模型之外的替代方案。

5 认识论程序主义

在第二章中，我们对比了程序主义与认识论工具主义。然而，这种对比可能是人为的。认识论标准或许与程序主义相容。在本节中，我们将考察一种具有这种形态的观点：埃斯特伦德的认识论程序主义。

根据埃斯特伦德（Estlund）的观点，程序性考量与认知性考量在证成民主时都至关重要。与纯粹的程序主义者不同，埃斯特伦德并不认为仅凭程序性价值就足以证成民主；但与许多认知民主论者不同，他也不认为仅凭认知性考量就足以证成民主。相反，他主张，在所有道德上可接受的替代方案中，民主在认知上是最优的。³¹

尽管某些政治体制（如知识精英统治）可能在认识论上优于民主制，但它们因非认识论的理由而被排除。例

如，埃斯特隆德（Estlund）认为，知识精英统治本质上是不公正的，因而不可接受。这是因为该体制要求对哪些公民更聪明或更有能力作出“贬损性的比较”，而这类比较存在合理的分歧。³² 因此，据埃斯特隆德所言，我们可以基于道德理由否决知识精英统治。然而，仅凭道德考量仍会留下若干可接受的选项，包括民主制、抽签决策和无政府状态。要在这些选项之间作出选择，我们必须考虑认识论因素。

我们应该诉诸哪些认识论因素？根据埃斯特隆德（Estlund）的观点，“民主法律之所以具有正当性和权威性，是因为它们是通过一种倾向于作出正确决定的程序产生的。”³³ 然而，此处需要两点澄清。首先，民主决策程序不太可能是追踪所有真理（例如科学真理）的最佳手段。更合理的理解是，埃斯特隆德主张：在所有可接受的选项中，民主在追踪规范性或道德真理方面具有优越性。³⁴ 其次，一项法律或政策的正当性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其正确性。这种“正确性理论”过于强调认识论，意味着政治决策的正当

性完全取决于其准确性。而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中，人们对于哪些决策是正确的，必然存在合理的分歧。³⁵ 因此，使民主程序产生的结果具有正当性和权威性的，并非其正确性，而是该民主程序本身的认识论可靠性。

为了阐明这一观点，埃斯特伦德举了一个陪审团审判的类比：

当陪审团审判恰当地进行时，其所产生的裁决似乎不仅具有法律效力，也具有一定的道德力量……如果陪审团审判不具备相当显著的认识论优势，它就不会拥有这种道德力量。复杂的证据出示、证人作证、交叉质询、对抗双方的平等地位，以及陪审团的集体审议，所有这些环节共同促成了审判——尽管远非完美——仅在被告有罪时才予以定罪，并且不会让过多罪犯逍遥法外的能力。倘若审判缺乏这种倾向，而是以某种随机方式决定谁受惩罚、谁获释放，那么就很难理解为何治安维持者或狱卒应当对其给予多少重视。因此，其认识论价值是这一论述中的关键部

分。正因其部分源于这种认识论价值，审判的裁决（在一定限度内）即使错误，也仍具有道德约束力。根据这一观点，裁决的约束力与正当性并非源于裁决本身的正确性，而是源于产生这些裁决的程序类型。然而，该程序之所以具有此种重要性，其核心特征之一恰恰在于它的认识论价值。36

换句话说，准确性本身并不能确立决策的有效性；相反，它有助于使民主决策具备合法性的潜力。埃斯特伦德将此称为“认知程序主义”。

值得强调的是，埃斯特伦德（Estlund）的观点在认识论上是多么谦逊。他认为，民主法律之所以具有合法性和权威性，是因为它们源自一种倾向于做出正确决策的程序。³⁷ 因此，我们只应期待最低限度的认识论表现，即决策结果优于随机选择。埃斯特伦德推测，民主制度部分得益于协商所具有的认识论价值，能够达到这一最低限度的认识论门槛。此外，他还主张，在所有道德上可接受的替

代方案中，民主是认识论上最优的制度。

这与两种不那么谦逊的观点有所不同。首先，兰德莫尔（Landemore）认为，民主比其他任何政府形式都更善于追踪真理。³⁸ 其次，基于陪审团定理（CJT）的论点主张，随着选民规模的扩大，民主程序将趋近于绝对无误。³⁹ 埃斯特伦德（Estlund）理论的一个优势在于，它并不要求民主程序具有高度准确性，即可在认识论基础上为民主提供正当性。

总之，埃斯特伦德（Estlund）挑战了自柏拉图以来民主理论中普遍存在的非此即彼的二分法。我们不必在以下两者之间做出抉择：要么以牺牲平等参与为代价优先考虑认知质量，要么以牺牲认知目标为代价追求平等与公平。相反，我们可以将埃斯特伦德的观点置于一个连续谱系之中：一端是认知性不足的理论（如公平程序主义），另一端则是过度强调认知性的理论（如知识精英统治，epistocracy）。认知程序主义（epistemic proceduralism）的优势在于，它融合了程序主义与认知主义两

种路径的优点，同时有望避免各自所伴随的问题。这正是埃斯特伦德观点的一大优势：他开辟了一个概念空间，使得我们可以为一种兼具认知性与程序主义的民主观进行辩护。

5.1 对认识论程序主义的异议

埃斯特伦德的认识论程序主义是对民主理论的一项重要贡献。它挑战了传统程序主义的观点，即民主决策的合法性仅源于公平的程序；同时，它也避开了针对纯粹认识论理论的常见批评。尽管如此，认识论程序主义自身也面临一些批评，我们现在就来探讨这些批评。

首先，埃斯特伦德（Estlund）推测，民主在达成正确决策方面优于随机选择。然而，一些人认为这一认识论要求“不可行”，因为无法确定选择一项公正政策的“随机”概率。⁴⁰ 将民主与陪审团类比具有误导性，因为陪审团面对的是预先设定且严格受限的选项：有罪或无罪。相比之下，民主制度并未被提供一套固定选项。正如伊丽莎白·安德森（Elizabeth Ander-

son) 所言：“民主政府最大的任务在于构建政策选项，即通过调查哪些问题值得采取公共行动，并设想针对这些问题的各种可能政策回应。”⁴¹ 这些选项并非固定或明确定义的，因此很难判断公民在找到正确结果方面是否优于随机选择。（这一反驳也适用于其他认识论理论。）

其次，埃斯特伦德（Estlund）并未为其主张——即民主即便仅满足“优于随机”的最低认知门槛——提供充分的证据。杰拉尔德·高斯（Gerald Gaus）写道：“我无法在[埃斯特伦德的论证]中看出一个在公共理性范围内得到充分辩护的论点，以证明民主作为一种立法程序，总体上优于随机选择，能够更好地契合政治真理（无论政治真理究竟为何）。”⁴² 兰德莫尔

（Landemore）指出：“埃斯特伦德……实际上并不真正致力于提供确凿的证据，以证明民主可以被合理地预期满足这一最低[认知]要求。”⁴³ 彼得（Peter）则认为，埃斯特伦德“并未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说明持续存在争议的民主审议究竟具有何种认知价值。”⁴⁴ 如果连最低认知门槛都

无法满足，那么按照埃斯特伦德本人的标准，民主便不具备任何权威性。因此，埃斯特伦德的观点同样未能回避权威困境的认知版本，因为我们缺乏一种独立于程序本身的标准，用以评估民主的认知价值。

第三，埃斯特伦德（Estlund）之所以能够避免得出“合法性认识论标准必然意味着承诺精英统治（epistocracy）”这一结论，仅仅是因为他诉诸了非认识论的、程序性的政治合法性依据。正如他所承认的，民主之所以优于大多数人们普遍担忧的替代方案——例如精英统治、独裁和寡头政治——并非因为民主在认识论上更优越，而是因为那些替代方案无法满足“合理可接受性”（reasonable acceptability）这一标准。因此，埃斯特伦德对民主的辩护本质上是非认识论的。这再次印证了一种观点：单靠认识论标准，可能会更倾向于支持精英统治程序而非民主程序。尽管埃斯特伦德视此为其理论的优点，但其他人或许会将其视为一种缺陷。通过退守到程序性价值，埃斯特伦德实际上将认识论阵地让给了他的批评者。这

或许并非最佳策略。如果民主在产生正确或公正结果方面不如其他统治形式可靠，那么我们说服同胞相信民主是最好的政治制度的前景将大打折扣。⁴⁵ 认识到这一潜在弱点，乔纳森·本森（Jonathan Benson）和兰德莫尔（Landemore）采取了另一种策略，主张民主制度在发现和落实规范性真理方面实际上优于精英统治制度。

第四，认识论程序主义无法回避布伦南（Brennan）所认为的对程序主义观点“毁灭性且决定性的”反驳，即程序主义可能会使不道德的决定合法化，例如允许父母对子女实施身体虐待（参见第二章）。在埃斯特伦德

（Estlund）看来，这类结果在民主社会中（相较于认识论上更劣等的制度安排）发生的可能性较小。然而，只要这一不道德的结果是由一种总体上可靠的民主决策程序所产生的，在埃斯特伦德看来，它仍会被视为合法的。

最后，埃斯特伦德或许无法回避将民主押注于认识论所带来的挑战（见第4节）。尽管埃斯特伦德的混合理论

能够削弱这种认识论赌博的力度，却并未完全摆脱它。对埃斯特伦德而言，民主必须是在包括无政府状态和抽签遴选在内的各种可接受替代方案中认识论上最优的制度。如果民主在认识论上逊于其中任何一种替代方案，或其可靠性不如随机选择，我们就必须放弃民主。

6 纯粹认知程序主义

为了提出一种民主的认识论论证，是否有必要诉诸民主作出正确决策的能力？彼得并不这么认为。她主张，与其关注民主程序所产生的结果，不如根据程序本身所具有的认识论价值来评价民主。具体而言，彼得声称民主审议具有内在的认识论价值——也就是说，无论其所产生的决策是否正确，它本身就具有价值。在彼得看来，民主审议能够培养诸如问责、公平和责任等认识论美德，这些美德的价值“超越了作出正确决策本身的价值”。⁴⁶ 因此，她的观点可被视为一种审议式认识论民主（参见第二章）。

与传统的民主认识论不同——后者聚焦于工具性的认识论价值（即产生良好的结果）——彼得将注意力转向了通过探究过程所实现的程序性认识论价值。这些“程序性认识论价值”包括诸如认识论公平（epistemic fairness）之类的原则——即所有参与审议者都有平等的机会表达自己的观点——以及认识论问责（epistemic accountability）——即参与者需以他人能够审查和评估的理由来证成自己的主张。根据彼得的理论，一项决定之所以具有正当性，并非因为它符合某种独立的真理，而是因为它源自一个能够促进负责任的认识论能动性的程序。47

彼得的理论与其他认识论理论（如埃斯特伦德的认识论程序主义）的不同之处在于，其“认识论上良好”的结果并非独立于决策过程来界定。对于传统的认识论民主主义者而言，民主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之所以具有正当性，是因为它倾向于产生符合独立真理的决策。然而，对于纯粹的认识论程序主义者来说，民主的认识论价值仅从程序本身来理解。因此，民主决策的

正当性并非取决于其结果是否符合某种独立真理，而是取决于程序本身是否体现了认识论上的公平性与认识论上的问责性。彼得认为，只要一项民主决策源自一个同时满足政治公平与认识论公平标准的过程，该决策便是正当的。⁴⁸

为了帮助阐明她的观点，彼得借鉴了近期关于同行分歧认识论的研究。“同行分歧”指的是这样一些情形：在知识和推理能力上大致相当（即认识论意义上的同行）的个体对同一问题持有不同看法。在认识论领域，学者们争论人们应如何应对这类分歧。彼得强调了该文献中的两个关键主张：第一，某些分歧是持续存在的，即理性的人可能持续持有不同意见；第二，当出现此类分歧、尤其在没有任何明确解决方案的情况下，争论各方有时应调整自己的信念。

彼得认为，民主审议体现了这种动态，并具有认识论价值，原因有二。首先，它使我们能够揭示政治领域中持续存在的分歧案例。其次，它鼓励参与者在面对合理的分歧时调整自己的信念，从而培养一种认识论上的谦

逊态度和相互问责意识。通过这种方式，民主审议促使个体成为更具责任感的探究者，迫使他们认真对待对立观点的存在，并以诚意与之进行交流。⁴⁹

彼得观点的一个吸引人之处在于，它在民主正当性论证中保留了认识论考量的核心地位，却无需依赖政治领域中客观“正确”结果的存在或可知性。彼得的理论并非根据民主程序是否产生“正确”结果来评价这些程序，而是将认识论考量直接纳入决策程序本身。它追问的是：该程序是否公平、包容，并促进认识论上的德性。⁵⁰通过这种方式，彼得避免了权威困境（见第1节）。具体而言，由于彼得并不依赖独立于民主程序之外的结果来证成民主，她便绕开了这样一个难题：为了宣称民主在认识论上具有正当性，必须事先知道什么是正确结果。此外，通过聚焦于认识论程序而非结果，彼得的观点也避免了“赌注异议”（见第4节）——该异议担忧，若将民主的正当性过度系于其认识论上的成功，反而可能危及民主本身。

然而，有人可能会基于以下理由反对彼得的观点：如果民主审议的认识论价值就在于程序本身，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即便公共审议降低了参与者信念的准确性，它依然具有认识论价值。彼得愿意接受这一结论。⁵¹ 但其他人可能会认为这难以置信。倘若所谓的认识论价值对信念和决策的准确性毫无助益，我们为何还要在意这些价值呢？对于真理主义（即认为真理是首要的认识论价值）和认识论后果主义（将认识论价值与良好结果相联系）的支持者而言，将认识论价值与信念或决策的准确性割裂开来，几乎毫无意义。此外，彼得的观点可能面临与其他纯粹程序性合法性理论相同的挑战。⁵²

在下一节中，我们将探讨另一种关于认知能动性（epistemic agency）如何恰当地支持民主合法性的观点。根据这一观点，民主的反对者不仅仅是错误的——他们是非理性的。

7A 民主的实用主义认识论论证

在本节中，我们探讨一种支持认知民主的实用主义论证。包括约翰·杜威（John Dewey）和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在内的众多实用主义思想家，都曾试图从认知的角度为民主辩护。⁵³ 由于篇幅所限，我们聚焦于两位当代实用主义者——谢丽尔·米萨克（Cheryl Misak）和罗伯特·塔利斯（Robert Talisse）。他们基于美国实用主义奠基人之一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C. S. Peirce）的著作，发展出一种对民主的证成。⁵⁴

简而言之，支持民主的实用主义认识论论证如下：

实用主义认识论论证

1. 作为信徒，我们致力于基本的认识论原则。
2. 这些基本的认识论原则蕴含着某些认识论上的承诺。

3. 这些认识论上的承诺蕴含着对民主的承诺。

米萨克 (Misak) 和塔利斯 (Talisson) 旨在通过依赖关于信仰者的一些最低限度且普遍的假设，来支持民主的合法性。塔利斯指出：“实用主义认识论审议民主论者认为，一种完整的民主观念可以从少数几条认识论上的自明之理中推导出来。”⁵⁵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逐一审视该论证的每一步。⁵⁶

第一步：基本认识论原则

米萨克 (Misak) 与塔利斯 (Talisson) 首先断言，作为信念持有者，我们都承诺接受某些基本的认识论原则。对米萨克而言，这些原则涉及信念、理由与真理之间的关系。她强调了信念的两条构成性规范：（1）我们力求自己的信念为真；（2）当我们持有一种信念时，便承诺以理由和证据为其辩护，并在持续的论证或证据证伪该信念时放弃它。⁵⁷ 这些规范体现了这样一种观念：信念必须对理由负责。

塔利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民间认识论”的五项原则，这些原则与米萨克提出的两条规范密切相关，但表述得更为详尽：

1. 相信某个命题 p ，就是相信 p 为真。
2. 相信 p 为真，就是认为 p 得到了最佳的理由、证据和论证的支持。
3. 认为某个命题 p 得到了最佳理由、证据和论证的支持，就承担了在被要求时阐明自己的理由、证据和论证的义务。
4. 阐明自己的理由，就是进入一个理由交换的社会过程。
5. 参与理性交换的社会过程，至少在隐含层面上意味着采纳某些与自身认知品格相关的认知规范和倾向性规范。58

让我们将这套原则和规范称为“基本的认识论原则”。根据米萨克（Misak）和塔利斯（Talissee）的观点，这些原则是如此基础，以至于任何人都无法否认它们。作为信念持有者，我们已然承诺接受这些原则。

第二步：认知承诺

下一步涉及从这些认识论原则转向一套关于我们应如何开展真理探索的承诺。塔利斯（Talissee）认为，作为负责任的信念持有者，我们有义务与他人互动，尤其是那些经验与观点不同于我们自身的人。这是因为探求真理需要直面新颖且陌生的挑战。⁵⁹ 由此，塔利斯推导出某些认识论规范——例如包容、平等和参与——来指导我们在探究过程中的互动。我们承诺包容，是因为我们必须“认真对待批评者的理由与论证”，才能负责任地追求真信念。⁶⁰ 我们承诺平等，是因为每个人都平等地拥有表达自身信念并以理由和论证为之辩护的权利。我们承诺参与，是因为压制异议、仅咨询与我们意见一致者，在认识论上是适得其反的。

第三步：认识论承诺蕴含民主

最后一步是这样一个主张：对这些认知活动的承诺蕴含着对民主的承诺。如果我们想要进行开放的审议和理性的交流，就需要一种政治环境来保障

某些权利与自由，例如言论自由、受保护的异议权以及获取信息的渠道。据塔利斯（Talissee）所言，民主是那种最能使我们作为信念持有者践行自身认知承诺的政治制度。他写道：

只有在民主制度中，个体才能行使恰当的认知能动性；换句话说，只有在民主制度中，一个人才能成为恰当的信念持有者。既然我们已然承诺于恰当的信念持有，我们就隐含地承诺于民主政治。⁶¹

因此，实用主义论证表明，反民主者按照他们自己的标准来看是不理性的。如果我们真正追求真理，就需要一个由熟悉的民主规范（例如包容、平等和参与）所支配的政治制度。事实上，米萨克（Misak）和塔利斯

（Talissee）断言，整套民主规范都可以从他们的实用主义认识论中推导出来，包括言论自由、公开辩论、信息自由、受保护的异议权以及问责制等自由权利。相比之下，在一个反民主或极权主义社会中，“信息受到严格控制，论点与理由的交流遭到压制”，这与恰当的信念形成是不相容的。⁶² 因

此，米萨克和塔利斯似乎持这样一种观点：民主不仅是比道德上可行的其他选项在认识论上更优的政治制度，而且是认识论上最佳的政治制度——这一观点与兰德莫尔（Landemore）相同，但遭到埃斯特伦德（Estlund）的反对。

实用主义对认知民主的辩护似乎避开了标准认知民主辩护所面临的两大挑战。首先，它避免了权威困境，因为它并不依赖任何外在的真理标准，而是诉诸于构成信念本身的标准。其次，它不会冒“将民主押注于认识论”的风险。从实用主义的观点来看，民主在认知上失败在概念上是不可能的，因为正是民主使得信念的恰当运用和对真理的追求成为可能。

7.1 对实用主义的异议

尽管有这些优势，实用主义对民主的证成并非没有受到批评。例如，埃娃·厄曼（Eva Erman）和尼古拉斯·默勒（Niklas Möller）认为，我们可以接受实用主义者的基本认识论原则，而无需诉诸民主。他们写道：

很难否认，平等、参与和包容这些民主规范是民主理论中的基本属性和核心概念。但我们怀疑，这三种——名称相同但内容各异——对平等、参与和包容的认识论承诺能否真正实现这一目标。

63

以平等为例，存在许多民主制度之外的替代方案，同样能够尊重对认知平等（epistemic equality）的承诺。我们可以设想一种专家统治的形式，它维持公民作为认知上的平等者和平等参与者的条件（如言论自由、开放的公共空间、信息自由等），但根据才能或能力来分配政治权力。事实上，密尔（Mill）恰恰持这种观点：他认为言论自由和公共理性对于个人与社会的繁荣至关重要，但他同时支持精英治理的理念，主张给予受过教育者更多的投票权（参见第十章）。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在不实行政治平等的情况下维护认知平等。也就是说，我们可能平等地拥有表达自身信念和参与说理的权利，但未必在决策过程中拥有同等的影响力。

同样，埃尔曼（Erman）和默勒（Möller）认为，认知参与（epistemic participation）并不必然导向民主参与，认知包容（epistemic inclusion）也并不自动带来民主包容。就前者而言，参与求真探究（truth-seeking inquiry）与参与民主过程截然不同。他们写道：“我们可能是恰当的信念持有者（proper believers），即遵循认知承诺（epistemic commitments）的信念持有者，却仍无力影响集体决策。”⁶⁴ 如果一个人选择不以民主行动者的身份参与公共领域，尚不清楚这会如何违反任何认知承诺。就后者而言，从认知包容推导出民主包容蕴含着激进的意涵。例如，巴西民众可能就瑞典的育儿津贴提出具有说服力的论点，这为将其论点纳入审议提供了充分理由。然而，若据此推断他们因此拥有对该议题的投票权，则似乎难以令人信服。因此，米萨克（Misak）和塔利斯（Talisso）所阐述的认知承诺未必必然迫使我们支持民主制度。他们试图从若干相对温和的认识论原则中推导出过多实质内容。⁶⁵

最后，实用主义的认识论论证可被批评为过于还原论。它似乎将政治探究简化为科学探究，并将民主公民身份简化为对真理的追踪。这种基础可能过于狭隘，不足以证成民主，因为它忽视其他重要的政治价值，例如自主性、正义与相互尊重，而这些价值并非纯粹属于认识论范畴。

8 超越真理的认识论民主

民主的认识论理论也可能因其对真理的执迷而受到批评。如第二章所述，认识论民主通常被界定为对真理的追踪。这种界定预设了一种“真值主义”

(veritistic) 的认识论价值理论，即认为真理是唯一根本的认识论善。然而，民主制度可能追求其他认识论善，例如证成的信念 (justified belief)、理解 (understanding) 或避免错误 (error avoidance)。例如，高斯 (Gaus) 主张，自由民主理论应强调证成的信念。⁶⁶詹姆斯·博曼

(James Bohman) 则认为，民主应主要聚焦于避免错误。⁶⁷迈克尔·汉农 (Michael Hannon) 强调，共情式

理解（empathetic understanding）应作为政治中的关键认识论目标。杜威（Dewey）则主张，民主寻求对社会进步的反思性认可（reflective endorsement）。这些都属于民主的认识论理论，但它们并不唯独聚焦于真理。

但这些非真理性观点是否合理呢？尽管我们无法在此全面探讨这些替代方案的丰富性与多样性，但仍可大致评估其潜力。首先，回顾一下权威困境（authority dilemma）——无论是其原始形式还是认识论形式（见第1节和第3节）。这一困境之所以出现在传统的民主认识论理论中，是因为它们诉诸于程序无关的“正确性”标准来证成民主。问题在于：如果我们已经知道何为正确的标准或结果，那么诉诸民主程序似乎就显得多余；反之，如果我们并不知道这些标准或结果，却仍坚持采用民主程序，那么我们就不再是在为民主提供一种认识论工具主义的辩护了。

非真理性理论或许可以规避这一困境。例如，强调证成信念（justified belief）的理论无需对哪些结果是“正

确”的做出有争议的假设。一个人的信念是否得到证成，主要取决于信念形成的过程，而非外在的真理。同样，杜威的实用主义观点完全避免诉诸真理，而是聚焦于我们通过反思性探究所认可的程序性改进。正如迈克尔·弗斯坦（Michael Fuerstein）精辟地总结道：“对杜威而言，政治探究关乎找出能够使我们共同繁荣的社群实践之改进；而这一事业的成功标准，正是我们对所产生变革的反思性认可。”⁶⁸此外，共情式理解（empathetic understanding）在政治中可能具有重要意义，无论其是否与真理相关。简言之，诸如证成信念、反思性认可和理解等价值，即便在缺乏关于正确答案的知识的情况下，也都可以成为有价值的认知成果。

这使我们回到前文（第4节）所讨论的认识论上的赌注问题。非真理主义者是否以一种令人质疑的方式将民主押注于认识论之上？根据定义，任何版本的认识论工具主义都将自身的命运寄托于认识论的希望之上，非真理主义观点也不例外。这种做法是冒险的还是鲁莽的？一场赌注的价值取决

于其胜算与赌注大小。避免错误的标准低于获得真理的标准。因此，押注于民主获得回报的概率更高。即便错误规避观将民主置于认识论的支配之下，只要获胜的概率足够高，这种做法或许就并非有问题。

对于其他非真理主义（non-veritist）的主张而言，获胜的几率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由我们掌控。尽管我们可能因世界不配合而无法获得真理，但在困难条件下，我们仍可获得得到证成的信念、反思性认可或理解。只要获得这些认知善品比获得真理更在我们的掌控之中，那么对于非真理主义者来说，这种认识论上的赌注可能风险更小，因为他们的关注点在于那些更容易实现的善品。

一位真理主义者会如何回应？他们可能会主张，诸如证成信念或理解之类的认知善的价值，归根结底仍取决于它们与真理的关联。正如汉农在讨论共情式理解时所承认的那样：“或许我们根本无法完全摆脱真理。”⁶⁹ 真理主义者或许会怀疑，非真理主义观点之所以能引起关注，仅仅是因为它们暗中预设了真理主义的承诺。归根结

底，是否有必要或可取地诉诸真理，以认知理由来证成民主制度，这一点仍然存在争议。

对于非真理主义观点而言，最后一个问题是经验性的，而非规范性或概念性的。这些观点通过民主制度促进真理之外的认识论价值（epistemic goods）的能力来为民主及其程序进行辩护。然而，鉴于当代民主所面临的诸如错误信息、两极分化和非理性等问题，我们或许会质疑它们是否真的实现了这一目标。民主制度是否确实促进了理解与证成信念（justified belief）等认识论价值？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鼓励读者反思民主制度在促进这些认识论价值方面的能力。民主制度是否真正在实现这些目标上取得了成功，抑或其他政治制度可能表现得更好？

9摘要

本章探讨了认识论民主理论所面临的各种挑战，并尝试对这些挑战作出回应。我们首先审视了认识论民主的一

个关键困境：若不对哪些结果是“正确”的做出有争议的假设，我们如何能够知道民主程序是否可靠？如果我们已经知道正确答案，民主程序似乎就变得多余；但如果我们无法获知正确的标准，那么从认识论角度为民主辩护就会变得困难。

随后，我们考察了对这一困境的若干回应。一些理论家认为，我们可以根据民主程序避免明显不良结果的能力来对其进行评价。另一些人则关注民主过程的内在认知价值，认为民主参与能够培养诸如开放性和问责制等认知美德。受C. S. 皮尔士启发的实用主义进路从基本的认知原则中推导出对民主的承诺，而非真理导向（non-veritist）的理论则强调超越真理的认知价值。这些理论展现出一定的前景，但它们是否能成功地在认知基础上为民主提供正当性，仍有待商榷。

归根结底，认识论民主（epistemic democracy）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或许在于经验层面，而非理论层面。当代社会面临着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似乎威胁着民主制度的认识论潜能。在下一章中，我们将探讨对现实世界民

主制度最紧迫的认识论批评之一：选民的无知。政治知识通常被视为民主公民身份的必要条件。然而，数十年来的研究始终一致地发现，普通选民对于基本政治信息的了解程度令人震惊地低下。这引发了一些紧迫的问题：选民是否因过于无知而无法实现自治？若缺乏具备知识的选民群体，民主制度还能否有效运作？公民是否负有获取政治信息的道德义务？我们将在下一章中探讨政治无知的程度及其影响，并考察对这一现象的解释与应对尝试。

注释

1. Peter2016: 138。
2. Kelsen 1955: 2、Waldron 1999: 252–254 和 Valentini 2012: 191 提出了一个类似的挑战。
3. Peter2016: 134。
4. Peter2016: 134。
5. Gaus 2011; Ingham 2013。

6. Dahl 1989; Estlund 2008;
Rawls 1993; Waldron
1999。
7. Peter2023。
8. 凯尔森1955: 2。
9. Peter2023: 85。
10. Peter2016: 133。
11. 英格汉姆2013: 149。
12. 密尔 [1859] 2001年。
13. Anderson 2006; Dewey
[1927] 2012; Estlund
2008; Landemore 2012a;
Martí 2006; Mill [1859]
2001; Young 1997。
14. Mercier 和 Sperber, 2017
年。
15. 埃斯特伦德2008年: 第169
页。
16. 埃斯特伦德2008年: 第163
页。
17. 英格汉姆2013: 148–149。
18. 贝内特女士。
19. Fishkin2018。
20. Fishkin 2009。
21. Fishkin2018。
22. Gerlsbeck2018。
23. Gerlsbeck2018。

24. Landemore 2012a: 211–213。
25. Estlund 2008: 7。
26. Brennan2016a。
27. 古丁与斯皮克曼2018: 312。
28. 古丁与斯皮克曼2018: 309。
29. Landemore2012a。
30. Landemore 2012a: 210。
31. 埃斯特伦德2008年: 第8、42页。
32. 埃斯特伦德2008年: 第36页。
33. Estlund 2008: 8。
34. Estlund 2008: 5, 24; Gaus 2011。
35. 埃斯特伦德2008: 99–102。
36. 埃斯特伦德2008年: 第19–20页。
37. 埃斯特伦德2008年: 第8、107、171页。
38. Landemore 2012a。
39. List and Goodin 2001。
40. 安德森2008: 134。
41. 安德森2008: 134。
42. Gaus2011: 299。
43. Landemore 2012a: 6。
44. Peter2009: 116。

45. Benson2024: 235。
46. Peter2016: 141。
47. Peter2008。
48. Peter2009: 3。
49. Peter2013。
50. Peter2016: 134。
51. Peter2016: 142。
52. Min 2016; 另见第2章。
53. Anderson 2006; Bohman
2007; Dewey [1927]
2012; Habermas 1996。
54. Misak 2002; Misak 和 Ta-
lisse 2014; Talisse 2009a。
55. Talisse2014: 128。
56. 我们对他们论点的概述严格遵
循了Erman和Möller (2016)
的论述。
57. Misak2004: 12。
58. Talisse 2009a: 87-88; 另见
Talissee 2009b。
59. Talisse2014: 127。
60. Talisse2009a: 124。
61. Talisse2009a: 121。
62. Talisse2009a: 122。
63. 埃尔曼与默勒, 2016年: 第
463页。

64. 埃尔曼与默勒，2016年：第466页。
65. Talisse 2014：128 承认了这些担忧。
66. Gaus1996。
67. Fuerstein2021。
68. 弗尔斯坦2021：81–82。
69. Hannon 2020：606–607。

更多资源

- 巴格，塞缪尔（2018）。《大众的力量：回应民主的认知道德挑战》。《美国政治科学评论》112.4，第891–904页。
- 本森，乔纳森（2024）。《智能民主：回应新民主怀疑论》。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
- 高斯，杰拉尔德（1996）。《证成自由主义：认识论与政治理论论稿》。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
- 汉农，迈克尔（2020）。《共情理解与协商民主》。《哲学

与现象学研究》101.3, 第591–611页。

- 英格汉姆, 肖恩 (2013) 。
《分歧与民主的认识论论证》。《政治、哲学与经济学》12.2, 第136–155页。
- 勒普特尔, 马克西姆·C.
(2022) 。《政治理解》。
《英国政治科学杂志》53.2,
第346–365页。
- 米萨克, 谢丽尔 (2002) 。
《真理、政治与道德: 实用主义与商谈》。伦敦: 劳特利奇出版社。
- 彼得, 法比安妮 (2016) 。
《民主的认识论境况》。载于
迈克尔·布拉迪与米兰达·弗里克
主编, 《群体的认识论生活:
论集体认识论的论文集》。牛
津: 牛津大学出版社, 第133–
149页。
- 萨马尔日贾, 哈娜 与 夸西姆·
卡萨姆 (编) (2023) 。《民
主的认识论》。纽约: 劳特利
奇出版社。
- 塔利斯, 罗伯特·B.
(2009) 。《常识认识论与民

主的证成》。载于《真理重要吗？民主与公共空间》，拉夫·赫嫩斯与罗纳德·廷内费尔特编，荷兰施普林格出版社，第41-54页。

4 政治无知

DOI:10.4324/9781003089483-5

现在似乎已达成一种共识：……
大多数公民对政治的了解和思考
少得令人瞠目结舌。——罗伯特·
卢斯金

引言

民主公民身份的一个关键要素是对政治的了解。正如詹姆斯·麦迪逊

(James Madison) 曾言，一个缺乏知情公众的民选政府“不过是闹剧或悲剧的序幕，抑或两者兼而有之。”¹ 在《美国人对政治的了解及其重要性》(What Americans Know about

Politics and Why It Matters) 一书中——这是关于选民知识最权威的研究之一——作者宣称：“民主制度在公民具备政治知识时才能发挥最佳效能。”² 然而，公民是否具备足够的知识以负责任地投票？他们能否胜任地行使对他人施加影响的政治权力？

过去60年中，政治学领域最一致的发现之一，便是公民在政治知识方面的惊人匮乏。普通选民甚至对最基本的政治信息都一无所知，例如他们的民选官员是谁、这些官员的对手持何种观点，以及近年来通过了哪些重要法律或政策。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在2012年进行的一项民调发现，只有53%的美国公众将共和党与支持小政府联系起来，61%的人将共和党与限制堕胎联系起来，而67%的人则将民主党与对富人征收更高税收联系起来。在该民调进行的那一年，最后一个问题正是民主党最关注的议题之一。

对于那些对政治感兴趣的人来说，很容易忘记大多数人对政治议题的了解竟是如此之少。如果你正在阅读本书，那么你可能生活、工作和社交

于一群政治知识非常丰富的人之中。然而，一旦我们走出自己的社交圈，就会发现公众的政治知识状况相当堪忧。以下是一些著名政治学家对选民无知程度和深度的看法：

公众在政治方面极度无知……[这一点]是社会科学所取得的最有力的发现之一——甚至可能是最有力的发现。4

大多数选民个人所表现出的无知之深，可能会令不熟悉相关研究的读者感到震惊。5

对于研究公众舆论与民主的学生而言，最令人震撼的莫过于大多数人所掌握的政治信息之匮乏。
6

有整本书专门记录公民对政治知之甚少的程度，例如《美国人对政治了解多少以及为何这很重要》《认知的陷阱》以及《民主与政治无知》。⁷ 我们向任何希望寻找公众无知之令人沮丧证据的人推荐这些著作。后一项研究指出：“在2000多个政治问题中，仅有13%的问题能被75%或以上的受访者正确回答。”这些问题并非仅仅是

政治琐闻。恰恰相反，“公众中仅有少数人掌握的许多事实，对于理解——更不用说参与——政治世界而言，似乎至关重要。”⁸

请考虑以下这个引人注目的例子。平均而言，美国人认为国家预算中有25%用于对外援助。而实际上，这一比例还不到1%的四分之三。只有5%的人知道这一事实。此外，每十人中就有一人认为每年有超过50%的预算拨给了其他国家！然而，民众却被期望就倡导不同国家支出政策的候选人和政纲进行投票。如果他们对当前实际支出金额抱有错误认知，又怎能做出明智的决定呢？

尽管美国选民的无知尤其有据可查，但我们认为美国人在这方面并非独一无二。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前一个月，一项全国民调显示，支持脱欧的选民认为欧盟移民占英国总人口的20%，而实际数字更接近5%。除了高估目前居住在英国的欧盟出生人口数量外，无论是脱欧派还是留欧派选民，都严重低估了来自欧盟的外国投资金额，并且极大地高估了发放给其

他欧洲国家家庭的儿童福利金所占比例。10

这说明了什么？它表明我们大多数人对社会现实的认知存在严重扭曲。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被公认为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记者——在其著作《公众舆论》

（Public Opinion）中强调了这一点。李普曼对民主持批判态度，他认为公民对“外部世界”并没有准确的认知，而是依靠头脑中高度不完整且扭曲的“图像”来行事。¹¹

在李普曼对民主提出批评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基于大量且多样化的研究，学界已形成压倒性的共识：大多数公民对政治的了解少得令人震惊。事实上，这些令人沮丧的发现可能还高估了选民的实际情况水平。这类调查通常采用多项选择题的形式；因此，当公民不知道正确答案时，可能只是随意猜测。一旦他们碰巧猜对了，调查就将他们计入“知道”该答案的人群之中。¹² 然而，知识所要求的远不止是碰巧正确的信念。¹³ 只有当一个信念是经过证成的、可靠的，或不易出错

的，它才能构成知识。仅仅答对答案是远远不够的。

1 他人的无知

继2016年两场出人意料的选举结果——英国脱欧公投和唐纳德·特朗普在美国当选总统——之后，欧美普遍流行一种观点，认为这些选举中获胜的一方是无知的。例如，《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就曾指出：“特朗普的胜利归功于那些缺乏信息的选民。”¹⁴ 英国媒体对脱欧选民的描绘也大体类似。¹⁵ 一般来说，选举中的失利方往往会以政治对手的无知来解释自己的失败。¹⁶

我们很自然地会认为政治对手缺乏了解。毕竟，当我们持有一种信念时，必然认为它是正确的。¹⁷ 例如，如果我相信气候变化是由人类活动引起的，那么我就相信“人类活动正在推动气候变化”这一说法是真实的。如果有人持不同意见，我就必须认为他们的信念是错误的。当然，我未必认为他们在总体上知识更少，但我必须认为

他们在当前这个问题上是错的。因此，我们可能会认为持不同政治信念的人缺乏相关知识，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一结论因以下事实而更加突出：政治信念往往彼此聚集，在美国至少如此。例如，支持堕胎权的人更可能支持枪支管制和福利项目。如果你在堕胎问题上持“选择权”立场（pro-choice），那么你很可能支持提高最低工资，并主张政府干预以应对气候变化。相比之下，如果你反对堕胎，那么你很可能也反对枪支管制、反对提高最低工资，并抵制政府对气候变化的监管。¹⁸

这种模式也适用于强制带薪产假、同性婚姻和焚烧国旗等问题。正如杰森·布伦南（Jason Brennan）所说：“如果我知道你对其中任何一个问题的立场，我就能以很高的准确度预测你对所有其他问题的立场。”¹⁹ 这令人惊讶，因为这些问题在逻辑上似乎毫无关联。例如，反对枪支管制的论点与支持堕胎的论点几乎毫无关系。

这种政治观点的聚集现象，可能为我们提供另一个理由，使我们认为政治对手的知识水平较低。如果我们在堕胎之类的问题上存在分歧，那么我们很可能在许多其他问题上也持不同意见。这种情况既适用于逻辑上相关的信念，也适用于不相关的信念。例如，亚当·埃尔加（Adam Elga）指出，两个在堕胎问题上意见相左的人，很可能也会在“人类是否拥有灵魂、是否允许对某些临终婴儿不予治疗，以及权利是否在正确的伦理理论中占据重要地位”等问题上存在分歧。

20

概括而言：如果我认为你在议题A上的看法是错误的，而关于A的信念通常与关于B、C、D和E的信念存在关联模式，那么我们在A上的分歧可能会让我认为我们在B到E上也存在分歧。此外，从心理上讲，我们不可能认为自己的信念是错误的（我无法既相信p，又相信p是假的）。因此，我很可能得出结论：你不仅在A上缺乏了解，在B、C、D和E上也同样如此。因此，我们应当预期，公民会认为持有不同政治信念的人在知识上系

统性地处于劣势，不仅限于当前议题，也包括其他话题。

2 知情者、不知情者与误信者

政治无知是一种两党共有的现象。几乎没有证据表明某一政党的成员总体上比其他政党的成员更加无知或信息错误。相反，无知似乎在党派之间均匀分布。²¹

在2015年的一项“新闻知识测验”

(News IQ) 调查中，皮尤研究中心要求受访者回答一系列有关时事的问题。²²他们发现，在知识水平方面，党派之间的差异非常小。样本中的共和党人平均在12个问题中答对了8.3题，而民主党人平均答对了7.9题。他们2013年的调查也得出了同样的结果。²³受访者被要求回答一系列有关国际事件的问题，样本中的共和党人平均答对了6.5题，民主党人平均答对了6.4题。总体而言，实证研究发现，在事实性政治知识方面，不同

党派之间几乎没有差异，即便有也微乎其微。

这并不是说所有人都同样无知。尽管政治无知在各政党之间大致均匀分布，但个体公民的政治知识水平却各不相同。此外，某些议题上，政治左翼可能比政治右翼了解得更多，反之亦然。例如，布莱恩·卡普兰（Bryan Caplan）认为，左翼人士往往对基础经济学了解较少，而拉里·巴特尔斯（Larry Bartels）则指出，保守派比自由派更容易对美国的经济不平等持有错误看法。²⁴ 然而，总体而言，无知似乎在党派之间大致均等分布。

某些群体在某些议题上可能具有认识论上的运气优势。例如，自由派通常在气候变化和进化论等问题上与科学专家意见一致，而保守派则更可能拒绝这些专家观点。尼尔·利维（Neil Levy）提出，这种差异并非源于知识或智力上的差别，而是源于不同的认识论顺从（epistemic deference）模式。²⁵ 其核心观点是，自由派和保守派都在理性地顺从各自所认同的政治权威。由于没有人能够亲自调查每一个复杂问题，因此依赖那些与我们拥

有共同宏观世界观的可信来源是一种审慎的做法。这种做法之所以理性，是因为我们的世界观会影响我们对证据、可信度和专业知识的评估方式。通过顺从那些与我们价值观和视角一致的人，我们采用了一种通常与我们对世界的理解相一致的启发式策略。然而，这种理性的顺从有时却会导致看似非理性的信念，使某些群体在特定议题上持有不准确的观点。

就我们的目的而言，将个人划分为以下三类广泛的政治知识水平类别将是有用的：

知情者 这类人对政治和时事高度了解。他们密切关注正在进行的政策辩论，持有坚定的意识形态政治信念，并将政治视为自身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类别包括政治家以及对政治充满热情的公民，约占总人口的10-15%。

26

不知情者 这类人对政治知之甚少。他们在政治知识测试中表现不佳，很少思考公共政策，政治在其生活或身份认同中并不占据

重要地位。作为一个群体，不知情者更可能表现出政治冷漠：他们很少投票（即便投票），也极少参与政治过程的其他环节。此外，这些人通常在意识形态上是“无辜”的。他们既不强烈认同自由派，也不强烈认同保守派，而且往往并不完全理解这些标签的含义。他们的政策偏好随时间随机波动，显示出在政治议题上缺乏稳定、一致且有意义的观点。

信息不足者 这些人通常对政治有浓厚兴趣，并持有坚定的政治信念，但他们对许多政治议题缺乏了解。布伦南称他们为“暴民”。²⁸ 他们通常是高度党派化的人士，带有深刻的偏见，并以一种证实其既有信念的方式来获取政治信息。这类人对自己的政治观点极为确信，抗拒改变，且通常对相反观点不屑一顾。

不知情者与被误导者都处于无知状态，但方式不同。不知情者对政治大多漠不关心，因此他们根本懒得形成太多观点，结果就是他们几乎没有什么真正的观点。相比之下，被误导者

积极投身政治，拥有大量政治观点，但这些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错误的。换句话说，被误导者怀有错误的信念，而不知情者则只是缺乏信念。这两种情况都是缺乏知识的表现。29

根据苏格拉底的观点，被误导在认识论上比无知更糟糕。与仅仅缺乏信息的人不同，被误导的人陷入了知识的幻觉之中。他们以为自己知道的，其实并非事实。

知识的幻觉可以说是一个比知识匮乏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一个无知的公民可能对政治知之甚少，但一个被误导的人却可以说比一无所知还要糟糕。被误导比无知更具危害性，因为错误的信念会排除怀疑，阻碍对真理的追求。当我们自以为知道某件事时，往往会固守自己错误的信念。因此，被误导者是双重无知的：他们甚至意识不到自己有多么无知！所以，知识的幻觉可能比单纯的无知更成为真理的劲敌。有些人甚至认为，这是我们所面临的最重大的社会问题，因为它妨碍了我们解决所有其他问题的能力。正如迈克尔·许默（Michael Huemer）所写道：

这是一个比犯罪、毒品成瘾甚至全球贫困更严重的问题，因为它阻碍了我们解决其他问题。在我们能够解决贫困问题之前，必须首先对贫困形成正确的信念——包括贫困的成因、缓解贫困的方法，以及不同政策可能带来的副作用。³¹

许多人缺乏政治知识，这或许并不令人意外。现代政府的庞大规模和复杂性，使得大多数普通公民几乎不可能对政府所作所为形成有根据的看法。正如伊利亚·索明（Ilya Somin）所指出的，获取政治知识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而这些资源本可用于其他有价值的事情。³² 然而，这并不能充分解释为何选民常常系统性地被误导。无知的头脑通常并非“一个洁净、空无一物的容器”。正如戴维·邓宁

（David Dunning）所说，它“充斥着各种无关或误导性的生活经历、理论、事实、直觉、策略、算法、经验法则、隐喻和预感，遗憾的是，这些东西看起来、感觉起来都像是有用且准确的知识。”³³

如果问题仅仅在于选民没有投入时间和精力去获取信息，那么他们的错误判断会围绕真相随机分布。但这种情况却很少出现。³⁴ 此外，许多持有错误观点的人往往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搜集政治信息并参与政治活动。他们通常还对自己的观点抱有高度的自信。³⁵ 他们将自己的无知当作真正的知识。人们为何会持有错误观点，这一问题我们将在本章末尾再次探讨。

3 政治无知重要吗？

有大量证据表明，普遍存在着政治无知现象，许多民众要么缺乏信息，要么持有错误信息。然而，这种现象在多大程度上应引起我们的担忧尚不明确。一些理论家声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被低估了，而另一些人则认为，政治无知并不会对民主构成重大威胁。下文将考察三种试图弱化对政治无知担忧的观点。

3.1 政治无知无关紧要

“政治知识”通常被定义为“对与政治和公共政策相关的事实性事项的了解。”³⁶ 约翰·扎勒 (John Zaller) 将其称为“中立、事实性的公共事务知识。”³⁷ 这包括对具体政策议题和领导人的了解，对政府基本结构要素的认识，对公职人员在各类议题上所负责任的知晓，以及对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等相互竞争的政治意识形态组成部分的理解。政治知识调查通常会提出如下问题：“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是谁？”“联邦政府的三个分支是什么？”“政府哪个分支拥有宣战权？”以及“美国参议员的任期是多长？”这些问题具有很强的学术性。这类知识究竟有多重要？

在有关选民无知的文献中，通常假定了解此类事实是进行合格投票所必需的。正如索明 (Somin) 所写：“大约三分之一的受访者属于‘一无所知者’，几乎不具备或完全缺乏与政治相关的知识。”³⁸ 但请思考一下：我们是否应该在意一个随机挑选的人无法说出首席大法官的名字？如果人们无

法辨认出政府哪个部门有权宣战，这真的重要吗？这些问题的答案或许对社会科学家、记者、律师、学生或政治爱好者具有价值。但我们为何要期望普通公民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当公民能够当场回答这类问题时，社会又能从中获得什么好处？要有效评估普通选民的知识水平，我们需要清晰地理解一个运转良好的民主制度究竟需要何种类型的知识。

著名批评者阿瑟·卢皮亚（Arthur Lupia）认为，许多关于政治无知的研究所采用的政治知识问题具有精英主义倾向。³⁹ 他指出，这些测试之所以是精英主义的，是因为它们预设了对学者、记者和政界人士而言重要的教科书式信息，同样也是普通选民做出知情政治决策所必需的。同样，阿尔文·戈德曼（Alvin Goldman）提出了“核心选民知识”（core voter knowledge）的概念，指民主制度有效运作所必需的选民基本知识。⁴⁰ 这种核心选民知识不太可能包含标准政治知识调查中经常测试的那些教科书式事实。

我们对这一批评表示理解，但认为它仅有部分说服力。我们将在下文提出两点回应。

首先，问题并不仅仅在于公民缺乏对政治琐事的了解；他们往往对直接影响其投票决策的政策提案也知之甚少。以2010年美国《平价医疗法案》（通常被称为“奥巴马医改”）为例。这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医疗改革是近年来美国政坛最具争议的议题之一。然而，选民对该医疗改革法案的许多方面却一无所知。⁴¹ 这种无知很可能影响了随后的投票行为；事实上，它或许有助于解释为何民主党在2010年失去了众议院的控制权。

有许多类似的例子。公民常常抱怨联邦政府在对外援助上的支出过多，尽管他们并不了解实际的支出金额。同样，公众对社会保障支出成本的估计也常常不准确。尽管如此，选民仍被期望能够评估各种改革税收和支出政策的不同策略，并据此选择候选人。然而，如果缺乏对联邦资金实际支出方式的基本了解，他们又怎能有效地做到这一点呢？

另一项研究揭示，支持提高富人税率的选民往往并未意识到，当前的税率实际上已经高于他们所期望的水平。

⁴²此外，尽管经济状况常被引述为影响选举的重要因素，但选民往往并不清楚在过去一年中经济是增长还是萎缩了。⁴³即使他们掌握了这一信息，也无法判断这种变化是否应归因于特定政治领导人的作为。那么，选民又如何能够准确评估现任官员的表现呢？

这些问题的答案似乎与一个人是否有能力进行明智投票密切相关。我们之所以投票，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相信自己所选候选人的提案比其他人的更能服务公众利益。然而，除非我们至少对这些提案及其可能产生的影响有一定了解，否则就无法判断哪个提案更优。即使对于那些获得广泛媒体报道的重大政策提案，人们有时甚至都不清楚这些政策究竟是关于什么的。因此，政治知识测试中的问题并非都是纯粹学术性的。

让我们再考虑另一种对“政治无知无关紧要”这一主张的回应。一些理论家认为，对这些基本问题的回答提供了一

种间接衡量政治知识的方式，而政治知识的定义可以更为宽泛。例如，一个无法说出选举中大多数其他候选人姓名的人，同样也不太可能了解自己所支持候选人的政策纲领与其他候选人有何不同。⁴⁴此外，那些连易于核实的问题都无法回答的人，也不太可能具备与政策议题相关的社会科学知识。

标准政治调查中所使用的知识题目未必构成相关的政治知识；相反，它们可能只是对此的一种诊断工具。这些题目不仅能够指出哪些选民缺乏知识，还能表明哪些选民拥有更广泛、更有意义的政治知识。⁴⁵例如，了解大量政治琐事的公民，其政策偏好与无知选民相比也呈现出系统性的差异。⁴⁶对教科书式事实的掌握程度，也与对相互竞争的政治意识形态的理解相关。⁴⁷因此，即使我们承认政治知识测试衡量的是琐碎知识，我们仍可利用这些测试来判断哪些公民具备更实质性的知识。这是因为，拥有大量琐碎知识的个体往往在政治的其他方面也更为知情。

3.2 存在获取知识的可靠捷径

尽管所知甚少，人们通常仍能做出良好的决策。试想你正在游览一座陌生的城市，想要享用一顿美味的午餐。假设你对当地的餐馆了解不多，也不确定该去哪里用餐。你会如何决定呢？当你在城市中漫步时，注意到有一家餐馆非常受欢迎。这似乎是一个可靠的信号，表明这家餐馆的食物很美味。毕竟，如果食物平庸，这家餐馆不太可能吸引如此多的顾客。因此，将餐馆的受欢迎程度作为判断其食物质量的启发式方法，是合乎理性的。

面对令人眼花缭乱的众多选择时，我们往往会采用认知捷径（或称启发式方法）来简化决策任务。例如，你可能对跑鞋了解不多，但如果你知道耐克产品声誉良好，这或许就能帮你决定购买哪双鞋。选民或许也能通过类似的捷径来弥补自身知识的不足。如果这些政治捷径是可靠的，那么即使选民掌握的信息很少，他们依然能够投出明智的一票。这至少能在一定程度上抵消选民无知可能带来的危害。

人们提出了许多帮助选民做出知情投票的捷径。以下是卢皮亚（Lupia）提出的一个例子（此人认为政治知识测试属于精英主义）：

例如，考虑一项关于枪支管制的全民公投，当地报纸和全国步枪协会（NRA）都表示反对。对于那些清楚自己在所有此类问题上的立场与该报纸或NRA一致的人来说，任何一方的反对立场都可以有效地替代诸如公投实际文本之类的信息，并引导他们投下完全相同的选票。⁴⁸

我们还可能通过一些经验法则来决定是否支持某位政治候选人，例如：“这位候选人是否受到我所尊敬的人的支持？”或“他是否被我所信任的人所厌恶？”根据卢皮亚（Lupia）的观点，这些启发式方法可能会产生“与选民如同行走的百科全书时所做出的相同选择。”⁴⁹

尽管某些启发式策略（shortcuts）可以帮助信息匮乏的选民做出更好的选择，但它们往往无法缓解无知所带来的危险。⁵⁰ 首先，一些学者认为，选

民可以利用日常生活中的信息（例如，通过购物和比较利率来评估经济趋势）。⁵¹ 但当面对日常生活中不常遇到的政治议题（如外交政策）时，这种方法就毫无用处。其次，我们不能仅仅依赖意见领袖的提示。这种策略要求我们首先决定应追随哪些领袖的提示，而这一决定本身就要求具备相当程度的政治知识。第三，选民选择启发式策略的原因往往与真相无关。正如我们将在第五章中讨论的那样，人类是带有偏见的生物，倾向于出于非认知性（non-epistemic）的原因来选择信息。正如索明（Som-in）所言：“选民……选择启发式策略是基于其娱乐价值、与既有观点的一致性，或其他心理满足感，而非基于真相。”⁵²

最常被提及的捷径之一是“回溯性投票”。根据这一理论，选民通过评判执政党在任期内的表现来简化自己的决策过程。他们无需深入研究具体政策或比较复杂的政纲，只需问自己一句：“自从该党执政以来，我的处境是否比以前更好了？”这种捷径使选民能够根据自己生活中或整个社会所发生

的变化进行个人评估，从而做出选择。通过反思执政党的表现，选民便可决定是“把这帮无能之辈赶下台”，还是继续让该党掌权。因此，回溯性投票基于这样一种假设：良好或糟糕的治理成效，会在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清晰可见。

但回溯性投票可能无法弥补选民的无知。这种捷径只有在选民了解以下三点时才有效：(a) 哪些官员负责哪些政策，(b) 这些政策的效果如何，以及(c) 这些政策是否存在更好的替代方案。⁵³ 这需要相当丰富的政治知识。此外，即使现任官员在其任期内表现良好，挑战者或许能做得更好；同样，如果现任官员表现不佳，其他候选人也可能表现得更差。选民还倾向于因完全超出现任官员控制范围的因素而责备或奖励政客。例如，政客们常常因全球经济波动所导致的经济衰退而受到惩罚，而这些波动是本国政府无法影响的。⁵⁴ 选民甚至会因干旱等不可控事件而惩罚政客，也会在地方体育队伍于选举日前夕赢得关键胜利时奖励政客。⁵⁵ 回溯性投票还具有短视性：尽管经济状况对选举结果有

强烈影响，但选民通常只考虑过去几个月内经济状况的变化。⁵⁶ 这使得选民很容易被操纵。

尽管回溯性投票在弥补政治无知方面存在局限，但形式政治理论的洞见表明，即使知识有限，选民仍可通过基于绩效的判断来影响现任官员。例如，斯科特·阿什沃思（Scott Ashworth）指出，选民对可见结果（如经济趋势或政策影响）的反应，能够促使现任官员采取通常有利于公众的行动。⁵⁷ 从这个意义上说，当选民能够清晰地看到结果并将其与特定官员联系起来时，回溯性投票可能会有效发挥作用。

然而，这种回应存在局限性。形式模型通常假设选民能够理性地处理信息，但研究表明，选民有时会将责任或功劳错误地归因于官员无法控制的事情。⁵⁸ 例如，选民可能会根据近期显著的事件来评判现任官员的表现，而非对其整个任期进行全面评估，这可能带来问题。有效的回溯性投票仍要求选民理解：谁应对特定政策负责、这些政策如何影响自身，以及是否存在更好的替代方案。尽管我们认

同形式模型在揭示回溯性投票如何塑造激励机制方面提供了宝贵见解，但这些模型可能高估了在普遍存在政治无知的情况下，回溯性投票作为一种补偿性捷径的有效性。

断然否认捷径和经验法则从来都不具实用性，未免过于草率。当政治领导人出现严重且高度显眼的失败，并且这些失败很容易归咎于他们本人时，回溯性投票似乎运作良好。这正是民主相较于独裁制度的一大优势：选民能够对重大而明显的政策失败予以惩罚。索明（Somin）指出，这有助于解释为何现代民主国家从未发生过大规模饥荒，以及为何针对本国公民的大规模屠杀在威权和极权独裁政权中更为常见。⁵⁹ 然而，即便是那些认同“捷径论”的学者也承认，选民必须具备一定的实质性知识，才能准确运用这些捷径。⁶⁰ 因此，知识捷径或许并不能使公众摆脱“无能”的指责。

3.3 我们被允许无知

或许，选民的无知并不值得我们担忧，因为公民应当有权基于任何他们

所希望的理由来选择政策和领导人，即使这些理由源于无知。⁶¹ 事实上，要求人们在投票前必须充分知情，这种期望本身可能带有精英主义色彩。对基本政治知识的调查一再发现，处于优势地位的群体（如富裕的白人男性）比处于劣势地位的群体（如有色人种的贫困女性）拥有更多的政治知识。因此，要求选民达到某种知识水平才能负责任地投票，可能是不公平或不公正的。正如玛丽安·斯米利

（Marion Smiley）所言，“能力话语”可能会使我们“基于精英主义的假设重新确立社会控制”。⁶² 如果政治知识的分布本就不均，那么处于不利地位的公民很可能将持续处于这种劣势之中。

米歇尔·奥巴马在拉斯维加斯的一场“动员投票”活动中，恰当地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选民并不需要对政治特别了解：

投票不需要任何特殊的专业知识。你知道，你并不需要拥有什么高深的学位才有资格投票。你也不必读遍每一篇新闻报道才有资格投票。你知道什么才让你有

资格投票吗？你需要是一名公民……你需要对你所在社区的问题有自己的看法。这才是你有资格投票的原因……我从18岁起就开始投票了。相信我，那时候我对任何事情都一无所知。

换句话说，人们可能会认为，民主的一个基本前提是：你掌握多少知识并不重要。每个人都应拥有发言权，因为他们与结果利害相关，并且是民主进程中平等的参与者。因此，对选民无知的担忧可能被视为无关紧要，甚至可能构成对我们民主权利的不公正攻击。

这种思维方式的问题在于，它违背了布伦南（Brennan）所称的“能力原则”（competence principle）。该原则大致认为，若因一个无能的群体以无能的方式或出于恶意而作出的决策，从而损害同胞公民的人生前景，这是不公正的。64

投票并非一种纯粹关乎自身的行为。当我们投票时，我们试图对他人行使权力。正如约翰·斯图尔特·密尔所言：“无论是作为选民还是作为代表，

行使任何政治职能都是对他人施加权力。”⁶⁵ 当我们愚蠢地投票时，便是在无能地行使这种权力。我们的决定不仅会伤害自己，他人也必须承受我们选择所带来的后果。例如，如果我们投票支持一位意图阻挠减少全球排放政策的政客，就可能危及子孙后代的福祉。如果这一决定是出于无知，那么它就违背了能力原则。尽管人们有权做出对自己不利的选择，但这种自由并不包括伤害他人的权利。

你可能会拒绝能力原则。如果是这样，你就会认为选民确实有权选择任何他们喜欢的政策，无论这些政策对其他公民造成何种影响。你可能会主张，即使选民缺乏了解，其投票行为也是可以接受的，因为这行使了个人的自由权利。即便如此，无知仍然是有害的，因为选民可能无法实现他们自己预期的结果。

例如，你可能会投票支持惠特莫尔，因为你认为移民会导致犯罪率上升，而惠特莫尔希望限制移民。事实上，移民的犯罪率低于本土出生的公民，这一事实与你的目标相关，但你可能并不知晓。因此，你的无知会限制你

以实现自身目标的方式投票的能力。由此可见，即使选民有权为了自身选择的政策而牺牲他人的福祉，当他们的选择基于无知时，也无法有效行使这一权利。

3.4 将程序置于首位

现在，让我们考虑一个针对“政治无知具有重要意义”这一主张更为根本的反对意见。一些理论家认为，我们不应以一种外在于选民价值观和民主程序的“正确性”标准来评判民主结果。这就是第2章所讨论的纯粹程序主义观点。根据纯粹程序主义，民主结果之所以具有正当性，是因为它们的产生方式，而非因为它们符合某种独立的正确性标准。例如，政治学家伊恩·夏皮罗（Ian Shapiro）就拒绝接受这样一种“鸟瞰式”的立场——即一种先于且独立于民主程序而存在的立场，可用于评估民主程序所产生的结果。

理论上，一种纯粹程序主义的民主观可能对政治知识漠不关心。正如索明（Somin）所言：“即使选民完全无知，只要遵循了适当的民主程序，纯

粹程序主义理论的要求仍有可能得到满足。”⁶⁷ 然而，一种不设任何知识前提的纯粹程序主义理论至少存在四个方面的缺陷，因而缺乏吸引力。

首先，我们将不得不认可任何在完全不了解其后果的情况下作出的重大政策决定，仅仅因为选民是通过民主程序作出这一决定的。其次，若缺乏任何独立于程序本身的标准来评判民主决策，我们可能将无法批评那些经由民主程序引发的不公正现象，例如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第三，即使我们不应质疑选民带入民主过程中的价值观，政治知识的匮乏仍可能阻碍选民实现其自身目标。我们无需采取一种外在的或“鸟瞰式”的视角，即可解释为何政治无知可能妨碍选民实现其自身的价值观或目标。我们可以依据选民自己所采纳的标准来评判民主过程的产出。⁶⁸ 最后，即使那些认为民主具有内在价值的人，大概也仍然希望对民选官员进行问责。要有效实现这一点，选民必须具备充分的信息。如果公民不知道谁应对哪些政策负责，或者不了解这些政策的后果，我们就无法实现有意义的问责。

4 政治无知是理性的吗？

人们很容易将无知等同于愚蠢，但有时无知实际上是一种聪明之举。试想一下，有人给你一美元，让你去数清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所有的草叶。接受这个提议才是愚蠢的。这项任务耗时极长，报酬远不值得付出如此努力，而且所获得的知识毫无用处。对这个问题保持无知，反而要理性得多。

这是一个愚蠢的例子，但它说明了一个严肃的观点：有些事情并不值得去了解。即使在重要的话题上，我们也预期人们会缺乏相关知识。以我们这些作者为例：我们对寻找癌症治疗方法知之甚少。尽管我们非常希望这项研究能够成功，但我们仍然不会花时间去学习相关的科学知识。同样，尽管我们认识到量子物理、海洋生态系统或城市基础设施的复杂性具有不可否认的重要性，但我们对这些领域几乎一无所知。而且，和我们一样，你无疑也有许多重要的主题知之甚少。

为什么我们对如此重要的事情一无所知？这并非因为我们懒惰或愚蠢（尽管我们有时确实如此）。而是因为学习存在机会成本：它需要耗费我们本可用于其他有价值之事的时间和精力，比如工作、照顾家人，或者看一部电影。理性无知理论指出，当我们（至少在潜意识里）意识到获取知识的成本超过拥有该知识所带来的收益时，保持无知就是理性的。有时候，即使知识本身有价值，也不值得付出那样的代价。

许多学者认为，政治上的无知往往是理性的。⁶⁹ 除非你是政治家、记者、政治学家，或者从了解政治中获得极大乐趣的人，否则投入超过最低限度的精力去学习政治，其成本远远超过收益。如前所述，现代政府的庞大规模和复杂性，使得普通公民几乎不可能充分了解大多数政治议题。此外，单个选民影响选举结果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例如，在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单张选票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概率大约仅为六千万分之一。⁷⁰ 因此，成为一位知识渊博的选民的激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或许选民们明白，深

入钻研政治细节的投入，其价值并不比去数草叶多出多少。

理性无知理论预测，如果选民知道自己的选票会更具影响力，他们就会寻求更多信息。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基于真实案例的思想实验来阐明这一观点：

唯一的选民 想象一下，有一场关于是否提高地方销售税的全民公投。假设由于一次失败的选区划分操纵，导致出现了一种奇怪的选举异常情况：你成了唯一有资格投票的选民。在做出决定之前，你会多么仔细地研究这一多少有些冷僻的政策议题呢？ 71

作为唯一有资格投票的人，你可能会比普通公投中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了解地方销售税。为什么？关键区别在于，你现在有更强的动机去深入了解。在普通公投中，你的选票只是成千上万张中的一张；而现在，你的选票具有决定性作用。

理性无知理论引发了一系列问题。首先，如果无知是理性的，那么为何有些人对政治高度知情？对政治高度了

解是否是非理性的？其次，如果个人选票的微不足道使得无知成为理性选择，那么为何仍有如此多的人去投票？按照同样的逻辑，他们难道不应该干脆决定完全不去投票吗？（这被称为“投票悖论”。⁷²）第三，如果选民明知自己保持无知，为何他们常常对自己的判断——即哪位候选人更优——如此自信？最后，如果无知之所以理性，是因为单个选民几乎不可能投下决定性的一票，那么为何还认为政治无知会对民主造成危害？我们将在下文尝试回答这些问题。

4.1 拥有知识是否是非理性的？

理性无知理论认为，为了改变选举结果而深入学习政治知识是不理性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学习政治知识总是不理性的。不妨类比一下体育运动。有些球迷会深入了解自己喜爱的球队和球员，但原因何在？并不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知识会影响比赛结果——那样想才是不理性的。相反，体育迷之所以去了解球员的历史、统计数据、赔率以及各种冷门的体育知

识，是因为这样做能提升他们观看比赛的乐趣。

政治亦是如此。政治“粉丝”从了解政治、为自己支持的政党、候选人和利益集团加油助威中获得乐趣，同时贬低反对派。换句话说，至少出于投票以外的原因去获取政治知识是完全理性的。然而有趣的是，许多人会以公民责任或成为知情选民为目标来为他们追求政治知识的行为辩护，而不是承认自己从中获得的乐趣。这种倾向反映出公民责任的规范常常塑造我们谈论自身兴趣的方式。

4.2 人们为什么会投票？

如果人们对政治是理性无知的，那他们为什么还要费心去投票呢？理性选择模型认为，鉴于一票改变选举结果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政治上的无知是理性的。但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选民为何还会出现在投票站呢？难道保持无知是理性的，而投票却是非理性的吗？抑或在某些条件下，投票也可以是理性的？

理性无知理论认为，个体为了改变选举结果而去投票是不理性的，但如果投票能满足其他目标，则可能是理性的。根据投票的表达性理论，人们投票是为了表达对自己支持候选人的拥护，或确认自己对某个政党的忠诚。

⁷⁴ 投票行为更像在足球比赛中加油助威：人们呐喊助威、涂脸或戴上巨大的泡沫“第一名”手指，并非为了影响比赛结果，而是为了展示对自己球队的支持。按照这种观点，即使选举结果已成定局，投票支持某位候选人也可能是理性的。

投票之所以是理性的，还有三个额外的理由。根据戈德曼（Goldman）的投票因果理论，当一个人重视自己成为导致选举结果之原因的一部分时，投票就是理性的。我们可以从群体能动性的角度来理解这一点：选民希望成为那个促成自己支持的候选人获胜的群体中的一员。⁷⁵ 第二种观点认为，投票是一种道德义务，或者人们出于责任感而投票，而道德义务为我们提供了充分的行动理由。⁷⁶（与此相关的观点是，人们之所以投票，是因为他们知道，如果自己不去投票而

自己支持的政党落败，他们会感到自己负有一定责任；而如果自己投了票但政党仍然落败，至少可以安慰自己已经尽了所能。⁷⁷⁾ 第三种观点由亚历山大·格雷罗 (Alexander Guerrero) 提出，他认为投票是理性的，因为我们不仅应关心谁胜谁负，还应关心候选人获得了多少支持。选民可以合理地在意——哪怕仅凭自己的一票——去加强格雷罗所称的其所支持候选人的“显性规范授权” (manifest normative mandate)。⁷⁸⁾

这些动机中的任何一种都可能强大到足以说服人们去投票，却不足以促使他们付出高昂的代价去充分了解相关信息。投票所需投入的精力远低于为明智投票而充分学习所需投入的精力。因此，即使在政治方面投入大量精力去学习是非理性的，去投票却仍可能是理性的。

4.3 为什么选民如此自信？

理性无知的选民是指那些主动选择对政治知之甚少的人。要使这种无知成为“理性”的，一个人至少必须在潜意

识中认识到，外界存在一些信息，不值得自己花时间去了解。（如果你错误地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所需的一切知识，那么你的无知就是无意的，而非理性的。）那么，为什么许多选民对自己的政治观点的有效性却如此自信呢？如果一个人知道自己所知甚少，难道不应该对政治议题持不可知论态度或保持谦逊吗？

根据索明（Somin）的观点，一位仅投入极少精力获取信息的选民，不应像那些对该议题做过深入研究的人那样对自己的结论充满信心。然而，“恰恰是因为她的选票几乎不可能产生决定性影响”，“即使只有适度的确信程度，也可能足以证明基于此形成观点并据此投票是合理的。”⁷⁹ 我们可以将此视为一种对投票（或自信投票）所需认知标准的**实用主义侵入**

（pragmatic encroachment）。当犯错的代价很低时，基于有限信息得出结论往往是可接受的。例如，许多人对“谁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电影演员”持有强烈看法，尽管他们并未全面回顾所有演员的职业生涯，也未深入分析其表演。鉴于在此问题上犯错的

后果微乎其微，即使信息有限，对此持有坚定看法也完全可以合理的。

错误的潜在代价可能以两种相互关联的方式影响我们的信念与行动。首先，要投出一张具备足够知识基础的选票所需的信息量，可能取决于利害关系的大小。当一张个人选票不太可能显著影响选举结果时，选民合理地依赖有限的信息或许是可接受的。然而，用于投票所需的知识水平，可能尚不足以让人自信地投票。这就引出了第二种类型的实践性侵入（pragmatic encroachment），它有助于解释为何理性无知的选民仍可能对自己的观点感到自信。具体而言，要自信地持有一种信念所需的信息量，也可能受到利害关系的影响。当犯错的代价较低时，一个人即便只有有限的证据，也可能自信地持有某种信念；但随着错误可能带来的后果日益严重，克制自己的信心、承认自身知识的局限性，便成为一种理性的做法。

4.4 无知会损害民主吗？

无知据称是理性的，因为单个选民不太可能影响选举结果。那么，出于同样的原因，无知是否也是无害的呢？如果一个人的选票极不可能改变任何事情，那么一张无知的选票又怎会造成危害呢？

对大多数人而言，对政府政策的无知似乎相对无害，尤其是在联邦层面，因为大多数人缺乏有效影响政治结果的手段。然而，选民的决策在总体上却会产生重大影响。在民主制度中，选民的决定会影响领导人和政策的选择，因此选民群体中普遍存在的无知可能造成严重损害，即使单个选民的无知几乎不会产生直接影响。例如，这种无知可能推动政府政策走向种族或族群不容忍、排外主义以及财政不负责任。当集体无知主导政府政策时，往往会给社会带来伤害。这正是柏拉图反对民主的原因。在《高尔吉亚篇》中，他批评民主制度依据无知公民的观点制定政策，却忽视了更有见识的专家的建议。柏拉图认识到，

尽管个人的无知通常无足轻重，但选民整体的无知却影响深远。

因此，公众的无知可能是有害的，即使它源于个体的理性。事实上，这种“理性的无知”使得它对民主构成的挑战比其他情况下更为严峻。⁸¹ 当充分获取信息的成本过高时，我们便缺乏动力去满足民主所要求的认知条件。其结果便是民主的缺陷。

如果公众的无知在总体上是有害的，这是否会产生一种道德义务，要求选民充分了解相关信息？西蒙·凯（Simon Kaye）认为，个体选民并无道德义务去充分了解信息，因为他们的知识不太可能影响选举结果。⁸² 在他看来，选民的无知无关紧要，因为“那种可能削弱人们追求政治知识积极性的无力感，同样也使得由此产生的政治无知变得无害。”⁸³

如果我们接受这一推理思路，那么同样可以得出结论：个人也没有道德义务去回收利用，因为每个人的行为对环境几乎没有任何影响。然而，许多人会拒绝这种论点。正如索明（Som-in）所言：“凯伊（Kaye）的论点就

好比声称空气污染不是问题，因为单看每一辆耗油的汽车，其对空气质量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⁸⁴

在《投票的伦理》一书中，布伦南主张，公民负有道德义务避免投下糟糕的一票。这一义务基于一种更广泛的义务，即当克制自身行为所带来的个人代价微乎其微时，应避免参与那些具有集体危害性的活动。索明对此表示赞同：他认为公众无知所带来的危险已足够严重，足以产生一种道德义务，要求人们明智地投票。假定个人对其忽视道德义务的行为负有道德责任，那么由此可推知，某些行为即便在个体层面上是理性的，仍可能在道德上应受谴责。

由此得出的图景是这样的：如果每位选民的唯一目标是影响选举结果，那么对他们而言，保持无知在个人审慎理性上是合理的。这与每位选民负有道德义务去获取信息并不矛盾。换句话说，如果你不打算投票，政治上的无知可能是理性的；但如果你确实决定投票，那么你可能就承担了一项道德责任，即投出负责任的一票。

然而，这两项承诺似乎存在张力。如果个人的选票并无实际影响力，那么投票可能造成的危害又如何能产生一种道德义务，要求人们明智地投票呢？索明（Somin）认为，集体危害的危险性足以构成这种道德义务的基础，但这一观点与其理性选择模型相冲突。只有当“糟糕”的选票确实能够对公共利益产生负面影响时，投票才可能在道德上具有危害性。索明声称，尽管单个公民影响选举结果的概率极低，但此类结果所带来的道德风险已严重到值得关切的程度。然而，一方面声称公众的无知是危险的，因为选民倾向于选出不良政策；另一方面又声称个体选民几乎不会产生影响——这两种说法之间显然存在张力。

这种张力出现在一系列思想家的观点中。例如，布伦南（Brennan）和马蒂亚斯·布林克曼（Matthias Brinkmann）都坚持以下主张：一方面，个人保持无知是理性的；另一方面，政治事关重大。布林克曼声称：“鉴于我们大多数人对政治结果几乎毫无影响，我们在政治议题上保持无知是理性的。”然而，他也表示：“政治问题

事关重大”，因此我们“有强烈的道德关切，希望把这些问题处理正确。”⁸⁶但如果我们的选票毫无作用，政治又怎能称得上“事关重大”呢？如果选民因为认识到自己的选票微不足道而选择无知，那么他们个人选票所带来的负面后果也必定微不足道。那么，为何还要费心去提升自己的政治知识呢？正如理查德·阿内森（Richard Arneson）所言：“即使是有道德倾向且认真负责的公民，在这种政治环境下也无法投出好的一票。”⁸⁷

因此，理性无知假说给我们留下了一个谜题。该理论本应解释为何许多选民处于无知状态。其解释是：无知是理性的，因为单个选票对选举结果的影响微乎其微。然而，这些微小的影响累积起来却会造成巨大的集体危害。据称，这些集体危害严重到足以产生一种道德义务，即选民有责任获取充分信息。因此，选民似乎确实拥有一个纠正自身无知的动机——一种道德动机。但选民依然保持无知。

5 选民是否极度无知？

有人可能会反对说，理性无知假说并不成立，因为它假设公民会仔细、详细地计算获取政治信息的成本与收益，而这种假设是不合理的。然而，理性无知假说的支持者并不需要坚持如此强的主张。实际上，只要普通选民大致有一种“直觉式”的认识，即投入超出少量精力去了解政治并不值得，这就足够了。⁸⁸

但即使这一较弱的假设也存在经验性的理由值得质疑。在2016年的一项民调中，1,000名具有全国代表性的美国潜在选民中有78%同意如下陈述：“一个人的选票确实重要。”⁸⁹ 在另一项调查中，7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自己的选票“确实重要。”⁹⁰ 一些批评者认为，这些数据对理性无知理论的一个关键前提——即选民知道自己的选票不太可能产生影响——构成了“毁灭性”的打击。⁹¹ 然而，这些结果并非完全明确，因为“确实重要”这一表述具有模糊性。选民可能只是在表明投票是有价值的或在道德上是可取

的，并未否认其选票影响选举结果的概率极小。⁹²

话虽如此，理性无知理论家可能难以解释其他一些数据。例如，1990年的一项《公民参与研究》显示，89%的近期选民认为“影响政府政策”是他们投票的一个“重要”原因。⁹³ 相关地，2014年，美国人口普查局曾询问未登记投票的美国公民，他们是否因为“我的选票不会产生影响”而没有登记投票。只有3.7%的受访者回答“是”。⁹⁴ 这些发现与“大多数人认为自己的一票无足轻重”这一假设并不相符。

鉴于此类证据，杰弗里·弗里德曼（Jeffrey Friedman）指出，选民并非“理性无知”，而是“彻底无知”。⁹⁵ 他们甚至从未考虑过自己的一票很可能毫无意义——对他们而言，这属于“未知的未知”。此外，彻底无知的选民并不知道（甚至从未想过）自己因过于无知而无法投出明智的一票；相反，他们错误地认为自己掌握的信息足以胜任投票。

一些调查数据支持这一观点。2012年7月，即美国总统大选前四个月，皮尤研究中心发现，9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已经掌握了决定如何投票所需了解的关于奥巴马的信息”，而69%的人则称他们对罗姆尼已有足够的了解以作出投票决定。⁹⁶ 根据弗里德曼的说法，这些发现与“理性无知”模型相矛盾。该模型假设：(a) 人们认识到要明智地投票就需要掌握更多信息，但(b) 他们认为不值得为此付出努力去明智地投票。相反，那些认为自己已掌握足够信息以投出知情选票的人，似乎并非有意地让自己处于信息不足的状态。

弗里德曼假设，大多数选民所采用的“充分知情”标准，低于索明（Som-in）及其他理性选择理论家所使用的标准。这些选民并不认为自己对相关事实处于理性无知状态，而是根本就认为自己并非无知。因此，弗里德曼将这些极度无知的选民称为“朴素实在论者”（naïve realists）。他们认为世界远比实际情况简单，因此觉得要对政治事务做到充分知情并不需要付出太多努力。正如弗里德曼所言：“现

代世界的复杂性，对他们而言，是一种‘未知的未知’。”⁹⁷

彻底无知的选民在三个方面表现出无知：他们缺乏足以胜任投票所需的政治知识；他们不知道自己的选票很可能无关紧要；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对上述两个事实都一无所知。弗里德曼认为，这是“对政治无知更令人不安但也更合理的看法。”⁹⁸ 如果弗里德曼是正确的，那么理性无知理论家就错误地假定选民所知道的比实际情况更多。尤其是，他们将“个体选票微不足道”这一知识归于选民。正是这种假定首先导致了投票悖论，因为表面上看，既然人们明知自己的选票无关紧要，为何还要费心去投票，这令人费解。而彻底无知假说则完全避开了这一悖论。

索明（Somin）出于两个理由拒绝“极端无知”观点。 第一，这种观点对人们普遍缺乏关于政治和公共政策的基本事实这一现象给出了一个难以令人信服的解释。弄清楚某些非常基本的信息对于投出知情的一票仍然具有相关性，这并非高深莫测之事。然而，大多数选民却缺乏这些信息。⁹⁹ 第

二，选民认为自己拥有足够信息以胜任投票这一事实，与“理性无知”观点完全相容。在“极端无知”观点看来，选民错误地认为自己知道得足够多，是因为他们对社会世界持朴素实在论（naïve realism）态度。而在“理性无知”观点看来，这是因为选民所认为足以做出一个相对不重要或无效力决策的“足够”知识量，远低于做出重要决策所需的认知标准。¹⁰⁰

在近期的研究中，亚当·吉本斯提出了一种更为细致的第三种政治无知观，认为政治无知既可以是理性的，也可以是激进的。¹⁰¹ 在他看来，无知属于理性还是激进，可能因人而异，甚至在同一人身上，针对不同类型的知识也可能有所不同。例如，一些选民可能出于获取信息成本过高而理性地选择对某些政治议题保持无知；另一些人则可能是激进地无知，既未意识到自身理解中的空白，也对政治知识毫无兴趣。此外，吉本斯指出，同一个人可能同时表现出这两种类型的无知——某些信念源于理性无知，而对其他相关信息则处于激进的无意识状态。他认为，相较于无知属于理性还

是激进，信息本身的复杂性在决定无知能否被克服方面更为关键。

6 战略性无知

一种更为被忽视的现象是战略性无知。与典型的理性无知案例不同，战略性无知源于拥有知识所带来的预期成本，而非获取知识的成本。¹⁰²

想想那些面临亨廷顿病或艾滋病毒（HIV）风险的众多个体，他们却拒绝接受免费、准确且匿名的检测来发现这些疾病。¹⁰³ 这些人选择保持无知。然而，这种选择无法用获取信息的成本来解释，因为这些检测是免费且容易获得的；也无法用信息的相对不重要性来解释，因为这些信息具有极大的实际价值。因此，选择保持无知更合理的解释在于预见到拥有这些知识所带来的代价。有些事情，我们宁愿不知道。¹⁰⁴

有时，政客和宣传者会策略性地在他 人中培植无知。在《怀疑的商人》

（*Merchants of Doubt*）一书中，娜奥米·奥雷斯克斯（Naomi Oreskes）

和埃里克·康韦（Erik Conway）描述了企业、政府甚至科学家如何在从烟草及二手烟的危害，到酸雨、全球变暖、农药以及臭氧层空洞等一系列议题上刻意制造无知。在这些案例中，无知被蓄意培植，以服务于自身的战略利益。然而，我们自己也可能培养策略性无知。《种族与无知的认识论》（Race and Epistemologies of Ignorance）一书描述了这样一些情境：占主导地位的人口群体成员有意回避关于受压迫群体的事实，以维持令人宽慰的幻觉，并逃避个人责任。¹⁰⁵ 与无意的无知不同，策略性无知要求个体意识到潜在知识的存在，并主动选择回避它。¹⁰⁶ 它并非无心之失，也不是诚实错误的结果，而是蓄意的、策略性的，并且常常在道德上存在问题。

策略性无知为民主政治提出了紧迫的问题。丹尼尔·威廉姆斯（Daniel Williams）指出，选民无知的很大一部分，与其说是获取信息的成本所致，不如说是因为拥有信息本身所带来的成本。¹⁰⁷ 与其认为选民获取信息的成

本太高，不如说他们拥有信息的成本往往更高。

为阐明这一点，不妨参考苏珊·斯特宾（Susan Stebbing）在其著作《有目的的思考》（Thinking to Some Purpose）中提出的一个重要观察。斯特宾指出，我们的意识形态信念是“珍视的信念”（cherished beliefs）。所谓珍视的信念，是指“我们希望保留的信念；持有这种信念令人愉悦。”¹⁰⁸ 对许多人而言，政治信念恰恰属于这一范畴。我们乐于成为某个政治阵营的一员，对自己的观点怀有情感依附，并且从持有这些观点中获得社会利益（参见第六章）。因此，这些信念并不容易被放弃——它们抗拒理性的修正。鉴于这些利益，我们形成或维持那些在认识论上存在问题（epistemically problematic）的信念，从工具理性的角度看，或许是合理的。我们至少在潜意识层面知道，这些信念存在潜在的反驳理由（即挑战它们的证据），而且这些信息很容易获取。因此，我们本可以通过主动寻求更多信息来改善自身的认识论处境。但我们缺乏这样做的动机。我们宁愿对那些

威胁到我们珍视信念的事实保持无知。

策略性无知有助于解释为何一些选民系统性地持有错误信息。尽管“理性无知”假说为选民缺乏信息提供了一种合理的解释，但它无法说明为何选民在政治议题上常常持有错误认知。正如威廉姆斯（Williams）所指出的：“如果问题仅仅在于选民不愿花费任何时间或精力去获取政治知识，那么我们应预期他们的错误会围绕真相随机分布。但这种情况极少出现。”¹⁰⁹ 那些持有错误观点的人往往也会投入时间和精力去搜寻政治信息。与那些因无知而弃权的非选民不同，持有错误信息的选民并非政治冷漠：他们积极寻求信息、参与政治，并对自己的信念抱有高度自信。这一点很难用理性无知理论来解释。正如丹·卡汉（Dan Kahan）的研究所示，那些在一系列具有政治争议的科学议题上系统性持有错误观点的人，实际上已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去了解相关议题并深化自己的理解。¹¹⁰ 这些选民常常是无知的，但并不缺乏信念。他们愿意承担

获取信息的成本，却依然持有错误认知。

为了解释这种行为，我们必须诉诸于“拥有知识”的代价，而非获取知识的代价。一项近期的心理学研究很好地说明了人们在多大程度上会策略性地回避政治信息。在该实验中，自由派和保守派都有机会了解其意识形态对立者对一系列议题（例如同性婚姻、大麻合法化以及特朗普担任总统）的看法。研究发现，人们宁愿放弃金钱，也要留在自己的意识形态“信息茧房”中。¹¹¹ 具体而言，参与者宁愿放弃赢得3美元的机会，也要阅读一段与自己观点一致的文字，而不愿为了赚取额外金钱而去阅读一段与自己信念相悖的文字。他们宁可放弃赚钱的机会，也不愿听取对方的观点。这一现象在政治光谱左右两派人群中同样成立。

我们为何会回避某些政治知识？很可能是因为拥有这类知识会带来个人和社会成本。当信息与我们的信念相冲突时，就会产生认知失调和不适感，而我们宁愿避免这种感受。即使有事实支持，放弃根深蒂固的信念也令人

痛苦。这一点在群体环境中尤为明显，因为在群体中持不同意见可能导致被社群排斥。正如卡汉（Kahan）所言：

普通公众成员作为消费者、选民或公共讨论参与者所做的一切，都不会对她本人或他人所面临的气候变化风险产生任何影响。枪支管控、水力压裂和核废料处置等问题亦是如此……然而，鉴于她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所体现的个人特质，若在日常与普通人的交往中持有一种错误的立场，就可能使她遭受毁灭性的后果，无论是在物质层面还是心理层面。

113

因此，有些人会策略性地避免接触相反的观点，这并不令人意外。事实上，这种做法在审慎理性上是合理的。

7 缓解无知

我们如何改变那些偏爱无知而非知识的激励机制？布鲁斯·阿克曼（Bruce

Ackerman) 和詹姆斯·菲什金

(James Fishkin) 提出设立一个新的全国性节日——审议日 (Deliberation Day)。在这一天，登记选民将在重大全国选举前两周聚集在社区会议场所，讨论关键的竞选议题。参与者将阅读精心平衡的简报材料，在小组中进行深入讨论，并有机会就这些议题向持不同观点的专家和政界人士提问。每位参与者将获得150美元

(或更多) 的当日报酬。为兼顾日常生活的需要，审议日将延续两天，使每位公民都能抽出其中一天参与这项公民审议活动。通过为公民创造一个专门的空间，让他们在结构化的环境中交流思想、了解政策议题，审议日旨在培养一个更加知情且积极参与的选民群体。

然而，这一提案面临若干实践性和认识论方面的挑战。首先，组织一场全国性活动所涉及的后勤复杂性、对熟练且公正的主持人之需求，以及所需的大笔资金投入（据2002年估算，每年约需150亿美元），构成了重大障碍。其次，仅凭一天时间，公民很可能无法充分理解哪怕一小部分联邦

政策议题，这引发了对该活动有效性的质疑。第三，“审议日”可能易受政治操纵，因为现任领导人和政党可能会干预议题的选择，或偏袒有利于其议程的叙事。¹¹⁵ 这种偏见风险还会因利益集团而加剧，它们可能通过选择性提供信息或影响主持人人选来操纵这一过程。

另一种可能性是向公民支付报酬，以促使他们更多地了解政治议题。¹¹⁶ 根据理性无知理论，许多选民目前缺乏了解政治的动力，恰恰是因为他们的选票不会产生实际影响；因此，他们几乎没有理由去获取相关信息。经济激励措施可能会改变这种成本—收益计算，使学习政治知识更具吸引力。然而，这一提议引发了一系列实际问题，包括应由谁来向公民支付报酬、应提供多少金额，以及这一数额是否足以激励广大民众去获取信息。尽管存在这些挑战，该提议仍有力地强调了考虑多种策略以激励信息获取的重要性。

与其专注于提升选民的知识水平，我们或许可以通过限制政府权力并使其权力去中心化，来减轻无知所带来的

风险。这一解决方案在自由意志主义（libertarian）对政治无知的批评者中颇受欢迎。¹¹⁷ 通过分散决策权并限制政府控制的范围，该策略降低了潜在的无知选民对高风险国家政策所产生的影响。然而，这一方法本身也面临挑战。尽管限制政府权力和权力下放可能减少因选民无知而带来的风险，但也可能导致各地区政策不一致，从而削弱应对医疗保健、环境保护或经济稳定等需要全国协调行动的大规模问题的努力。

一种更为激进的应对政治无知的方法是将投票权集中于知识丰富者手中。

¹¹⁸ 此类提议包括剥夺低知识水平选民的投票权，或向信息更充分者授予额外选票，以确保政治决策主要由那些对政策议题有更深入理解的人所影响。该方法的支持者认为，如此一来，政治决策将更符合事实与专业知识，从而降低因错误信息或误解而制定政策的可能性。然而，这一提议颇具争议，因为它挑战了民主制度中平等代表与自治的基本原则，并可能对边缘群体造成不成比例的影响。我们将在第10章对此提议进行详细探讨。

8Summary

密尔认识到公众无知的广度与深度，以及其对民主可能构成的威胁。尽管如此，他仍持乐观态度，相信信息的传播和正规教育能够培养出知情的选民群体。

然而，过去150年并未证实这种乐观看法。正如索明（Somin）所指出的：“即使面对教育水平的大幅提升，以及公众以极低成本获取信息的数量和质量前所未有地扩展，相对稳定的无知水平依然持续存在。”¹¹⁹ 尽管信息技术（包括互联网）取得了进步，但自20世纪30年代末大规模调查研究开始以来，选民的知识水平几乎没有提高。如果无知是理性和策略性的，这一结果便在意料之中。其含义是，除非选民有动力去获取更多信息，否则他们的知识水平不会提高。仅仅提供更多可用信息是远远不够的。

人们普遍认为，民主制度的良好运作需要一个知情的公民群体，但现实情况是，大多数人对基本的政治事实都

严重缺乏了解。无知通常被视为一件坏事，但不能仅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理解它。其他非认识论的动因在维持选民无知方面也起着重要作用。有些无知是无意的，但其中很大一部分可能是理性的、策略性的。我们需要了解的信息实在太多，以至于我们无法对大多数事情都形成有根据的看法。因此，对个人而言，对政治知之甚少在工具理性上可能是合理的。

问题在于，个体的理性可能对社会造成灾难性后果。对任何一个人而言，无知的代价或许微不足道，但普遍无知的累积效应却可能给社会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¹²⁰这对任何民主制度都构成了一个根本性难题：如果政府是“民有”的，同时也必须是“民治”的，而民众在很大程度上又是无知的，那么政治决策就必然是无能的。

并非所有学者都持这种悲观看法。学界对于政治无知问题究竟有多严重，以及如何缓解这一问题，存在诸多分歧。本章的目的并非解决政治无知问题，而是探讨其维度、范围及重要性。在下一章中，我们将转向一个相

关但性质上有所不同的对民主的威胁：非理性。

注释

1. 麦迪逊 [1822] 2013年：555页。
2. DelliCarpini 和 Keeter 1996：1。
3. 皮尤研究中心，2012b。
4. 弗里德曼1998年：第397页。
5. Somin2016：17。
6. Ferejohn1990：3。
7. Delli Carpini 和 Keeter 1996；Duffy 2018；Somin 2016。
8. DelliCarpini 和 Keeter 1996：101–102。
9. 凯撒家庭基金会 2013年。
10. 益普索2016年。
11. 李普曼 [1922] 1998：3。
12. Somin 2016：26；Brennan 2016a：27。
13. 盖梯尔1963年。
14. Brennan2016b。
15. 富勒2019年。

16. Herbert2004。
17. Williams1973。
18. Brennan 2016a: 41; 另见
Joshi 2020。
19. Brennan2016a: 41。
20. Elga2007: 493。
21. Somin2016。
22. 皮尤研究中心 2015 年。
23. 皮尤研究中心 2013 年。
24. Bartels 2016; Caplan
2007。
25. Levy2019。
26. Campbell 等, 1960; Con-
verse, 1964; Delli Carpini
和 Keeter, 1996。
27. Converse1964: 47。
28. Brennan2016a: 1。
29. 李普曼 [1922] 1998年版:
第307页。
30. Brennan2016a: 24。
31. Huemer 2016: 463。
32. Somin2016。
33. 邓宁2014年。
34. Caplan2007。
35. Williams2021a。
36. Somin2016: 9。
37. Zaller 1992: 221。

38. Somin2004: 第8页, 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39. Lupia2006。
40. Goldman1999: 320。
41. Somin2016: 1, 17。
42. Schroeder2012。
43. Somin2016: 1。
44. Neuman1986: 15。
45. Delli Carpini 和 Keeter, 1996 年。
46. Althaus2003。
47. Bennett2003: 317。
48. Lupia2006: 227。
49. Lupia2006: 223。
50. Somin2016: 106–135。
51. Popkin1991。
52. Somin2016: 107。
53. Somin2006: 263。
54. Leigh2009。
55. Achen 和 Bartels, 2016; Healy 等, 2010。
56. Huber 等, 2012。
57. Ashworth2012。
58. Healy 和 Malhotra, 2013 年。
59. Somin2016: 120。

60. Galston 2001; Popkin 和 Dimock 1999。
61. Somin2016: 4。
62. Smiley1999: 51。
63. 奥巴马2018年。
64. Brennan2016a: 141–142。
65. Mill [1861] 2015: 80; 另见Brennan 2012。
66. Shapiro 1996: 9; 另见 Barber 2003: 117–118。
67. Somin2016: 62。
68. Somin2016: 11–12。
69. Brennan 2016a; Caplan 2007; Downs 1957; Somin 2016。
70. Gelman 等, 2012 年。
71. Somin2016: 79。
72. Downs1957。
73. Somin2016: 93。
74. Brennan 和 Hamlin 1998; Brennan 和 Lomasky 1993。
75. Goldman 1999: 217; Tuck 2008: 50–62。
76. Campbell2006。
77. 哈丁2006年: 第185页。
78. Guerrero2010: 275。
79. Somin2016: 86。

80. Brennan 2016a; Caplan 2007; Somin 2016。
81. Somin2016: 75。
82. Kaye2015。
83. 凯伊2015年: 318–319页。
84. Somin2015: 384–385。
85. Kaye2015: 325。
86. Brinkmann 2022: 12; 另见 Brennan 2011。
87. Arneson2009: 201。
88. Somin 2016: 79; 另见 Brennan 2016a: 31。
89. 拉斯穆森报告2016年。
90. Somin2016: 87。
91. Friedman2013。
92. Somin2016: 87。
93. Campbell2006: 52。
94. 弗里德曼2019年: 第278页。
95. 弗里德曼2019年。
96. 皮尤研究中心, 2012a。
97. Friedman2013。
98. 弗里德曼2005年: 第xvi页。
99. Somin2016: 245。
100. Somin2013。
101. Gibbons2023。
102. Williams2021a。
103. Oster 等, 2013 年。

104. Williams2021a: 7808。
105. Williams 2021a: 7; 另见
Frye 1983; Mills 2007。
106. Kinney 和 Bright 2021。
107. Williams2021a: 1。
108. Stebbing1939: 31。
109. Williams2021a: 13。
110. Kahan 2013, 2017a, b。
111. Frimer 等, 2017 年。
112. 费斯廷格1957年。
113. Kahan2017b: 4。
114. Ackerman 和 Fishkin 2004。
115. Somin2016: 206–207。
116. Lupia 2016: 174–177;
Gibbons 2023: 14–18;
Somin 2023: 299–300。
117. Caplan 2007; Somin
2016。
118. Brennan2016a。
119. Somin2016: 20。
120. Kahan、Peters 等, 2012;
Williams, 2021a。

更多资源

- 布伦南，杰森（2016）。《反对民主》。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 卡普兰，布莱恩（2007）。《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国家会选择糟糕的政策》。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 弗里德曼，杰弗里（2019）。《无知识的权力》。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
- 凯伊，西蒙·T.（2015）。《无知之下的民主：质疑政治中对知识的推崇》。《批判评论》27卷第3-4期，第316-337页。
- 李普曼，沃尔特（[1922] 1998）。《公众舆论》。新不伦瑞克：Transaction出版社。
- 卢皮亚，阿瑟（2006）。《精英主义如何削弱选民能力研究》。《批判评论》18卷1-3期，第217-232页。
- 索明，伊利亚（2016）。《民主与政治无知：为何更小的政

府更明智》。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 沙利文，香农 与 南希·图安娜（编）（2007）。《种族与无知的认识论》。奥尔巴尼：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
- 威廉姆斯，丹尼尔（2020）。《动机性无知、理性与民主政治》。《综合》，第198卷第8期，第7807–7827页。

5 非理性与偏见

DOI:10.4324/9781003089483-6

做一个理性生物竟是如此方便，因为它使我们能够为自己心中所想的每件事找到或编造一个理由。——本·富兰克林

引言

约翰·斯图尔特·密尔认为，让公民参与政治会使他们变得更聪明、更高

尚。他提出，就政治事务进行公共审议对民主有益，因为它为公民提供了“以谬误换取真理的机会”，以及获得“对真理更鲜活印象”的契机。¹

其他人则不那么乐观。20世纪极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认为，政治参与不仅无法让我们变得更聪明或更高尚，反而会使我们变得不那么理性，更加愚蠢。熊彼特写道：

普通公民一旦进入政治领域，其心智表现水平便会立即下降。他会以一种在自身真正关切的领域中会立刻视为幼稚的方式进行争论和分析。他再次变得原始起来。

同样，杰森·布伦南（Jason Brennan）认为政治对我们有害。他指出，政治“不仅未能教育或提升我们，反而往往使我们变得愚钝和堕落。”³

这种担忧有道理吗？政治是否会让理性的人产生非理性的信念和行为？大量证据表明情况确实如此。一项被称为“有史以来最令人沮丧的大脑发现”的研究表明，政治甚至会扭曲人们最基本的数学推理能力。⁴ 在丹·卡汉

(Dan Kahan) 及其合作者进行的一项实验中，参与者被提供了一组关于某种护肤霜治疗皮疹效果的数值数据。⁵ 要得出关于该护肤霜效果的正确答案，需要一定的数学能力。不出所料，数学能力更强的人更有可能答对——这并不令人意外。真正令人惊讶的是，当人们面对同一问题但被赋予政治色彩的版本时所发生的情况。当完全相同的数字被用来描述枪支管制法律在降低犯罪率方面的有效性时，参与者的数学能力就不再是预测其能否答对的最佳指标了。相反，自由派人士在数据显示枪支管制法律有效时（这符合自由派普遍持有的观点），往往能正确解答问题；但当数据显示相反结论时，他们则倾向于答错。保守派的表现则恰好相反：当数据支持他们先前的信念时，他们表现良好；而当数据与他们的信念相悖时，表现则较差。⁶

在另一项研究中，卡汉 (Kahan) 同时测试了人们的科学素养及其政治意识形态。当被问及气候变化的风险时，那些科学素养更高的人，如果此类威胁与其所属政党的立场相冲突，

反而对气候变化更加持怀疑态度。科学素养并未帮助他们推理出正确答案；恰恰相反，它使他们更容易推理出自己想要的结论。其他实验也得出了类似的结果。⁷ 一般来说，人们会运用其复杂的推理能力，巧妙地摆脱那些与自身政治信念相矛盾的证据。

本章探讨政治如何干扰我们清晰思考的能力。首先概述政治偏见如何影响我们的思维，尤其对那些知识更丰富的人影响更大。尽管我们常将这些认知偏见视为非理性的，但我们将探讨它们实际上是否可能是理性的。正如人类可以“理性地无知”（如前一章所述），他们也可以“理性地非理性”。按照这种观点，形成非理性信念能以较低的成本帮助我们满足对社会归属感和心理舒适感的渴望。另一种可能性是，选民确实以追求真理和证据为优先，其党派偏见仅仅反映了他们所获取信息的差异，或对信息来源信任程度的不同。在探讨这些观点之后，我们将评估保守派与自由派是否同样容易产生偏见，抑或其中一方更易受影响。本章最后讨论将他人贴上“非理性”标签可能带来的危害。

1 政治动机性推理

1951年11月23日（星期六）下午，普林斯顿橄榄球队在赛季最后一场比赛中对阵达特茅斯队。这是一场激烈而肮脏的比赛，场上出现了从轻微到公然的各种犯规行为。第二节比赛中，普林斯顿队的明星球员因鼻梁骨折离场；第三节时，一名达特茅斯队球员则因腿部骨折被抬下场。这场比赛尤为重大，因为普林斯顿队当时保持全胜战绩，而他们的明星球员——刚刚登上《时代》杂志封面——正在参加他的最后一场比赛。

比赛一结束，指责便纷至沓来。究竟是哪支球队率先开始粗暴打法？是否有一方比另一方踢得更干净、更公平？谁的犯规次数最多，而这些违规行为是轻微的还是明目张胆的？

比赛结束几周后，普林斯顿大学和达特茅斯学院的学生被要求观看该场比赛的录像，并说明他们看到了什么。结果令人震惊：普林斯顿的学生认为达特茅斯队的犯规次数是达特茅斯学生所看到的两倍以上，而达特茅斯的

学生则认为普林斯顿队犯下了远比普林斯顿学生所目睹的更为恶劣的违规行为。简而言之，他们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比赛。他们对现实的感知受到了球队忠诚度的影响。8

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就像体育运动。当一群美国人观看一段政治示威活动的视频，以判断抗议者是否从事了违法行为时，他们对自己所看到的内容却无法达成一致。观众必须判断，这些抗议者是在进行受宪法保护的“言论”，还是通过阻拦、威胁或恐吓公众成员而从事了违法的“行为”。其中一半观众被告知，示威者是在一家堕胎诊所外抗议堕胎合法化；另一半则被告知，示威者是在一家征兵中心外抗议军方的“不问不说”政策。持有不同价值观的人不仅对示威活动的评价存在尖锐分歧，就连一些关键的“事实”——例如抗议者是否阻拦并威胁了行人——也看法迥异。所有参与者观看的是同一段视频，但他们所“看到”的内容却取决于各自的价值观。

在政治和体育领域，人们都以高度偏颇的方式解读信息。正因如此，选民常被比作体育流氓。¹⁰“政治流氓”本

质上是政治的狂热粉丝。他们对自己的政治身份抱有强烈认同，并以自己所属阵营的成员身份为荣，同时对持不同意见者表现出强烈不满。他们的政治观点已融入其身份认同之中，而归属于某个政治团体（如民主党、共和党、工党或保守党）对其自我形象至关重要。因此，他们倾向于以一种维护和强化自身政治身份的方式来解读政治信息。他们的判断受到其所希望融入的社会群体、所要维持的自我形象，以及不愿承认错误的心理所引导。

当信息通过党派立场的视角进行评估时，往往会扭曲判断。政治身份会导致公民对完全相同的信息做出不同的评价，具体取决于该信息是否支持他们既有的政治观点。这种现象被称为党派偏见（partisan bias）。总体而言，党派偏见的特点是“人们普遍倾向于以一种无意中偏袒自身政治群体或以有利方式呈现自身意识形态信念的方式进行思考或行动。”¹¹

党派偏见可以表现为多种形式，并在信息处理的不同阶段显现出来。例如，我们可能会选择性地接触那些证

实我们既有政治信念的证据，同时回避与之相矛盾的信息。¹² 这种行为通常被称为选择性接触。¹³ 我们还可能选择性地记忆和评估信息，不加批判地接受支持我们观点的数据，却对相反的证据过于挑剔或容易遗忘。¹⁴ 这种总体倾向——即主动寻求、选择性回忆并以有利方式解读支持我们信念的信息，同时回避、抛弃或否定相反证据——被称为确认偏误。¹⁵ 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两个人即使面对完全相同的证据，也可能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认为证据所显示的内容大相径庭。

这些偏见有时被统称为**动机性推理**（motivated reasoning）。当我们以一种符合自身价值观和愿望的方式来收集和处理事实信息时，我们的推理就是动机性的。认知心理学的大量研究表明，我们常常以符合自己先前世界观的方式来解读和筛选证据。我们“会以系统性偏向的方式去寻找、解读、评估和权衡证据与论点，从而倾向于得出那些出于与证据真伪或合理性无关的原因而‘希望’得出的结论。”¹⁶ 这一点在政治领域尤为明

显，因为政治推理更容易出错和产生偏见，因为它触及对我们至关重要的信念。我们的政治、道德和宗教信念往往构成我们身份认同的核心。¹⁷ 因此，我们可以将这类信念归类为**身份构成性信念**（identity-constitutive beliefs）。这些信念反映了一种关于“自己是谁、属于何种类型的人，以及自己如何与他人关联”的自我认知。¹⁸

对人性有敏锐洞察力的人早已预见了一些心理学发现。1620年，弗朗西斯·培根写道：“人类的理解力一旦采纳了某种观点（无论该观点是被普遍接受的，还是因其本身令人愉悦），便会将其他一切事物拉来支持并附和这一观点。”¹⁹ 1928年，伯特兰·罗素宣称：“我们天性中有一条法则：只要有任何可能，我们总会采纳那些能够维护自尊的信念。”²⁰ 在罗素之前两百多年，约翰·洛克就在《论理解力的指导》中评论了人类心智的可悲状况：

在理解力方面，存在着若干弱点与缺陷，这些或源于心智的天然禀性，或源于后天养成的不良习

惯，从而阻碍了其通往知识的进程。倘若对心智加以深入研究，此类弱点与缺陷之多，或许不亚于身体的种种疾病；每一种都在某种程度上拖累并削弱了理解力，因而都值得予以关注并加以纠正。21

尽管洛克深刻意识到我们智力上的缺陷，但他对我们克服这些缺陷的能力持乐观态度。他主张我们应公正地自我审视自身的信念，以根除“从教育、党派、崇敬、时尚和利益中所吸收的偏见。”²² 换言之，他认为严格的自我省察有助于揭示我们的偏见。

洛克过于乐观了。自我判断常常被合理化和偏见所蒙蔽。这不仅使错误的推理未被察觉，还让我们过分自信地认为自己已经排除了这些错误。正如内森·巴拉尼恩（Nathan Bal-lantyne）所言：“我们觉得自己已尽最大努力做到不偏不倚，这种感觉会促使我们相信确实没有偏见，但这种感觉并不可靠。”²³ 这种感觉之所以不可靠，是因为偏见通常在意识中不留痕迹。从主观角度看，带有偏见的判断与无偏见的判断看起来毫无

差别。正如蒂莫西·威尔逊（Timothy Wilson）和南希·布雷克（Nancy Brekke）所调侃的那样：“人类的判断——即便是非常糟糕的判断——也不会散发出异味。”²⁴ 因此，我们通常无法仅凭内省来判断自己是否存有偏见。我们深受心理学家所称的“客观性错觉”之害：我们总以为自己比实际上更加客观、更少偏见。²⁵

因此，在关于党派偏见的研究中，参与者并未意识到自己的推理方式存在偏见，这也就不足为奇了。以杰弗里·科恩（Geoffrey Cohen）关于政党认同如何影响政策偏好的著名研究为例。他开展了一项实验，向参与者介绍了两项福利计划：一项严苛（即吝啬）的福利计划和一项优厚（即慷慨）的福利计划。正如你所预料的那样，民主党人倾向于支持慷慨的福利计划，而共和党人则倾向于支持吝啬的福利计划。但关键在于：当民主党人被告知他们所属政党支持严苛政策时，他们便转而支持该政策；同样，当共和党人被告知他们所属政党支持优厚政策时，他们也转而支持该政策。政策的实际内容几乎无关紧要；

唯一重要的是哪个政党被宣称支持该计划。更糟糕的是，参与者完全意识不到党派立场的影响。当被要求解释自己的政策偏好时，他们声称自己是基于政策的客观优点做出判断，并坚称政党归属毫无关系。这既体现了动机性推理的力量，也揭示了我们对这种力量的盲目无知。

2 知识与偏见

我们都会进行动机性推理，但动机性推理是否与无知有关呢？你可能会认为，政治上的动机性推理源于无知，或者认为缺乏智识上的成熟会助长偏见思维。然而，事实往往恰恰相反。通常，那些知识最丰富、思考最深入的人在评估政治信息时，反而表现出最高程度的偏见。

一般来说，党派倾向强烈的人往往对政治最为了解。²⁷ 例如，共和党或民主党的坚定支持者通常比政治认同较弱的人更了解政治。单就这一事实而言，并不令人意外。我们越是在意某件事，就越有动力去了解它。咖啡爱

好者往往更了解咖啡；摩托车爱好者对摩托车的了解也更多；而最狂热的体育迷通常会积累大量关于自己喜爱球队的知识。政治也不例外。最热衷于政治的“粉丝”往往会吸收最多的政治信息。²⁸ 这解释了为何具有强烈党派认同的人通常政治知识最为丰富。

但政治立场最偏颇的个体（通常也是知识最渊博的）也最有可能因政治因素而使其思维受到扭曲。²⁹ 党派认同起着一种“知觉滤镜”的作用，我们通过它来筛选信息。³⁰ 你对某个政党的认同感越强，就越难以客观地评估信息。毫不奇怪，政治偏见通常在党派立场最鲜明的个体中表现得最为强烈。³¹

2.1 武器化知识

知识与权力一样，也可能被以腐败的方式加以利用。你对某个主题了解得越多，手中可用于寻找理由来拒斥与自己偏好观点相冲突的事实、数据和论点的“弹药”也就越多。例如，查尔斯·泰伯（Charles Taber）和米尔顿·洛奇（Milton Lodge）曾就平权行动

和枪支管控政策的态度展开研究，比较了对这些议题了解较多的人与了解较少的人。他们发现，那些对政策持有最强烈态度的公民最容易陷入动机性推理；同时，他们还发现，政治知识最丰富的人尤其容易产生动机性偏见。这是因为，他们拥有更多“弹药”来反驳与其观点相矛盾的信息。³² 在“低知识”组中，参与者列出的支持自己立场的理由数量是反对理由的两倍；而“高知识”组则倾向于主要聚焦于驳斥对方论点。尽管高知识组总体上列出的想法要多得多，但他们却几乎没有提出任何支持对方立场的理由。³³

在《理性的谜题》（The Enigma of Reason）一书中，雨果·梅西耶

（Hugo Mercier）与丹·斯珀伯（Dan Sperber）通过历史人物爱德华·柯克爵士（Sir Edward Coke）的案例，生动地阐明了这一担忧。柯克是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的英国法学家，被称作“或许是史上学识最为渊博的普通法律师。”³⁴ 他能够将自己的观点“建立在无数中世纪文献的基础之上——其中大多数是手稿卷轴——而

他以不知疲倦的热情研读过这些文献。”然而，问题在于柯克“显然希望找到符合其法律与政治信念的先例”，并且“为了支持自己的论点而曲解了先例”。据梅西耶与斯珀伯所言，“1766年，威廉·布莱克斯通爵士（Sir William Blackstone）在其《英国法释义》（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中警告说，法官的知识与才智并不能保证其判断公正，他当时所指的或许正是柯克。”³⁵ 布莱克斯通写道：

在将事实问题交由任何单一治安法官裁断和裁定时，偏袒与不公便有了充分的施展空间：要么公然断言未经证实之事为已证事实，要么更为巧妙地通过隐匿某些情节、夸大扭曲其他情节，并对剩余部分加以曲解区分，从而达到不公之目的。³⁶

我们之前提到，高度党派化的人可能拥有更多的政治知识，因为他们对政治的兴趣提升了他们从中获得的乐趣。（回想一下体育迷的类比：体育迷获取知识是为了增强观看比赛和支持自己球队的乐趣。）然而，爱德华·

柯克爵士（Sir Edward Coke）的例子说明了党派人士往往更加知情的另一个原因：他们获取知识是为了将其武器化。通过掌握更多知识，他们能更有效地拒斥那些与自身信念相矛盾的信息。

这与一种简单、直观且广为接受的政治理论相悖，我们称之为“无知假说”（Ignorance Hypothesis）。根据这一假说，民主之所以运转失灵，部分原因在于公民对政治议题相对缺乏了解。³⁷ 按照这种观点，糟糕政策和激烈政治斗争的根源在于信息不足。然而，“无知假说”不仅错误，而且恰恰颠倒了事实。心理学研究表明，党派人士掌握的信息越多，他们反而越固执己见，分歧也越深。另一种假说——我们称之为“武器化知识假说”

（Weaponized Knowledge Hypothesis）——则认为，党派人士对政治了解得越多，他们在涉及政治争议话题时往往就越顽固。如果这一替代理论成立，那么一个更聪明、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公民群体未必会减少政治极化、促成更优的政策决策或改善民

主。相反，它可能只会加剧政治问题。³⁸

这带来了一个令人困扰的两难困境。人们普遍认为，一个民主制度要良好运作，离不开具备知识的公民。然而，那些知识最丰富、政治热情最高的选民，往往也是意识形态色彩最浓的群体，因而最有可能以扭曲、偏颇的方式思考问题。尽管大多数公众对基本政治事实的无知程度令人震惊，但恰恰是那些知识渊博的党派人士最为固执己见、教条僵化。这使我们陷入一种尴尬的权衡：我们究竟想要无知的选民，还是消息灵通却固执己见的教条主义者？³⁹

我们在此不会试图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的观点很简单：知识渊博的公民对民主而言显然并不一定更好。尽管他们不那么无知，却往往更具偏见且更“非理性”。我们只是用一种无能换来了另一种无能，而两者都可能威胁民主。

2.2 党派偏见如何劫持理性思考

给予党派人士更多弹药以拒斥不利事实和论点的，不仅仅是知识或信息。我们的批判性推理能力常常被劫持，用于维护那些构成身份认同的信念。正如塔利·沙罗特（Tali Sharot）所言：“分析能力越强的人，越有可能随意曲解数据，相较而言，推理能力较低的人反而较少如此。”⁴⁰ 如果你受过高等教育或掌握大量信息，你可能拥有更多弹药；如果你智力超群，你就更善于为自己的信念进行合理化。这种结合在政治领域尤其危险。正如迈克尔·休默（Michael Huemer）所指出的：“一个带有偏见的人会将自己的智力和教育当作合理化信念的工具。”⁴¹

这些担忧并不仅仅是愤世嫉俗的猜测；它们得到了实证支持。大卫·珀金斯（David Perkins）及其合作者发现，智商比教育程度更能预测人们在辩论中的表现，但它仅能预测人们提出支持己方观点的论点数量。⁴² 换句话说，聪明人擅长做律师和新闻秘书，但在寻找支持相反观点的理由方

面并不更出色；事实上，他们往往表现得更差。与此相关的是，在“认知反思”测试中得分最高的人——即倾向于深思熟虑而非依赖本能反应的人——反而最有可能表现出动机性推理。⁴³ 马克·乔斯林（Mark Joslyn）和唐纳德·海德-马尔克尔（Donald Haider-Markel）发现，“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党派人士在事实认知上的分歧最大”，部分原因在于他们拥有更多信息来反驳与自身观点不一致的事实。⁴⁴ 教育似乎并未如富兰克林·罗斯福所认为的那样“为民主提供真正的保障”，反而加剧了强烈的党派动机。其他研究也呼应了这些发现。⁴⁵

这些研究揭示了政治对认知所造成的腐蚀性影响。如果说知识为党派人士提供了更多“弹药”来摧毁威胁性的信息，那么智力就是他们的“武器”。一个人所拥有的认知火力越强，就越有能力扭曲数据和论点，使其符合自己想要得出的结论。这驳斥了“动机性推理主要是智力较低者的一种特质”这一观点。

3 理性非理性

2016年特朗普当选时，《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指出，他的胜利源于“愚人之舞”。⁴⁶ 在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广受欢迎的政治著作《我们到底有多愚蠢？》（Just How Stupid Are We?）中，里克·申克曼（Rick Shenkman）认为，大多数选民在政治上是“愚蠢的”。⁴⁷ 此外，2016年《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一封读者来信呼吁美国人“重新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确立理性的地位”。⁴⁸ 尽管将党派偏见简单地归为根本性的非理性或许颇具诱惑力，但这种判断可能过于简单化了。

在处理信息时，个体可能具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目标：准确性目标和定向目标。在心理学中，“定向目标”指的是这样一种动机：无论结论是否真实，都力求得出特定的、所期望的结论——例如，将自己视为聪明、诚实或讨人喜欢。⁴⁹ 这与以准确性为导向的推理形成对比，后者关注的是揭示客观真相。因此，我们可以依据两种不

同的成功标准来评估理性主体：认识论标准和实用标准。正如丽莎·博尔托洛蒂（Lisa Bortolotti）所言：“理性主体要么是那个‘把事情弄对’的人

（例如，拥有真实信念的人），要么是那个‘事情进展顺利’的人（例如，拥有有助于幸福或繁荣的信念的人）。”⁵⁰ 因此，我们需要区分“理性”一词的两种含义：认识论意义上的理性和工具意义上的理性。

3.1 认知理性与工具理性

认识论学者倾向于关注认知理性（epistemic rationality）。这种理性大致强调信念的一致性、推理的可靠性以及遵循证据。具备认知理性，意味着你的信念与证据相符，信念之间逻辑一致，并且能够避免偏见与谬误。例如，如果你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冰箱里有牛奶，并且你的信念正是基于这一证据，那么你就是认知理性的。相反，如果你仅仅因为希望冰箱里有牛奶就相信里面有牛奶，那你就是认知非理性的。（一厢情愿的思维并非认知理性。）

相比之下，工具理性涉及选择实现目标所必需且有效的手段。例如，如果你打算买牛奶，并前往杂货店，因为你相信那是购买牛奶的最佳地点，那么你就是工具理性的。但如果你需要买牛奶，也相信去商店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必要手段，却无意前往，那么你就是工具非理性的。经济学家在解释人类行为时通常援引这种类型的理性。此类理性还包括人们处理信息不仅是为了满足物质需求，也是为了维持其在社会群体中的地位的情形。

这两种理性密切相关。⁵¹ 要成功实现你的目标，你需要将行动建立在反映现实的信念之上。一个对汽车一无所知的修理工很快就会失去顾客；一个错误地认为毒蘑菇有益健康的采集者则会丧命。在日常生活中，准确性是有回报的，因为认知上的非理性会受到惩罚：如果你对如何驾驶汽车持有错误的理论，你就会撞车；如果你对如何烤肉抱有错误的信念，肉就会烧焦。这些例子说明了一种直观且广为接受的观点：实践上的成功往往依赖于认知理性。

但政治却有所不同。政治生活的一个特点是，实践上的成功往往与认知理性相冲突。⁵² 在大型民主国家中，每位选民影响选举结果的机会微乎其微。因此，正如布伦南所指出的那样，个人持有错误信念所付出的代价极低：

普通人只有在认为道路安全时才会过马路。他们有充分的动机左右张望……毕竟，如果判断错了，他们就会丧命。现在假设同一个人即将去投票。如果他们沉迷于某种阴谋论，或只是犯了一个诚实的错误，会发生什么呢？唉，几乎不会有什么后果。个人的一票产生任何实际影响的概率微乎其微……人们通常对街道交通非常了解且理性……因为非理性会受到惩罚。但……他们在政治问题上却往往无知且非理性。或许在投票这件事上，知识和理性得不到回报，而无知与非理性却不会受到惩罚。⁵³

支持那些感觉良好或能让己方团队取得胜利的政策，会带来显著的心理益处。这可能导致选民放纵自己的认知

和情感偏见。从经济学角度看，非理性需求之所以旺盛，是因为犯错的成本很低。这也解释了为何准确性在政治中并不值钱。

3.2 认识论非理性的益处

尽管犯错的代价很低，但动机性推理带来的好处却很高。在政治领域，人们往往更倾向于持有与同伴相同的信念，尤其是当他们认为他人与自己相似时。⁵⁴ 认同某个政治“阵营”具有诸多益处：它能培养一种社群感、安全感和团结感，从而满足我们对归属感的基本需求；加入一个更大的群体还能带来存在意义上的慰藉，并形成一种共享的现实感。⁵⁵ 此外，这种归属感也是自豪感、自尊和幸福感的重要来源。正如伊利亚·索明（Ilya Somin）所指出的：

体育迷和政治迷往往都固执己见、思想封闭，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最初选择参与这些活动的主要目的并非寻求真相。相反，他们的动机包括娱乐消遣、

印证自己已有的观点、享受与其他粉丝的归属感，等等。56

当我们的团队获胜时，它会提升我们的情绪，减轻我们的压力，并让我们感到自己属于某种比自身更宏大的事物。人类从群体归属中获得极大的情感意义。事实上，这种归属感能够为我们的生活赋予意义与价值。

“理性非理性”（rational irrationality）理论认为，在工具理性

（instrumentally rational）的意义上，保持认知非理性（epistemically irrational）可能是合理的。⁵⁷简而言之，有时以带有偏见的方式思考反而对我们有利。政治领域正是理性非理性行为普遍存在的典型情境，因为在政治中，错误通常不会受到惩罚，而偏见却能为我们带来种种好处。正如布莱恩·卡普兰（Bryan Caplan）所言，我们的错误与其现实后果之间存在一道“防火墙”。⁵⁸正因如此，政治领域充斥着大量理性非理性的行为。我们的政治信念能为我们提供心理安慰和群体地位，却几乎不带来任何风险。个体犯错的低成本，激励我们以认知非理性的方式处理政治信息。⁵⁹

从自私的角度来看，认知理性并不划算。因此，我们往往不负责任地行使民主赋予我们的那点政治权力。

政治领域中缺乏清晰的反馈，同样有助于解释为何基于方向性动机（而非准确性）来形成信念可能是理性的。假设我支持一项增加公共教育经费的政策，但该政策实施后不久，考试成绩却下降了。那么，是这项新政策导致了成绩下滑，还是即使没有这项政策，考试成绩本来也会下降？同样，如果国家陷入经济衰退，这是总统的过错，还是某些外生因素所致？这类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往往模糊不清，即便是专门研究这些问题的专家也常常各执一词。相比之下，当我买到一颗腐烂的蔬菜时，我会立刻尝到自己犯错的后果，许多其他私人决策也是如此。⁶⁰ 在缺乏一种清晰可解读的方式来判断我们的信念是否准确反映了现实世界的情况下，将这些信念建立在来自社会世界的更直接、更积极的反馈之上——例如我们的身份认同、社群归属感或自身利益——便是合乎情理的。⁶¹

需要明确的是，理性非理性（rationally irrational）的人并非故意选择相信某种错误的东西。这种做法需要一种不切实际的“双重思想”

（doublethink）：即一个人明知某事为假，却仍选择相信它。⁶² 一个理性非理性的人并不会有意识地决定以带有偏见的方式思考。他们不会这样推理：“如果我相信p，就会产生有益的效果E；因此，我应该相信p。”相反，理性非理性理论认为，当犯错的成本较低时，人们往往会放松自己的认知标准，更容易受到认知偏见和情绪的影响。他们并非刻意追求拙劣的推理或错误的信念，而是不再努力仔细评估那些可能与自己信念相冲突的证据。⁶³

3.3 理性无知与理性非理性

其中一些内容可能在前一章中听起来很熟悉，因为“理性非理性”与“理性无知”具有关键的相似之处。回想一下，理性无知理论认为，当获取知识的成本超过其收益时，保持无知就是理性的。这两种理论都指出，选民受到了误导，从而导致民主制度存在缺陷。

它们还提出，个人的政治选择几乎没有什么实际影响，因此降低了人们做出知情决策的积极性。此外，根据这两种理论，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目的并非寻求真理或提高投票质量，而是为了获得心理安慰并提升自身的生活质量。

然而，理性非理性与理性无知在两个重要方面有所不同。首先，理性无知并不预测选民信念中存在任何系统性偏误。相反，该理论与选民以随机方式持有错误信念的情况是一致的。这就为民主制度中的“集体智慧”解决方案（例如聚合奇迹，参见第2章）留下了可能性。相比之下，理性非理性则预测，政治错误将是系统性的，并且很可能出现在那些“感觉良好”的政策与实际有益的政策相背离的地方。因此，理性非理性排除了聚合奇迹的可能性。当政治错误在人群中并非随机分布时，这些错误便无法相互抵消。

其次，“知识的幻觉”——即认为我们比实际上知道得更多——最好用“理性非理性”（rational irrationality）而非“理性无知”（rational ignorance）

来解释。理性无知的选民是那种“对某一主题一无所知”，因此“持不可知态度，并乐于将决策交予更明智之人”的人。⁶⁴ 相比之下，理性非理性的选民则认为知道自己知道一些实际上并不正确的事情。正如卡普兰（Caplan）所写：“他并不需要花数

因此，尽管个别选民的行为可能具有工具理性，但这些选民作为一个整体却可能并未按照其集体自身利益行事。尽管对任何个体而言，以这种方式形成信念符合其自身利益，但当所有公民都这样做时，却可能损害他们的集体利益。一旦这种情况发生，民主制度就更有可能采纳那些并非基于最佳可得证据的政策。这会使我们整体处境变得更糟。然而，这一后果并不会改变任何个体选民在决定政治议题立场时所面临的激励。从个体角度看，将自己的信念与自身意识形态或政治群体保持一致似乎是合理的，因为个人信念不太可能产生显著影响。

4 比我们想象的更理性？

理性非理性理论既讨人欢喜，又令人沮丧。它并非以微弱的赞许来贬低，而是以赞许的方式予以贬低。尽管这比被断言我们在所有意义上都是非理性的要好，但若能有一种理论，让我们在认知上和工具上都具备理性，岂不更妙？

幸运的是，确实存在一些这样的理论。尽管许多人利用心理学的实验数据来揭示我们根深蒂固的动机性推理，但另一些人则认为，党派人士可能恰恰是以一个认识论上理性的行动者应有的方式来处理信息的。至少有两种相互补充的说法可以支持这一替代理论，即党派人士确实关心真相。

4.1 不同的信息视角

根据第一种理论，党派偏见的出现可以用不同群体所掌握的信息差异来解释。⁶⁷我们称之为“信息差异观”（Different Information View）。此处所说的“信息”不仅包括不同的事实性信息，也包括关于成为某一特定群体成

员是何种体验的各种经历或知识。按照这种观点，党派人士之所以看似带有偏见，并非因为他们不理性，而是因为他们是从各自不同的证据和经验池中得出结论的。

当不同群体拥有不同的信息时，这可能是因为他们被困在了认知泡沫

（epistemic bubbles）之中。这些泡沫“是通过排除相关的认知来源而形成的，而非主动贬低这些来源。”⁶⁸

我们之所以陷入这些泡沫，有时是因为我们有意或无意地想要回避那些挑战自身信念的信息；而另一些时候，我们陷入其中则并非自身过错。例如，我可能会基于共同的爱好和兴趣来构建自己的社交网络。然而，我自己并未意识到的是，我的朋友们可能只代表了政治光谱中的某一方，从而限制了我接触其他观点的机会。

算法化的个性化过滤也可能导致认知泡沫。随着媒体公司越来越多地根据我们现有的兴趣和用户画像定制内容，它们往往会强化我们已有的信念。困在这些泡沫中的人可能正在根据他们所掌握的证据进行理性的更

新；只不过，不同立场的人所拥有的证据各不相同罢了。

4.2 差异化信任观

根据第二种理论，党派偏见的出现可以用这样一个事实来解释：不同的党派群体信任不同的信息来源。⁶⁹ 我们不妨将这一观点称为“差异信任观”。该观点可以补充并部分解释第一种理论：如果我们信任不同的信息来源，最终就会获得不同的信息。⁷⁰ 然而，这两种观点在一个关键方面存在差异。第一种理论预测，接触新信息应当会缩小党派分歧，而第二种理论则认为这一策略无效。如果党派分歧的真正根源在于信任模式的差异，那么仅仅提供更多信息并不能弥合分歧。相反，我们需要重新调整信任与不信任的关系。

为什么不同群体在信任模式上存在差异？我们信任对象的不同，可能源于价值观、初始假设以及对证据类型或来源的偏好的差异。⁷¹ 例如，某一群体可能更信任媒体和科学专家，而另一群体则更倾向于接受宗教领袖的证

言。⁷²当我们信任的对象存在显著差异时，回音室（echo chambers）就更有可能形成。与以信息差异为特征的认知泡沫（epistemic bubbles）不同，回音室的特点在于信任上的巨大分歧：尽管能听到不同观点，但这些观点会被主动贬低和否定。⁷³当不同群体信任不同的信息来源时，他们自然会得出不同的信念。这并非非理性行为。根据“差异信任观”（Differential Trust View），看似出于动机的推理，实际上是个体基于自身既有价值观、信念和偏好，对证据进行的理性更新。

综上所述，到目前为止，党派人士似乎表现出无可救药的偏见，并陷入动机性推理之中。不同的信息观和差异性信任观试图解释这种表面上的认知非理性现象。这两种相辅相成的观点认为，党派信念之间显著的差异并非由偏见所致，而是由其他某些因素造成的：

不同的信息视角 对立阵营的党派人士持有不同的信念，是因为他们掌握的信息不同。

差异性信任观 对立党派持有不同信念，是因为他们信任不同的信息来源。

究竟是其中一种理论正确，还是党派人士实际上存在偏见？

这是一个持续争论和讨论的话题。仅凭实验数据本身，并不能断定党派人士是无可救药地带有偏见，还是在认识论上是理性的。差异性信任观和信息观成功地说明了党派人士如何可能以认识论上理性的方式进行推理。然而，他们是否确实在以这种方式进行推理，则是另一个问题。正如丹尼尔·威廉姆斯（Daniel Williams）所指出的：“问题不在于非动机性解释是否可以在事后（post hoc）被套用于实验结果，而在于这些解释是否具有合理性。”⁷⁴ 我们邀请读者自行思考这个问题：哪一个解释在你看来更为合理？

虽然我们不想影响你的判断，但我们还是要为党派偏见的说法提出两点理由。第一，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原因，说明公民可能更容易受到其方向性动机的影响，而非追求真理（参见

第3节)：错误信念的代价微乎其微，而将信念与自身社会群体保持一致所带来的好处却十分显著。

其次，要使替代性解释能够令人信服地反驳党派偏见的表象，我们必须假定人们之所以掌握不同的信息或信任不同的信息来源，完全是出于与动机性推理或认知偏见毫无关联的原因。

⁷⁵但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有多大呢？许多人之所以拥有不同的信息，是由于选择性接触，而非不幸所致。我们常常了解持不同意见的观点，却仍选择予以摒弃。此外，我们信任或不信任谁，往往取决于社会归属关系，而非其认知资质（epistemic credentials）。⁷⁶我们承认，对立的党派群体确实常常拥有不同的信息或信任模式。然而，这并不必然使其由此产生的信念具有理性，因为这些差异本身可能正是非理性的产物。尽管某些公民在坚持其党派立场时可能在认知上是理性的，但若声称大多数公民在这方面都是理性的，这种说法即便不是出于动机性偏见，也至少是过于乐观了。

5 非理性是否具有不对称性？

在政治领域，指责对方存在偏见、非理性以及智力低下等言论十分普遍。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9年的一项民调发现，75%的民主党人认为共和党人比其他美国人更加思想封闭；而64%的共和党人对民主党人持有同样的看法。此外，36%的共和党人声称民主党人的智力低于平均水平，而38%的民主党人也对共和党人提出了同样的指控。⁷⁷在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2016年当选总统后，民主党人抱怨称，经济条件较差的共和党选民是非理性的，因为他们投票违背了自身利益。在媒体上，政客和评论员经常将政治对手描绘成带有偏见的一方，同时将己方对事实的看法标榜为“客观公正”。

这些指控可能表明，党派偏见是一个两党都存在的问题。我们往往更容易察觉他人的偏见，而非自身的偏见。

⁷⁸然而，我们或许也会疑惑：政治光

谱的一方是否比另一方存在更多偏见？

5.1 政治意识形态与人格

大量研究发现，政治意识形态与人格特质之间存在相关性。这一研究领域始于20世纪50年代，当时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及其团队探索了权威主义作为保守意识形态的心理基础。⁷⁹ 更近期的研究发现，政治保守主义与一些心理因素相关，例如对模糊性的不容忍、对损失的恐惧、对结构的需求、死亡焦虑以及恐惧管理。⁸⁰

政治保守主义也与某些认知动机相关。在一项2017年的元分析中，研究者对来自14个国家的133,976名参与者进行了调查，发现保守的政治意识形态与一系列认知倾向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这些倾向包括思维僵化、教条主义、认知复杂性降低、对模糊性的不容忍、对不确定性的回避、思想封闭、对认知闭合的需求，以及缺乏反思能力。⁸¹ 其中，思维僵化和教

条主义的效应最为显著，它们始终与政治保守主义和右翼观点相关。⁸²

上述研究强调的是认知风格的差异，而非智力能力的差异。然而，一些证据表明，自由派在标准化认知能力测试中的表现优于保守派。⁸³此外，智力较低的儿童在成年后更有可能认同社会保守主义意识形态。⁸⁴保守派似乎也更容易轻信他人，更倾向于传播假新闻和阴谋论，并且对科学的认知方式兴趣较低。⁸⁵

此时，我们可以想象，持政治自由主义立场的读者们正感到颇为自鸣得意。“看吧，我们思想开明；他们却带有偏见！”“我们肯定是对的；他们肯定是错的。”然而，就此宣布胜利并离开战场还为时过早。上述总结的结果存在强烈争议。

首先，那些指责共和党人非理性的民主党人，往往预设了理性要求个人按照自身的物质利益投票。当收入较低的共和党人投票反对自身利益时，他们就被称作非理性。但人们的行为动机未必是自利的或物质性的。例如，人们常常为了表达自己的价值观而投

票，即使这会损害自身的利益。当民主党人声称自己是为了他人福祉、表达自身价值观或世界观而投票时，他们便认为自己的行为是理性的；然而，当工人阶级的共和党人做出同样的选择时，却被视为非理性。⁸⁶ 这是一种虚伪。

其次，对这项研究的一个持续批评是，左翼学者忽视了左翼自身的教条主义。例如，菲利普·泰特洛克

（Philip Tetlock）及其合作者分析了政治演讲和访谈，发现无论是右翼还是左翼的极端分子，都比中间派更加教条和思想封闭。⁸⁷ 其他人则声称，自由派在专制倾向、思维僵化、简单化、不宽容以及认知偏见等方面，可能与保守派同样严重。⁸⁸ 约阿夫·甘扎赫（Yoav Ganzach）发现共和党人与民主党人的智商几乎毫无差异。⁸⁹ 尽管社会保守主义似乎与智力呈负相关，但经济保守主义却似乎与认知能力和科学素养均呈正相关。⁹⁰ 一些研究甚至显示，共和党人在智力测试中的得分高于民主党人。⁹¹

一项对41项实验研究的最新荟萃分析发现，没有证据表明在美国政治中，

意识形态偏见在政治右翼比左翼更为明显。⁹² 彼得·迪托 (Peter Ditto) 及其同事对12,000名参与者所表现出的所谓党派性推理偏差进行了比较，结论是自由派与保守派的党派偏见程度相似。因此，他们支持“认知对称性假说” (cognitive symmetry thesis)，该假说认为在美国政治中，左翼与右翼的意识形态偏见程度相当。

5.2 自由主义者在认识论上更幸运吗？

如果认知对称性论题是正确的，为什么那么多研究者声称发现了保守派与自由派之间的心理差异？

可能的情况是，保守派共和党人更倾向于否认某些事实，尽管拒绝这些事实所涉及的认知过程具有普遍性，并且在政治光谱的双方都会被激活。换句话说，可能存在信息不对称，但并不存在认知不对称。一些学者已提出过类似的观点。⁹³ 卡汉 (Kahan) 的研究支持这一假说，表明在若干威胁自由派意识形态的问题上，自由派对科学的理解是错误的，而保守派则是

正确的。⁹⁴在当代政治中，自由派可能拥有更准确的科学信念，仅仅是因为他们在认识论上更为幸运。自由派所信赖的个人和机构恰好更为可靠，这确保了他们的信念更具正当性，或更有可能为真。⁹⁵因此，尽管当前“科学否认主义”在政治右翼可能比左翼更为普遍，但这并非源于认知上的根本差异。

或者，我们也可以否认自由派在整体上拥有更准确的科学观点。诚然，自由派在气候科学和进化论这两个问题上是正确的（我们姑且如此假设），而许多保守派在这两个问题上是错误的。由于这两个问题都高度政治化，人们可能会倾向于推断：自由派在其他具有政治争议的问题上也往往更正确。然而，要确立某一群体在认知上的优越性，我们需要考察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科学议题，而不能仅凭少数经过精心挑选的例子。

事实上，一些人认为自由派一方也存在大量否认科学的现象。例如，基思·斯坦诺维奇（Keith Stanovich）指出，自由派倾向于否认以下科学共识：智力具有中等程度的遗传性；在

控制职业选择和工作背景后，女性从事相同工作时的收入并不比男性低20%；单亲家庭的孩子往往更容易出现行为问题；以及在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及其他学科领域，没有证据表明在女性的招聘和晋升中存在偏见。⁹⁶ 同样，一些人指出，自由派往往对经济学持怀疑态度，并更倾向于相信占星术之类的伪科学。⁹⁷ 如果这些学者的观点正确，那么民主党人宣称自己是“科学政党”并将共和党人斥为“科学否认者”的做法就过于草率了。两个群体的成员都难以接受那些威胁其既有信念的证据。

5.3 自由派研究者是否存在偏见？

我们所有人都对自己一方的偏见视而不见，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一个由左翼社会科学研究员主导的领域声称发现了自由派与保守派之间的认知差异。因此，对认知对称性论点的否定，另一种解释是：自由派研究者自身就带有偏见。⁹⁸ 在试图找出政治对手认知缺陷的过程中，占压倒性多数

的自由派教授群体可能选择性地收集那些证实其先入之见的证据，同时回避与之相冲突的证据。正如迈克尔·舍默（Michael Shermer）打趣道：

正如医学科学家研究癌症是为了治愈这种疾病一样，自由派政治科学家研究政治态度和投票行为，是为了治愈人们身上保守主义这一“癌症”。学术界中的这种自由派偏见根深蒂固，已然成为自由派之鱼所游弋的“政治之水”——他们甚至对此浑然不觉。

99

这种自由派偏见的指控并非无人回应。一些人反对将自由派左翼与保守派右翼之间进行这种“虚假对等”。乔纳森·巴伦（Jonathan Baron）和约翰·乔斯特（John Jost）指出，那些显示保守派并未表现出更大意识形态偏见的研究，实际上“是出于其他目的而挑选的，并非为了考察意识形态的不对称性。”¹⁰⁰ 他们认为，这些研究在设计上刻意使其难以揭示党派偏见的不对称性。这是因为这些研究所使用的材料旨在引发所有参与者（无论其政治倾向如何）的偏见。因此，其

研究结果可能无法准确反映左右翼冲突中所涉及的议题和论点。

尽管对保守派偏见的关注，可能源于一个由政治自由派占压倒性多数的学科本身所存在的偏见，¹⁰¹但人们同样容易产生另一种偏见——即不愿承认真实存在的差异。例如，那些致力于维护两党制政治体系合法性的人，可能会倾向于认为双方对民主制度的缺陷负有同等责任。毕竟，如果事实证明其中一个政党一贯比另一个更非理性或更缺乏信息，这对民主制度本身又意味着什么呢？

尽管目前尚无定论，保守派和自由派是否同样存在偏见，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在指责对方之前，我们中的许多人都有必要保持谦逊。毕竟，我们已经看到，政治偏见无处不在，难以自我察觉，且对任何人都毫不留情。甚至我们当中最聪明的人可能尤其容易受到它的影响。

6摘要

在上一章中，我们探讨了无知何以可能是理性的。在本章中，我们考察了选民不仅会限制自己获取信息，还会以特定方式处理他们所拥有的信息。令人沮丧的是，大量证据表明，选民在思考政治问题时表现出动机性推理（motivated reasoning）。这包括选择性接触证据、选择性记忆，以及对信息进行不对称的审视。启蒙思想家曾颂扬理性有能力使我们摆脱激情的束缚，但实证证据却对这些期望提出了质疑。事实恰恰相反，更多的知识和更高的认知复杂性非但未能缓解我们的偏见，反而常常加剧了它们。

如果获取政治知识主要是为了投出更好的选票，那么持续存在的偏见和不准确性就难以解释。但如果主要目标是获得社会和心理层面的收益，那么政治知识越丰富的人偏见反而越大，就具有现实合理性。事实上，我们已有充分理由认为，许多选民是“理性地非理性”的：他们以有利于自己阵营的方式选择和处理政治信息，因为这样做的收益很高，而成本却很低。

我们想以指出一些对日常政治话语的实际启示作为结尾。即使有充分证据表明我们许多人在政治上是非理性和带有偏见的，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应该在具体个案中随意指责他人。在放纵自己批评他人的冲动之前，至少有三个理由让我们有所迟疑。

首先，正如杰弗里·弗里德曼（Jeffrey Friedman）所指出的，我们在对他人信念进行心理化解读时，常常采用双重标准：我们倾向于将他人的观点归因于心理因素，却不会这样看待自己的观点。作为纠正，他建议我们应默认他人并无非理性，除非有证据证明其确实如此。¹⁰² 正如我们通常认为自己的信念是理性的，我们也应当给予他人同样的宽容。否则，我们在指责他人存在偏见时，就有陷入虚伪的风险。

其次，很难判断一个人究竟是真正非理性地相信某事，还是仅仅犯了错误或运气不好。如前所述，党派偏见的表象可能源于真诚地追求真相的努力。当人们相信看似非理性的事情时，这可能是理性认知过程的结果。

¹⁰³ 也许你那位“非理性”的叔叔，只是

不幸地被困在了一个认知茧房之中，而他自己并无过错。

最后，指责他人非理性在政治上可能适得其反。如果你认为对方无可救药地带有偏见且非理性，你还会愿意与之合作或寻求共识吗？这类指控在道德上也具有危险性，有可能助长针对对方的性别歧视、阶级歧视、种族主义或反智主义偏见。¹⁰⁴ 这可能导致“认知不公”（epistemic injustice），即我们在他人作为认知主体的能力上对其造成伤害。¹⁰⁵ 在许多民主观念中，必须纳入多元的声音，民主才能繁荣发展。将他人视为非理性，会威胁到这一愿景的实现。

本章及前一章所讨论的选民在认知方面的缺陷，也引发了关于民主制度中政治信念之本质与功能的棘手问题。鉴于社会激励机制和背景性的非理性，许多政治信念似乎缺乏哲学家通常赋予“信念”这一概念的典型特征。这使人质疑：政治信念是否以追求真理为目标？公民是否拥有稳定且有意义的政治信念？以及政治行动是否真的由信念所驱动？回答这些问题，对于构想信念在民主政治中应有的角色

至关重要。我们接下来将探讨这些问题。

注释

1. 密尔 [1859] 2001: 19。
2. 熊彼特 [1942] 2013: 263。
3. Brennan2016a: 2。
4. Kaplan2013。
5. Kahanet 等, 2017 年。
6. 参见 Stagnaro 等人 (2023) 对该发现稳健性的质疑。
7. Kahan 2013; Kahan、Peters 等, 2012。
8. 哈斯托夫与坎特里尔, 1954 年。
9. Kahan、Hoffman 等, 2012 年。
10. Brennan2016a。
11. Ditto 等, 2019: 274。
12. Iyengar 和 Hahn, 2009 年。
13. 西尔斯和弗里德曼, 1967年。
14. Lord 等, 1979; Taber 和 Lodge, 2006。
15. Nickerson1998。

16. Ancell2019: 418; 另见 Kunda 1990。
17. 海特2012年。
18. Hogg 和 Abrams 1988。
19. 培根 [1620] 1939年版: 第 35页。
20. 罗素 [1928] 2004: 51。
21. 洛克 [1706] 1996年版: §12。
22. 洛克 [1706] 1996年版: §10。
23. Ballantyne2019b: 131–132。
24. Wilson 和 Brekke 1994: 121。
25. Kunda1990。
26. Cohen2003。
27. Converse 1964; Hannon 2022a。
28. Somin2016: 93。
29. Lavine 等, 2012 年。
30. Campbell 等, 1960: 133。
31. Lavine 等, 2012 年。
32. Taberand Lodge 2006: 757。
33. Taber and Lodge 2006: 763。

34. Caenegem1987: 14。
35. Mercier 和 Sperber 2017: 271。
36. 布莱克斯通 [1768] 1979年版: 第380页。
37. Brennan 2016a; Somin 2016。
38. Klein2014。
39. Converse 1964; Friedman 2006。
40. Sharot2017。
41. Huemer 2016: 464。
42. Perkins 等, 1991 年。
43. Kahan 2013; Kahan 等, 2017; 另见 Tappin 等, 2020a 的相反观点。
44. Joslyn 和 Haider-Markel 2014: 919。
45. Drummond 和 Fischhoff 2017; Hamilton 2011。
46. Brennan2016b。
47. Shenkman2008。
48. Millies2016。
49. Kahanet 等, 2017; Kunda, 1990; Williams, 2021b。

50. Bortolotti 2015: 第7页, 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51. Hannon 和 Woodard, 即将出版。
52. Williams2021b。
53. Brennan2016a: 23-4。
54. Cialdini 1993; Huemer 2016。
55. 乔斯坦·阿莫迪奥2012: 2。
56. Somin2013。
57. 卡普兰2007年。
58. 卡普兰2007年: 第120页。
59. Brennan2016a: 48-49。
60. 弗里德曼1998年: 第409页。
61. Huemer 2016; Williams 2021b。
62. 卡普兰2007年: 第125-126页。
63. Williams2021b。
64. Caplan2012: 322。
65. Caplan2012: 322。
66. Kahan2014: 213。
67. Lepoutre 2020; Nguyen 2020a; Pennycook 等 2022。
68. Nguyen2020a: 143。

69. Levy 2019, 2022a; Nguyen 2020a; Rini 2017; Weatherall 和 O'Connor 2021。
70. Lepoutre 2020; Pennycook 等, 2022。
71. Brinkmann 2022; Lepoutre 2020; Levy 2019; Tappin 等 2020b。
72. Druckman 和 McGrath, 2019; 皮尤研究中心, 2021。
73. Nguyen2020a。
74. Williams2023: 12。
75. 参见Stanovich 2021a。
76. Hannon 2022b; Lavine 等 2012; Worsnip 即将出版。
77. 皮尤研究中心2019a。
78. Pronin et al., 2002 年。
79. 阿多诺等, 1950年。
80. Jost 等, 2003 年。
81. Jost2017; Jost 等, 2017。
82. Jost 等, 2003 年。
83. Deppe 等, 2015
84. Deary 等, 2008; Schoon 等, 2010。

85. Faris 等, 2017; Lewandowsky 和 Oberauer, 2016; Miller 等, 2016; Pennycook 和 Rand, 2017。
86. Stanovich2021a。
87. Tetlock 1983, 1984。
88. Conway III 等, 2016; Conway III, 2018; Crawford 和 Pilanski, 2014; Frimer 等, 2017。
89. Ganzach2016。
90. Carlet 等, 2016; Kemmelmeier, 2008。
91. Carlet 等, 2016。
92. Ditto 等, 2019 年。
93. Kahan 2015; Levy 2019; McKenna 2021。
94. Kahan 2013, 2015。
95. Levy2019: 322–323。
96. Stanovich2021b。
97. Joshi 2020: 44; Lindgren 2014。
98. Ditto 等, 2019; Stanovich, 2021b。
99. 舍默2011: 233。
100. Baronand Jost 2019: 292。
101. Ditto 等, 2019: 276。

102. 弗里德曼2021年：265页。
103. Levy2022a。
104. Flores2021。
105. 弗里克2007年。

更多资源

- 阿亨，克里斯托弗·H. 与拉里·M. 巴特尔斯（2016）。《现实主义者的民主》。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 布伦南，杰森（2016）。《反对民主》。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 Ditto, Peter H., Jared B. Celnikier, Shiri Spitz Siddiqi, Mertcan Güngör 和 Daniel P. Relihan（2025）。“政治判断中的党派偏见。”《心理学年评》第76卷，第717–740页。
- 弗里德曼，杰弗里（2019）。《政治非理性是一种迷思吗？》，载于《劳特利奇政治认识论手册》，迈克尔·汉农与耶罗恩·德里德主编。伦敦：劳

特利奇出版社，第263-273页。

- 海特，乔纳森（2012）。《正义之心：为何好人因政治与宗教而分裂》。纽约：万神殿出版社。
- 汉农，迈克尔（2022）。《知识渊博的选民是否是更好的选民？》，《政治、哲学与经济学》第21卷第1期，第29-54页。
- 许默，迈克尔（2016）。《为何人们在政治问题上是非理性的》。载于《哲学、政治与经济学：文集》，乔纳森·阿诺马利等编。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第456-467页。
- 克劳斯，莎伦（2008）。《公民激情：道德情感与民主审议》。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 斯坦诺维奇，基思·E.（2021）。《分裂我们的偏见：确认偏误的科学与政治》。剑桥：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

- 威廉姆斯，丹尼尔（2023）。
《党派动机性推理之辩》。
《综合》202.89，第1-27
页。

6 政治信仰

DOI:10.4324/9781003089483-7

迪克·切尼：“我们，呃，相信什么？”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我们相信什么？好问题，切尼！好问题！”——《副总统》（剧本）

引言

试想一个社会：人们乐于在闲暇时间阅读报纸、杂志和书籍，通过电视和互联网获取新闻，在各种论坛上辩论政治议题，认真考量特定政策和候选人的论点与证据，并据此形成和更新自己的政治信念。这是一种令人振奋的民主愿景。它预设选民会主动寻求

可靠的信息，基于这些信息形成自己的政治观点，评估候选人在各项议题上的立场，进而选择支持最符合自身偏好与价值观的候选人或政党。

我们可以将这种观点称为政治行为的“信念优先模型”。¹ 该模型假设选民的心理是认知性的，并且在认识论上是理性的。根据这一理论，选民对政治议题、候选人和政策有相当程度的了解，并基于对这些信息的理性评估来投票，这种评估与其个人利益和价值观相一致。反过来，政治信念构成了政治行动的基础，包括投票、政治活动以及其他形式的政治参与。这种对政治信念的解释，符合更广泛的常识性观点，即信念与欲望共同导致并解释行为。这一观点被称为“民主的民间理论”。²

这一直观图景至少依赖于四个假设：第一，我们的政治信念以真理为目标；第二，许多公民拥有稳定且有意义的政治信念；第三，公民基于这些信念选择支持特定的政治候选人或政党；第四，民主政府会对选民有意义的政治信念和偏好作出回应。这四个假设都是可以质疑的。

事实上，许多政治“信念”缺乏哲学家通常归于信念、或认为信念所必需的特征。首先，尽管普通信念通常以求真为目标，但我们的政治观点往往并非如此（参见第五章）。相反，它们通常是具有社会适应性的认知状态，服务于非认知功能。其次，正如民意调查所反映的那样，许多政治信念并非根深蒂固；它们不稳定，且倾向于随机波动，这可能导致对选民“信念”的严重扭曲认知。第三，某些政治“信念”对证据具有极强的抵抗力，看起来更像是教条式的信条，而非真正的信念。最后，尽管人们普遍认为信念和欲望驱动行为，但在政治领域，行为往往由身份认同所驱动。公民常常声称自己持有并受某些特定信念的影响，但其行为却常常与此相矛盾。

什么使一种信念具有“政治性”？在本章中，我们对“政治信念”一词采取相当宽泛的解释。它涵盖有关社会应如何治理和组织的理念与价值观，包括公共机构的角色。它也包括对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的具体看法，以及对政府权威的作用和范围所持的态度。更广义而言，政治信念涉及关于政治

应遵循何种正确路径的规范性信念，范围从对理想社会的整体信念，到应实施的具体政策的详细信念。最后，我们还将涉及政治化议题的信念纳入其中，例如气候变化、选举结果的合法性以及疫苗安全性。尽管这些议题并非明确关乎政治，但它们却发挥着政治信号的作用。

政治信念是否以真理为目标？

生存与成功依赖于真实的信念。为了活命，我们必须相信自己的身体需要水；为了避免生病，我们必须弄清楚哪些食物有毒；为了保住工作，我们必须对自己的工作表现持有真实的信念。如果我们对重要的真相无动于衷，人类的生活将会充满挫败、痛苦且短暂。事实上，人类可能早已灭绝。正如W. V. O. 奎因（W. V. O. Quine）曾说过的那样：“那些在归纳推理上一贯错误的生物，有一种可悲却值得称道的倾向——在繁衍后代之前就死去。”³

在哲学讨论中，人们普遍认为信念“以真理为目标”。⁴ 如何确切理解这一主张尚存争议。一种理解诉诸信念的**目的论**（teleological）概念。根据这种观点，认知系统的功能目标在于形成并维持真信念。因此，一种态度若由那些有助于导向真理的认知过程所形成和调节，便可被视为信念。在此功能意义上，信念以真理为目标。相比之下，有些人更倾向于将“真理之目标”理解为一种**规范性论题**

（normative thesis）。按照这种解释，信念受制于一种**真理规范**

（norm of truth）：一个信念当且仅当为真时才是**正确的**（correct）。

无论我们如何理解这一目标，诸多考量都表明信念与真理密切相关。首先，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是：相信某事，就是相信它是真的。声称自己相信p，却又认为p是假的，这是荒谬的。一旦我们认为某事为假，就不再相信它了。其次，按照真理的样子形成信念并非由我们自主决定。我们无法直接凭意志去相信或不相信。无论形成错误信念多么便利，我们都不能

简单地在方便时随意采纳或放弃信念。第三，错误的信念似乎存在缺陷，有时甚至值得批评。例如，缺乏充分证据就形成信念之所以成问题，恰恰是因为证据能提高真理的可能性。

然而，许多信念似乎并不以真理为目标。我们的关注点在于政治信念，但类似的论点也适用于道德、宗教以及其他构成身份认同的信念。在所有这些情况下，人类倾向于以非求真

（non-truth-conducive）的方式来评估证据并形成信念。正如前一章所讨论的，人们通常会主动寻找、不加批判地接受，并更容易回忆起支持自己观点的证据；同时，他们也倾向于回避、拒绝并遗忘与自己观点相矛盾的证据。⁶此外，人们通常与观点相似的人进行政治讨论，并从强化其既有观点的媒体来源获取新闻。⁷这种行为与“我们的信念以真理为目标”这一观念相冲突。人类经常进行动机性推理（motivated reasoning）、身份保护性认知（identity-protective cognition）和虚构解释（confabulation）。我们容易陷入各种积极错觉

(positive illusions)，这些错觉让我们对自己的生活感觉更好，却往往以牺牲真理为代价。当然，这并不是要否认：通过带有偏见且不可靠的过程所形成的信念，在我们自身看来仍然显得真实。然而，从外部视角来看，很难坚持认为这类信念是以真理为目标的。

2 政治信念是否具有社会适应性？

如果真信念在某些情境中如此重要，为何在其他情境中却不是如此？一个合理的解释是，错误的信念有时具有适应性。它们能为我们提供心理安慰，促进群体忠诚与归属感，并服务于各种与真理无关的其他目的。

我们认为，政治信念的一项主要功能是社会联结。⁹大量证据表明，人们倾向于使自己的信念和态度与周围人保持一致，尤其是当他们认为他人与自己相似时。¹⁰在政治领域，个体常常采纳与自己希望归属的群体相一致的信念，从而满足带有强烈情感色彩的

群体忠诚。当某些信息威胁到我们的自我认知或社会身份时，我们的“心理免疫系统”会自动调整信念，以抵御此类威胁。¹¹这往往需要回避严酷的真相，转而相信令人愉悦的虚假信息。

根据克里斯托弗·阿亨（Christopher Achen）和拉里·巴特尔斯（Larry Bartels）的观点，投票行为真正的心理基础并非源于独立判断，而是源于群体认同。他们写道：

选民选择政党，首先是为了使自己与适当的社会群体联盟保持一致。大多数公民支持某个政党，并非因为他们仔细计算过该党的政策立场最接近自己的立场，而是因为“他们这类人”属于该政党。¹²

简而言之，人们会采纳那些最符合其社会群体信念的“信念”。

2.1 社会适应性信念

这些观察可能促使我们将信念区分为两类：****普通的世界建模信念****（ordinary world-modeling beliefs）与

****社会适应性信念**** (socially adaptive beliefs)。¹³ 这两类信念的功能属性差异显著，足以将它们视为不同的认知态度。普通的世界建模信念以追求真理为目标，而社会适应性信念则以获取社会—心理利益为目标。对于这两种信念而言，其信念生成机制都可被视为正常运作——即执行了该类型信念在祖先环境中被自然选择所赋予的功能。例如，某人错误地相信希拉里·克林顿为换取捐款而向俄罗斯泄露机密信息。这在其信念系统内部可能并非一种处理错误，而恰恰是该系统按其设计意图正常运作的结果。这是因为此类信念的目的未必在于求真，而在于实现社会适应性。

这种区分有助于阐明政治信念的本质。一般来说，根深蒂固的政治信念似乎对证据无动于衷，受情感驱动，并主要基于非证据性的理由。¹⁴ 因此，政治信念（以及其他构成身份认同的信念）似乎与许多旨在反映世界的普通信念属于不同的认知态度。在政治领域，我们往往更关心归属感和团队忠诚，而非真理，因为对许多人而言，政治实际上并非关乎真理。对

我们日常信念而言，其真实性远比政治信念的真实性更为重要。

最后一点听起来可能有违直觉。政治信念（例如关于正义要求什么的看法）通常被认为非常重要；相比之下，许多日常信念则显得平凡无奇，比如我相信我的钥匙放在桌子上。然而，保罗·布鲁姆（Paul Bloom）很好地阐明了拥有准确的日常信念比拥有政治信念更为重要：

如果我对如何炒鸡蛋持有一种错误的理论，炒出来的鸡蛋就会太干；如果我在日常道德上持有错误的观念，就会伤害我所爱的人。但假设我认为反对党领袖与猪发生性关系，或彻底搞砸了与伊朗的军售协议，除非我属于一个极小而有权势的群体，否则我的这些信念对世界毫无影响。对于我对单一税制、全球变暖和进化论的看法而言，情况当然也是如此。这些观点不必以事实为基础，因为其真假对我的生活没有任何影响……因此，若抱怨某人关于全球变暖的观点缺乏事实依据，就完全抓错了重点。¹⁵

当一种错误信念能为我们带来社会利益，且几乎不产生实际代价时，我们的认知加工似乎倾向于促进并维持这类信念。这也解释了为何纠正错误信念往往如此困难。如果一种信念在社会适应性方面具有显著优势，那么提供准确信息可能对改变人们的看法作用甚微。

2.2 社会信号理论

一个密切相关的想法是，政治信念起到社会信号的作用。¹⁶ “信号”是指任何被设计或选择用来传递信息的事物，其目的是被某个接收者察觉，从而改变其行为。¹⁷ 为说明这一点，不妨类比体育运动。假设你认为你所在地区的运动队是最棒的。你持有这一信念，可能是因为他们确实是最棒的。然而，更合理的解释是，如果你的同伴察觉到你持有这种信念，他们会对你更好。从信号传递的观点来看，持有这种信念的目的，并非为了更准确地理解世界或借助更精确的“地图”来导航现实，而是为了让你能被邀请参加烧烤聚会、晚宴和露营旅行。

（这并不是说人们意识到了自己信念的社会功能。）

政治信念亦是如此。通过表明我们属于某个特定的政治阵营，我们能够获得社会收益。当我的同阵营者察觉到我是一名民主党人，并与他们持有相同观点时，他们会对我更加友善，更有可能邀请我到他们家中做客，也更少在背后议论我。信念的这种信号功能或许也能解释某些认知偏见的存在：当这些信念起到信号作用时，即使有相反的证据，我们仍可能形成错误的信念。¹⁸ 因此，信号论的一个推论是：当信念发挥社会信号作用时，它们未必需要以追求真理为目标。

为什么不干脆假装持有这些有利的信念呢？这样我们既能获得社会收益，又能保持对世界的真实认知。然而，正如埃里克·芬克豪泽（Eric Funkhouser）所指出的，真诚的信念更容易令人信服地表达出来，而虚伪地表达信念则负担更重。¹⁹ 假设我住在费城，但私下支持的是波士顿红袜队，而非费城费城人队。为了融入当地同伴，我不得不购买自己并不想要的体育装备，在费城人队获胜时勉强欢

呼，甚至还要冒着与对方球队球迷就一个自己并不支持的立场发生争执的风险。这需要付出相当大的努力和投入。因此，伪装信念的成本使得信号保持诚实。

这些都不应使我们放弃接受这样一个看似合理的主张：通常而言，避免错误信念是有价值的。显然，相信自己是不朽的或永不犯错的，并非一种适应性的做法，尽管承认这些局限可能会令我们感到失望或沮丧。然而，那种简单地将信念视为仅以真理为导向的观点，忽视了众多服务于非真理目的的认知加工形式。有时，持有错误信念反而具有积极价值。信念是否应当始终为真，取决于我们认为信念究竟是为了什么。

就社会适应性信念属于真实信念而言，它们对“所有信念都以真理为目标”这一观点提出了挑战。信念可能服务于多重目标，而不仅仅是真理。社会适应性信念也对“所有信念都应依据证据和证成等认识规范加以评价”这一观点提出了挑战。尽管许多信念确实应当依据这些标准来评判，但并非所

有信念皆是如此。正如大卫·帕皮诺（David Papineau）所言：

在这些情况下〔指具有价值的错误信念〕，某个信念可能在某种意义上是“无根据的”，即它是以某种随意的方式获得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不应该以这种方式获得。单凭“该信念是无根据的”这一判断本身并不具有规范性力量，除非我们进一步赋予求真这一目标某种价值。

你可能会疑惑：为何认为社会适应性信念确实属于信念的一种，而非一种完全不同的认知态度？尽管社会适应性信念的确在功能属性上与普通信念有所不同，但它们仍具有关键的相似之处。例如，它们会引导真诚的断言，在行动和推理中发挥作用，并且并非完全不受反面证据的影响。因此，普通信念与适应性信念之间的差异可能只是程度之别，而非种类之分。²¹ 不过，有些人可能仍倾向于将社会适应性信念视为一种完全不同的态度。接下来，我们将探讨这种可能性。

3 政治信念

另一种解读大量政治信念以带有偏见的方式产生和维持、且常常对证据无动于衷这一证据的方式，是质疑这些信念是否真的属于“信念”。那些看似真诚信念的断言，实际上可能只是不同潜在态度的表达。

尼尔·范·利文（Neil Van Leeuwen）区分了两种具有不同心理功能的心智状态：“事实信念”（factual belief）与“宗教信奉”（religious credence）。²² 广义而言，事实信念是日常的、直截了当的态度，用于描述诸如列车时刻表、商店位置以及冰箱里有哪些物品等简单事实。相比之下，宗教信奉则是构成身份认同的态度，承担着重要的社会功能。这一区分类似于“世界建模信念”与“社会适应性信念”之间的区分，只不过此处专门应用于宗教语境。在本节中，我们将首先阐明宗教信奉的关键特征，然后将“信奉”这一概念拓展至政治领域。

根据范·莱文（Van Leeuwen）的观点，许多宗教信徒实际上并不真正“相

信”他们所宣称相信的内容——至少不是在该术语的通常意义上。宗教信念之所以不同于事实性信念，是因为它涉及不同的认知态度。事实性信念具有三个特定属性，而宗教信念则缺乏这些属性：

1. 事实性信念是实践情境无关的；也就是说，它们在所有情境中都被用于实践推理和行动选择。相比之下，宗教信念仅在特定情境中被激活。它们是否被用于指导行动，取决于个体是否处于宗教情境或身份检验情境中，从而“开启”或“关闭”。例如，说玛雅语的伊察人（Itza'）声称某些人类会变成动物，但他们吃肉时并不会担心自己可能在吃一个人。
2. 事实性信念在认知上支配着其他态度；也就是说，它们是进行其他认知态度之间推论的基础。相比之下，宗教信念并不为我们所有的认知活动提供这种背景。
3. 事实性信念在证据上是脆弱的；也就是说，相反的证据往

往会消除这类信念。相比之下，宗教信念则具有不可撼动性，或至少在面对证据反驳时远不如事实性信念那样脆弱。当人们遇到表明其宗教态度内容为假的证据或论点时，他们极少会因此放弃这些态度。²³

基于这些理由，范·莱文声称宗教信念是一种不同于事实信念的认知态度。

当然，某些宗教信仰可能看起来像是事实性的，例如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然而，根据范·吕文（Van Leeuwen）的观点，这些主张并非反映事实性信念，而更像是重要的身份标识：它们表达了对某一特定宗教的承诺，从而起到划定群体成员边界的作用。与具有社会适应性的信念类似，宗教信念的主要功能在于标示社会成员身份。群体成员身份带来众多心理和社群层面的益处，包括归属感和同志情谊（参见第五章）。

拥有宗教信念的价值，并非来自对其付诸行动，而是来自让他人相信你持有这些信念。这解释了为何宗教信念并不会系统性地指导行动或推理，正

如上文伊察人（Itza'）的例子所示。这也解释了为何宗教信徒常常难以清晰表述其信念的确切内容。例如，基督教各大教派均将对“三位一体”教义的信仰视为基督教正统的核心。然而，大多数基督徒却无法确切解释这一教义究竟是什么，而“相信”它也并不影响他们的行为。尽管他们声称这些信念对他们至关重要，却常常难以理解或阐明其具体内容。但这并不妨碍这些信念有效地充当群体成员身份的标志。宗教群体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由其所共享的信念所界定的。重要的并非他们具体相信什么，而是他们都以相同的方式相信。

我们对范·吕文关于宗教的观点是否正确不持任何立场。然而，他所提出的“信念度”（credence）概念可以合理地延伸至政治领域，从而暗示了一种有别于事实信念的“政治信念度”（political credence）概念。

某些政治“信念”是否更应被理解为置信度（credences）？似乎确实如此。试想，许多选民所宣称的政治观点，他们自己其实并不理解。例如，尽管绝大多数民主党人支持《平价医

疗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但其中很少有选民对该政策的具体内容有任何明确的认识。然而，这并未阻止许多党派支持者高调宣称自己支持该法案。这并非孤例。学者们发现，那些对政治议题持有强烈观点的人，往往并不真正了解自己所谈论的内容。正如布鲁姆（Bloom）所写道：

例如，许多对“总量控制与交易”（cap and trade）持立场的人，根本不知道“总量控制与交易”究竟是什么。同样，许多坚称美国在对外援助上花费过多或过少的人，往往并不清楚实际支出的具体数额，无论是绝对金额还是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这些政治立场也是一种信念（credences），持有这些立场的人，就如同那些坚称“十诫”应成为道德基石，却连其中三条或四条都列不出来的人一样。²⁴

如果布卢姆是正确的，我们就不应把这些政治信念的声明当作字面意思来理解。正如在宗教情形中一样，它们更类似于信念程度（credences）。

将政治观点归类为“社会适应性信念”或“政治信条”，其关键何在？乍看之下，这种区分似乎主要是措辞上的差异。然而，适应性信念与信条在这些态度所起的行动指导作用上有所不同：社会适应性信念在多种情境中引导行动，而信条仅在涉及身份认同考验的情境中引导行动。因此，如果政治信念属于社会适应性信念，我们应预期它们会系统性地支配行动；相比之下，如果它们仅仅被视为信条，那么它们在激励行动方面的作用就更具争议性。哪种模型更能准确描述政治观点，很可能因具体案例和个体信念者而异，但这对于预测不同情境下的行动和推理具有重要意义。

更为重要的是这两个观点所共有的内容。关键在于，它们都否认政治观点是直接的事实性信念。这对规范性理论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当社会科学家研究政治观点时，他们往往关注这些观点的准确性及其对证据的回应程度。然而，与其聚焦于这些信念的认识论地位，我们或许能通过考察政治实践的实际性质以及这些观点所扮演的角色——即这些信念的意义——获

得更深刻的洞见。一旦我们更充分地理解了它们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我们或许也能更好地理解，为何政治上的“信奉者”通常并不担忧其信念的认识论地位。尽管对缺乏信息的选民持批评态度的人可能将此视为政治信念非理性的证据，但那些理解其功能性作用的人则会认识到，这些态度所服务的目的远不止于假设、预测和追踪真理。

第二，政治信念（credences）和社会适应性信念（socially adaptive beliefs）都相对难以被证据所动摇。这预示着人们很少会因新的论点而改变自己的政治观点。如果大多数政治观点实际上属于社会适应性信念或信念（credences），那么针对非理性、两极分化和分歧等问题，基于证据和信息的解决方案很可能无效。由于对问题的诊断有误，我们将提供错误的解决方案。

第三，代表理应响应公众意见。然而，如果选民的意見是基于群体忠诚和利己性的表态，而非对证据进行审慎且无私的思考，那么这些意见为何应当指导政府决策就变得不明确了。

我们将在第6节中再次探讨这一观点。

4. 政治“信念”仅仅是表达性的吗？

在本节中，我们考虑另一种论证观点，即许多政治观点并非真正的信念。与其主张政治信念是“置信度”

（credences），不如说人们可能是故意错误报告自己的信念，以此来表达自己的态度。这种现象被称为“表达性回应”（expressive responding）或简称为“助威式表态”（cheerleading）。

举例来说，当被要求比较一张特朗普2017年就职典礼人群的照片与一张奥巴马2009年就职典礼人群的照片时，特朗普支持者是如何回答的。在一项针对近700名美国成年人的调查中，参与者同时看到了这两张照片，并被问及一个简单的问题：“哪张照片中的人更多？”尽管正确答案显而易见，但近15%的特朗普支持者声称那张特朗普就职典礼上人群稀疏的照片

中人数更多，而希拉里·克林顿选民中持此观点的仅有2%。26

这些特朗普支持者真的相信一张明显只有一半人满的照片里有更多人吗？如此解读他们的回答未免有失公允。更合理的解释是，一些特朗普支持者选择表达对特朗普的支持，而非如实作答。这类表达依然可靠地揭示了受访者某种潜在特质或事实，即亲特朗普的态度。因此，故意错误报告自己的信念并不一定意味着欺骗。然而，当这些表达性声明被解读为真实的信念陈述时，就会产生误导。

人们在多大程度上会错误报告自己的政治信念？一些政治行为研究指出，表面上看似事实性分歧的情况，往往只是党派立场的附和行为。例如，约翰·布尔洛克（John Bullock）及其团队的研究发现，当参与者因正确回答政治敏感问题而获得金钱奖励时，他们倾向于给出更准确（且党派倾向更弱）的回答。因此，民主党人与共和党人在回答事实性问题时的差距显著缩小。对正确回答给予小额报酬，就能使党派分歧至少减少60%；而当参与者因回答正确或承认自己不知道正

确答案而获得报酬时，党派分歧更是减少了80%至100%。其他研究也报告了类似的发现。

如果这些调查回答反映的是真实的信念，那么向党派人士支付报酬以促使他们给出正确答案就不应影响其回答。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当提供相对较小的报酬时，民主党人与共和党人之间观察到的差距会显著缩小。这表明，党派人士“对于许多重要事实，并未持有截然不同的信念。”²⁹ 此外，这也说明党派人士有能力承认令人不适的真相，并且在受到激励时愿意如实报告。然而，若缺乏足够的激励，支持自身政党的动机可能会压倒给出准确回答的动机。正如美国广播公司（ABC News）前首席民调专家加里·兰格（Gary Langer）所言：“一些强烈反对某人或某项提案的人，会抓住几乎任何机会表达这种反感……他们并非要表达其‘信念’（按通常意义理解），而是为了投掷言语的石块。”³⁰

民意调查 consistently 显示，党派人士无法就事实达成一致。³¹ 这些模式通常被视为党派倾向影响人们对政治

事实信念的证据。然而，鉴于上文所述的研究发现，我们应谨慎对待那些带有党派含义的事实性问题的回答，不应仅凭表面意思理解，因为这些回答往往受到“为己方阵营加油助威”动机的干扰。另一种解释是，此类模式仅仅反映了人们希望赞扬自己所属政党或谴责对方政党的愿望。人们内心相信一种答案，却表达出另一种答案以支持自己的政党。这或许是个好消息：表达性回答往往会掩盖人们在事实问题上实际存在的跨党派共识。因此，人们并非身处“各自不同的现实”之中。³² 相反，这些政治上的“分歧”反映的只是党派性的助威行为。如果党派人士的回答具有表达性，我们就无需苛刻地将明显错误的事实信念归咎于他们。

然而，关于身份表达型政治行为的证据并不一致。尽管在某些情况下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存在表达性回应，³³但在其他情况下则几乎没有此类证据。³⁴例如，那些声称唐纳德·特朗普在2020年大选中因舞弊而落败的人，似乎并非为了传达党派立场而故意歪曲自己的真实信念。³⁵此外，人

们可能会怀疑，党派人士私下持有的准确信念是否真能克服最初引发表达性回应的政治倾向。³⁶如果政治行为的关键驱动力是政党认同和团队忠诚，那么即使私下持有事实性信念，在现实世界中也可能难以影响政治行为，或难以抵消党派一致性所带来的压力。归根结底，这一领域的研究仍处于早期阶段，尚需更多研究来更好地理解党派分歧在回答事实性问题时的成因。

5 意识形态的天真与即兴的信念

在他1964年发表的开创性论文中，菲利普·康弗斯探讨了以下问题：普通公民的政治态度究竟有多真实、多有意义？他的主要发现是，许多人并不具备意识形态上连贯或稳定的政治信念。事实上，普通大众往往只是当场临时编造自己的政治观点。

人们通常认为，公民在接触政治世界时心中已有一种意识形态。所谓“意识形态”，大致是指一套信念体系，用以

表达人们所认为的正确与恰当之事。唐纳德·金德（Donald Kinder）和内森·卡尔穆（Nathan Kalmoe）将意识形态概括为具有以下特征：它们涉及社会、经济和政治领域；由构成有序结构的观念组成；这些意识形态结构被广泛共享；相互竞争的意识形态塑造并影响政策偏好；而构成意识形态的信念则是人们真诚且坚定持有的。³⁷ 然而，康弗斯（Converse）发现，很少有人以这种方式持有意识形态。大多数公民对意识形态是“无知”的。

在康弗斯（Converse）研究的基础上，金德（Kinder）和卡尔莫（Kalmoe）认为，尽管美国选民在党派立场上日益分裂，但意识形态对党派认同而言在很大程度上是无关紧要的。尽管政治精英在意识形态上存在严重分歧（我们将在第8章中讨论），但许多普通选民并非如此。在大多数情况下，选民的政治身份并非建立在信念体系之上。在决定支持哪位候选人或哪项政策时，意识形态并非关键的组织原则。相反，政治偏好源于群体归属感，这种归属感本质上是情感性的，而非认知性的。正如金德和卡尔

莫所言，公众舆论主要反映的是“群体生活中的依附与反感”，而非我们在政治、社会或经济方面的意识形态信念。³⁸

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天真”具有重要意义。意识形态提供了一种智识框架或信念体系，能够“为公民理解世界和采取行动提供稳定的基础。”³⁹ 但当个体缺乏意识形态时，其政策偏好可能随机波动，且在不同议题领域之间缺乏连贯性。金德（Kinder）和卡尔莫（Kalmoe）发现，仅有六分之一的美国选民（17%）以意识形态的方式进行思考；这一比例在过去50年中未曾改变。他们通过若干指标来衡量“以意识形态方式思考”：在政治讨论中自发使用意识形态概念；正确理解并运用意识形态标签；在不同政策领域中观点的一致性；以及这些观点随时间推移的稳定性。他们的结论是，大多数人对于政治议题缺乏稳定、一致且有意义的看法。

约翰·扎勒（John Zaller）捍卫了类似的观点。在他1992年的著作《大众舆论的起源与本质》（The Nature and Origins of Mass Opinions）

中，扎勒认为，大量接受政治调查的受访者往往会在接受调查时当场构建自己的观点。⁴⁰ 例如，某位受访者声称相信希拉里·克林顿曾将机密信息泄露给俄罗斯以换取捐款，此人可能在此前从未真正相信过，甚至从未思考过此类事情。当公民对某一政治议题的立场感到茫然时，他们常常会根据当时最容易想到的、最突出的考虑因素，即兴表达自己的观点。

扎勒（Zaller）提出，人们在面对任何特定政策领域时，通常脑海中会存在许多相关的考量因素，因此个体的偏好将取决于在特定时刻哪些考量因素占据主导地位。究竟哪些考量因素会占据主导地位，则取决于无数因素，包括他们最近在新闻中看到的内容、问题的措辞、问题的顺序、采访者的种族、他们偶然接收到的社会线索，以及其他众多内在和外在的考量因素。（这与康弗斯（Converse）对政治态度的解释有所不同，我们将在下文探讨。）

考虑一个我们借自詹姆斯·库克林斯基（James Kuklinski）的例子。一位纳税人最初可能反对增加学校经费，因

为首先想到的是高额的房产税。然而，她后来可能转而支持增加学校经费，因为另一个考量因素（例如教师薪资过低）在她的思考中变得突显。根据库克林斯基的说法：“这位纳税人内心矛盾，因此她在任一时刻所表达的态度，取决于当时被提示主要考虑支持还是反对的因素。”⁴¹ 她只是在过程中逐渐形成自己的看法。

公民在这些问题上并不持有“真实态度”这一观点，对公众舆论研究构成了重大挑战。调查是公众舆论研究的支柱。为了了解公众的信念，研究者会向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样本提出一系列关于特定议题的问题，然后根据这些回答推断公众在该议题上的总体看法或信念。然而，如果人们是在回答问题时临时构建自己的信念，那么民意调查往往会通过凸显某些考量因素（同时忽略其他因素）而产生其所试图探查的答案。其结果是，这类调查可能会高估此类信念在总体人口中的普遍程度。

这种情况发生的精确程度尚存争议。据扎勒（Zaller）所言：“大多数人在大多数议题上，并没有真正对任何特

定观点进行过‘深入思考’。”⁴² 其他学者则提出了更为温和的解释，认为情境因素与既有倾向都会影响受访者的回答。⁴³ 我们在此并不打算解决这一争议。无论情况是极其糟糕还是仅仅相当糟糕，人们普遍承认，个体在许多政治议题上缺乏有意义的态度。

对康弗斯（Converse）而言，基本问题在于缺乏思考，或想法太少，这导致人们几乎随机地选择答案。而对扎勒（Zaller）来说，问题并非人们想法太少，而是头脑中考虑的因素太多，这些因素将他们的态度推向相互冲突的方向。无论哪种解释是正确的，似乎都有很大一部分选民“根本就没有形成有意义的信念，即使在那些已在精英阶层中引发长期激烈政治争议的问题上也是如此。”⁴⁴

这也与一种广为接受的信念观相矛盾，该观点认为信念并非孤立的数据片段，无法任由我们随意采纳或抛弃。在《知识的错觉》（The Knowledge Illusion）一书中，史蒂文·斯洛曼（Steven Sloman）和菲利普·费恩巴赫（Philip Fernbach）指出，政治信念“与其他信念、共享的文化价值观

以及我们的身份认同深深交织在一起。”⁴⁵ 按照这种观点，我们很少会抛弃某种信念，因为那样做意味着必须同时抛弃大量相互关联的其他信念。尽管这一说法可能适用于我们那些根深蒂固的信念，但康弗斯（Converse）、扎勒（Zaller）等人的研究却表明，许多信念其实是善变或脆弱的。尤其是民意调查所测量的那些“信念”，往往只是人们临时采纳或抛弃的孤立数据片段。这些政治观点对人们而言并不深刻、稳固，也无足轻重。

康弗斯（Converse）和扎勒（Zaller）得出结论认为，个体在这些问题上缺乏“真实的”态度或真正的信念。若持相反观点，就等于认同政治态度的“文件抽屉”模型。该模型认为，当个体被问及自己的观点时，他们会搜索相应的心理文件夹，并报告其中的内容。例如，当被问及增税或最低工资等问题时，他们会分别查阅标有“税收”或“最低工资”的文件夹。然而，有关即兴形成且转瞬即逝的意见的研究却与这一图景相矛盾。相反，个体往往会在实时情境中构建新的、短暂的

意见，而由于这些意见具有时间上的不稳定性，它们从未被储存起来。

6 政治信念的含义

这项关于观点形成的研究引发了一些有趣的问题：究竟何为共和党人、民主党人，或任何党派人士？传统观点认为，党派认同是对政党表现、意识形态信念以及与该党一致的政策偏好的一种“持续累计”评估。⁴⁶ 然而，另一种相互竞争且日益流行的观点则是党派身份的表达性理论。根据这一观点，党派认同是一种持久的身份认同，它通过社会联系、情感依附和群体动态而不断强化。⁴⁷

这对党派认同和政治分歧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当一个典型的党派支持者就某个政治议题表达他们的“信念”时，我们不应假定这反映了他们与他人存在深层次的分歧。相反，我们应将这种行为视为一种象征性表达，体现的是对自身政治阵营的忠诚以及希望该阵营获胜的愿望，而非对该阵营所代表理念的深层承诺。在许多情

况下，人们并不能被说成真正“相信”其政党的意识形态或纲领；他们只是在表达对该政党的认同。因此，他们的政治“分歧”可能是表面的、非真实的。那些看似表达真实信念的行为（从而看似政治分歧的证据），实际上不过是一种旨在彰显党派归属的宣言。

你可能会争辩说，这些心理状态仍然可以被视为信念。当调查受访者当场构建他们的回答时，你可以认为选民起初真诚地相信某件事，而当不同的考量浮现在脑海中时，他们又真诚地相信了另一件事。同样，在表达性回应的情况下（见第4节），你可以认为选民起初真诚地持有一种信念，而在受到经济激励的提示后，他们会修正并更新自己的信念。这样一来，人们就可以坚持认为，选民至少在某些时候是真诚作答的，同时也会在不同考量的提示下真诚地改变主意。

沿着这一思路，尼尔·利维（Neil Levy）认为，人们常常在每一刻重新构建自己的信念。⁴⁸ 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人们的行为常常显得虚伪，似乎

与其所宣称的道德观点相矛盾。利维举了以下例子：

例如，可以想想福音派对唐纳德·特朗普的支持，或者一些知名共和党人最初谴责他，甚至称他不适合担任公职，但随后却转而表示支持，而且往往并未承认自己改变了立场。林赛·格雷厄姆

（Lindsey Graham）便是一个绝佳的例子。2016年2月，他曾形容特朗普是个“怪人”，“不适合担任公职”；而到了2017年11月，他却对媒体将总统描绘成“某种不适合当总统的怪人”的做法表示担忧。49

根据利维（Levy）的观点，这是一种信念重构的案例。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缺乏稳定且详尽的内部表征，因此会通过观察外部线索来构建自己的信念。其中一个强有力的线索是：我所属群体的成员支持这项政策。另一个线索是：我所不喜欢的人反对这一议题。利维认为，这是一种适应性的信念形成方式，因为群体通常比个体更善于把握重要的真相。50

如果这一假设是正确的，那么政治中的虚伪就比看上去要少。许多人只是起初相信一件事，后来又相信了一件与之相冲突的事，这使得他们的行为看起来与其信念相矛盾。

但再一次，我们或许会问：这些重构出来的态度真的算是信念吗？面对这个问题，你可能会感到矛盾。一方面，人们通常认为信念在指导行动和推理中起着核心作用。倾向性信念理论认为，发挥这一作用并不仅仅是信念的一个标志性特征，而是其必要条件。根据这些观点，相信p就是以普通人在相信p时所认为典型的方式去行动、反应，并在其他方面表现出相应的倾向。⁵¹然而，尚不清楚那些临时拼凑出来的信念如何能在行动和推理中发挥足够稳固的作用。同样不清楚的是，它们如何在推理、隐含假设、计划中的依赖或可靠断言中发挥作用。⁵²

另一方面，我们或许可以在某种意义上将这些心理状态称为“信念”。具体而言，我们可以将它们视为脆弱的信念。这些信念寿命短暂，且极易被修正。或者，我们也可以将它们视为介

于信念之间的状态，这类状态表现出某些信念的典型特征，却不具备其他特征。⁵³ 在此类情形中，我们对于是否应将其归为信念感到犹豫不决：它们并不会迫使我们产生一种非此即彼的直觉，来判断该主体是否拥有完整的信念。

此外，我们甚至可以主张，这些政治观点是被“接受”而非“相信”的。⁵⁴ 接受 p ，就是拥有或采取一种将 p 设定或假定为真的政策。与信念不同，接受处于个人直接的自愿控制之下。此外，接受的理由通常是实践性的，而非基于证据的。这似乎与选民“追随领袖”的情形相吻合：他们采纳自己政党所支持的任何观点，继而宣称这些就是自己的“信念”。因此，将选民对其政党某些核心信条所持的积极态度解释为“接受”这些观点，而非“相信”它们，或许更为准确。

脆弱的信念究竟是真正的信念、非信念，还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某种状态，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语词之争。我们可以通过澄清我们期望“信念”这一概念所承担的理论角色，进而探讨如何最好地界定信念以实现这些角色，

从而避免纯粹的语词之争。无论如何，承认一种更弱化的信念概念具有两项重要意涵。

首先，上述例子暗示人们经常进行认知上非理性的信念或态度调整。他们会真诚地持有某些观点，却又任意地改变这些看法。当人们改变主意时，往往并非出于对证据的回应，而是因为某些偶然的特征恰好变得突显。这不是一种理性地更新判断的方式。伪善的指责被替换成了反复无常的指控。

其次，无论我们如何对它们进行分类，脆弱的“信念”都不太可能足够全面或稳固，从而为规范性民主理论提供坚实的基础。许多关于民主的论述，其核心都包含一种更为厚重的信念概念。这一点在罗伯特·达尔

（Robert Dahl）的经典著作《多元政体：参与与反对》（Polyarchy: Participation and Opposition）的第一页就显而易见。他写道：“民主的一个关键特征在于政府对其公民偏好的持续回应性。”⁵⁵ 可以想见，民主的目标绝非仅仅是将那些摇摆不定的个体偏好简单聚合为集体选择。事实

上，正是出于这一担忧，许多政治理论家才关注“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s）问题——即提问措辞的微小变化可能极大地影响政治观点。⁵⁶ 民主理论通常假定人们拥有稳定的偏好，而负责任的政府必须恰当地回应这些偏好。因此，政治判断的脆弱性将给识别公众在政策议题上的真实偏好带来巨大挑战。若缺乏可供落实的稳定公众态度，民主便会失去“其出发点”。⁵⁷

简言之，对信念的“厚”理解与“薄”理解之间的区分，不仅仅是一种理论上的精微之处。公民拥有有意义的政治信念至关重要。至少，这是规范性民主理论中一个常见的初始假设。

然而，一些人可能会认为，关于意见稳定性的研究并未动摇民主制度的基础。人们在调查中很少对具体议题持有固定态度，这一事实并不必然意味着他们在投票时缺乏坚定的信念。这或许仅仅反映出民意调查并不总能准确捕捉人们的真实信念。实际上，公民对自己最为关切的问题可能持有稳定的看法。因此，尽管大众政治态度的波动给民意研究带来了挑战，但对

规范性民主理论而言，这些波动未必构成同等程度的担忧。

7摘要

当我们思考信念的意义时，往往会认为其功能在于表征世界。但这种思路很难适用于许多政治“信念”。政治信念常常似乎发挥着不同的功能：强化群体忠诚、维护身份认同，或带来心理满足感。我们已讨论了几种不同的模型来理解这一点：政治信念作为社会适应性的产物、政治信认（political credences）、非认知态度的表达，或是即兴编造而成。

哲学家以做出区分而闻名。当被问及如何描述哲学家的工作时，悉尼·摩根贝瑟打趣道：“你做几个区分，澄清几个概念，这就足以谋生了。” 详细阐明各种类信念态度（belief-like attitudes）的范围及其彼此之间的差异，是认识论和心灵哲学中的一项重要任务。对我们而言，最终重要的是这些区分所牵涉的实质内容。

我们并未试图判断这些模型中哪一个最为合理或最有前景。在我们看来，它们或许可以和平共存。某些政治信念或许最好被理解为具有社会适应性，另一些则更适合被视为表达性态度，还有一些可能只是即兴编造出来的。我们同样无意就这些模型所描述的态度是否配得上“信念”（belief）这一标签表明立场。有些人可能更愿意称它们为政治“观点”（opinions）、“态度”（attitudes）或“置信度”（credences）。只要明确一点——即存在丰富多样的心理态度，这些态度对于理解政治行为至关重要——那么究竟哪些态度被称为“信念”在很大程度上就无关紧要了。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政治态度所展现的特征。

政治观点的性质对规范性理论具有重要意义。如果许多人的政治信念并不稳定、不一致，也并非植根于某种深层的意识形态，这可能会对民主的民间理论（folk theory of democracy）提出质疑。⁵⁸ 民主制度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之上：公民拥有信息充分、逻辑一致的偏好，这些偏好指导其决策，并且在时间上具有稳定

性。然而，如果政治态度正如这些模型所表明的那样，具有高度的多样性、流动性和适应性，那么这可能会动摇民主治理的根本基础。当民众的意愿是任意的、善变的或不真诚的，一个以代表人民意志为前提的制度又如何能有效运作呢？

回答这一问题超出了本章的范围。然而，这种不确定性凸显了有必要重新审视民主规范与制度，以更好地适应人类政治心理的复杂性与现实。归根结底，调和政治心理学的现实与民主理论的要求，是政治哲学的一项重要任务。

这些关于政治信念本质与功能的发现，也引发了关于如何理解政治分歧的棘手问题。将政治信念视为具有社会适应性或身份表达性的态度，或许有助于解释政治分歧所具有的某些独特特征，例如其普遍性与持久性。如果许多政治“信念”实际上根本就不是真正的信念，那么许多分歧就仅仅是表面的或虚假的。这对如何化解或消解表面上的政治争端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接下来将对此展开探讨。

注释

1. 参见西姆勒与汉森，2017年：第264页。
2. Achen 和 Bartels，2016 年。
3. 奎因1969：126。
4. Shah 2003；Williams 1973。
5. Williams1973。
6. Lord 等，1979 年。
7. Mutz2006。
8. Williams2021b。
9. Graham 和 Haidt，2010 年。
10. Cialdini 1993。
11. 曼德尔鲍姆2019年。
12. Achen 和 Bartels 2016：307。
13. Williams2021a。
14. Achen 和 Bartels 2016。
15. Bloom2016：236–237。
16. Funkhouser 2017；Simler 和 Hanson 2017。
17. 芬克豪泽2017年：第811–812页。
18. Funkhouser2017：810。
19. Funkhouser2017。
20. 帕皮诺2013年：第69页。

21. Williams2021b: 351。
22. VanLeeuwen2014。
23. VanLeeuwen2014: 699。
24. Bloom2015。
25. Bullock 等, 2015 年。
26. Schaffner 和 Luks 2018。
27. Bullock 等, 2015 年。
28. Khanna 和 Sood, 2018;
Prior 等, 2015。
29. Bullock 等, 2015: 522。
30. Langer2010。
31. 辛诺特-阿姆斯特朗2018。
32. Kullet 等, 2004年。
33. Bullock 等, 2015; Khanna
和 Sood, 2018; Prior 等,
2015; Schaffner 和 Luks,
2018。
34. Berinsky 2018; Malka 和
Adelman 2023。
35. Fahey 2023; Graham 和 Yair
2023。
36. Malkaand Adelman 2023。
37. 金德与卡尔莫, 2017年: 第
12-13页。
38. Kinder 和 Kalmoe 2017:
136。

39. 金德与卡尔莫, 2017年: 第12-13页。
40. 扎勒1992; 扎勒和费尔德曼1992。
41. Kuklinski2001: 243。
42. Zaller1992: 76。
43. Sniderman 等, 2001 年。
44. Converse1964: 245。
45. 斯洛曼和费恩巴赫, 2017年: 第160页。
46. Achen 和 Bartels 2016; Campbell 等 1960。
47. Green 等, 2002; Huddy 等, 2015。
48. Levy2021。
49. Levy2021: 43。
50. Levy2021: 56。
51. 施维茨格贝尔2010年。
52. Rose 等, 2014 年。
53. 施维茨格贝尔2001年。
54. Cohen1992。
55. Dahl1971: 1。
56. Kelly2012。
57. Achen1975: 1227。
58. Achen 和 Bartels, 2016 年。

更多资源

- 弗洛雷斯，卡罗琳娜（即将出版）。“抵抗性的信念，回应性的信念者。”《哲学杂志》。
- 芬克豪泽，埃里克（2022）。《部落心智：标示群体身份或承诺的信念》。《心灵与语言》，第37卷第3期，第444–464页。
- 格林，唐纳德·P.、布拉德利·帕尔姆奎斯特和埃里克·希克勒。（2002）。《党派之心与思想：政党与选民的社会认同》。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
- 哈农，迈克尔（2021）。《分歧还是诋毁？表达性话语在政治中的作用》。载于《政治认识论》，伊丽莎白·埃登伯格与迈克尔·哈农编。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第297–317页。
- Huddy, Leonie（2001）。《从社会认同到政治认同：对社会认同理论的批判性考察》。《政治心理学》，22卷第1期，第127–156页。

- Kinder, Donald R. 与 Nathan P. Kalmoe (2017)。《既非自由派也非保守派：美国公众的意识形态天真》。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 特拉尔迪，奥利弗 (2024)。《政治信念：哲学导论》。纽约：劳特利奇出版社。
- 威廉姆斯，丹尼尔 (2021)。《社会适应性信念》。《心灵与语言》，36卷第3期，第333–354页。

7 政治分歧

DOI:10.4324/9781003089483-8

民主要求我们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冲突与分裂是政治固有的组成部分，不存在一个能够最终实现“人民”统一之完全现实化的和解之地。——尚塔尔·墨菲，《民主的悖论》

引言

平权行动是否构成逆向种族歧视？持枪是否能提升个人安全？死刑是否能遏制谋杀？如果我们不立即采取行动，气候变化是否会带来灾难性后果？仇恨言论是否应被定为非法？

这些问题，以及其他许多问题，引发了激烈的分歧。政治对手在经济、外交、教育、能源、医疗保健、环境、私有化、堕胎、移民等诸多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在美国，近一半的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表示，他们“几乎从不”认同对方政党的立场。¹ 而且，持不同意见的不仅仅是普通民众，专家 and 政界人士也同样如此。在政治领域，人们意见相左的议题数不胜数。

分歧是政治中无处不在的特征，但这是否是一件坏事呢？让-雅克·卢梭认为，广泛的分歧表明国家正处于衰落之中。卢梭声称，严重的分歧是公民缺乏对公共利益承诺的表现，我们应当努力解决分歧问题。² 另一些人则否认这一点。约翰·罗尔斯认为，在任何自由社会中，分歧都是不可避免

的。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中，我们应当预料到人们会持有不同的价值观和偏好。理性的公民会认识到，善意之人完全可能在道德和政治问题上持有相异的观点。³ 对罗尔斯而言，政治分歧恰恰体现了一个自由、多元、包容且健康的民主社会。如果他的观点正确，那么我们既不应期望、也不应试图解决许多政治分歧——至少当这些分歧源于合理但互不相容的立场时。

那么，对于经验性、事实性问题的分歧又该如何看待呢？这类分歧可能对民主审议构成一种独特的挑战。尽管政治中出现价值观上的分歧是意料之中的事，但事实层面的分歧却可能尤为令人担忧。⁴ 这是因为它们破坏了理性辩论、妥协以及有效治理所必需的共同认知基础。若无法就基本事实达成共识，我们进行有意义讨论并作出集体决策的能力就会受到威胁。

例如，围绕选举安全与选民舞弊的争论便是一个典型案例。关于选民舞弊的普遍程度、投票系统的完整性以及选举结果的准确性等问题，都是应通过证据和透明程序加以解决的经验性

议题。然而，当党派分歧导致各方在这些问题上形成相互对立的“事实”时，公众对民主制度的信任便会削弱，选举程序本身也会因此变得不稳定。一旦事实分歧被政治化，不仅会阻碍基于证据的决策制定，还会妨碍问责机制的运行：如果公民无法就何为真相达成共识，他们便无法就民选官员的行为或政策追究其责任。

本章将探讨政治分歧的性质、成因、意义及其认识论。我们将尝试回答如下问题：何谓分歧？政治分歧是否不同于其他类型的分歧？面对与其他公民持续存在的政治分歧，理性的回应是什么？政治分歧是否能够通过理性方式加以解决？我们将论证，政治分歧具有一些独特特征，使其尤为难以化解。然而，即便政治分歧常常难以通过理性方式解决，审议与论辩仍可能在道德、政治和认识论层面具有重要价值。

1 各种分歧

当我们说两个人意见不一时，有时是指他们正在发生一场争执。在这里，他们正在进行一种活动。两个人是否正在发生争执，取决于他们彼此之间的态度和行为。

然而，两个人也可能在没有发生“争执”的情况下“持不同意见”。这乍听起来或许令人困惑，但两个人仅仅因为持有彼此不相容的信念，就构成了意见分歧。在这个意义上，“分歧”并非一种行为，而是一种状态。⁵ 例如，我从未与柏拉图有过任何争执，但我仍然在许多事情上与他意见相左（例如，他相信“理念论”，而我并不相信）。当“分歧”被界定为信念之间的不相容时，两个人完全可能从未交谈过却依然存在分歧。事实上，他们甚至可以在互不相识、未察觉彼此分歧的情况下持不同意见，即便双方早已去世亦是如此。

正如两个人可以意见不同却不产生分歧一样，两个人也可能产生分歧但实际上并无不同意见。哲学争论有时就

是如此。两个人可能在所有相关问题上都持有一致看法（在状态意义上），却仍然继续争论（在活动意义上），因为误解使他们错误地认为彼此的观点互不相容。例如，你我对于是否应将仇恨言论定为非法，可能持有彼此兼容的信念，却相互批评，因为我们未能意识到这种兼容性。也许我们对“仇恨言论”一词的理解不同。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的争论就仅仅是语词之争。我们在所有事实上都达成一致，但语言上的差异使我们误以为彼此存在分歧。

为了明确术语，我们不妨这样界定：当两个人积极地存在分歧时，他们处于一场争执（dispute）之中；而当他们持有相互冲突的信念时，他们就是意见不一（disagree）。由于我们必须首先认为自己意见不一，才能产生争执，因此后一种概念更为根本。尽管某些政治上的“分歧”实际上只是争执，但本文主要关注的是两人或多人持有相互冲突信念的情形。

分歧的认识论是一个复杂的课题，包含各种有趣的案例。假设一个人相信某个命题 p ，而另一个人否认 p ，但双

方都没有犯错。这类情况被称为无错分歧 (faultless disagreements)。大多数人认为，在趣味问题上可能存在无错分歧。一个人觉得好笑、美味或美丽的事物，并不总是另一个人觉得好笑、美味或美丽的事物。当迈克尔说毕加索的《哭泣的女人》是一幅美丽的画作，而艾莉丝对此表示不同意时，双方可能都没有犯任何错误。我们必须区分关于客观事实的分歧与关于非客观意见的分歧。在本章中，我们关注的是那些存在事实真相的分歧，或者至少是参与者有理由相信存在事实真相的分歧。

个体对某一命题也可能持有不同层次的信心。例如，两个人可能都同意气候变化正在发生，但其中一人可能比另一人更加确信。尽管有时将这种情况归类为“分歧”可能有一定用处，但我们认为这种用法略显人为。我们将聚焦于人们对某一主张持有不同“粗粒度”态度的情形，即相信 p 与不相信 p （亦即相信 p 为假）。当满足以下条件时，我们称两个人“存在分歧”：

1. 一个人相信 p ，而另一个人不相信 p ；

2. 关于p是否存在一个事实，或者参与者合理地相信存在这样一个事实。

尽管这一定义很直接，但要准确判断人们是否真正存在分歧，往往十分困难。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难以确定某人是否真的相信某个命题 $\neg(p)$ ，还是仅仅在没有真正信念的情况下断言 $\neg(p)$ 。例如，大约七分之一的美国人会断言巴拉克·奥巴马是“敌基督者”。这些人真的相信这一点吗？也许其中一些人确实如此。但如前一章所讨论的另一种解释是，这类说法往往反映的是一种党派助威（partisan cheerleading），而非真实的信念。这是一种表达“民主党真差劲！”和“共和党加油！”的方式。或者，这些断言或许更应被理解为政治信念度（political credences）（参见第6章第3节）。这使得我们难以确定条件（i）是否得到满足。此类情形可能涉及争论，但未必构成真正的分歧。

此外，道德、美学以及某些政治领域等话语领域中是否存在客观事实，这一点颇具争议（参见第一章）。反实在论者认为，并不存在客观的规范性

事实。他们主张，诸如“堕胎是错误的”这类伦理陈述并非客观上为真或为假的事实性主张；相反，这些陈述要么是主观性主张（伦理主观主义），要么根本就不是真正的主张（非认知主义），要么则是错误的客观性主张（道德虚无主义）。相比之下，道德相对主义者则否认对一个道德问题只存在唯一正确的答案。他们认为，某一命题对某个人或群体而言是“真的”，而另一个不同且相互矛盾的命题则对其他人而言是“真的”。

尽管相对主义者表面上显得更能容忍并尊重不同的观点，但他们却回避承认真正分歧的存在。他们也未能认真对待他人的论证。正如理查德·费尔德曼（Richard Feldman）所写道：

既然他们自己的观点对他们而言是“真实的”，相对主义者便不认为自己的立场会受到他人观点的挑战。因此，他们无需认真审视那些持异议观点的论据。这就好比他们在面对某个议题的对立论点时，会这样回应：“嗯，那个论点对你来说或许不错，但我有自己的看法，我会坚持它，因为它

对我而言是真实的。”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回应几乎是不屑一顾的，却又伴随着一种难以解读的断言，即对方的观点也是正确的。9

我们不会试图裁决实在论者、反实在论者与相对论者之间那场丰富而错综复杂的争论。如上所述，我们将假定：要么政治分歧涉及某种客观事实，要么参与者合理地相信存在这样的事实。换句话说，我们关注的是人们自认为在某一主张的真理性上存在分歧的情形。这使我们得以避开棘手的元伦理学问题。

2 政治分歧的特征

政治分歧有什么独特之处吗？它们与其他类型的分歧有何不同？如果有，又是如何不同？我们将重点阐述当代自由民主国家中政治分歧的五个关键特征。

1. 它们非常普遍。正如亚伦·安塞尔（Aaron Ancell）所指出的：“地球上没有任何一个国

家，其人民在社会应如何治理、谁应掌权、法律应如何制定，以及诸多其他属于政治范畴的问题上不存在分歧。”¹¹ 政治分歧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都很常见，并非仅限于少数人之间的意见不合。

2. 它们范围广泛。政治分歧涵盖众多议题，仅举几例，如堕胎、枪支管控、气候变化、疫苗安全性、平权行动、竞选资金、税率以及海外军事干预等。这些分歧既涉及道德议题，也涉及非道德议题，并且存在于不同抽象层次上，从一般性的道德原则到具体政策的实施细节皆有体现。
3. 他们具有持久性。分歧似乎是政治的一个永久特征。正如尚塔尔·墨菲（Chantal Mouffe）所言，我们必须“放弃这样一种幻想”，即政治分歧终将完全消失。¹² 此外，即使经过数小时的辩论，政治分歧也极难化解。论点与证据的交换往往几乎无法促使人们改变主意。

4. 他们的观点是聚集在一起的。
正如迈克尔·休默（Michael Huemer）所指出的：“你常常可以根据某人对某个完全无关议题的看法，预测他对另一个议题的信念。例如，支持枪支管制的人更有可能支持福利项目和堕胎权。”¹³ 这一点在美国尤为明显，那里人们对各种政治议题的看法高度相关。¹⁴
5. 他们彼此对立。政治分歧正变得越来越充满敌意。许多选民不再将对方视为在道德和政治问题上仅持有不同意见的善意之人，而是将其视为愚蠢、不道德，甚至对国家构成威胁的人。¹⁵ 政治对手之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厌恶对方，倾向于将负面特质归于“另一方”的成员，甚至声称如果自己的子女与另一党派的人结婚，他们会感到不安。¹⁶

这五个政治分歧的特征应当让你觉得奇怪。与代数、地质学、经济学、语言学、物理学以及许多其他学科中的大多数分歧不同，政治分歧往往是激

烈的、顽固的，且广泛存在。相比之下，其他大多数学科中的分歧更容易解决，数量更少，对抗性更弱，并且是在大量共识的背景之下发生的。

那么，为什么政治分歧如此难以解决？为什么在逻辑上彼此独立的政治议题，其观点却会聚集在一起？又为什么我们难以理解，那些理性且善意的人们竟能得出截然不同的政治结论？接下来的三个部分将探讨这些问题。

3 为什么我们会意见不一？

对持续存在的政治分歧的一种常见解释是，人们持有不同的基本价值观。在《民主与分歧》一书开篇，艾米·古特曼（Amy Gutmann）与丹尼斯·汤普森（Dennis Thompson）指出，当今民主面临的最严峻问题乃是“道德分歧问题。迄今为止，无论是民主政治理论还是实践，都尚未找到应对基本价值观冲突的充分方法。”¹⁷ 同样地，在《民主与道德冲突》一书中，

罗伯特·塔利斯（Robert Talisse）写道：“我们在最根本的道德承诺上存在分歧。我们对道德基本问题意见不一，因而也就无法就我们的政治应采取何种具体形态达成一致。”¹⁸

尽管这种解释看似合理，但它存在一个重要的缺陷：自由、平等、隐私等基本价值观不太可能在政治分歧的双方之间缺乏广泛共识。人们常常指责自己的政治对手不尊重某些特定价值观，但认为他人通常缺乏这些基本价值观却是难以令人信服的。正如安塞尔（Ancell）所言：“几乎没有人真正憎恨自由，或完全不关心平等。事实上，在大多数政治分歧中所涉及的基本价值观——诸如自由、平等、安全、隐私、人类福祉等等——几乎为所有人所共享。”¹⁹

一种更为合理的解释是，人们拥有不同的价值优先次序。也就是说，我们在基本价值观上大体一致，但在这些价值观发生冲突时，我们对其优先次序或权衡方式存在分歧。（一个密切相关的解释是，人们拥有不同的价值具体化方式：他们在抽象层面上认同基本价值观，但在如何解释或应用这

些价值观上存在分歧。)正如罗尔斯所写道:

在被迫于珍视的价值观之间做出选择,或当我们同时坚持多种价值观而必须根据彼此的要求对每一种加以限制时,我们在设定优先次序和进行调整方面会面临巨大的困难。许多艰难的抉择似乎都没有明确的答案。

根据价值多元论者,价值之间的冲突难以裁决,因为这些价值本身“在质上异质,无法被还原为一种共同的价值衡量标准。”²¹ 价值一元论者则拒绝这一观点。他们主张,所有价值都可以被还原为一种共同的衡量标准,例如快乐。我们在此并不试图解决这一元伦理学上的争论。相反,我们只是想强调,当道德价值看似发生冲突时,要令人满意地解决分歧是十分困难的。

价值观上的分歧是政治分歧的一种常见解释。另一种常见解释则是对非道德事实的分歧。根据这种观点,表面上看似基于价值观的分歧,往往源于对非道德事实的不同看法。例如,两

个人可能因对移民的程度及其危害存在分歧，而对一项新移民法案的优劣产生不同意见。

为什么在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获取信息的情况下，人们还会对非道德事实产生分歧？标准答案是，相关事实难以获知。例如，罗尔斯认为，涉及政治问题的证据常常“相互冲突且错综复杂，因而难以评估和判断。”²² 安塞尔（Ancell）通过反思关于死刑的争论，很好地阐明了这一观点：

这场辩论双方的人士常常就死刑是否能威慑暴力犯罪存在分歧。而关于死刑是否具有威慑作用的证据确实不一。因此，难以确定死刑是否能威慑暴力犯罪，这很可能是导致人们在死刑优劣问题上产生分歧的主要原因之一。²³

这只是一个例子，但这一观点具有普遍性。政治是复杂的，几乎任何政治议题都可能涉及大量非道德性的事实。正如亚瑟·卢皮亚（Arthur Lupia）所言：“与政府运作相关的事实数量是无限的。”²⁴

我们现在已考察了两种对政治分歧的解释。第一种认为，政治分歧通常源于价值观或价值优先次序的差异，这种差异导致人们对于哪些政策是可取的得出不同的结论。第二种认为，政治分歧通常是关于相关非道德事实的分歧所致，因为与这些事实相关的证据复杂、相互冲突且可作多种解读。政治理论中的主流观点认为，政治分歧是由价值分歧、事实分歧，或两者共同造成的。

4 为何标准观点是错误的

对主流观点而言，不幸的是，每种解释都有其不足之处。首先，认为政治分歧可由事实分歧来解释的观点是不完整的：它无法解释政治分歧的若干关键特征。其次，这两种解释都将因果关系颠倒了：事实与价值上的差异往往是由政治分歧所导致的，而非相反。我们将简要阐述上述每一点，并借鉴安塞尔（Ancell）的研究成果。

4.1 标准观点是不完整的

首先，诉诸事实分歧无法解释为何人们会对那些证据确凿的非道德事实产生分歧。在政治领域，即便对于那些证据清晰、明确且易于获取的非道德事实，人们之间也普遍存在分歧。

例如，人们经常对通胀、失业率或经济增长等关键经济指标持有错误的看法。尽管存在确凿无疑的事实，人们在疫苗安全性与气候变化等问题上仍存在分歧。举例来说，69%的民主党人认为气候变化是由人类活动造成的，而共和党人中持这一观点的比例仅为23%，尽管科学界在这一问题上几乎达成了普遍共识。²⁷ 为什么人们会对证据确凿的非道德事实产生分歧？正如前一章所讨论的，这些信念往往更多地基于党派立场，而非客观现实。²⁸ 人们倾向于相信那些有利于自己政治阵营的事实。（此处需附加一个普遍性提醒：某些民调数据可能反映的是表达性回应或政治性信念，而非真实的事实认知。若果真如此，实际分歧可能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严重。）

标准观点也无法解释，为何在政治问题上持不同意见的人往往对所争论议题缺乏基本的理解。如果政治分歧源于人们对相关非道德事实持有不同信念，那么我们理应预期他们至少对这些事实具备最低限度的连贯理解。但实际情况往往并非如此。正如有关政治无知的文献所清楚表明的那样，大多数人对于他们所发表意见的政策和政治人物，甚至连最基本、无可争议且明显相关的事实信息都不了解。事实上，他们常常甚至不清楚自己所支持的政党或政治人物的立场是什么。加布里埃尔·伦茨（Gabriel Lenz）发现，在15项以上的不同政策议题中，“只有大约50%的选民能够正确判断主要候选人或政党彼此之间的左右立场。”²⁹ 广泛存在的无知表明，政治观点很少建立在对事实的评估之上。尽管人们常常认为自己的政治观点是基于对相关事实的评估，但证据并不支持这一看法。

此外，标准观点无法解释为何许多人对自我的政治观点抱有极大的信心。如果政治分歧的产生是因为证据复杂、相互矛盾且难以评估，那么人们

为何不持有试探性的观点，甚至干脆悬置判断呢？当证据模棱两可、答案并不明显时，人们通常不会以极大的信心持有某种信念。然而在政治领域，许多人却觉得自己的观点显而易见，并对他人持不同意见感到困惑或沮丧。

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人们根本意识不到政治议题有多么复杂。如果他们认为政治问题的答案显而易见，并相信相关证据清晰明了，那么我们就不应指望人们持有试探性的观点或暂缓判断。然而，这引发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为什么人们会觉得自己的政治观点如此显而易见，尤其是考虑到

- (a) 许多这类议题的证据本身复杂、相互矛盾且可作多种解读，以及
- (b) 大量普通民众（有时甚至包括专家）并不持有相同的观点？

4.2 标准观点把事情弄反了

标准观点面临另一个问题。如果该观点是正确的，那么人们之所以在政治议题上存在分歧，是因为他们在价值观或非道德事实上存在更深层次的分

歧。然而，心理学和政治学领域的近期研究表明，实际情况往往恰恰相反：这些关于价值观和非道德事实的分歧，实际上是党派分歧所导致的结果。³¹

考虑关于堕胎是否被允许的争论。为何这种分歧持续存在？标准的解释是，人们在胎儿的道德地位以及生命权与身体自主权的相对重要性上存在分歧。然而，情况可能恰恰相反：人们之所以对胎儿的道德地位以及这些权利的权重持有不同看法，是因为他们早已在堕胎的道德可允许性问题上存在分歧。在这种情况下，诉诸价值观或非道德事实的做法，可能只是试图为既有的信念提供合理化解释。

同样，一个人对非道德事实的信念，可能是其对政治人物、政党及政策优劣看法的结果（而非原因）。以关于死刑的争论为例。传统观点认为，人们对死刑是否可取存在分歧，是因为他们在死刑是否能威慑暴力犯罪这一问题上看法不同。但对某些人而言，因果链条可能恰恰相反：他们对死刑威慑效果的信念，可能是其先前已有的道德可接受性观点所导致的结果。

更广泛地说，人们在相关非道德事实上的分歧，可能恰恰是他们本应解释的政治分歧所产生的后果。人们会调整自己的价值观，并扭曲证据，以使其符合自己先入为主的立场。我们可以将这种政治信念模式称为“党派优先”模型。

5A “党派优先”的认识论

“以党派为先”的模型将政治忠诚和党派偏见作为思考政治分歧的出发点。安塞尔（Ancell）对这一观点描述如下：

人们的政治观点植根于其党派忠诚和社会身份。党派归属通常具有传承性，一般并非基于先前的意识形态或政策偏好。人们采纳与其党派忠诚相一致的政治观点，以帮助自己融入所属社会群体，或反映其对外群体的偏见。由于人们起初持有不同的党派忠诚，并隶属于不同的社会群体，因此他们采纳了不同且常常相互对立的政治观点。随后，人们会

以符合其既有观点的方式来解读和权衡价值观与事实，往往只是简单复述政党所提供的理由，从而营造出一种理解的假象。这进一步导致人们在如何解读和权衡价值观以及非道德事实方面产生更多分歧。32

如果这种观点是正确的，那么人们通常并不是根据自己对事实的价值观和信念来决定支持哪些政治人物或政党。相反，他们会首先与某个政治联盟结盟，然后调整自己的信念，使其与自己偏好的政党或候选人的观点保持一致。

支持这一观点的证据越来越多。在《追随领袖》一书中，伦茨写道：

我惊讶地发现，几乎没有证据表明选民会根据政治人物的政策立场来评判他们。选民很少会将选票转向那些与自己观点一致的政治人物——即使某个政策议题刚刚变得极为突出，即使政治人物在该议题上采取了清晰且截然不同的立场，即使选民清楚了解这些立场。相反，我通常发现的是

相反的情况：选民首先出于其他原因决定喜欢某位政治人物，然后采纳他或她的政策观点。³³

简而言之，选民将党派置于政策之上。³⁴ 人们宁愿改变自己的政策偏好以与自己偏好的政党保持一致，也不愿调整自己的党派忠诚以符合自己的政策偏好。这或许是标准政治分歧观点所面临的最严重问题。标准理论假设，选民会基于自身的价值观以及对事实的信念来评估政策、政党和政治人物。然而，实际情况往往是，选民因其党派忠诚而获得价值观，并据此形成对事实的信念。

关注政治如何与群体忠诚和社会认同紧密交织，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政治分歧的本质及其成因。例如，“党派优先”模型可以解释为何政治分歧常常充满敌意，以及为何人们认为自己的观点显而易见地正确。首先，由于党派忠诚，我们对其他群体产生反感：我们倾向于以“我们对抗他们”的方式看待政治冲突，并对“他们”形成负面态度。正如杰森·布伦南（Jason Brennan）所言：“我们带有偏见地认为自己的群体是善良且公正的，而其

他群体的成员则是邪恶、愚蠢且不公平的。”³⁵ 其次，我们认为自己的政治观点显然正确，是因为我们是动机性推理者：我们会以系统性偏颇的方式解读和权衡价值观、事实与证据。结果，即使我们的观点并不正确，我们仍觉得它们显而易见，并由此推断那些与我们意见相左的人必定是思想封闭、无知或道德败坏的。

党派优先模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何政治日益两极分化。（我们之所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正如我们在下一章中所讨论的，两极分化程度的加剧很可能由多种复杂因素共同导致。）人们普遍承认，意识形态上的两极分化在政治精英层面（例如民选官员）已明显加剧。³⁶ 这种现象究竟为何发生，尚存争议。但无论原因如何，精英阶层的两极分化可能会导致大众层面的两极分化——即选民对政治议题、政策和政治人物的态度沿着党派界限严重分裂。当政治人物采取更极端的立场时，其支持者也会随之调整自身的信念和价值观，以与所属政党的立场保持一致。正如克里斯托弗·阿亨（Christopher Achen）和

拉里·巴特尔斯（Larry Bartels）所言：“即便是那些更为关注政治的公民，也大多只是将政党的政策立场当作自己的立场：他们是政党的镜子，而非主人。”³⁷

党派优先模型也能解释为何人们的政治观点会聚集在一起。当政策偏好主要由党派忠诚所驱动时，人们便会采纳与其所偏好的政党相关联的各种观点。这解释了为何例如支持枪支管制的美国人更有可能同时支持福利项目和堕胎权——所有这些观点都与同一个政党相关联。当政治观点倾向于追随党派立场时，逻辑上互不相关的议题便会聚集在一起。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考察了政治分歧的显著特征及其常见解释。这些理论强调了不同的道德价值观、事实信念和社会身份在解释政治分歧为何普遍存在、范围广泛、持续不断、集中成簇且充满对抗性方面所起的作用。然而，一些认识论学者最近强调了不同的认识规范和原则在解释政治分歧中的作用。下一节将探讨这一观点。

6 深层分歧

政治分歧通常根深蒂固。与我们是否正确计算了晚餐账单，或渥太华是否是加拿大首都这类分歧不同，政治分歧往往是持久的、对抗性的，并且与我们的情感和身份紧密交织在一起。正因如此，一些哲学家声称，政治分歧属于“深层分歧”。³⁸ 但究竟什么才使一种分歧成为“深层”的呢？

一种刻画深层分歧的方式是将其视为关于认识论第一原则的分歧。³⁹ 认识论第一原则指的是一种形成信念的基本方法，例如感知、记忆或归纳，这些方法构成了知识与证成的起点。这些方法之所以被称为“基本的”，是因为我们无法给出一个不最终依赖于该方法本身的认识论理由来支持它们。例如，我们无法在不依赖感知判断的前提下，为感知的可靠性进行辩护。请考虑迈克尔·林奇（Michael Lynch）所举的以下例子：

该隐和亚伯正在喝咖啡，并就地球的年龄争论不休。亚伯满怀信心地断言，地球仅有7,000年历

史。该隐对此感到惊讶，指出亚伯的说法与化石记录所提供的证据不符，而这些证据表明地球要古老得多。然而，亚伯认为，了解远古过去最可靠的方法是查阅圣经，圣经的权威凌驾于任何其他相冲突的证据之上。该隐对此嗤之以鼻，并拒绝将圣经视为了解远古过去的可靠来源；他坚持认为，唯一可靠的方法是结合化石记录与历史记录，运用溯因推理与归纳推理。

在这个例子中，亚伯对圣经可靠性的信念可能建立在圣经自身的见证之上。同样，该隐关于溯因和归纳可靠性的信念，可能预设了这些方法本身的可靠性。因此，我们可以将深层分歧理解为熟悉的证成无限后退问题的实例。⁴¹ 问题在于，我们的认识论第一原则无法在不陷入循环的情况下得到证成，因为任何试图捍卫某个认识论第一原则的做法，最终都必须依赖于该原则本身。

然而，大多数政治分歧——即便是看似难以调和的分歧——似乎都不太可能以这种方式“深刻”。政治上的对立

者并非在感官知觉、归纳推理、记忆或演绎逻辑的基本原则是否是获取真信念的可靠方法这一问题上存在分歧。我们都将这些基本的认识来源视为不可动摇的基石。尽管我们有时会质疑与我们意见相左之人的记忆或感官经验（例如，“事情根本不是那样发生的！”或“老兄，你眼花了！”），但我们并不质疑记忆或感官知觉本身。即便是该隐（进化论者）与亚伯（神创论者）的例子，也并未涉及对感官知觉、归纳推理或证言的全盘接受或彻底拒斥；相反，分歧源于对这些原则应用方式的不同，比如应优先考虑文本诠释还是化石记录。尽管分歧的深度可能各不相同，但我们的政治分歧不太可能追溯至基本认识原则上的差异。若果真如此，那分歧就位于过于深层的层面了。

根据另一种刻画方式，深层分歧出现在各方无法就相关领域内如何最好地获取证据或形成有根据的信念达成一致之时。⁴² 例如，两个人可能就气候变化的成因与后果产生分歧，因为他们对何为良好证据、如何权衡不同证据来源以及谁是专家等问题持有不同

的基本承诺。这种分歧未必涉及认识论上的第一原则：双方可能都同意感知、推理和证言是可靠的。他们甚至可能都承认全球气温已上升、应咨询科学专家，以及统计建模是得出准确判断的有用工具。然而，他们仍可能在哪些专家值得信赖、各种证据应赋予多大权重等问题上存在分歧。这种分歧之所以“深层”，是因为它超越了对事实本身的分歧，而涉及关于如何最好地形成有关事实的信念的不同基本承诺。

我们认为这是一种更好的方式来刻画深层分歧，但它可能仍然过于狭窄。并非所有深层分歧都涉及不同的认识论承诺（epistemic commitments）。有些分歧可能并不在于对证据来源、其权重或方法的争议，而是涉及相互冲突的道德或政治承诺（moral or political commitments）。如前所述，分歧各方可能持有不同的基本道德价值观，或者持有相同的价值观但对其排序不同，又或者以不同方式应用道德规范。因此，更恰当的做法是将深层分歧广义地刻画为关于规范性原则或价值观的

分歧。正如耶罗恩·德里德（Jeroen de Ridder）所言，深层分歧的各方缺乏“一个共享的规范性框架。”⁴³

深刻的分歧与政治分歧有许多共同特征。首先，深刻的分歧通常涉及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话题，而非单一议题。例如，对于地球年龄存在深刻分歧的人，通常也会在许多其他问题上持不同意见，比如上帝是否存在、创世论是否属实，或者化石记录是否能作为地球年龄的可靠证据。这种分歧是系统性的，而非孤立的。然而，这与我们之前提到的逻辑上无关信念的“聚集”有所不同。我们的信念可能以两种方式“聚集”在一起：一种是围绕逻辑上相互独立的议题聚集（例如堕胎和移民问题），另一种则是涉及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话题（例如地球的年龄与对上帝的信仰）。

第二，深层次的分歧通常无法通过理性方式加以解决。这是因为争论各方缺乏足够广泛的共同承诺。当我们陷入深层次分歧时，由于缺乏共享的规范性框架，我们便不清楚该如何推进；关于如何继续下去所必需的共识根本不存在。出于这一原因，罗伯特·

福杰林（Robert Fogelin）颇具挑衅性地声称，在此类情境中进行论证是徒劳的，非理性的说服成了唯一可行的选择。⁴⁵我们将在下一节回到这一观点。

第三，深刻的分歧之所以持续存在，部分原因在于它们在理性上无法解决。当然，有些分歧尽管并非深刻，却依然持续存在。例如，某个问题可能极为复杂，难以处理；或者某人可能“迟钝或固执”，因而拒绝承认一个已被有效确立的观点。⁴⁶（在这种情况下，理性上的解决方案是存在的，因为存在某些论据或证据理应促成分歧的解决。）然而，分歧持续存在的一种解释正是其在理性上无法解决。

相比之下，普通的分歧通常是孤立的、在理性上可解决的（至少原则上如此），并且发生在一个大体共享的规范框架之内。这并不意味着参与普通分歧的各方会在所有证据来源上达成一致。例如，一位医生可能与另一位医生就某项特定检测的可靠性存在分歧。然而，这种争议可以通过诉诸其他更基本的原则来解决。如果我们能够诉诸更基本的原则来解决分歧，

那么这就是一个关于非根本性原则的分歧。⁴⁷ 在此类情况下，只要给予足够的时间、努力和能力，该分歧至少在理论上是可以解决的。

7 超越理性论证

如果关于堕胎、LGBTQ权利和枪支管控（等等）的政治分歧属于深层次分歧，那么我们就可能缺乏理性解决这些问题所必需的共同基础。这对某些民主观念构成了重大挑战。按照林奇（Lynch）的观点，民主是一个“理性的空间”，在其中，我们力求在公共领域以合理的方式解决争端。⁴⁸在公民社会中，我们试图以认知上的理由向彼此证成自己的主张，而非操纵或胁迫我们的同胞公民。事实上，许多政治理论家认为，这种公共证成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正是政治决策具有合法性的原因。在公共领域中辩论观点也理应增进公共知识：当我们共同厘清自己的想法时，所有人都能在认知上获益（参见第二章）。然而，如果公民无法就何为证据、应如何权衡证据以及谁是专家等问题达成共识，那么

民主审议就无法导向知识。当分歧过于深刻时，争论似乎就变得徒劳无功了。

如果追求理性共识是一项徒劳之举，那么我们应当转而采取什么做法呢？福杰林建议我们放弃理性，转而采用非理性的说服方式。他赞同地引用了维特根斯坦的一句话：“在理由穷尽之处，便是说服的开始。”⁴⁹ 与其继续进行理性论辩，我们不如公开诉诸非理性的说服手段来化解分歧。毕竟，寄望通过理性论证达成共识往往是一种幻觉。福杰林认为，当理性论辩失效时，我们就应转而采用说服策略。然而，这一提议引发了一些疑虑。

首先，我们如何判断何时应当放弃理性论证，转而采用非理性的说服方式？假设我们对“智能设计论是否应在学校教授”存在分歧。我们已经分享了各自的证据，交换了论点，却仍无法达成一致。这看似是一种深层次的分歧，但分歧表面上的“深刻”并不能保证它实际上就是深刻的。仅仅因为我们尚未达成理性的共识，并不意味着这种共识是不可能达成的。我们的分歧可能源于信息缺失、推理错误或教

条主义。作为容易犯错的生物，我们常常意识不到自己的错误、偏见或逻辑上的跳跃。要确定一个分歧确实是深层次的，我们就必须知道：即便各方都完全理性、信息充分，并拥有充分的时间和能力进行深入思考，分歧依然会持续存在。然而，我们几乎从未处于能够确知这一点的位置。

第二，哪些非理性说服技巧在道德上是可允许的？即便如福杰林（Fogelin）所言，我们必须诉诸非理性说服才能促使对立各方达成共识，但此类说服可采取何种形式仍存在争议。或许我们可以诉诸对话者的自身利益或对他人的同理心，但恐惧或愤怒之类的情绪呢？诉诸权威或使用灌输技巧又如何？还有宣传（propaganda），它被广泛视为对自由民主制度的威胁，又该如何看待？我们必须仔细区分可接受与不可接受的非理性说服形式，否则便有滑向操纵与胁迫的风险。⁵¹

第三，非理性说服似乎与协商民主的理念相冲突（参见第二章）。当我们试图解决道德与政治分歧时，我们的目标并不仅仅是以任何必要手段达成

一致；相反，我们的目标是达成一种“真正的共识——即通过理性、集体协商所产生的共识。”⁵² 共识并不仅仅是各方达成一致的结果，而是通过集体道德反思与协商所取得的成就，这一过程要求各方通过理由相互说服。这强调了协议的道德权威性取决于其达成的方式。换言之，运用非理性的说服方式来促成共识，在程序上可能是有问题的。试想，如果有一种神奇药剂，只要将其投入供水系统，就能立即让你的政治对手同意你的观点，你该使用它吗？正如林奇（Lynch）所言：“即使在利害攸关、且该方法能迅速高效地解决问题的情况下，通过操纵让人们无意识地同意你的观点，显然也是错误的。诉诸理由本身具有某种内在价值。”⁵³

最后，我们或许能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理性地解决深层次的分歧：即悬置判断。通常，当我们双方通过推理达成一致时，就算理性地解决了分歧。但这并非解决分歧的唯一方式。我们也可以选择对争议问题悬置判断。⁵⁴ 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在两人意识到彼此持有不同且不可通约的价值

观，却又缺乏任何理性依据来偏好其中一方的价值观时。在此情形下，双方对争议命题悬置判断或许是理性的做法。诚然，悬置判断的人并未解决该问题，但他们确实已化解了彼此的分歧，因为他们不再对相关命题持有相互冲突的信念。⁵⁵

如果对政治分歧采取悬置判断是理性的回应，那么政治领域中所有合理的分歧都将（或至少应当）消失。但这一预期与广为接受的观点相冲突，即公民在道德与政治问题上可以存在合理的分歧。正如罗尔斯所言：“一般而言，肯定诸多合理的整全性学说之一（包括各种道德、宗教和哲学观点）并非不合理。”⁵⁶ 因此，要求人们在面对分歧时悬置判断，可能会危及合理多元主义这一理念本身。

8 合理的分歧是理性的吗？

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在自由社会中，广泛的政治分歧是不可避免的。即使公民参与理性、开放且相互尊重

的辩论，也难以指望在政治问题上达成共识。正如罗尔斯所言：“在宪政民主体制的自由制度框架内，人类理性运作的正常结果，就是产生多种合理却互不相容的整全性学说。”⁵⁷ 例如，一个人认为天主教是唯一真正的宗教，这可以是合理的；另一个人认为印度教是唯一真正的宗教，同样也可以是合理的。除非我们愿意宣称任何与我们意见相左的人都是“不讲道理的”，否则我们就必须承认，存在着彼此冲突却又各自合理的观点。

合理多元主义这一事实已在政治理论中被广泛接受。塔利斯（Talisie）遵循自由主义传统，主张：“公民在基本信念上的冲突不仅不可避免，而且许多此类冲突……在理性上是无法解决的。”⁵⁸ 即便是罗尔斯（Rawls）政治自由主义的批评者也承认政治分歧的不可避免性。穆芙（Mouffe）指出：“民主要求我们接受冲突与分裂是政治固有的组成部分，并且不存在一个能够最终实现‘人民’统一之完全实现的和解之地。”⁵⁹

然而，我们或许可以质疑合理分歧本身是否可能。为了说明原因，请考虑以下例子：

理性的民主主义者 艾玛是一位理性的民主主义者，她相信民主是确保正义和保护个人权利的最佳政治制度。然而，她认识到一些理性的人与她意见相左：他们信奉知识精英统治（epistocracy），即政治权力应集中在那些拥有更卓越知识或专长的人手中。作为一名理性的人，艾玛并不认为这些知识精英统治论者是非理性的。她认为，他们的观点同样是合理的。

一方面，似乎有道理的是，理性的人们对于哪种政治制度最佳可以持有不同看法。另一方面，艾玛一方面相信民主是最好的制度，另一方面又认为民主与精英统治（epistocracy）是同样合理的观点，这似乎是非理性的。如果艾玛真的这样认为，那她为何会选择相信民主而非精英统治呢？在这种情况下，偏爱其中一种观点似乎就是任意的。为避免非理性，艾玛必须相信，那些支持精英统治的人要么忽

略了相关证据，要么未能像她那样恰当地回应现有证据。毕竟，如果说“民主是最好的制度，但我的精英统治支持者朋友和我一样可能正确”，这显然是荒谬的。⁶¹

为了进一步阐明这一点，假设你正在三个选项 A、B 和 C 之间决定相信哪一个。每个选项都同样合理，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一个选项优于其他选项。你该如何选择？从某种意义上说，你不会出错：无论你选择哪一个，最终得到的都是一个合理的观点。但从另一种意义上说，你无法理性地偏好其中一个观点而排斥另外两个：你相信 A 的理由并不比相信 B 或 C 的理由更多。因此，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唯一合理的立场是对这三个选项悬置判断。

这是一个玩具式的例子。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或许会认为，合理的分歧之所以可能，是因为证据往往十分复杂。正如罗尔斯（Rawls）所言，合理的分歧源于“判断的负担”（the burdens of judgment），其中包括“证据可能是相互冲突且复杂的。”⁶²然而，这一点并不能帮助你摆脱非理

性的指责。如果你认为证据是复杂的，那么要相信命题 p ，你就必须认为自己已经克服了这种复杂性，并对证据作出了恰当的回答。否则，你看起来就是非理性的。

此外，人们无法通过声称个体可能对证据赋予不同但合理的权重来避免非理性的指责。⁶³ 假设我们的首要目标是尽可能多地相信真理，并尽可能多地拒绝谬误。在决定相信什么时，我们面临着相信真理的价值与避免谬误的价值之间的权衡。⁶⁴ 许多哲学家认为，并不存在一种唯一最佳的方式来为这两种价值分配权重。⁶⁵ 这可能导致合理的分歧，因为两个主体可以采用不同但同样合理的策略来权衡证据。然而，当你明知其他权重分配方式同样合理时，却执意选择自己的权重分配，这似乎显得武断。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悬置判断也可能是理性的。

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合理的分歧呢？为了澄清问题，我们必须区分“合理分歧”的多种含义。

8.1 合理分歧的类型

两个人可以在以下意义上合理地持不同意见：一个人拥有支持 p 的有力证据，而另一个人则拥有支持非 p 的有力证据，但双方都没有意识到他们所依据的证据并不相同。例如，辩护律师可能因为知晓一个可信的不在场证明而相信其当事人是无辜的，而检方则由于新发现的法医证据而认为该当事人有罪。在这种情况下，两位律师之所以能够合理地持不同意见，是因为他们所掌握的证据不同。

一种观点也可能在“最低限度地看似合理”或“并非明显不合理”的意义上被视为“合理的”。在此，我们可以区分“合理性”在认识论意义上的用法和道德意义上的用法。在道德意义上，某些政治观点在一个民主社会中根本不可接受，因为它们违背了民主制度关于政治平等者之间实行自治的根本承诺。

66 常见的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民族主义形式在这种意义上就是“不合理的”，因为它们否认某些公民作为政治平等者参与政治的权利。（这些观点在认识论意义上也可能不合理，但我

们现在暂且搁置这一点。) 按照这种解释，凡不违背基本道德准则的观点，均可被视为“合理的”。

这种“合理”的道德含义与一种认识论意义上的“合理”形成对比。如果两种观点都达到了某种最低可接受的认识论标准，那么这种分歧在认识论上就是合理的。例如，你可能相信民主是最好的政治制度，但同时也承认精英统治 (epistocracy) 是一种合理的观点，因为支持它的论点中有若干可信且富有启发性的论证。在这种情况下，你并不认为支持民主和精英统治的理由同样合理；你只是承认这两种观点都达到了认识论上可接受的基本门槛。

如果合理性——无论是道德意义上的还是认识论意义上的——被理解为一种最低标准，那么就没有必要得出怀疑论的结论。持不同意见的各方无需对自己的观点是否正确暂停判断。他们仍然可以有充分理由相信，自己的观点得到了证据的最佳支持。与此同时，他们也可以认为对方的观点虽属合理却是错误的：该观点可能是真诚

得出的，符合普遍接受的推理形式，且并未诉诸于道德上恶劣的立场。67

然而，“合理”还有一种更强的认识论意义上的理解，这种理解可能与理性地维持对自己观点的信心不相容。如果我认为你的观点是合理的，意即它与我的观点一样得到了证据的充分支持，那么我就应当降低对自己观点的信心，甚至完全悬置判断。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在遇到一位“认识论上的对等者”（epistemic peer）时，即一个在智力、推理能力以及背景信息方面与你大致相当的人。如果你将某人视为你的认识论对等者，那么你就认为他们拥有与你几乎相同的相关证据、推理能力、训练和背景信息。

当认知对等者在政治问题上产生分歧时，理性的回应是什么？我们应当坚持己见吗？我们是否在理性上有义务在某种程度上作出让步？理性是否要求我们完全悬置判断？接下来我们将探讨这些问题。

9 理性应对政治分歧

关于同行分歧的认识论意义，存在着广泛的哲学争论。这一文献中的两种主要立场是“坚持派”（steadfast）观点和“调和派”（conciliationist）观点。坚持派观点认为，在遭遇同行分歧之后，继续像之前一样持有原有信念仍可能是理性的。⁶⁹ 调和派观点则主张，如果你不完全悬置判断，至少也应在理性上降低对自己信念的确信程度。⁷⁰ 在政治领域，一些人主张，当公民与同行发生分歧时，应当完全采取调和立场。⁷¹ 另一些人则批评这种立场，认为它将棘手的政治分歧当作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来对待。⁷² 按照后一种观点，我们应当坦然接受——甚至珍视——合理分歧的存在，既不应试图解决它们，也不应期待它们得到解决。

然而，人们可能会质疑分歧认识论中的争论对于政治分歧的相关性。这些争论主要聚焦于我们与被视为认知对等者（epistemic peers）的人产生分歧的情形。然而，很少有人会将他们的政治对手视为认知对等者。正如我

们将在下一章讨论的那样，党派人士通常认为他们的政治对手思想封闭、无知、带有偏见，甚至非理性。如果认知对等关系不成立，那么调和主义（conciliationist）观点也就不再具有相关性。

对此，有人可能会争辩说，我们认为自己的政治对手在认识论上处于劣势，这种看法是缺乏正当理由的。正如前几章所讨论的，我们判断政治对手并非我们的认识论同侪，这一判断本身可能正是源于我们自身的无知

（见第四章）、偏见（见第五章）或其他非认识论因素（见第六章）。因此，断定我们的政治对手在认识论上处于劣势是错误的。

我们对这一回应抱有极大的同情。然而，对于为何反对党成员不应被视为认知对等者（epistemic peers），可能存在一种偏见更少、更为合理的解释。原因在于，在政治语境中，对某一议题持不同意见的人，通常会在许多相互关联的问题上存在分歧；此外，当我们认为某人在太多相关问题上犯了错误时，我们既无法、也不应将其视为认知对等者。

举例来说，亚当·埃尔加（Adam Elga）邀请我们思考两位朋友安（Ann）和贝丝（Beth）之间的分歧，她们分别站在政治光谱的两端：

安和贝丝在堕胎是否道德上存在分歧。安认为堕胎在道德上是可允许的，而贝丝则否认这一点。安是否认为贝丝在这一问题上是自己的认知对等者？假设安暂时搁置自己关于堕胎主张的推理（以及贝丝对此的相反观点），安是否认为贝丝与自己一样可能正确？

根据埃尔加（Elga）的观点，答案是否定的。“争议问题”纠缠于一个更广泛的争议丛中，这使得安（Ann）即便不是完全不可能，也极难将贝丝

（Beth）视为自己在该议题上的认知对等者。例如，堕胎主张与许多其他问题紧密相关，比如人类是否拥有灵魂、生命的神圣性、人格的本质，以及在正确的伦理理论中占据核心地位的具体权利。在安看来，贝丝在这些密切相关的问题上得出了错误的结论。⁷⁴ 因此，安无法将贝丝视为认知对等者。

因此，即使我们接受在与认知对等者（epistemic peer）发生分歧时应当采取调和立场，也并不意味着在大多数政治分歧的情形中就必须悬置判断。我们完全可以否认那些持有截然不同政治观点的人在相关意义上属于认知对等者。然而，这一论点至少存在三个问题。

9.1 三个反对意见

首先，希拉里·科恩布利斯（Hilary Kornblith）认为，在许多情况下，即使争议问题纠缠于一系列复杂的争议之中，我们仍可合理地将我们的论辩对手视为认知对等者（epistemic peers）。⁷⁵ 试考虑认识论中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之争，或伦理学中功利主义与义务论之争。在这些情形中，正如安（Ann）与贝丝（Beth）的情形一样，争议问题无法与其他有争议的问题分离开来。这是否意味着我们不能将那些与我们意见相左的人视为认知对等者？科恩布利斯回答道：“绝非如此。”他接着说道：

即便这些分歧再广泛，也是在一种极为广泛的共识背景之下发生的——这种共识涉及认识论中的重要议题、哪些立场值得认真对待、何种理由支持或反对各种观点，等等。简言之，我在认识论中看待内在论者的方式，与安（Ann）看待贝丝（Beth）的方式大体相同。当然，这意味着我完全可以将这些哲学家视为我的认知对等者（epistemic peers），而事实上，这正是我对他们的看法。76

如果科尔恩布利斯（Kornblith）是正确的，那么在堕胎争论这类涉及广泛相关议题的分歧中，人们并不会因此而自动失去将对方合理地视为认知对等者（epistemic peers）的资格。基于这一理由，科尔恩布利斯主张，唯一理性的做法就是在许多争议性问题上悬置信念。

其次，全球性地贬低政治对手的策略会带来令人不安的后果。正如马丁·埃贝林（Martin Ebeling）所指出的，肆意贬低意识形态上的对立者很可能加剧两极分化，并助长知识上的傲

慢。这有损于对众多同胞公民智力品质的认可。77

第三，埃尔加的论证暗示，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的政治出发点总体上比政治对手的出发点更有利于接近真理。但我们为何应当假定自己拥有独立于分歧的理由来得出这一结论呢？大量证据表明，受政治动机驱动的推理是人类心理的一种普遍特征，并非仅仅影响我们的政治对手。我们所有人都同样容易选择性地解读证据，并扭曲论证以支持自己偏好的结论。若否认这一点，便表现出一种“偏见盲点”（bias blind spot）——即认为那些经常影响他人推理能力的偏见，不太可能影响到自己。⁷⁸ 如果我们认真对待“每个人都很可能带有偏见”这一观点，那么就很难再简单地将我们的政治对手视为非认知对等者（non-epistemic peers）。

10摘要

尽管本章对解决政治分歧的前景似乎持悲观态度，但若因此断定政治讨论

与辩论毫无意义或存在问题，那就错了。即使面对深刻的分歧，我们仍有若干令人信服的理由继续与同胞展开政治辩论。

首先，并非所有分歧都注定无法通过理性加以解决。我们可以期待某些政治辩论无需我们搁置判断便能得到解决。对政治分歧的强调常常忽视了那些存在广泛共识、且部分解决成为可能的重要领域。其次，说服他人接受自己立场的真实性并非审议的唯一目的。审议还具有许多其他重要功能：它能够培养对不同观点的宽容，展现相互尊重，促进妥协意愿，鼓励公民参与，增强对民主制度的信心，并最终有助于培育更优秀的公民。⁷⁹

审议与分歧也具有认识论上的益处。正如第二章所讨论的，接触对立观点可以使我们更加知情，使我们的观点更加理性，深化我们对复杂问题的理解，并以更接近真理的方式完善我们的意见——即使共识依然难以达成。除了改善我们自身的观点之外，审议还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同胞公民的立场，以及他们与我们产生分歧的原因。⁸⁰ 因此，审议并不会仅仅因为未

能总是达成一致而变得毫无意义。它对个人乃至整个社会都具有道德和认识论上的益处。

事实上，应当明确的是，期望说服他人并非审议的唯一动机。我们经常遇到与有能力的推理者之间持续存在的分歧，却仍会继续进行审议，尽管存在这一事实。以哲学实践为例：哲学家们终其职业生涯与论敌辩论，却并不指望这些分歧最终会达成共识。例如，功利主义者很少指望能说服康德主义者，怀疑论者几乎从不期待将非怀疑论者转化为怀疑论者，而柏拉图主义者也几乎不奢望能说服唯名论者。然而，分歧与审议依然具有价值。

然而，人们日益认识到政治分歧往往既无成效又难以化解，这引发了对极化现象加剧的担忧，而极化正是下一章的重点。我们将探讨：极化究竟是政治分歧的一种加剧形式，还是包含了一些额外的、令人忧虑的特征，从而带来独特的挑战。当政治分歧扩大到使富有成效的审议与妥协几乎无法实现的地步时，健康民主制度的根基便面临风险。

注释

1. 皮尤研究中心 2016 年。
2. 卢梭1762年〔1968年版〕：
第四卷，第二章。
3. 罗尔斯1993年。
4. 辛诺特-阿姆斯特朗2018：18-20。
5. 卡佩伦和霍桑 2009：60-61。
6. Ballantyne2016。
7. Kolbel2004。
8. Harris2013。
9. Feldman2007：198。
10. 我们采纳自 Huemer 2016 和 Ancell 2017。
11. Ancell2017：24。
12. Mouffe 2000：11。
13. Huemer 2016：458。
14. 参见第8章第4节，以进一步讨论信念聚类。
15. 皮尤研究中心 2014 年。
16. Iyengar 等，2012 年。
17. 古特曼和汤普森1996年：1。
18. Talisse2009a：3。
19. Ancell2017：7。
20. 罗尔斯1993：55。

21. Galston 2002: 30。
22. 罗尔斯1993: 56。
23. Ancell2017: 17。
24. Lupia2016: 2。
25. Ancell2017。
26. Ancell2017。
27. Ancell2017: 46。
28. Achen 和 Bartels, 2016 年。
29. Lenz2013: 226。
30. Huemer2016。
31. Achen 和 Bartels 2016; Ancell 2017; Brennan 2016a。
32. Ancell2017: 85–86。
33. Lenz2013: 3。
34. Cohen2003。
35. Brennan2016a: 39。
36. McCarty 等, 2016 年。
37. Achen 和 Bartels 2016: 299。
38. Aikin 2018; de Ridder 2021; Lynch 2010。
39. Kappel 2012; Lynch 2010, 2016; Ranalli 2018。
40. Lynch2010: 264。
41. Aikin 2018; Lynch 2010。
42. Kappel2012。

43. deRidder2021。
44. deRidder 2021；Ranalli 2018。
45. Fogelin1985： 6。
46. Fogelin1985： 7。
47. Lynch2016。
48. Lynch2012。
49. Fogelin1985： 6。
50. Adams 2005： 68–69。
51. Adams2005。
52. Adams2005： 74。
53. Lynch2012： ix。
54. Feldman2005。
55. Feldman2005： 17。
56. 罗尔斯1993： 60。
57. 罗尔斯1993年： 第xvi页。
58. 塔利斯2009a： 14。
59. 穆芙2000： 15–16。
60. 参见Enoch 2017。
61. 以诺书2017： 138。
62. 罗尔斯1993： 56。
63. 古特曼和汤普森1996年： 25 页；罗尔斯1993年： 56–57 页。
64. 詹姆斯 [1876] 1979年。
65. Riggs2003。
66. Talisse2009a： 14。

67. Larmore1994。
68. Elga 2007； Kelly 2005。
69. Kelly 2005； van Inwagen 2010。
70. Christensen 2007； Elga 2007； Feldman 2007。
71. Ebeling2017。
72. Gelfert 2011； Liveriero 2015。
73. Elga2007。
74. Elga2007： 493。
75. Kornblith 2010； 另见 McGrath 2008。
76. Kornblith2010： 51。
77. 埃贝林2017： 178–179页。
78. Hallsson2019。
79. 古特曼和汤普森 1996； 曼斯布里奇 1999； 穆茨 2006。
80. Hannon2020。

更多资源

- 费尔德曼，理查德（2007）。《合理的宗教分歧》。载于《无神论哲学家：关于无神论与世俗生活的沉思》，露易丝·

安东尼编。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第194-214页。

- 古特曼，艾米 与 丹尼斯·F·汤普森（1996）。《民主与分歧》。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
- 汉农，迈克尔（2025）。《分歧与当代政治哲学》。载于《分歧哲学劳特利奇手册》，玛丽亚·巴格拉米安、J. 亚当·卡特与拉赫·科斯克-罗兰德编。伦敦：劳特利奇出版社，第385-397页。
- 约翰逊，凯西·丽贝卡（编）（2018）。《表达异议：公开分歧的伦理学与认识论》。纽约：劳特利奇出版社。
- 科恩布利斯，希拉里（2010）。《面对争议的信念》。载于《分歧》。理查德·费尔德曼与泰德·A·沃菲尔德编。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第29-52页。
- 莱基，詹妮弗（2019）。《我们何时应在政治问题上持不同意见？》，载于《政治认识论》，伊丽莎白·埃登伯格与迈

克尔·汉农编，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第280-296页。

- 梅森，莉莉安娜（2018）。
《不文明的共识：政治如何成为我们的身份认同》。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 密尔，J. S.（[1859] 2001）。
《论思想与讨论的自由》。
《论自由》。基奇纳：巴托什图书公司。
- 罗尔斯，约翰（1993）。《政治自由主义》。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 桑斯坦，卡斯（2017）。《#共和国：社交媒体时代的分裂民主》。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 塔利斯，罗伯特·B.
（2009）。《民主与道德冲突》。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

8 极化与党派之争

如果一个人心里对你充满怨恨与敌意，那么即便你用尽基督教世界所有的逻辑，也无法让他接受你的想法。——戴尔·卡耐基，
《如何赢得朋友并影响他人》

引言

在《联邦党人文集》第十篇中，詹姆斯·麦迪逊警示了“派系暴力”的危险。他指出，对民主最大的威胁并非来自外部，而是源于社会内部因激烈分裂而产生的内患。当公民和政治人物分裂为立场僵硬对立的阵营，拒绝妥协或向对手让渡权力时，民主便面临危机。今天，我们正面临类似的威胁，这种威胁被称为“极化”。

极化被广泛视为对民主的核心威胁之一。2022年的一项民调显示，30%的美国人认为政治极化是国家面临的首要问题之一。¹ 然而，这一问题绝非美国独有。比较研究表明，全球许多民主国家的极化现象正在加剧。² 因此，政治极化已成为学者、政策制

定者和普通民众共同关注的重大议题。

“极化”一词常被提及，但其含义往往模糊不清。它已被用于描述各种现象，从政治领导人之间日益扩大的意识形态鸿沟，到公共领域中公民话语的衰退。在许多方面，“极化”已成为一个包罗万象的术语，用以指代导致政治共识碎片化的社会、心理和文化因素。尽管对极化的研究是当代政治学中最具影响力的研究领域之一，但学界对其本质、成因及影响仍存在广泛争议。

在本章中，我们试图厘清政治极化错综复杂的脉络，以理解其起源、驱动因素及后果。首先，我们辨识出若干种不同但相互关联的极化概念。其次，我们列举促成极化的若干因素，包括媒体信息偏好、政治领袖以及更广泛的社会与心理力量。第三，我们考察极化是否具有认识论上的合理性，发现某些形式的极化比其他形式更为合理。第四，我们审视极化可能带来的后果，例如政治暴力和对民主制度信任的削弱。最后，我们质疑极

化是否真如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严重。

1 什么是偏振？

政治中的“极化”是什么意思？本质上，极化指的是个人与群体之间在政治态度和身份认同上的差距不断扩大。这些差距导致了深刻的社会分裂与敌意。然而，极化并非一种单一的现象；它具有多个维度。

首先，极化既可发生在观点相似的群体内部，也可发生在持对立观点的群体之间。这两种情况分别被称为**群体内极化**（intragroup polarization）与**群体间极化**（intergroup polarization）。其次，极化既可以描述一种**静态属性**，也可以描述一个**过程**。前者指在特定时间点上个体或群体之间的距离；后者则代表一种随时间不断演化的动态现象。第三，极化可能出现在**整个民众**（population as a whole）之中，也可能特指**政治精英**（political elites）之间的极化，这构成了**大众

极化** (mass polarization) 与**精英极化** (elite polarization) 之间的区别。

大多数专家都认为，美国的政治领导人已在意识形态上变得更加两极分化。例如，美国国会中几乎没有持中间立场的议员。然而，对于选民是否在意识形态上两极分化，学界则较少达成共识。尽管如此，学者们普遍一致认为，美国选民在对彼此的情感态度上高度两极分化。因此，我们还可以区分意识形态极化 (ideological polarization) 与情感极化 (affective polarization) 。

极化是一种复杂的现象，若加以简化，势必会造成误读。区分不同类型的极化至关重要，原因有三。首先，这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这一多维度概念的复杂性，包括个体或群体可能在哪些不同维度上发生极化，以及这些维度之间的相互关联。其次，它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各类极化现象的成因与后果。例如，我们可以探究个体或媒体是否在其中负有部分责任。最后，认识到这些差异有助于识别哪些类型的极化尤其有害，并据此

制定有效的策略，以减轻其负面影响。

1.1 意识形态极化

政治极化通常从议题立场的角度来看待。当大量民众在特定政策议题上持续持有分歧观点时，这被称为“议题极化”。例如：

环境监管。1994年，39%的共和党人和29%的民主党人同意“更严格的环境法律和法规会导致大量失业并损害经济”。到2014年，两党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扩大了两倍多：59%的共和党人和24%的民主党人同意同样的说法。⁶（分歧从10%扩大到35%。）

尽管议题极化聚焦于特定话题或政策领域，例如枪支管控、堕胎或环境监管，但它通常发生在更广泛的意识形态极化背景之下。

当政党纲领与意识形态之间的距离扩大时，就会出现意识形态极化。“意识形态”在此指的是一套信念、价值观、

原则和思想，用以指导个人对政治的理解。政治意识形态包括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意识形态提供了一个全面的框架，人们借此解读和分析政治议题、制定政策立场，并就治理和社会组织作出决策。（需注意，“意识形态”有时也被用来描述那些延续压迫的信念体系；然而，我们在此关注的是其在中性、非贬义意义上的用法。）与议题极化不同，意识形态极化意味着存在一套更为一致且总体性的政治信念，这些信念指导着人们对各种议题的立场。话虽如此，人们也可能在特定议题上出现极化，却未必在意识形态上极化。

皮尤研究中心发现，从2004年到2014年，持一贯保守或一贯自由观点的美国人所占比例翻了一番。⁷ 这表明美国的意识形态极化程度有所加剧。意识形态极化是指人们在与政治意识形态相关的问题上（例如政府角色、经济政策、社会价值观和文化规范）持有强烈对立的观点。与议题极化不同，意识形态极化关注的是群体

之间整体哲学和意识形态上的距离，而非个别具体议题。

人们通常认为，公民在接触政治世界时心中已有一种意识形态。然而，正如第六章所讨论的，许多公民对意识形态是“无知”的。⁸ 在菲利普·康弗斯（Philip Converse）研究的基础上，唐纳德·金德（Donald Kinder）和内森·卡尔穆（Nathan Kalmoe）认为，美国选民并未在意识形态上出现两极分化。他们指出，普通公民对政府政策的看法很少表现出沿政党路线连贯一致的组织性。⁹

在学者中，人们普遍强烈认同精英阶层在意识形态上日益两极分化，但对于选民是否同样两极分化则共识较少。一组学者认为，大多数美国人在大多数议题上持温和或中间立场。¹⁰ 另一组学者则声称，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无论是大众公众还是精英阶层，意识形态两极分化都显著加剧。¹¹ 我们在此经验性问题上不持立场。普通党员是否在意识形态上两极分化，我们并不清楚。然而，无可否认的是，许多人认为当今在政策议题上的两极分化程度更高了。

1.2 情感极化

传统上，极化是通过政策偏好和意识形态取向的差异来衡量的。然而，研究人员越来越关注极化的情感动态。当个体对对立政党的成员产生强烈的负面情绪——例如厌恶、不信任、愤怒、憎恨、恐惧，甚至仇恨——时，这被称为“情感极化”。

情感极化可以在没有意识形态极化的情况下发生。例如，莉莲娜·梅森

(Lilliana Mason) 认为，尽管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在大众选民中情感上的极化程度日益加剧，但在意识形态上却并非如此。她指出：“党派支持者……可能会说他们偏好自己的政党是因为该党在议题上的立场，但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之所以偏好该党，仅仅因为那是他们的‘主队’。”¹²

有大量证据表明情感极化现象的存在，尤其是在美国。¹³ 社会科学家采用多种方法来考察这些党派情感。其中一种方法是使用“情感温度计”

(feeling thermometers)，即受访者表明自己对对立党派成员的亲疏态度。例如，1994年，仅有16%的民

主党人和17%的共和党人对彼此持非常负面的看法；而到2016年，这一比例分别飙升至55%和58%。¹⁴ 此外，特质评分（trait ratings）显示，受访者常常将负面刻板印象归于对方党派成员，将其描述为思想封闭、不诚实、刻薄、愚蠢和自私。¹⁵ 社会距离（social distance）测量进一步揭示了这一日益扩大的分歧。例如，对子女与对立党派人士结婚持不满态度的党派支持者比例急剧上升——从20世纪60年代的不足5%，上升到如今49%的共和党人和33%的民主党人。

16

情感极化的加剧几乎完全源于对对立政党的负面情绪日益增长，而非源于对本党更强烈的正面情感。这被称为“负面党派主义”。¹⁷ 曾经对政治对手仅有的轻微反感，如今已演变为深刻的党派敌意。

情感极化与其他形式的极化密切相关。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党派间的敌意随着意识形态极化的加剧而急剧上升。¹⁸ 同样，乔恩·罗戈夫斯基（Jon Rogowski）和约瑟夫·萨瑟兰（Joseph Sutherland）指出，随着

政客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扩大，民众的情感极化程度也会加深。¹⁹ 这表明意识形态极化会助长情感极化。然而，情感极化也可能在缺乏意识形态极化的情况下出现。事实上，即使意识形态分歧在缩小，情感极化仍可能加剧。

1.3 群体极化

想象一群人在晚餐时，随意讨论他们对当地公园乱扔垃圾问题的担忧。随着谈话的展开，他们对这一问题的感受逐渐变得更加强烈。到谈话结束时，他们的观点变得更加极端：那些最初认为乱扔垃圾只是个小问题的人，现在将其视为严重问题；那些曾经支持处以小额罚款的人，如今主张处以更高罚款；而那些认为乱扔垃圾者应被暂时禁止进入公园的人，现在则呼吁实施永久禁令。这种现象被称为“群体极化”。群体极化是指人们在与观点相似的人交流信息后，其观点变得更加激进或极端的现象。

“群体极化”（group polarization）这一术语并非指群体成员会向两个极

端分化，从而拉大彼此之间的距离。相反，他们会共同朝同一方向偏移，在观点上变得更加固执或更加极端。这一点将群体极化与议题极化和意识形态极化区分开来。后两种现象指的是社会中的个体或群体在特定政策议题或意识形态信念上日益分裂。相比之下，群体极化要求态度朝一个方向统一移动，趋向于比原先持有的观点更为激进的版本。

群体极化可以表现为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正如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所指出的，我们可能采纳更为极端的信念内容，也可能增强对既有信念的信心。²¹ 我们将使用“极端主义”（extremism）和“激进主义”

（radicalism）这两个术语来区分上述现象。²² 当群体成员在意识形态光谱上转向更为极端的立场时，即为极端主义。激进主义则指个体对自己信念的信心增强，无论这些信念在内容上是温和的还是极端的。这一区分至关重要，因为即便采纳了更为极端的信念内容，只要仍保持开放的心态，未必必然损害民主；然而，即使你的信念内容相对温和，若因过度自信而

拒绝与其他政治观点进行交流，则可能对民主造成损害。

群体极化并不仅限于政治议题。它几乎可以在任何话题上发生在观点相似的群体中，包括纯粹的事实问题（例如，一栋建筑的高度）、个人品味问题（例如，牙科椅的舒适度），或价值判断问题（例如，正义的要求是什么）。然而，群体极化可能会加剧某些形式的政治极化。假设群体A略微倾向于提高联邦最低工资，而群体B则略微倾向于反对提高。根据群体极化定律，这两个群体的观点将日益分化，这可能会加剧意识形态极化和情感极化。

1.4 信念极化

一个相关的现象是信念极化（belief polarization），即当持相反观点的个体在面对同一组混合证据后，反而更加固守自己的原有信念。他们并未趋向于达成中间共识，而是使最初的分歧进一步加剧，每个人都以强化自身既有立场的方式来解读新信息。23

尽管一些学者将“信念极化”（belief polarization）与“群体极化”（group polarization）互换使用，但这两个现象存在重要差异。首先，群体极化是在群体讨论之后产生的，而信念极化则是在缺乏群体商议的情况下发生的。因此，信念极化是一种个体现象，而群体极化则是一种集体现象。其次，群体极化发生时，相关个体朝同一方向极化；而信念极化发生时，个体则朝相反方向极化。然而，在这两种情况下，结果往往相同：个体最终所持的观点比最初更加极端。

以下是一个信念极化的经典例证：

死刑。在1979年的一项研究中，查尔斯·洛德（Charles Lord）及其同事选取了两组持有不同观点的本科生：一组坚定认为死刑对犯罪具有威慑作用，另一组则坚定认为恰恰相反。研究人员要求学生分别评估两项虚构但逼真的实证研究——一项支持威慑效应，另一项反对威慑效应——以及针对这些研究的著名批评意见和所谓作者对此作出的回应。24

你能猜出这项研究的结果吗？在接触了混合证据之后，那些最初支持死刑的人最终更加坚定地支持死刑，而那些反对死刑的人则更加坚决地反对死刑。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基本上，支持死刑的人认为支持威慑效应的研究更具说服力，而反对者则更容易被反对威慑效应的研究说服。这表明，参与者倾向于接受与自己先前观点一致的证据，说明信念极化是一种认识论上的非理性。我们将在第3节中再次讨论这一问题。

信念极化不同于其他形式的极化。与群体极化不同，信念极化发生在个体层面。与情感极化不同，信念极化关注的是信念的分歧，而非情绪的对立。与意识形态极化不同，信念极化可以在特定议题上发生，而无需与更广泛的意识形态立场挂钩。本质上，信念极化是一种更为局部的现象，其核心在于个体在面对新信息时如何解读并强化其既有观点，而非涉及更广泛的群体动态、情绪反应或整体性的政治意识形态。

总之，极化具有多个维度。极化可能存在于不同的层次（例如精英层面与大众层面）、不同类型（例如情感驱动型或议题驱动型）、时间维度（例如静态或动态），以及不同的发生场域（例如两个个体、单一群体或多群体）。为了更好地理解极化这一问题的成因、后果及潜在的应对措施，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种复杂性。

2 什么导致了极化？

在本节中，我们探讨导致极化的各种因素。尽管有许多要素共同塑造了这一复杂现象，我们重点关注四个常见的“罪魁祸首”：媒体环境、政治领袖、广泛的社会趋势以及群体内部动态。

2.1 媒体环境

许多人认为新闻媒体加剧了政治极化。²⁵ 这种观点正确吗？如果正确，它导致了哪些类型的极化，又是如何导致的？

近几十年来，两大转变重塑了媒体格局。其一是党派新闻媒体的兴起，这类媒体强化受众既有信念，选择性地报道事实，并以负面方式描绘对立党派成员。其二是互联网——尤其是社交媒体——在传播错误信息、制造回音室效应以及放大极端或边缘观点方面所起的作用。我们将在下文的讨论中聚焦于这两种趋势。

2.1.1 党派媒体与选择性接触

一些学者担心，党派媒体正在加剧公众的两极分化。²⁶ 有线电视和互联网的兴起催生了一个日益碎片化且深度极化的媒体格局。²⁷ 我们当代的信息环境使受众能够选择与其观点一致的新闻来源，这些来源所提供的新闻报道和社论都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倾向。

党派媒体助长了选择性接触。所谓选择性接触，是指个体倾向于主动寻求并接触那些与其既有信念、价值观和政治意识形态相一致的信息，同时积极回避或排斥相反的观点。在当今的媒体环境中，人们常常选择与自身观点一致的新闻来源。例如，持自由派

立场的选民可能主要观看MSNBC，而保守派选民则可能更偏爱福克斯新闻（Fox News）。一项研究发现，共和党人看到带有福克斯新闻台标的新闻报道时，阅读的可能性高出25%；但如果该报道带有CNN或NPR的台标，其阅读可能性则几乎降低10%。其他研究也发现，激励人们收看党派性电视节目会加剧其态度的两极分化。正如桑斯坦（Sunstein）所指出的，党派媒体充当了“回音室”（echo chambers），不断强化观众已有的信念。因此，经常接触观点一致媒体的人往往在意识形态上更加两极分化。

党派媒体还会加剧情感极化。党派新闻媒体常常将对立党派成员漫画化，将其描绘成意识形态极端且政治参与度极高的人。毫不奇怪，此类媒体的受众对另一方的态度变得越来越负面。³¹错误认知滋生敌意：当我们认为对方党派人士极端且意图强加其观点时，他们便被视为威胁，从而引发蔑视情绪。³²

重要的是，不仅党派新闻会加剧我们的两极分化。即使接触平衡或中立的

新闻，也可能导致信念极化。如第1.4节所述，当个体对与自身观点不一致的信息加以驳斥和反驳时，信念就可能发生极化。因此，在观看一则平衡的新闻报道时，一位自由派人士可能通过拒绝保守派论点并进一步认同自由派论点而变得更加极化。然而，这种现象的程度取决于观众既有的态度和政治素养。

2.1.2 互联网与社交媒体

如今，人们普遍担忧网络媒体对民主的影响。在《#共和国：社交媒体时代的分裂民主》一书中，桑斯坦指出：“显而易见，对许多人而言，互联网正成为极端主义的温床，恰恰是因为志同道合的人们如今能更轻松、更频繁地彼此联系，而且往往听不到相反的观点。”³⁴ 这一观点在记者、研究人员和普通民众中广为认同，他们认为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是加剧社会极化的重要因素。桑斯坦强调，脸书（Facebook）和推特（Twitter，现为X）等平台在打造一种“每日自我”（Daily Me）——社交媒体用户几乎

只与观点相近的人互动，分享那些强化其世界观的新闻和信息。

埃兹拉·克莱因将此称为“极化回音室理论”，其内容可概括如下：

极化回音室理论 社交媒体通过促进封闭式在线社群的形成，加剧了政治极化。在这些“回音室”中，个体主要与观点相似的人互动，从而强化其既有信念，并使其脱离多元观点与信息。结果，社交媒体增强了人们对自身信念的确信，进一步加深了社会中的意识形态分歧。³⁵

回音室理论呼应了人们对党派性有线新闻兴起的担忧。随着媒体选择的激增，公民可以选择性地接触与自身观点一致的信息，从而进一步将自己与相左的观点隔离开来。尽管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都可能充当回音室，但后者还运用强大的机器学习算法为用户筛选内容，即使用户并未主动寻求意识形态上的认同。因此，用户常常被推送偏向其既有信念的新闻，即便他们更希望获得多元化的信息。

2.1.3 媒体是否应为两极分化负责？

回音室理论是否正确？政治极化是否真的可以归因于党派媒体和封闭的在线社群？近期研究表明，答案可能更为复杂。尽管这些因素无疑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它们对极化的影响程度可能被夸大了。

首先，党派媒体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在向已有共识的受众传教。消费党派新闻的人通常本身就具有高度的党派倾向，他们寻求的是对自己既有信念的确认。³⁶ 因此，媒体选择可能并非导致极化的主要原因，而更多地反映了既有的极化状态。³⁷ 其次，来自英国、美国及其他地区的研究发现，大多数人接触的新闻媒体来源相对多元。这些发现适用于传统媒体和在线媒体。仅有极少数人（通常仅占几个百分点）完全从党派性来源获取新闻。³⁸ 事实上，社交媒体很可能增加了我们接触各类新闻和政治观点多元信息的机会。³⁹

然而，如果人们面对不同观点时抱持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并将其视为非法而加以拒斥，那么接触多元信息便是

无效的。C. Thi Nguyen 通过明确区分“回音室”（echo chambers）与“认知泡沫”（epistemic bubbles）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认知结构，阐明了这一点。⁴⁰ 在认知泡沫中，人们之所以缺乏对相关信息和观点的接触，源于算法过滤、选择性关注或无意的无知等因素。这种信息接触的缺失并非必然源于对外部人士的不信任，而是由偶然的信息缺口所致。因此，认知泡沫中的成员一旦接触到外部信息，通常持开放态度，因为他们对此类信息并无先入为主的偏见。克莱因（Klein）所称的“回音室”，在阮（Nguyen）看来，实际上应称为“认知泡沫”。

相比之下，回音室（按阮氏的定义）是一种更具危害性的社会结构，其成员主动不信任外部人士，并依赖于一套狭隘界定的“权威”信息来源。回音室的特点在于有意识地努力贬低和排斥外部信息来源。因此，当回音室成员接触到外部观点时，他们更不容易接受这些观点，因为他们配备了专门用于否定此类信息的机制。这种动态使回音室对健康的信息环境尤其具有

破坏性，因为仅仅接触多元观点几乎无法削弱其影响力。

互联网，尤其是社交媒体，是否助长了回音室效应？人们普遍如此认为。然而，这一说法似乎与证据相矛盾，这些证据表明，线下环境中的极化现象实际上比线上更为严重。例如，情感极化程度最高的群体，恰恰是那些最不可能使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人群。⁴¹ 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玛丽亚·诺德布兰特（Maria Nordbrandt）发现，虽然社交媒体的使用受到情感极化的驱动，但反过来却不成立。⁴² 另一项研究甚至发现，像Facebook这样的平台具有去极化的效果。⁴³ 这些研究结果挑战了当前普遍认为互联网加剧了极化的观点。

归根结底，关于党派媒体和互联网具有极化效应的证据充其量是混杂不清的。一些研究者发现，社交媒体加剧了极化，⁴⁴ 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使用社交媒体实际上可能减少极化。⁴⁵ 还有其他研究发现，社交媒体使用与极化之间几乎没有（如果有的话）关联。⁴⁶ 就传统媒体而言，有人认为党派电视节目的受众规模太小、本身已

过于极端，且接触了足够多样的内容，因此不太可能对公众舆论产生显著影响。⁴⁷ 尽管如此，我们仍可能担忧，党派媒体会进一步激化那些原本就持有相对极端观点的受众。⁴⁸

2.2 政治领导人的作用

公众舆论常常受到精英话语的影响，因为政治领导人、政党官员和知名人士塑造了人们对议题的理解和框架。因此，精英阶层的两极分化可能会加剧选民之间的分歧。⁴⁹ 当政党领袖和活动人士采取两极分化的立场时，选民往往会追随他们的引导，从而加深社会内部的意识形态分裂。

以气候变化问题为例。在美国，随着科学界共识日益增强，气候变化却在同一时期变得更加意识形态化和两极分化。这一令人费解的现象该如何解释？研究人员在分析过去三十年的新闻报道后发现，随着越来越多的共和党当选官员开始公开否认气候变化的真实性，公众在该问题上的两极分化也随之加剧。⁵⁰ 相比之下，民主党政治人物在此期间始终承认气候变化的

真实性。这表明，共和党选民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本党领袖言论的影响，从而拒绝接受气候科学。

在新冠疫情方面也观察到了类似的动态。研究表明，精英阶层在这一问题上的言论存在显著差异，尤其是在疫情初期。共和党领导人强调自由和对企业造成的损害，而民主党人则强调对公共健康的威胁。⁵¹ 调查数据显示，在唐纳德·特朗普对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的态度发生转变后，共和党选民对CDC等机构的信任度急剧下降。这进一步说明了精英信号如何造成鲜明的党派分歧。基于这些理由，詹妮弗·麦考伊（Jennifer McCoy）认为：“精英是极化的主要推动力。”⁵²

然而，另一些人则认为，选民的两极分化是精英两极分化的原因，而非其结果。在《我们为何两极分化》一书中，克莱因指出，美国公众在精英阶层之前就已经出现了两极分化：

极化的逻辑……是这样的：为了迎合一个更加两极分化的公众，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者会采取更

加两极分化的行为方式。随着政治制度和行为者变得更加两极分化，他们又进一步加剧了公众的两极分化。这就引发了一个反馈循环：为了迎合一个更加两极分化的公众，制度必须进一步极化；而当公众面对更加两极分化的制度时，又会进一步极化，如此循环往复。⁵³

其他人也持类似立场。⁵⁴根据这一理论，政界人士只是在公众的两极分化已经出现之后，才开始反映这种分化，从而使公众分歧的程度更加明显。

然而，选民引发极化的证据却难以捉摸。在将选民的议题立场与立法者立场进行比较的研究中，研究发现，议员所持立场明显比其选民更为极端。

⁵⁵ 尽管精英极化与大众极化之间的因果关系尚无定论，但前者可以说加剧了后者。

2.3 排序

民主国家民众中普遍存在一种与政治分歧相一致的“分化”趋势。社会空间

和政党日益趋于同质化。在本节中，我们将探讨三种相互关联的分化类型，它们可能加剧极化现象：党派分化、社会分化和地理分化。

2.3.1 党派分化

党派认同与意识形态认同之间日益趋同，这一过程被称为“党派分化”

（partisan sorting）。在美国，这意味着自由派人士越来越多地认同民主党，而保守派人士则越来越多地认同共和党。⁵⁶ 因此，两大政党之间的分歧变得更加尖锐。这与20世纪中期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当时两党在意识形态上区分不明显，党内既有自由派的共和党人，也有保守派的民主党人，双方在政策立场上存在较大重叠。“党派分化”似乎加剧了意识形态极化。然而，这种描述是否准确，取决于其成因。如果将党派认同更恰当地理解为一种社会身份，而非意识形态立场，那么它可能更多地助长了情感极化（affective polarization）——至少在普通公众中是如此。接下来，我们将探讨这一观点。

2.3.2 社会与地理分层

随着党派认同与意识形态认同日益趋于一致，其他显著的社会身份——如种族、性别、年龄、族裔、宗教和阶级——也逐渐与党派认同趋同。这一现象被称为“社会分群”（social sorting），指的是个体的社会身份日益与某一党派身份相一致的过程。⁵⁷ 因此，同一党派成员在社会和人口统计特征上变得更加相似。例如，民主党日益成为女性、非白人、无神论者、专业人士和城市居民的政党，而共和党则在比例上更多地由年长的白人男性、福音派基督徒和农村居民构成。这种社会身份的趋同将政治取向转变为梅森（Mason）所称的“超级身份”（mega-identity），使得对立党派成员彼此之间不仅不同，甚至难以相互理解。由于党派归属常常发挥着超级身份的作用，“如今，一次投票不仅能表明一个人的党派偏好，还能揭示其宗教信仰、种族、族裔、性别、居住社区乃至最常光顾的杂货店。”⁵⁸

社会分类有助于解释为何政治认同日益被视为个人身份的核心要素，这一转变也加剧了情感极化。⁵⁹ 个体与外

群体的区分越强烈，他们对外群体表现出的容忍度就越低。⁶⁰ 当党派归属与其他重要、显著且具有意义的社会分界线相重合时，对立群体之间的身份重叠就会减少。因此，他们更有可能彼此厌恶和不信任。正因如此，人们越来越倾向于通过基于身份的框架来看待党派归属和政治冲突。⁶¹

社会分群也助长了地理分群。地理分群是指人们居住在主要由持相同政治观点者构成的地区。社会身份促使个体寻求与志同道合者组成的社区，而这些环境反过来又强化了他们的社会身份。这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社会分群与地理分群彼此加深、相互固化。此外，地理分群还会导致比尔·毕晓普（Bill Bishop）所称的“意识形态近亲繁殖”（ideological inbreeding），即“我们不了解、无法理解，甚至几乎无法想象那些仅几英里之外的‘那些人’。”这种政治上的聚类现象加剧了对外群体的偏见。我们越来越缺乏处理理性冲突的经验，因而对“对立阵营”感到威胁并产生愤怒情绪。

2.4 群体的内部动态

让我们回到群体极化现象（见第1.3节）。是什么原因导致观点相似的群体朝着同一方向极化？对此有两种常见的解释，我们将在下文讨论。

信息理论认为，群体成员会接触到一个支持群体主导立场的证据与论点池。⁶⁵ 当群体讨论这些支持性理由时，成员对该群体立场的信念会变得更加坚定。相比之下，社会比较理论则指出，个体会将自己的信念和行为与群体中其他成员进行比较，并采取比群体平均水平略为极端的立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与众不同被视为一种优势。人们力求在总体上与群体其他成员相似，但同时又希望“令人向往地与众不同”。⁶⁶ 正如我们在第3节中进一步阐述的那样，这两种理论对群体极化的认识论地位提出了截然不同的判断。

根据罗伯特·塔利斯（Robert Talisse）的观点，信息理论和社会比较理论都存在局限性。⁶⁷ 如果信息理论是准确的，那么我们只会发现在群体内部交换信息的情况下出现极化现

象。然而，志同道合的群体有时即使在没有新证据和新论点的情况下也会发生极化。社会比较理论也面临类似的解释困境：它无法解释为何即使群体成员之间没有任何互动，群体仍会出现极化。正如塔利斯所指出的：

当一个人被引导认为，她所认同的群体广泛持有她所支持的观点时，极化就可能简单地发生。她无需听到任何支持该观点的理由，也无需身处该群体其他成员之中以进行自我比较。仅凭一种粗略的印象——即相关人群所肯定的内容大致与她所肯定的内容一致——就足以导致其信念内容发生极端化偏移。68

这一观察促使塔利斯（Talissee）追随桑斯坦（Sunstein），采纳了群体极化的佐证理论（corroboration theory）。

确证理论认为，信心与他人的确证之间存在紧密联系。简言之，赞同你观点的人越多，你对该观点的信心就越强。正如桑斯坦（Sunstein）所言：“在各种广泛的实验情境中，人们的意

见已被证明会仅仅因为其观点得到他人确证而变得更加极端。”⁶⁹ 以这种方式更新信念，在认识论上可以说是合理的。如果你得知那些看似见多识广的同伴与你想法相似，这理应增强你对自己判断的信心。⁷⁰ 这正是同行分歧文献中一个常见观点的镜像：该观点认为，得知同行持不同意见应降低你的信心；依循同样的逻辑，得知他们与你意见一致则应提升你的信心。

然而，佐证理论（corroboration theory）自身也存在局限性。尽管它很容易解释个体为何会对自己原有信念变得更加自信（即我们所说的“激进主义”），却难以解释为何有人会采纳一种更为极端的信念内容（即我们所说的“极端主义”）。假设我认为堕胎在大多数情况下应属合法，但在某些情况下应加以限制。随后，我看到数据显示，像我这样的自由派人士普遍支持这一政策。这种佐证可以轻松解释为何我会（并且理应）对自己的初始观点更加确信，却无法直接解释我为何会转向一种更极端的立场，例如主张堕胎在所有情况下都应合法化。

事实上，我的初始观点——即堕胎在大多数情况下应合法，但在某些情况下应受限——已得到众多志同道合的自由派人士广泛佐证，这一事实甚至可能为我提供了额外的理由，不去采纳那种更极端的立场。

其次，确证理论（corroboration theory）似乎只是信息理论（information theory）的一种版本。如前所述，确证本身为个体提供了支持其观点的证据。当我们得知他人在某个问题上与我们意见一致时，我们有合理的理由增强自己的信心。举例来说，假设你我一起外出用餐，并约定平摊账单。我在心里计算后得出结论：我们每人应付43美元。如果你独立地核对了计算，并得出了相同的结论，那么我更有理由对自己的计算结果增加信心。⁷¹ 我们的一致具有证据价值。同样，如果我得知许多同胞公民在某个政治议题上与我持有相同的信念，那么我更有理由对自己的观点增强信心。但这恰恰只是信息理论的一种表现形式：当我得知他人与我意见一致时，我便获得了支持自己初始信念的新证据。

塔利斯试图通过区分“确证”（confirmation）与“佐证”（corroboration）来规避这一问题。按照他的用法，“确证”具有证据价值，而“佐证”则没有。当一种信念得到佐证时，“所发生的不过是该信念获得了额外的肯定。”⁷² 然而，支持佐证理论的研究并未排除额外确证所具有的证据价值。因此，就我们目前所知，并无证据支持“佐证”优于“确证”。

3 极化是理性的吗？

人们通常认为极化是非理性的。但事实上，它是否可能是认识论上理性的呢？换言之，它是否可能是按照良好推理和基于证据的思维之规范与原则来处理信息所产生的结果？这一问题至关重要，因为诊断决定治疗方案。如果极化源于认知缺陷，那么适当的补救措施就应包括教育公民如何进行良好推理、培养认识论美德以及纠正偏见。正如曼努埃尔·阿尔马格罗

（Manuel Almagro）所指出的：“如果有人认为极化是我们非理性的结果，那么他可能会认为，一种有效的

去极化干预措施就是对人们进行认识论美德的教育。”⁷³ 相反，如果极化在个体层面上是认识论理性的，那么上述干预措施可能就是误入歧途。我们应将资源转向制度性和结构性的变革，例如改变信息环境以及重构信任关系。

在探讨极化的合理性时，我们将特别聚焦于群体极化与信念极化。这是近期大量文献所关注的重点，而且理由充分：这两种形式显然是最容易从认识论角度加以评估的，因为它们涉及个体的信念。尽管两者都会导致立场变得更加极端，但其背后的机制却有所不同。回想一下，群体极化源于与志同道合者之间的讨论，而信念极化则通过个体对证据的评估而产生。然而，在我们能够评估这两种极化的认识论地位之前，首先必须澄清认识论合理性与真理之间的关系。

3.1 理性与真理

人们很容易认为，随着我们转向更为极端的观点，我们便离真相越来越远。“真相位于中间”之类的陈词滥调

表达了一种常识性的看法，即更极端的观点很可能是错误的。然而，真相有时恰恰位于极端之处。正如桑斯坦（Sunstein）所指出的：

两极分化并不一定意味着已经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也许更极端的倾向反而更好。回想一下，群体极化很可能推动了废奴运动以及许多其他广受认可的运动……“极端主义”一词未必带有贬义；一切取决于极端主义者所倡导的是什么。74

因此，当我们持有更极端的观点时，这并不必然意味着我们更可能出错。一个信念是否为真，与它是否得到证成或是否合理，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问题。正如我们可能拥有真实但未经证成的信念一样，我们也可能拥有错误却合理的信念。

一种自然的想法是，极化会导致个体采纳那些缺乏正当理由或非理性的观点，即使他们的观点碰巧是正确的。事实上，社会心理学中的主流观点通常被认为就是：信念极化和群体极化在认识论上都是非理性的。75

3.2 群体极化可以是理性的吗？

群体极化是否理性，取决于其背后的解释。在第2.4节中，我们探讨了两种主要的解释：信息理论和社会比较理论。前者认为群体极化源于讨论者获得了新信息，而后者则认为它源于人们希望脱颖而出的愿望。不出所料，这两种解释对群体极化是否理性得出了相互矛盾的结论。

如果信息理论是正确的，那么群体极化在认识论上往往是理性的。根据这一观点，群体成员之所以发生极化，是因为他们接触到了支持其原有立场的新证据和论点，而没有接触到任何新的反面考量。换句话说，他们获得了支持自己观点的新的—阶证据，这在理性上强化了他们的信心。此外，正如确证理论所补充的那样，群体的一致意见会确证他们共同持有的观点。当个体了解到许多其他人也持有相同观点时，这种一致性本身就构成了支持该观点的新证据。理性行动者会根据自己的证据进行信念更新。根据信息理论，群体讨论确实为参与者提供了新的证据。因此，当群体极化

是基于对新信息的回应时，它是合理的。

相比之下，社会比较理论认为，群体极化是由个体希望在同伴中获得积极评价的欲望所驱动的。如果这一解释是正确的，那么群体极化所涉及的信念调整就几乎（如果有的话）与真理或证据等认识论考量无关。因此，这种极化在认识论上是非理性的。要实现认识论上的理性，一个人的观点必须对认识论考量（而非出于自利或声誉的考量）作出回应。话虽如此，只要极化有助于个体实现社会接纳和声望的目标，那么这种极化在工具理性上可能是合理的。⁷⁶

正如我们之前所指出的，即使某种版本的信息理论是正确的，它也无法从理性上为所有群体极化的实例提供辩护。首先，信息理论未能对在缺乏新信息的情况下群体为何仍会极化提供一种合理化的解释。其次，佐证理论至多只能解释激进主义的合理性，而无法解释极端主义。换句话说，它可以解释人们为何会增强对自己信念的信心，却无法解释他们为何会采纳更为极端的观点。

这些局限可以通过联合两种理论来超越：信息理论和确证理论各自能够解释对方无法解释的现象。前者可以解释极端主义的合理性，而这正是后者难以处理的问题。信息理论可以主张，人们接收到了支持更极端立场的新考量。与此同时，确证理论则可以在个体未获得新信息的情况下，解释激进主义的合理性。这种观点的结合并非特设性的。正如我们所见，确证理论或许最好被理解为信息理论的一种版本。

然而，这种组合并未解释的是：在缺乏新信息的情况下，采纳更为极端的观点如何在认识论上是理性的。这是否构成一个重大关切？或许并非如此。首先，我们并不清楚是否希望为这类情形的理性性进行辩护——在没有新信息的情况下，采纳更极端的观点如何可能是理性的？其次，这类情形究竟有多普遍也尚不确定。不幸的是，关于群体极化的研究往往未能仔细区分激进主义（radicalism）与极端主义（extremism）的案例。相反，这些研究通常仅报告人们持有了更积极或更消极的观点，或更愿意采

取极端行动，却未阐明这些转变的本质。⁷⁷ 因此，区分极端主义与激进主义对于未来实证研究的设计至关重要：我们能否准确诊断并应对群体极化，取决于能否对信念转变进行精确分类。如果许多群体极化案例涉及在缺乏新信息的情况下走向极端主义，那么这一现象通常是不理性的。

3.3 信念极化可以是理性的吗？

我们现在转向探讨信念极化是否具有理性。乍看之下，很容易得出否定的答案。信念极化涉及对新证据的选择性审视：我们轻易接受支持自身观点的信息，却对挑战我们观点的证据持高度批判态度。如果两个人面对完全相同的证据，得出的观点不仅彼此不同，而且进一步强化了各自先前的信念，那么他们很可能是在以一种带有偏见的方式进行推理。毕竟，如果他们是客观地、纯粹以追求真理为目标进行推理，又怎会最终都得出与自己原有信念一致的结论呢？正如第五章所讨论的，人们出于诸多社会和心理原因而坚持政治信念，这些原因与其信念的真实性无关。因此，信念极化

似乎源于带有偏见的证据评估，或者更广义地说，源于动机性推理——这两者都是典型的认知非理性表现。⁷⁸

然而，在匆忙得出负面结论之前，我们应保持谨慎。尽管社会心理学家常常否认信念极化的合理性，但该领域的早期先驱者却对其批评有所节制。要理解其中缘由，不妨设想一下：你面前摆着两项据称是科学的研究，一项声称占星术能可靠地预测未来，另一项则支持疾病的细菌理论。如果你是一名科学家，你很可能对前者进行更严格的审视，而轻易接受后者。这种做法完全合理：将我们有限的认知资源更多地用于那些令人意外或与既有认知相悖的发现，而非那些已被广泛接受或司空见惯的结论，是合乎情理的。⁷⁹ 换言之，将注意力集中在我们认为错误的观点上，实际上是一种节约稀缺认知资源的方式。正如偏见研究领域的先驱之一托马斯·吉洛维奇（Thomas Gilovich）三十多年前所指出的那样：

我们在评估那些证实或反驳我们先入之见的信息时，究竟应该保持多大程度的公正，这一问题远

比大多数人所意识到的更为微妙和复杂。这个问题之所以复杂，还在于如果一个人在生活中对所有事实一视同仁，并在每次遇到与自己观点相悖的事实时都重新审视自己的信念，这种做法同样是不恰当且错误的。如果某个信念已经得到了一生经验的支持，那么对该信念提出质疑的某次观察或报告持怀疑态度，同时欣然接受支持该信念有效性的证据，完全是合情合理的。80

其他心理学家甚至更早就提出了同样的观点：

人们愿意推断：支持自己基于理论的预期的研究，比与自己预期相矛盾的研究更具证明力或方法论上更优越，对此实际上并无真正的争议。当某种“客观真理”已知或被强烈假定时，那些结果反映该真理的研究，理应比那些结果未能反映该真理的研究获得更高的可信度。81

因此，尽管“对新信息采取如此不平等的对待方式，在大多数人看来完全是

毫无道理且可能有害的”，但对不同观点采用更高的标准仍可能是完全理性的。⁸² 选择性审视本身并非问题所在。正如许多人所指出的，即使在完全遵循贝叶斯推理的理性个体中，信念极化现象仍可能发生，尤其是在证据模棱两可或可作多种解释的情况下。⁸³

那么，问题就在于：在许多现实情境中，信念极化是否具有合理性。正如吉洛维奇（Gilovich）提醒我们的那样：“一旦我们认可了对新信息采取不均衡处理方式的正当性……我们就会担心这种做法被推向极端。”⁸⁴ 虽然某种程度的选择性审视是合理的，但对证据完全无动于衷则不然。通常而言，对反面证据完全抗拒、彻底拒绝改变自己的想法，是不理性的。遗憾的是，许多人恰恰陷入这种境地，声称无论什么情况都无法改变他们的想法。⁸⁵ 他们冒着使自己的信念变得不可纠正的风险——无论出现多少新证据，都无法动摇这些信念。⁸⁶

初始信念的合理性地位同样重要。科学信念通常基于专家共识以及对证据（相对）无偏的评估，而政治信念则

常常在存在广泛分歧的情况下，仍以偏见且自信的方式形成。因此，洛德（Lord）、莱珀（Lepper）和罗斯（Ross）指出，他们研究参与者的问题在于“他们乐于使用那些已经以带有偏见的方式处理过的证据，来强化最初‘正当化’了这种处理偏见的理论或信念。”⁸⁷ 输入不良，输出亦劣。

最后，有必要强调那些声称信念极化与贝叶斯推理相容的论点所存在的局限性。（粗略而言，贝叶斯主义是一种在不确定性条件下进行推理的方法，它要求人们根据先验信息和新证据来更新自己的信念。）这些论点表明，在某些情况下，信念极化与某些基于新证据的概率性更新规则是相容的。然而，它们并未证明我们在政治领域观察到的大多数信念极化现象，最好被解释为人们以这种方式更新信念的结果。然而，令人担忧的是，学者们常常从一个理论主张——即完美的贝叶斯推理者可能会出现极化——直接跳转到一个经验主张——即那些表现出极化的人类行为是理性的。

首先，正如许多人所指出的，大多数人类并不擅长贝叶斯推理。⁸⁸ 其次，

即使他们擅长，这也并不意味着贝叶斯更新（而非例如一厢情愿的思维或方向性偏见）能够解释个体层面的极化现象。第三，这种推理方式远不足以确立一个关于信念极化大多数实例成因的普遍性主张。第四，一些研究表明，尽管个体可能以大致符合贝叶斯方式更新其政治信念，但他们仍倾向于偏向自己原有的信念。此外，这类学习通常导致观点趋同，而非极化，因此无法充分解释政治极化现象。⁸⁹

那么，结论如何？信念极化是非理性的吗？在这一点上，我们认为真相确实处于中间地带。与其他人一样，我们认同在某些条件下，无论是信念极化还是群体极化都可能是理性的。⁹⁰ 这些条件出现的频率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经验性问题。无论如何，我们认为，同时针对个体的理性能力与结构性环境的解决方案值得探索。我们既可以努力改变人们的选择，也可以改变他们做出选择的方式。

4 聚类信念的认识论地位

还存在另一种被称为“聚类”（clustering）的极化形式，值得进行认识论上的评估。聚类是指人们在原本不相关议题上的信念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得日益相关。⁹¹ 这种极化形式与意识形态极化密切相关；后者指的是政党内部信念的一致性增强，而政党之间的共同点却减少。然而，我们所关注的这些信念并不明显构成任何特定的意识形态（即它们并非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等意识形态的部分构成要素）。事实上，这些“聚类”的议题在逻辑上似乎并无关联。

举例来说，请考虑以下命题：

- 堕胎：在大多数情况下，堕胎在道德上是错误的。
- 气候：对碳排放征税以减缓全球变暖是个好主意。
- 移民：非法移民进入美国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 工资：美国联邦最低工资应从当前水平提高。

- 枪支：美国政府应加强对枪支拥有的管控。
- 平权行动：在大学招生中给予少数族裔优待是合理的。
- 执法：非裔美国人受到警方的不公平针对。
- 法规：美国企业面临的法规太多了。92

在美国，你往往可以根据某人对其中任意一个问题的看法，预测其对许多其他问题的立场。例如，支持枪支管制的人更有可能支持福利项目、堕胎权、平权行动、对碳排放征税以及提高联邦最低工资。皮尤研究中心发现了引人注目的证据：70%的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在七个重大议题（气候变化政策、移民、海外军事干预、医疗保健、经济、堕胎和枪支管制）中，至少在五个议题上与本党立场一致；而双方约有40%的人在全部七个议题上都与本党立场一致。简言之，美国存在两种明显的意见集群，且这些集群与党派立场日益趋于一致。

群体聚集对党派人士构成了认识论上的挑战。⁹⁴ 假设亚历克斯是一名民主党人，在一系列议题上都遵循本党的

立场。他赞同“气候”、“工资”、“枪支”、“平权行动”和“治安”等议题，却反对“堕胎”、“移民”和“监管”。他的共和党对手马克斯则持完全相反的观点，恰恰支持亚历克斯所反对的那些立场。这就引发了一个认识论上的警示信号。在亚历克斯看来，马克斯不仅犯了错误，而且是**反可靠的**

(anti-reliable)：他在这些问题上系统性地得出错误答案。然而，这种“反可靠性”的指控需要某种解释：马克斯为何如此脱离真相？我们也可以向马克斯提出类似的问题：亚历克斯为何如此容易犯错？如果任何一个特定议题只有两种选择（即支持或反对），那么即便纯粹靠随机猜测，正确答案的概率也应约为一半。那么，为何对立党派的成员会一贯地出错呢？

在最近一篇关于这一主题的文章中，赫里希克什·乔希（Hrishikesh Joshi）向党派人士提出了这一解释性挑战，问道：

但究竟什么样的信念形成方法会导致一个群体在一组彼此正交的问题上持续犯错呢？……我想指

出，一种在心理上现实可行的信念形成方法，不太可能在这样一组彼此正交的问题上可靠地追踪错误。95

如果这一论点成立，那么持有聚类信念的党派人士便拥有高阶证据（即关于其推理可靠性的证据），表明他们的一些政治信念是错误的。基于此，乔希主张，党派人士应当降低对这些信念的确信程度。

至少有两种方式可以回应乔希

（Joshi）的挑战。第一种是主张这些问题实际上并非真正正交。例如，有人可能会指出，共和党人倾向于关注小政府，这解释了他们为何支持“监管”和“枪支管控”之类的主张，却反对“气候”议题。然而，这无法解释他们在“堕胎”或“移民”问题上的政策立场。同样，有人可能会认为，民主党人希望帮助最需要帮助的人群，这解释了他们为何支持“工资”和“平权行动”。然而，乔希认为，这些立场实际上也是正交的。

第二种策略是卸下解释负担，即说明为何对方是反可靠的。也许某一方更

为不宽容、带有偏见、自私、缺乏智慧，或不信任专家。然而，正如乔希（Joshi）所指出的，这些解释要么在经验上存在争议，要么未能卸下解释负担。因此，要为信念聚类的证成合理性（epistemic rationality）提供辩护，尚需进一步的研究。

我们认为，乔希的论点对当代党派人士提出了一个严肃的认识论挑战。该论点表明，对成簇的信念抱持高度确信是非理性的。基于此，乔希主张，党派人士在理性上应当降低对自己政治观点的确信程度。

当我们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产生分歧的议题往往彼此聚集在一起——这一挑战就显得更加重要了。正如第四章所讨论的，这种聚集现象通常被视为一种证据，表明那些在某个问题上与我们意见相左的人，很可能在许多其他问题上也犯了错误。然而，同样的模式也可能产生相反的效果。我们自身政治信念的聚集性，或许恰恰证明了我们自己的某些信念是错误的。与其贬低对手的认识论地位（即认为他们更加无知），我们或许

应当将自身信念的聚集性视为质疑自身观点的理由。

5 极化的危害

当我们担忧极化时，我们究竟在担忧什么？某些类型的极化是否比其他类型更具危害性？在此，我们将概述极化的五种令人担忧的后果：

1. 它使人变得不那么宽容，也更不愿意尊重他人。96
2. 它增加了政治暴力发生的可能性。97
3. 它导致僵局，并阻碍有效的政策制定。98
4. 它侵蚀了政治和社会信任。99
5. 它使民主面临风险。100

我们将在下文简要回顾上述每一项主张，说明极化如何解释其他有问题的政治现象。尽管这份危害清单并不全面，但它表明情感极化是最令人担忧的一种极化类型。

5.1 不耐受

当群体身份融合成一种“超级身份”

(mega-identity) 时，人们会变得格外不容忍且带有偏见，常常对群体外成员持负面看法。¹⁰¹群体之间的差异显得更加鲜明，从而加剧了竞争感和威胁感，并强化了“我们对抗他们”的心态。这种程度的敌意助长了政治上的不容忍，因为党派人士越来越不愿意将公民自由和权利延伸至与自己意见相左的群体或个人。¹⁰²此外，这种敌意使我们对“对方阵营”产生负面刻板印象，进而引发厌恶、恐惧和不信任。我们甚至可能将政治对手非人化，认为政治光谱另一端的人不值得尊重或考虑。¹⁰³令人担忧的是，有20%的美国人表示，对方阵营中的许多人“缺乏被视为完整人类所必需的特质”。¹⁰⁴

5.2 暴力

随着我们对与自己不同之人的不容忍情绪日益加剧，这种情绪可能导致针对他们的暴力行为的容忍。恶毒的言辞可能演变为残忍的行动。例如，

2021年1月6日，抗议活动导致四人死亡，数十人受伤，最终演变为叛乱分子对美国国会大厦的袭击。在前一年，民兵组织成员曾密谋绑架密歇根州州长。此外，还发生了多起个人因意识形态对立而枪杀抗议者的致命事件。¹⁰⁵ 仇恨言论、骚扰和欺凌行为的增加，尤其是在网络空间中的此类现象，也可能归因于情感极化。¹⁰⁶

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23%的受访者赞成在选举失利后采取暴力手段，而40%的受访者认为在某些情况下，报复性暴力是正当的。¹⁰⁷ Oluf Gøtzsche-Astrup 的研究表明，积极的党派认同能够预测对暴力政治意图的支持。¹⁰⁸ Kalmoe 和 Mason 指出，多达一半的美国人对伤害政治对手持正面态度，其中甚至有十分之一的人可能明确表示支持。¹⁰⁹ 同样，Steven Webster 发现，负面党派认同与对对立政党候选人的愤怒和敌意增强相关。¹¹⁰

5.3 僵局

两极分化可能使政治人物更不愿意携手合作以寻求共识，或制定有利于整个社会的政策。当立法者将意识形态的纯粹性置于务实解决方案之上时，妥协就变得愈发遥不可及，我们也就无法为公共利益立法。事实上，麦卡蒂（McCarty）及其合作者发现，在美国分裂的立法机构中，通过的法案更少。¹¹¹ 这导致选民日益感到幻灭，因为他们目睹了领导人无法协同合作。根据最近的一项民调，53%的美国人认为政治体制过于分裂，无法解决国家面临的问题。¹¹² 然而，公众的态度本身可能也会影响民选官员是否愿意寻求妥协。如果某些证据表明选民并不希望其代表做出妥协，那么政党领袖可能会采取毫不妥协的立场，以避免遭到支持者的反弹。¹¹³ 换言之，大众层面的两极分化可能加剧精英层面的政治僵局。

5.4 不信任

极化还可能削弱社会信任和政治信任。社会信任指的是对同胞公民的信

任，而政治信任则涉及对政府、民主制度以及民选官员的信任。¹¹⁴ 许多学者认为，这些信任赤字源于不同形式的极化。例如，情感极化可能导致社会信任的降低，¹¹⁵ 而精英极化则会因导致政治僵局而削弱政治信任。¹¹⁶

在高度两极分化的社会中，尤其是在美国，社会信任和政治信任已显著下降。20世纪70年代初，约有一半的美国人表示“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而今天，持这一观点的人已不足三分之一。¹¹⁷ 2017年，约70%的共和党人表示，他们不信任任何投票支持希拉里·克林顿竞选总统的人；同样，大约70%的民主党人也表示，他们不信任那些投票支持唐纳德·特朗普的人。¹¹⁸ 人们对政府也缺乏信任。截至2019年，只有17%的美国人表示他们“始终”或“大多数时候”信任联邦政府，而这一比例在20世纪60年代曾高达70%。¹¹⁹ 如今，只有十分之四的美国人表示，他们至少在某些时候相信联邦政府会做正确的事。¹²⁰ 总体而言，有大量证据表明，两极分化削弱了社会和政治信任。我们将在下一章再次探讨信任的下降及其后果。

5.5 民主倒退

极化的累积效应可能导致民主倒退或民主规范的侵蚀。如果我们认为政治对手不可信且具有威胁性，就可能倾向于忽视基本的民主规范。这些规范包括文明礼貌、妥协精神、对程序的信任以及问责制——而这一切都是为了赢得选举。

有证据支持这一担忧。在一项涵盖土耳其、委内瑞拉和美国等多个国家的研究中，米兰·斯沃利克（Milan Svolik）发现，当党派利益足够紧迫时，选民愿意牺牲民主原则以推进这些利益。¹²¹此外，当选民的主要目标是击败对立政党时，他们就更不愿意追究自己所支持政党的责任。受对对手的负面情绪驱使，选民可能会容忍本党“无能、不诚实和不道德的行为”。¹²²令人担忧的是，这种对冷酷无情的容忍可能为威权主义开辟道路。¹²³正如斯沃利克所警告的那样：“当惩罚一位领导人的威权倾向意味着必须投票支持其支持者所憎恶的纲领、政党或个人时，许多人会认为这一代价过高而无法承受。”¹²⁴

总之，极化已被认为与民主制度的许多当代弊病相关。这些弊病包括不宽容、政治暴力、政治僵局、不信任以及民主倒退。¹²⁵ 然而，必须强调的是，这些危害中的许多很可能根源于情感极化（affective polarization）。问题并不仅仅在于人们坚定地持有截然对立的观点；而在于他们的分歧导致他们对持相反观点者产生恐惧、憎恶甚至妖魔化。因此，极化会侵蚀尊重、合作与妥协等基本原则，而这些原则对于一个健康且有效运作的民主制度至关重要。

6 极化真的是问题所在吗？

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丹尼尔·克赖斯（Daniel Kreiss）和香农·C·麦格雷戈（Shannon C. McGregor）认为，极化本身未必对民主有害。¹²⁶ 事实上，它可能是追求真正民主平等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结果。他们指出，极化源于不同群体为争取政治与社会正义而展

开的斗争，而冲突往往是推动必要变革过程中产生的副产品。

以同性恋权利运动为例。倡导者不得不进行抗议和抗争，这不可避免地引发了那些抵制变革之人的反弹。然而，这种反弹本身并非核心问题。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社会未能承认公民权利，并剥夺了某些群体在法律下获得平等保护的权力。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运动亦是如此。根本问题并非两极分化，而是系统性种族主义，以及持续未能向所有公民提供平等保护。

克赖斯（Kreiss）和麦格雷戈（McGregor）批评了一些学者，这些学者将极化本身视为问题所在，而真正的问题其实是其深层原因。要理解极化，我们必须将其置于一个更广泛的框架中，考察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正如他们所写道：

当我们有群体在为平等而抗议，并对警察等主导性机构构成威胁时，我们真正应该关注的是这些群体本身处于严重的不平等状态，而不一定是因为那些推动平

等的群体引发了两极分化，或导致其他人对它们产生反弹。127

为了进一步阐明他们的观点，克赖斯（Kreiss）和麦格雷戈（McGregor）提到了2021年1月6日美国国会大厦遭袭事件。尽管这一事件可能是极化现象的一种表现，但真正的问题并非极化本身，而是反民主的极端分子试图在一场合法且安全的选举之后，破坏权力的和平交接。

根据克赖斯（Kreiss）和麦格雷戈（McGregor）的观点，“极化”这一框架过于政治中立。人们很容易说：“我们所有人都过于极化了”，但这种观点将责任归咎于极化本身，而非直面其中涉及的政治议题。真正的问题并非我们在枪支管控、气候变化或种族正义等问题上存在分歧，而在于美国频发的大规模枪击事件、政客对科学证据的否认，以及某些少数群体持续遭受系统性剥夺法律平等保护的现实。聚焦于极化，会使我们回避这些关键问题。对极化的担忧，可能演变为一种讨论政治的方式，却无须直面这些冲突的根本原因。128

7摘要

在本章中，我们探讨了政治极化的本质、成因、后果及其合理性地位。极化是一种复杂且多层面的现象，受到社会、地理和技术变革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认识并理解极化的这些不同维度，对于应对它对民主治理和社会凝聚力所构成的挑战至关重要。由于不同形式的极化往往相互强化并加剧彼此，因此应对极化需要采取一种多管齐下的方法，这种方法必须切合实际地考虑政治激励结构和我们的心理机制。唯有理解极化的根源及其后果，我们才能构想出一条重建更具凝聚力社会的道路。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政治极化也可能为民主带来某些益处。首先，在极化的环境中，政党或意识形态之间的区别往往更加清晰、连贯。这种清晰度使选民能够做出更明智的决定，因为他们能更清楚地了解候选人和政党在关键议题上的立场。¹²⁹ 其次，极化可以推动更高的政治参与度。当政治分歧更加明显时，选民可能会感受到更强烈的紧迫感，从而积极参与选

举，并支持与自己观点一致的候选人。第三，正如桑斯坦（Sunstein）所指出的，极化在历史上曾推动了重要的社会运动，例如民权运动和环保主义。¹³⁰ 尽管围绕极化的讨论大多强调其负面影响，但必须指出的是，某些形式的极化也可能对民主参与和社会进步产生积极影响。

在下一章中，我们将探讨极化的一个令人担忧的后果：信任的下降。现代民主国家的特点是，人们对政治领导人、同胞公民乃至科学专家的信任都在减弱。这种不信任的氛围影响了民主的健康，包括我们应对集体挑战的能力。在阐明了极化、分歧和不信任等问题之后，最后一章将探讨当代民主可能的补救措施与改革方案。

注释

1. Skelley 和 Fuong, 2022 年。
2. Boxel 等, 2022; Carothers 和 O'Donohue, 2019。
3. DiMaggio 等, 1996 年。

4. McCarty 2019; McCarty 等, 2016。
5. Iyengar 等, 2012; Mason, 2018。
6. 皮尤研究中心 2014 年。
7. 皮尤研究中心 2014 年。
8. Converse 1964。
9. Kinder 和 Kalmoe, 2017 年。
10. Fiorina 等, 2008 年。
11. Abramowitz 和 Saunders, 2008 年。
12. Mason 2015: 130。
13. Iyengar 2021; Iyengar 等, 2012。
14. 皮尤研究中心 2016 年。
15. Garrett 等, 2014。
16. Iyengar 等, 2012 年。
17. Abramowitz 和 Webster, 2018; Iyengar, 2021。
18. 皮尤研究中心 2014 年。
19. Rogowski 和 Sutherland, 2016 年。
20. Myers 和 Lamm 1976; Sunstein 2000, 2002。
21. Sunstein 2017: 74–75; Talisse 2019: 107。

22. Almagro2023。
23. Ditto 和 Lopez, 1992; Redlawsk, 2002; Taber 和 Lodge, 2006。
24. Lord 等, 1979 年。
25. Klepper2023。
26. Levendusky 2013; Prior 2013。
27. Prior2007。
28. Iyengar 和 Hahn 2009。
29. Levendusky2013。
30. Sunstein 2009。
31. Abramowitz 和 Webster 2018: 127。
32. Druckman 等, 2022: 1108。
33. Lord 等, 1979 年。
34. 桑斯坦2017: 76–77。
35. Klein2020: 159。
36. Messing 和 Westwood, 2014 年。
37. Prior2013: 119。
38. Ross Arguedas 等, 2022 年。
39. Messing 和 Westwood, 2014 年。
40. Nguyen2020a。

41. Boxel 等, 2017;
Zhuravskaya 等, 2020。
42. Nordbrandt2021。
43. Yarchi 等, 2021 年。
44. Allcott 等, 2020。
45. Barberá 等, 2015 年。
46. Prior2013。
47. Arceneaux 和 Johnson,
2013 年。
48. Levendusky2013。
49. Abramowitz 和 Saunders,
2008 年。
50. Merkley 和 Stecula 2018。
51. Green 等, 2020。
52. McCoy2019: 2。
53. 克莱因2020年: 第xix页。
54. Campbell 2018; Leven-
dusky 2013。
55. Barber 和 McCarty 2015:
22。
56. Levendusky2009。
57. Mason2016。
58. Mason2018: 14。
59. Bishop 2008; Iyengar 和
Krupenkin 2018; Mason
2018。

60. Levendusky 2009; Roccas 和 Brewer 2002。
61. Achen 和 Bartels 2016; Green 等 2002; Huddy 等 2015; Mason 2018。
62. Bishop 2008: 40。
63. Bishop 2008: 40。
64. Mutz 2006。
65. 伯恩斯坦与维诺库尔, 1977 年。
66. 兰曼与迈尔斯, 1978年: 第 185页。
67. 塔利斯 2019: 111–113。
68. 塔利斯 2019: 113。
69. Sunstein 2019: 87。
70. Begby 2022: 8。
71. Christensen 2007: 193。
72. Talisse 2019: 113。
73. Almagro 2023: 309。
74. Sunstein 2000: 108。
75. Jernett 等, 2014; Singer 等, 2018。
76. 参见第5章关于工具理性与认知理性的讨论。
77. 塔利斯 2019: 101–105。
78. Lord 等, 1979; Taber 和 Lodge, 2006。

79. Begby 2022; Kelly 2008。
80. 吉洛维奇1993年： 50–51页。
81. Lord 等， 1979： 2106。
82. Gilovich1993： 50。
83. Dorst 2023; Jern 等，
2014; Kelly 2008。
84. Gilovich1993： 51。
85. Fantl2018： 128。
86. Lord 等， 1979： 2107。
87. Lord 等， 1979 年。
88. 参见Williams 2023的引文。
89. Hill2017。
90. Broncano-Berrocal 和 Carter
2021： 40。
91. Dellsén 2024。
92. Joshi2020。
93. Huemer 2016; Joshi 2020;
皮尤研究中心 2014。
94. Joshi2020。
95. Joshi2020： 41。
96. McCoy 等， 2018 年。
97. Kalmoe和Mason， 2022年。
98. 辛诺特-阿姆斯特朗2018：
21; 塔利斯2019。
99. Vallier2020。

100. Carothers 和 O'Donohue, 2019; McCoy 和 Somer, 2019。
101. Roccasand Brewer 2002。
102. 克劳福德和皮兰斯基2014年：841页。
103. Martherus 等，2021 年。
104. Kalmoe 和 Mason, 2019 年。
105. Flesher 和 White 2023; Pietsch 和 de León 2020。
106. Berntzen 等，2023 年。
107. Watch2020。
108. Gøtzsche-Astrup 2021。
109. Kalmoe 和 Mason 2019；但参见 Westwood 等人 2022 年的批评。
110. 韦伯斯特2018年。
111. McCarty 等，2016 年。
112. Epstein2022。
113. Gutmann 和 Thompson 2014。
114. Vallier2020： 6。
115. Torcaland Thomson 2023。
116. Uslaner2015。
117. Vallier2020： 1。
118. Vallier2020： 1。

119. Vallier2020: 1.
120. Hitlin 和 Shutava, 2022 年。
121. Svolik2019。
122. 艾扬格和克鲁彭金2018:
215。
123. McCoy 等, 2018; Vallier,
2020。
124. Svolik2019: 24。
125. Kalmoe 和 Mason 2019;
McCoy 和 Somer 2019;
Svolik 2019。
126. 克赖斯桑德·麦格雷戈2023
年。
127. Rosenberg2023。
128. Rosenberg2023。
129. 麦卡蒂2019年: 19–20页。
130. Sunstein2000。

更多资源

- 艾扬格尔, 尚托 (2021) 。
《美国政治的极化》。载于
《劳特利奇政治认识论手
册》, 迈克尔·汉农与耶罗恩·德
里德主编。伦敦: 劳特利奇出
版社, 第90–100页。

- 乔希，赫里希克什（2020）。
《你对所有事情都正确的可能性有多大？——对现代党派主义的一个认识论挑战》。《政治、哲学与经济学》第19卷第1期，第36-61页。
- 凯利，托马斯（2008）。《分歧、教条主义与信念极化》。
《哲学杂志》105.10，第611-633页。
- 克莱因，以斯拉（2020）。
《我们为何两极分化》。纽约：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
- 梅森，莉莉安娜（2018）。
《不文明的共识：政治如何成为我们的身份认同》。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 麦卡蒂，诺兰（2019）。《极化：每个人都需要了解的知识》。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
- 麦考伊，詹妮弗、塔赫米娜·拉赫曼和穆拉特·索默
（2018）。《极化与全球民主危机：民主政策的共同模式、动态及有害后果》。《美国行

为科学家》62.1期，第16–42页。

- 阮，C·氏（2020）。《回音室与认知泡沫》。《认识论》17.2，第141–161页。
- 桑斯坦，卡斯·R.（2002）。《群体极化的法律》。《政治哲学杂志》10.2，第175–195页。
- 塔利斯，罗伯特·B.（2019）。《过度民主：为何我们必须将政治置于其应有位置》。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

9 信任与专业

DOI:10.4324/9781003089483-10

只有一位专家才重要……那就是你，选民。——吉塞拉·斯图尔特（脱欧倡导者）

引言

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从他人那里获得的知识所塑造。我们所知的内容中，只有一小部分来自自身的直接经验。相反，我们主要依赖他人提供的信息，包括各专业领域的专家。这种依赖使我们能够积累海量信息，但也使我们面临风险。当我们依赖他人时，便将自己的福祉置于他们手中。因此，信任可靠的信息来源至关重要。如果我们未能信任正确的人，或无法辨别真正的专业知识，就有可能因信息不完整或不准确而被误导或误传。

当今的民主社会正面临一场对专业知识的深刻信任危机。在全球范围内，人们对传统机构和权威的怀疑日益加剧。媒体经常被斥为带有偏见或不可靠，政客被视为不诚实和腐败，公民也常常无视专家就重大公共议题提出的建议。这种日益增长的不信任不仅针对专家和政客，还延伸至普通民众彼此之间。随着对专家、政客以及彼此的信任不断减弱，民主社会在公共卫生、气候变化和经济政策等关键议

题上难以达成共识。这给有效治理带来了严峻挑战，并威胁到民主制度的根基。

这场所谓的危机不仅表现为信任的缺失，还涉及错位的信任与不信任。随着人们对既有专家的怀疑日益加深，一些可疑的信息来源往往获得了不应有的可信度。许多人不再依据信息的可靠性或其背后的专家资质来评估信息，而是屈从于确认偏误，轻信那些自私自利的江湖骗子，并偏爱与自身意识形态一致的叙事。这种信息生态系统的扭曲为虚假信息的泛滥铺平了道路，造就了一个既过度怀疑又危险轻信的公众群体。

近期大量出版物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叙事。诸如《专业知识之死》和《专业知识的危机》等著作突显了人们对传统权威日益增长的怀疑态度。¹ 诸如《民主与信任危机》和《美国为何不再信任专家》之类的专栏文章反映出人们对专家判断力信心不断削弱的普遍忧虑。² 学术论文则描绘出一种“全球信任赤字”以及一种“对相关专家的不信任文化”。³ 这些作品共同强调了一种令人不安的趋势：公众对民主制

度、政府机构、科学界、主流媒体，甚至对彼此公民的信任正在不断流失。人们普遍认为，要解决这场危机，我们必须重建对可信且具备资质的知识权威的信任。

然而，民主与专业知识之间的恰当关系比通常所描述的更为复杂。一些学者认为，民主与专业知识之间存在一种内在张力：如果每个声音都具有同等分量，我们为何要赋予专家意见以特殊地位？此外，“专业知识”这一概念本身——尤其是在道德与政治判断领域——极具争议性。是否存在道德或政治领域的专家？与此同时，对技术性专业知识的依赖也带来了其特有的挑战，包括对技术官僚治理的担忧。

尽管人们对专家缺乏信任存在合理的担忧，但也有人警告不要盲目信任专家并赋予他们过多权威。例如，史蒂夫·富勒（Steve Fuller）将社会日益依赖专家的现象描述为“民主未来所面临的最大单一问题。”⁴ 同样，诺里娜·赫兹（Noreena Hertz）声称我们正生活在“专家的暴政”之下。⁵ 在民主制度中如何恰当地界定专家的角色，

是一个关键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对民主社会如何应对复杂的政策决策具有深远影响。

在本章中，我们探讨信任、专业知识与民主之间的恰当关系。我们提出一种方法，既承认专家在制定政策和引导决策中的关键作用，又尊重民主原则及公众在治理中的参与。为实现这一平衡，必须培育一种透明和问责的文化，使专家既能为公众所接触，又对公众负责。这需要培养一个具有批判精神的公众群体，使其能够与专业知识互动，而不被专业知识所压制。

我们首先回顾一些表明信任危机的经验趋势。这些报告警示称，许多公民对专家的信任程度过低。随后，我们通过剖析民主与专业知识之间潜在的张力，提出一种不同的叙事。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我们对公民过度信任专家的现象提出担忧。这引出了如何调和民主价值观与专家权威之间张力的讨论。我们考察了对专业知识的不同理解、识别专家的标准，以及这些标准对民主理论的影响。接着，我们区分了对专家持怀疑态度的若干来源，并强调价值观在信任专家过程中的作

用。本章最后强调了独立思考所带来的机遇与陷阱。

1 信任危机

是否存在信任危机？大量数据表明确实如此。多项调查指出，公众对专家、新闻媒体和政府的信任度急剧下降。例如，在2022年，仅有34%的美国人相信大众媒体能够公正、准确地报道新闻，而表示完全不信任的比例则达到了创纪录的39%。⁶ 在英国、澳大利亚、法国、瑞典、韩国和日本，信任度甚至更低。⁷ 2022年和2024年的全球调查均显示，记者是受信任度最低的职业之一，仅高于政客。⁸ 全球范围内，只有42%的人相信本国政府领导人会做正确的事。⁹

对科学家的信任也不例外地受到这些趋势的影响。尽管在新冠疫情初期，公众对科学的信任度有所上升，但此后却持续稳步下降。到2023年，仅有23%的美国成年人表示对科学家以公众最佳利益行事抱有极大信心——较2020年4月下降了14个百分点。随

着信任度的下降，不信任感则不断上升。对科学家表示“很少”或“毫无”信心的人群比例从2020年4月的12%增至2023年11月的27%，增长了一倍以上。¹⁰

党派倾向加剧了这些模式。从2020年到2023年，表示对科学家为公众利益行事“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信心的共和党人比例几乎增至三倍，从14%上升至38%。相比之下，绝大多数民主党人（86%）仍表示至少“一定程度上”相信科学家会为公众的最佳利益行事。¹¹ 尽管近期事件加剧了这种党派分歧，但这一分歧早在新冠疫情之前就已存在。早在2019年，民主党人表示对科学家高度信任的比例就已明显高于共和党人（43% 对 27%），而这一差距至少自2016年以来一直存在。然而，党派倾向对科学信任的影响具有选择性，公众对科学专家的态度往往取决于具体议题。

12

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对于科学专家在政策制定中应扮演何种角色也存在分歧。2019年，73%的民主党人认为科学家应积极参与政策辩论，而共和

党人中持此观点的仅有43%。大多数共和党人（56%）认为，科学家应专注于确立事实，完全避免参与政策讨论。在科学家是否更擅长就政策问题作出决策这一问题上，两党支持者同样意见相左：66%的共和党人认为专家的表现与非专家相当甚至更差，而54%的民主党人则相信科学家表现更佳。不出所料，两党支持者对于科学家是否存在偏见也看法不一：62%的民主党人认为科学家仅依据事实作出判断，而55%的共和党人则认为科学家并不比普通公众更少偏见。13

对专家日益增长的不信任令人担忧。随着社会面临越来越复杂的挑战，专业知识的重要性愈发凸显。例如，气候变化和经济不稳定等问题，需要科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见解，才能被有效理解和应对。以专家建议为基础制定政策，可确保这些决策建立在现有最佳证据之上。然而，要使这些政策取得成功，不仅需要坚实的基础，还必须赢得公众的支持。当公众对专业知识的信心较高时，政策制定者和普通民众都更有可能接受专家

的建议。反之，普遍的不信任则可能导致抵制，从而削弱政策成效。

党派之间在信任上的分歧也引发了对公平性和民主合法性的担忧。信任科学的人更有可能接受并遵循专家的指导；例如，对科学的信任显著影响疫苗接种率。¹⁴ 然而，由于信任程度因党派归属、种族、族裔和教育水平而异，科学带来的益处可能分布不均。

¹⁵ 此外，如果民主国家的政策以专家指导为基础，那么这些政策必须获得公众的认可，才能被视为具有民主合法性。如果公民认为政界人士和官员在缺乏公众支持的情况下强行推行政策，可能会进一步削弱对制度的信任，并加剧诸如政治极化之类的问题。

对政府和媒体的低信任度进一步加剧了公众对专业知识的信任危机。新闻媒体作为专家、政策制定者与公众之间的关键中介，有助于政策的传播与接受。它们为专家和官员提供了一个平台，用以分享信息、论证政策提案并争取公众支持。然而，当公众不信任媒体时，这一至关重要的沟通渠道便会中断，从而限制了政府在关键政

策问题上向公民传递信息和说服公众的能力。

尽管人们对某些专家和机构——尤其是在政治领域——日益持怀疑态度，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对专业知识的依赖依然坚定。我们信任机械师修理汽车，信任牙医照看牙齿，信任飞行员保障航空旅行的安全。这种有选择性的信任凸显了一个关键区别：专业知识之所以引发争议，主要是在其与政策制定和实施相交之时。专家知识一旦被政治化，往往就会引发怀疑与抵触，尤其是当专家影响治理和公共决策时。因此，信任危机并非对专业知识的普遍否定，而是对其在政治中所扮演角色的特定质疑。

为何对政治领域专业知识的怀疑态度变得如此普遍？这种怀疑是否合理？尽管近期对专家的不信任似乎在一定程度上沿着党派界限分化，但人们对专家在民主制度中所扮演角色的担忧，其实有着更深层且由来已久的哲学根源。这些担忧包括对问责制、透明度，以及专家与公众之间潜在脱节等问题的质疑。接下来，我们将探讨这些问题。

2 民主与专业知识之间的张力

1831年，法国政治思想家兼历史学家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启程前往美国。尽管他此行本意是研究监狱制度，但这位年轻的贵族却深深被美国社会及其民主制度所吸引。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托克维尔指出了一个典型的美国特质：“在大多数心智活动中，每个美国人都只诉诸自己个人的理解力。”¹⁶ 托克维尔将这种倾向追溯至美国民主的本质——强调平等，并对传统持怀疑态度。他甚至提出，在一个“公民地位平等、彼此密切注视，无人明显或毫无争议地优于他人”的国家里，知识分子的影响力“必然是非常有限的”。¹⁷ 因此，美国公民“缺乏信任任何个人权威的倾向”，而更倾向于依靠自己的判断。¹⁸

托克维尔的观察并不仅限于美国。他指出，任何重视平等的社会都倾向于优先强调智识上的自主性。随着个体在地位上日趋平等，他们便越发不觉得有必要依赖他人的判断。托克维尔

在欧洲也注意到了这一趋势，并指出，智识上的自立“在欧洲的确立与普及，恰恰是随着社会状况日益平等、人们彼此之间越来越相似而逐步实现的。”¹⁹ 但为何对政治平等的承诺竟能解释——更不用说证明——拒绝服从他人判断的做法呢？大概是因为，服从他人意味着承认他人的判断优于自己的判断，而这违背了平等的基本假设。

出于同样的原因，对专家的信任似乎与民主平等格格不入。专业知识本质上具有排他性和等级性。并非人人都能成为专家，而专家按定义就优于新手。²⁰ 正如托马斯·尼科尔斯所指出的：“在民主社会中，人们对专家主张感到不适的一个原因在于，专业化必然是排他的。”²¹ 纳迪娅·乌尔比纳蒂也表达了类似观点：“一旦知识（episteme）进入政治领域，政治平等就可能受到质疑，因为能力标准本质上是不平等的。”²²

民主与专业知识之间的这种张力，在整个政治思想史上一直为人所认识。正如格洛丽亚·奥里吉（Gloria Origgi）所指出的：

专业知识与民主之间的关系历来存在问题，这构成了政治哲学的一个核心议题。民主是一种反权威的政体，其一项基本原则是对待民众意见的中立性：国家不应偏袒任何特定群体所表达的意见。就此而言，专业知识本质上是权威主义的。23

依赖专家有可能将公民排除在政治进程的实质性参与之外。当我们赋予专家意见特权时，便违背了民主的一项核心承诺——即所有声音应具有同等分量。如果某些意见被赋予更大权重，又怎能确保每个人拥有平等的发言权？简言之，对专家的依赖威胁到民主对公民平等以及对相互竞争观点保持中立这两项承诺。24

一些理论家认为，专业知识与权威之间存在一种内在联系。按照一种观点，专家不仅应被视为更优越的顾问，还应被当作权威对待。更具体地说，他们应被视为**认知权威**（epistemic authorities），我们应当遵从其判断。将某人视为权威，意味着在该问题上搁置自己的思考。正如理查德·弗里德曼（Richard Friedman）

所言：“遵从权威……就是不去坚持将亲自审视并接受所要求之事（或所要求相信之事）作为执行（或相信）它的必要条件。”²⁵ 例如，若一位公认的专家声称地球至少有45亿年历史，那么无论你本人持何种业余见解，都应予以遵从。一些哲学家进一步主张，对专家的遵从应当是**盲目的**（blind），而另一些人则警告说，对透明度的要求可能会妨碍专家的判断。²⁶ 然而，权威很容易滥用其权力，从而引发专制主义的阴影。

民主与专业知识之间的这种张力令人深感不安。一方面，民主制度依赖专家来识别并应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和失业等复杂问题。如果选民缺乏信息且非理性（见第4章和第5章），而政治家又自私自利或缺乏专业技术知识，我们就不能指望他们独自选出最佳政策。另一方面，过度依赖专家可能会损害公民平等和国家中立这些民主基本原则。问题在于：我们如何才能能在政治中享有专业知识的优势，同时又不牺牲我们对基本民主原则的承诺？

3 专业知识与民主的调和

理论家们提出了各种策略，以应对或缓解民主与专业知识之间的这种张力。一种流行的做法是主张在专家与公民之间实行分工。根据这一观点，公民应基于共同价值观来确定我们的政治目标，而专家则应确定实现这些目标的最佳手段。²⁷

例如，菲利普·基彻（Philip Kitcher）认为，尽管公民最能识别自身的抱负与价值观，但专家可以“帮助他们克服知识上的局限，从而更有效地制定并追求其自主选择的目标。”²⁸ 同样，哈里·柯林斯（Harry Collins）与罗伯特·埃文斯（Robert Evans）区分了公共决策中的技术阶段与政治阶段：前者决定科学的内容；后者决定社会对科学不确定性的回应。在他们的模型中，“科学决策总是在政治决策之后作出。”²⁹ 托马斯·克里斯蒂亚诺（Thomas Christiano）提出了类似的分工模式，即“公民通过选择社会的目标来治理社会”，而专家则“借助其专业知识来实现这些目标。”³⁰ 这一框架试图通过将专家视为服务于公民

目标的辅助者，来缓解人们对专家越权的担忧。公民选择目的，专家选择手段。

为了支持这种“分而治之”的策略，我们可以承认，科学家未必是道德或政治问题的专家。尽管他们能够为我们提供相关的描述性事实，却缺乏告诉我们应当如何行动的专业知识。正如伊恩·麦克马伦（Ian MacMullen）恰当地指出：“经验事实并不能决定政治选择：这些选择还关键性地依赖于价值观，而在一个民主社会中，这些价值观属于普通公民。”³¹ 换言之，科学家并不拥有通向道德或政治真理的特殊途径。³² 事实上，规范性专业知识（normative expertise）本身是否存在，就颇具争议，我们将在第6节中对此展开讨论。按照所提议的分工，专家帮助我们理解事实，而民主公民则在自身价值观的指引下，对如何运用这些事实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尽管这一提议初看颇具吸引力，但人们对其可取性与可行性仍存有疑虑。首先，公民可能缺乏确定自身目标所需的必要信息，这本身就已要求他们

依赖专家。以气候变化为例：我们之所以能认识到这是一个亟需应对的紧迫问题，恰恰是因为我们遵从了科学专家的意见。对此，克里斯蒂亚诺

（Christiano）等人强调，公民与专家之间的关系应当是互动且互惠的，而非单向的。³³ 然而，这种说法只是重申了张力所在，并未真正化解这一矛盾。我们仍需考虑公民判断的经验可靠性，以及应赋予专家何种程度的权威。

第二，技术判断与政治判断往往相互交织。（我们在第6-8节中进一步阐述这一观点。）专家们可能并不总是意识到那些塑造其决策的规范性假设。此外，试图将事实与价值判断截然分开，未必总是有益的。这种表面上的分离或许可以解释为何技术专长在许多公民看来常常显得无关紧要。

34

另一种调和民主与专业知识的提议强调，公民应在选择专家和评估专家主张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例如，麦克马伦（MacMullen）认为，识别专家的过程可以融入民主原则：

识别真正的专家、可信赖的媒体机构，以及在何种范围内应将每个信息来源视为认识论上可靠的过程，可以是民主的：这是一个动态的、审议性的、开放的、参与式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普通公民持续决定他们应信任谁来提供其作出政治决策所需的各种不同类型的实证信息。35

这一建议的可行性取决于我们对专家的定义以及我们可靠地识别专家的能力。如果成为专家需要满足某些认知标准，而这些标准对于非专家而言往往是不透明的，那么使用民主程序来识别专家可能并不可靠。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我们的依赖是民主的，但却并非认知上负责任的。我们将在第4节和第5节中探讨这些问题。

第三种调和策略涉及调整我们看待专家的方式。当我们假定将某人视为专家就意味着将其视为权威时，专业知识与民主之间的冲突就显得最为尖锐。然而，这一主张颇具争议。另一种模式建议将专家视为顾问，而非权威。回想一下，当我们放弃自己的判断而直接遵从专家意见时，就是将专

家视为权威；相比之下，当我们把专家的意见视为一种证据，并将其与我们自己先前的信念进行权衡时，就是将专家视为顾问。珍妮弗·莱基（Jennifer Lackey）将这种模式称为“专家作为顾问”模型。如果专家仅仅是一名顾问，那么他们的意见就不会自动凌驾于普通公民的意见之上；相反，他们所提供的意见只是有助于形成观点的有益输入，而不会削弱民主承诺。

此外，区分将某人视为**认知权威**（epistemic authority）与将其视为**实践权威**（practical authority）至关重要。即使我们认为某人更了解情况，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有权告诉我们该做什么。若作此假设，便犯了大卫·埃斯特伦德（David Estlund）所称的“专家/老板谬误”（expert/boss fallacy）。仅仅因为他人更了解，并不必然意味着他们拥有统治的权威。

³⁷ 或许，我们可以通过赋予专家认知权威而不赋予其实践权威，来调和民主与专业知识之间的张力。我们在第6节中将讨论这一方法的优点与局限。

总之，已有若干策略被提出，以平衡民主诉求与专业知识需求之间的关系。第一，可将专业知识的领域限定于事实与方法，而非价值与目标。第二，我们可以确保通过民主程序来识别和裁决专家主张。第三，我们可以将专家视为关键事实的信息提供者，而非我们行动的最终裁决者，亦即视其为认知权威（epistemic authorities）而非实践权威（practical authorities）。然而，这些策略的有效性，以及它们旨在解决的问题之性质与严重程度，都与有关专业知识的形而上学和认识论问题密不可分。这些问题包括：专家究竟是什么、如何识别专家，以及应如何恰当地对待专家证言——这些正是我们接下来将探讨的主题。

4 什么是专家？

要确定专家在民主制度中的恰当角色，我们首先必须弄清楚什么是专家。对“专家”的不同理解，会引发对其在政治中所扮演角色的不同担忧。如果“要求他人服从的权力”是专家概

念的核心要素，那么民主与专家之间就会直接产生冲突。例如，奥里吉（Origgi）认为，专家是：

某人的认知权威由那些有意将其部分权威委托给专家认知权威的政治利益相关者所授予并合法化……因此，成为专家意味着在做出关键决策时，有人会遵从你的专业意见。³⁸

如果按照定义，专家就是我们必须遵从的认知权威，那么关于专家判断排挤民主共识的担忧就会变得尤为突出。尽管对专业知识更为谦逊的理解或许可以回避这一问题，但它们又会带来自身特有的挑战，这一点我们将在下文探讨。

初步而言，专家是指被视作在某一特定领域拥有广博知识或技能的人。更严谨地说，对“专家”这一概念有两种宽泛的理解方式。³⁹ 第一种在分析认识论中较为普遍，将专家定义为在某一主题上比大多数人知道得更多的人。第二种在政治理论中更为常见，将专家视为拥有某种声誉或社会地位

的人。因此，我们可以区分出两种关于专家身份的解释：

认知论解释 专家在某一特定领域比大多数人更具能力。这种能力可体现为更高的可靠性、知识、理解力或技能。

地位账户 专家是指在某一领域被公众公认为权威人士或享有专家声誉的人。这种声誉意味着其在该领域内的知识或技能水平高于大多数人。

根据知识论观点，专长涉及满足某些知识论标准。相比之下，地位观点则将专长视为一种社会地位。前者强调拥有知识的重要性，而后者则强调被视作拥有知识的价值。

地位账户（Status Account）面临一个明显的问题：它意味着江湖郎中、骗子和诡辩家可以被视为真正的专家，而不仅仅是伪专家。⁴⁰ 当人们利用自己的资历和论辩技巧兜售错误信息，通常是为了谋取私利时，他们欺骗我们，让我们相信他们是专家。这使他们成为骗子，而非真正的专家。

因此，拥有专家的声誉并不足以使人成为真正的专家。

此外，一些人认为声誉地位甚至并非必要。如果一位专家搬到一个无人认识他的新城镇，说他因此就不再是专家，似乎并不合理。⁴¹ 同样，也可以主张那些未被认可的科学天才应被视为专家，而地位论（Status Account）却否认这一点。⁴² 因此，我们或许会同意阿尔文·戈德曼（Alvin Goldman）的观点：“单纯的声誉与实际专长几乎毫无关系。”⁴³ 然而，地位论的一个优势在于，它使专家的识别变得简单：我们只需寻找社群的认可以及社会公认的专长标志即可。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一任务对于知识论立场（Epistemic Account）而言更具挑战性。

认识论解释在当代认识论中更为流行。首先，它轻松避开了对江湖骗子和冒牌货的担忧。其次，它把握住了人们对“专家”这一概念的直觉性且常被引用的含义：即在某一领域真正具备专业能力的人。与地位解释不同，认识论解释不会将表象与现实混为一谈。

鉴于上述优势，认知论路径（Epistemic Account）为专业知识确立了一个看似合理的必要条件。但它是否充分呢？一个人是否可能在无人承认的情况下仍为专家？未被认可的天才是否应被归类为专家，部分取决于“专家”这一标签的重要性。某些观点认为，将某人称为专家意味着将其视为认知权威，从而要求他人遵从其判断。⁴⁴ 如果“专家”这一称谓确实赋予如此权力，那么我们是否真的应该将这一标签授予那些未经认证的奇才或匿名新人，即便他们的能力与受过专业训练的专家相当？或许，一种同时要求声誉要素与认知要素的混合型路径（hybrid account）更为可取。

如果我们接受认识论立场（Epistemic Account），那么要确定谁是专家就会变得更加困难，因为专业知识与声誉、资历、地位和论辩能力等外部标志仅有松散的关联。这带来了一个重要的实践挑战。如果专家应当在民主政治中发挥作用，我们就需要有识别他们的工具。然而，在许多现实情境中，关于专业知识指标的不确定性使得非专家更难判断应该信任谁。这

就像财富一样，外在表象可能具有误导性（例如，真正富有的人可能衣着朴素，而财力较弱的人却可能穿着租来的名牌服饰），若缺乏共同的专业能力或内部知识，真正的专家身份可能难以辨识。

这些争论对于理论化专家的角色至关重要。如果知识论立场（Epistemic Account）是正确的，且能力是专业知识的必要条件，那么专家更有理由提供建议，但更难被识别出来。如果地位立场（Status Account）是正确的，那么专家更容易被识别，但他们主张权威的理由则较弱。正如亚历克斯·沃斯尼普（Alex Worsnip）所指出的，地位立场与知识论立场各有其相互对应的优点与缺点。前者“使专业知识易于识别，但意味着值得遵从性（deference-worthiness）并不会自动随专业知识而来”；相比之下，后者“确实使值得遵从性几乎自动地随专业知识而来，但却使专业知识极难被识别。”⁴⁵ 在下一节中，我们将讨论如何识别那些真正拥有知识或能力的人。

5 如何识别专家？

任何将能力视为专长前提的理论，也应提供如何识别专家的指导。这并非易事。在许多情况下，新手会面临一种悖论：若不先成为专家，就无法评估专家的表现。

然而，在民主制度中，识别专家的能力至关重要。要使政策既具备专业知识基础又具有民主合法性，公民必须能够识别出称职的顾问。正如伊丽莎白·安德森（Elizabeth Anderson）所指出的，我们对专家的依赖并不会损害政策决定的民主性质，“只要公民能够判断谁值得信赖。”⁴⁶同样，斯蒂芬·特纳（Stephen Turner）声称：“只有当普通公民无法胜任（识别专家的）这一平凡过程时，专业知识才会成为民主理论的一个深层难题。”⁴⁷尽管安德森和特纳对普通民众完成这一任务的能力持乐观态度，但其他人则更为怀疑。

识别专家的难题并非新近才出现。如同政治认识论中的许多问题一样，它最初由柏拉图提出讨论。在《卡尔米

德篇》中，苏格拉底与克里提亚斯辩论普通人如何区分真正的医生与骗子。苏格拉底对此表示怀疑，并说道：

他既无法区分那个假装是医生却并非医生的人与真正是医生的人，也无法对其他任何领域的专家作出这种区分。48

如果一个外行能够评估医生的资质，那么他们自己就具备医学专业知识，而实际上他们并不具备。49

在有关专业技能的文献中，学者们区分了两个问题：

新手—专家问题：新手如何区分专家与伪专家？

新手—两位专家问题：当专家意见相左时，新手如何评估他们各自的可信度？50

如果这些任务尚不足以令人望而生畏，还有一个更进一步的担忧。除了要判断一位所谓的专家是否具备足够的能力之外，我们还需要判断他们是否真诚。专家可能拥有与讲真话相冲突的利益，例如在说服他人接受其主

张方面存在经济、声誉或个人方面的利害关系。他们的利益可能与销售、经费资助、荣誉或声望挂钩。正如亚历山大·格雷罗（Alexander Guerrero）所指出的：“或许[这类专家]在这样做时也会传达真相并提供信息，或许不会。但这并非[总是]他们作出断言的目的。”⁵¹ 要评估一位证言者的可信度，我们需要同时评估其能力与真诚度。在接下来的两个小节中，我们将探讨如何做到这一点。

5.1 判断能力

虽然非专家通常缺乏直接评估复杂技术问题的能力，但他们可以依靠各种专业能力的指标来辅助判断。这些指标可能包括：

1. 机构资质与声誉：相关学位、认证、荣誉奖项、机构隶属关系以及同行评审出版物。
2. 辩证技能：提出有力论点、有效回应异议以及批判性评估对立观点的能力。

3. 过往记录：展现出准确预测的历史，或其他能够证明其具备追踪真相能力的证据。
4. 共识：相关领域内专家之间或更广泛群体的支持程度。

这些潜在指标引发了两个关键问题。第一，这些专业能力的标志有多可靠？第二，外行人士能否有效地使用它们？成功的指标必须同时具备可靠性和对非专业人士的可及性。然而，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两个标准常常相互冲突。事实上，每个专业能力的标志都各自带来一系列问题。

首先，诸如学位之类的基本资质很容易被滥用。一些教育机构，尤其是营利性机构，有招收学生并授予容易获得的资质的经济动机，却几乎没有动力去撤销这些资质。⁵²此外，资质仅能证明过去的专业能力；曾经可靠的专家可能随着时间推移而丧失其可靠性。⁵³拥有良好资质的人士也可能越界或“跨界”，将其所谓的专业能力延伸至其实际专业领域之外。⁵⁴普通公众可能难以质疑此类越界行为。例如，当著名天体物理学家尼尔·德葛拉司·泰森（Neil deGrasse Tyson）暗

示其物理学背景足以使其有资格探讨形而上学问题时，普通人又该如何有效反驳这一主张呢？

声誉指标也可能不可靠，或难以被非专业人士评估。非专业人士可能不熟悉出版渠道的质量、相关机构的声望，或各类奖项的竞争激烈程度。尽管引用次数和影响因子更容易评估，但它们同样可能产生误导。例如，某位专家的引用量可能很高，是因为其发表的观点引发了争议，而非因为其研究成果被广泛接受或尊重。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是：线索的可靠性往往与其可用性之间存在权衡。

接下来，考虑辩证技能。戈德曼

（Goldman）指出，如果一位专家在面对异议时保持镇定，而另一位则显得慌乱，我们或许可以合理推断前者具备更卓越的专业知识。⁵⁵ 然而，将辩证能力作为专业知识的替代指标存在显著局限。首先，普通公众很少有机会直接观察专家之间的辩论。其次，这些技能往往与真正的专业知识仅有松散关联。富有魅力、口才出众的发言者可能获得不应有的信任，而腼腆或不善言辞的专家则可能被忽

视。专业知识与沟通能力之间的这种脱节是一种广为人知的现象：杰出的研究者并不总是出色的演说家。此外，人们对辩论表现的评估还可能受到个人偏见的影响，包括源于党派立场的偏见。如果我们本来就倾向于偏爱某位专家，就可能会有选择性地解读有关论证质量的证据，以强化自己已有的信念。

过往的业绩记录可以成为评估专家的一项宝贵工具。事实上，戈德曼

（Goldman）指出，它们“或许能为非专业人士提供判断可信度的最佳证据来源。”⁵⁶ 其理由很简单：外行人士可以评估专家过去的判断是否已被证明是准确的。然而，过往业绩记录的使用往往受到限制。首先，许多专家（如生物学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并不做出预测。其次，即使做出了预测，由于存在多种相互竞争的因果因素以及较长的时间跨度，这些预测也难以评估。第三，某些预测需通过实验室实验或复杂的统计分析加以验证，而这两者对普通公众而言都是难以接触的。⁵⁷ 因此，尽管过往业绩

记录能提供一些洞见，但在许多现实情境中其适用性却十分有限。

最后，我们或许可以诉诸专家共识来评估专业能力。如果大多数专家一致认为人为导致的气候变化正在发生，或HIV会导致艾滋病，那么这种共识就为我们接受他们的结论提供了强有力的理由。然而，这预设了我们已经解决了“新手—专家问题”，并正在对专家们的主张进行裁断。乍看之下，专家共识是可用的——只需看看人数即可！但专家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达成一致呢？此外，批评者可能会指出，表面上的共识可能源于对权威的顺从而非独立验证，或者可能反映了系统性偏见。例如，杰弗里·弗里德曼（Jeffrey Friedman）认为，许多经济学家之间的共识观点可能是“经济学研究生所接受的新古典经济学教授们所共有的自由市场教条式教学”的产物。⁵⁸

简言之，批评者担心这些标准过于不完善、过于难以使用，或要求过高，无法为普通人在评估和裁断专家主张时提供切实可行的指导。⁵⁹

5.2 判断真诚

假设我们能够识别谁是知识渊博的专家。然而，我们仍需评估他们的诚实与真诚。这一点不应被视为理所当然。⁶⁰ 专家可能出于财务、职业或个人动机试图说服你。这些因素可能导致专家以带有偏见或误导性的方式呈现信息，即使他们在自己的领域具备必要的知识和技能。

要获得积极的指标来判断一位所谓专家在陈述事实时是否真诚或诚实，可能颇为困难。然而，我们至少可以寻找一些负面指标，以质疑其可信度。例如，他们可能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如受烟草游说团体收买），或有科学不端行为的记录（如剽窃或伪造数据）、做出误导性陈述（如选择性使用数据），或歪曲对手的论点。⁶¹ 这些指标表明，即便我们认为该专家因其具备足够的知识、理解力或技能而达到了胜任的认知标准，我们也不应信任他们。

针对识别可信赖专家的困难，一些学者提出了制度性改革建议。例如，格雷罗（Guerrero）建议建立一个“专

家数据库”，该数据库将对不同领域的各类专家进行编目并提供相关信息，并可由其他专家进行评审。⁶²戈德曼（Goldman）建议，社会认识论学者应研究哪些教育举措能够提升我们识别专家的能力。他还建议探究传播中介如何促进外行与专家之间建立一种基于合理遵从（justified deference）而非盲目信任的关系。⁶³安德森（Anderson）认为，尽管公民具备判断专家可信度的能力，但由于不负责任的大众媒体、回音室效应以及偏见等不良社会条件，他们往往缺乏这样做的意愿。她建议通过确立新的媒体规范、实施整合性选区重划，以及审慎关注政策语言等改革措施来应对这些问题。⁶⁴这些改革措施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缓解识别可信赖专家这一难题，仍有待进一步探讨。

6 对专业知识的怀疑

尽管专业知识在许多领域都受到重视，但“政治专家”这一概念却容易引发怀疑。在政治和道德等领域，是否真的存在专家？如果存在，我们能否

辨别出他们是谁？如果我们能够识别出这些专家，他们是否应当影响公共政策？这些问题反映了人们对专业知识的三种怀疑态度：

1. 形而上学层面：对“专业知识”本身是否存在的怀疑。
2. 认识论上的：对我们识别专家能力的怀疑。
3. 政治：对专家在政治决策中的相关性持怀疑态度。

在实践中，区分这些类型的怀疑主义可能颇为困难。以英国脱欧派工党议员吉塞拉·斯图尔特（Gisela Stuart）的言论为例：“只有一位专家才真正重要……那就是你，选民。” 她所支持的是哪一种怀疑主义？斯图尔特是在暗示每位选民才是唯一真正的专家，从而贬低或轻视专业知识吗？还是她在暗示专家并不可信，因而敦促选民依靠自己的常识？又或者，她是在表达对真正专家意见相关性的怀疑，主张最终重要的是每位选民自身的判断？澄清这些模糊之处，对于评估此类主张的有效性，并针对其所带来的

挑战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至关重要。

6.1 什么是政治专长？

为了阐明政治专长的概念，请考虑以下四个截然不同的例子：

政治分析师：内特·戈尔德（Nate Gold）是来自密歇根州的一名记者兼政治评论员，对美国政治充满热情。他以对选举趋势和政党动态的敏锐分析而闻名，其关于政治策略与公众舆论的见解广受追捧。戈尔德专长于城市政治与选举行为，经常就全国及州级选举提供评论。

政治理论家：罗恩·罗尔斯（Ron Jawls）是哈佛大学的一位政治哲学家，以其在民主理论与正义领域的开创性研究而闻名。罗尔斯的研究探讨了政治权威的规范性基础，对治理的伦理维度提出了深刻见解。他的理论贡献对当代关于正义与政治合法性的讨论产生了深远影响。

高效的政治家：玛吉·撒切尔

（Maggie Thatcher）议员是英国最富成效的立法者之一。她对政治行为和制度动态有着敏锐的理解，始终致力于构建联盟以推进自己的议程。撒切尔在起草细致入微的法案以及驾驭议会程序方面的娴熟技巧，已促成多项政策取得成功。

道德专家：奥芙拉·温利（Ofra Winley）是一位极具影响力的脱口秀主持人、电视制作人和慈善家。尽管她并非政界人士，温利仍利用自己的平台探讨重要的社会议题并推动正义。她以对道德要求的深刻洞见而闻名，并倡导促进公共利益的政策。

这些个体各自展现出一种独特的、具有政治相关性的专长。这些例子表明，政治专长可能包括对政治事实的了解、理论知识、实践能力以及道德判断。

稍作简化，我们可以区分技术性专长与规范性专长。技术性专长涉及事实判断，而规范性专长则关乎价值判

断。规范性专家对道德与政治真理有更深入的理解，例如什么有助于构建一个公正的社会；而技术性专家则对世界中的描述性事实有更深入的理解，例如气候变化的成因。举例来说，规范性专家会知道晚期堕胎在道德上是否被允许，而技术性专家则知道如何实施该手术，以及胎儿在子宫外何时具备存活能力。

柏拉图认为，政治专长主要不在于实践技能或技术知识，而在于理解正义的原则并追求公共利益。对他而言，政治专长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规范性专长。然而，政治专长可能不止于此。鉴于现代政策的复杂性，仅凭规范性专长似乎不足以构成政治专长。

65

6.2 对规范性专业知识的怀疑

规范性专长比技术性专长更具争议性。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常常质疑规范性专长的存在性、可识别性及其相关性。根据这种观点，在政治领域并不存在相关类型的专长，原因要么在于不存在独立于程序的是非标准，要

么即使此类标准存在，也没有人比其他人更了解这些标准。相比之下，对技术性专长的怀疑则较少被主张。

从罗尔斯（Rawls）和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到罗伯特·塔利斯（Robert Talisse）和罗伯特·兰姆（Robert Lamb），众多思想家都否认规范性政治专家的存在。⁶⁶ 罗尔斯认为：“并不存在[规范性政治]专家：哲学家并不比其他公民拥有更多权威。”⁶⁷ 同样，西蒙·凯（Simon Kaye）主张，鉴于价值多元主义，根本“不存在所谓道德专长这回事”。⁶⁸ 当然，道德事实本身是否存在就颇具争议。但即便我们承认其真实性，是否有可能认识这些道德事实仍是另一个问题——而能否识别出那些掌握这些知识的人，则又是一个更进一步的问题。⁶⁹

另一些人则认为，对规范性专长持形而上学怀疑论是难以置信的。例如，埃斯特隆德（Estlund）认为，“很难否认”“某些人（相对而言为数不多）比其他人更了解[真实的]规范性标准。”⁷⁰ 几页之后，他的信心进一步增强，宣称“可以肯定的是，就政治道

德而言，确实存在一些公民群体，其智慧高于全体公民的整体水平。”⁷¹

同样，丹尼尔·维霍夫（Daniel Viehoff）声称，否认规范性政治专长的存在将付出“巨大代价”，这会使我们难以判断政治决策孰优孰劣，也难以批评候选人和选民做出错误的决定。

⁷² 对这些理论家而言，形而上学怀疑论的后果极为严重，将迫使我们对我们现有的实践进行彻底的重新诠释。

尽管我们无法在此解决有关规范性专长的形而上学争论，但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某种形式的对规范性专长的怀疑态度被广泛接受。即使那些拒斥形而上学怀疑论的人，也常常愿意认可对规范性专家的某种认识论或政治上的怀疑态度。

首先，人们可能会认同一种关于识别规范性专家能力的认识论怀疑论。我们似乎缺乏可靠的方法或标准来确定谁真正在道德或政治事务上具有专长。事实上，这些领域并不存在普遍公认的专长标准，我们也缺乏独立验证规范性主张的工具。尤其考虑到人们对道德和政治问题存在合理的分歧，我们无法就谁是专家达成一致。

正如埃斯特伦德（Estlund）所调侃的那样：“没有任何一位认知者是如此可知，以至于能被所有理性之人所认知。”⁷³ 兰姆（Lamb）同样指出，所谓的规范性专家面临一种“资质问题”：“规范性政治专家……将无法提供其权威性的依据，而这些依据是[非专家]能够合理地认为有说服力的。”⁷⁴

即使我们能够就谁是专家达成一致，我们仍可能否认他们的专业知识具有相关性。这相当于对规范性专业知识持一种政治怀疑论立场。假设专家确实存在，且我们能够识别他们，我们仍可能坚持认为，公民独立思考至关重要。埃斯特伦德（Estlund）在写道：“不应赋予专家特权，因为不能期望、假定（更不用说鼓励或强迫）公民放弃自己的道德判断，至少在重要事务上如此。”⁷⁵ 时，似乎就持这种政治怀疑论立场。鼓励公民独立思考，可能出于政治、道德以及工具性等多方面的重要理由。例如，这或许能降低精英阶层支配的风险，发挥教育作用，并且是汲取群体智慧（crowd wisdom）的必要前提——

而群体智慧的实现要求选民行使独立判断（参见第二章）。76

我们在第3节中已经预览了一种较弱形式的政治怀疑论，当时我们提出，专家未必应被视为实践权威；相反，他们可被看作知识顾问。按照这种观点，专家并非完全无关紧要，但他们的意见只应被视为众多证据中的一条。政治怀疑论是否站得住脚，取决于人们如何看待专家。而在其他观点看来，专家就是你理应遵从的人。

6.3 对技术专长的怀疑

对技术专长的怀疑远不如对规范性专长的怀疑那么常见。正如许多理论家所指出的，我们需要技术专家来帮助我们实现复杂社会的目标。⁷⁷ 例如，公共卫生专家对于制定和实施抗击疾病、改善人群健康的策略至关重要。同样，经济顾问帮助政府应对复杂的金融体系、管理国家预算，并制定促进经济增长与稳定的政策。

然而，技术性专长与规范性专长之间的区分可能是站不住脚的。首先，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往往相互交织，难

以剥离。正如科学哲学家数十年来所主张的那样，价值观和背景承诺常常影响专家的探究、评估与主张。⁷⁸ 泽内普·帕慕克（Zeynep Pamuk）指出：“科学和科学家自身拥有其价值观、目标和标准，这些塑造了他们的研究。”此外，“这些价值观、目标和标准未必与那些必须依靠科学发现以追求不同目标的其他人的价值观、目标和标准相一致或可被其接受。”⁷⁹ 因此，如果我们不确定其中暗含了哪些规范性判断，就可能会对技术专家的证言持保留态度。事实上，哈贝马斯（Habermas）和米歇尔·福柯

（Michel Foucault）等批判理论家担忧，“专家知识表面上伪装成中立的事实”，实则暗中推进维系支配体系的意识形态。⁸⁰

因此，我们面临一个困境。一方面，我们需要技术专家就政策问题作出有根据的决策；另一方面，人们对规范性专家的怀疑普遍存在，而且往往难以将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区分开来。因此，我们可能不愿完全信任技术专家。认真对待科学中蕴含价值这一问题，可能会促使我们采纳一种党派性

认识论（partisan epistemology），在这种认识论中，党派价值观与决定信任哪些专家相关。我们将在第8节中再次探讨这一观点。

话虽如此，对技术专长的怀疑态度并不需要以事实与价值相互交织为前提。在《无知识的权力》（Power without Knowledge）一书中，弗里德曼（Friedman）批判了政治中的“技术官僚统治”（technocracy），质疑了技术专长能够有效解决社会与经济问题这一假设。弗里德曼将技术官僚统治定义为“一种旨在为其民众解决、缓解或预防社会与经济问题的政体。”⁸¹ 其目标是“通过应对诸如失业、通货膨胀、学校教育失败、医疗体系失灵、药物成瘾等问题，来促进社会与经济福祉。”⁸² 尽管技术官僚通常被视为拥有政策效果专业知识的持证专家，但弗里德曼认为，这样的专家并不存在。他主张，没有人真正拥有可靠的知识来解决、缓解或预防经济与社会问题。

弗里德曼的怀疑源于现代社会问题的复杂性。他指出：“对于技术官僚政策效果的真正分歧总是合理的，因为原

则上，任何技术官僚政策都可能产生意外后果，而这些后果可能超过政策预期所带来的益处。”⁸³ 这种复杂性体现在技术官僚所需的四种经验知识上：（1）了解哪些社会问题是重要的；（2）了解这些问题的成因；

（3）了解哪些行动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以及（4）了解这些解决方案的成本。⁸⁴ 每一类知识都带来了独特的挑战和不确定性，从而削弱了可靠的技术官僚专业知识的可能性。

意外后果的可能性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对政治领域技术专家意见的怀疑。弗里德曼概述了政策导致意外结果的几种方式：将资源错配到无关紧要的问题上、只治标而不解决根本原因、实施无效的解决方案从而浪费资源，甚至通过“监管反噬”（regulatory backfire）使原本旨在解决的问题更加恶化。弗里德曼列举了许多现实世界中恰好体现这些问题的实例。他援引的案例包括：《美国残疾人法案》无意中加剧了就业歧视，联邦学生贷款计划助推了学费上涨，租金管制政策往往导致住房短缺，最低工资法增加了低薪工人的失业率，以及美国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法规阻碍了救命药物的研发。⁸⁵这些例子表明，即便是看似不言自明的政策，也可能弊大于利，从而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对政治中技术官僚式专业知识的怀疑态度。

弗里德曼的怀疑态度挑战了这样一种普遍看法：政府决策者拥有足够的知识来实施能够实现社会广泛认同目标的政策。换句话说，弗里德曼否定了第3节中所描述的劳动分工，该分工假定由公民选择社会目标，而由专家确定实现这些目标的最佳途径。在弗里德曼看来，并不存在知晓哪些政策能够实现相关目标的政府决策者。

这一观点与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早期的研究形成鲜明对比。李普曼在其关于公众舆论的经典研究中曾著名地断言，唯有由专家组成的官僚体系才能使民主有效运作。

⁸⁶ 与弗里德曼（Friedman）一样，李普曼认为现代社会的复杂性使得普通公民无法直接了解民主政体所面临的大量问题。然而，与弗里德曼不同的是，李普曼对技术官僚专家抱有相当大的信心。在《公众舆论》（Public

Opinion) 一书中，李普曼赞许地指出，各类政府机构通过向作出政治决策的民选官员提供专业知识，从而帮助民主制度正常运转。⁸⁷ 专家的作用并非指导公众，而是通过提供对世界的准确描述来为政治官员提供信息，但并不就应作出何种决策提供建议。在李普曼看来，公众的角色并非掌握专业知识的技术细节，而是识别并判断谁才是真正的专家。

然而，正如我们在第5节中所讨论的，识别专家绝非易事。李普曼或许过于乐观地认为普通公民甚至能够满足这种更为有限的认识论要求。此外，如果弗里德曼对技术官僚专业知识的怀疑是正确的，那么李普曼对专家的信任本身就可能是错位的。再者，如果政治从根本上并非关乎“解决问题”（参见第2章第6节），那么李普曼的技术官僚式愿景可能就完全失去了其出发点。

7 民粹主义认识论

民粹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是审视对专业知识不信任现象时需要考虑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民粹主义近期引起了广泛关注，尤其是在唐纳德·特朗普当选之后。尽管对民粹主义的定义各有不同，但它通常与对政治精英的不信任、将“人民”置于这些精英的对立面加以推崇，以及倾向于接受与主流机构所倡导的解释相悖的另类社会现象解释有关。

在《民主与真理》一书中，索菲亚·罗森菲尔德（Sophia Rosenfeld）将“民粹主义认识论”的逻辑概括如下：

民粹主义者通常不是主张辩论与分歧，而是描绘一个即将来临的共识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只要正确的人掌权，就能通过简单、务实甚至显而易见的非意识形态方案解决问题。这并非一个完全放弃客观真理或现实承诺的世界……相反，在许多方面，这恰恰是技术官僚所构想世界的倒影：在这个世界里，真理并不依

赖于多方持不同观点者之间通过复杂、协作的程序进行协商，而仅仅依靠一部分真正“更懂”的人群所天然具备的问题解决能力。民粹主义者……往往拒绝将科学及其方法视为指导原则的来源，在许多情况下，他们更推崇情感上的真诚、直觉以及发自内心的真实，而非枯燥的事实准确性、科学证据、检验过程和专业资质。88

在罗森菲尔德等人工作的基础上，我们可以确定民粹主义认识论的四个核心信条：

1. 对精英的不信任：民粹主义运动往往不信任精英，尤其是那些与生产并传播知识的既有机构有关联的精英。民粹主义叙事通常将这些精英描绘为自私自利、腐败，或从根本上脱离普通民众的现实生活。89
2. 倡导“人民”：民粹主义话语强调“人民”与“精英”之间存在明确的对立，将前者描绘成一个团结、道德高尚且拥有实践智慧的群体。这一叙事将普通民

众刻画为勤劳、诚实，并遭受腐败精英的剥削。90

3. 对专业知识的怀疑：民粹主义者常常质疑既有的、拥有资质认证的专业知识。他们推崇常识、实践智慧和亲身经历，而非制度化的学习，认为普通民众拥有一种专业知识，这种知识往往比官方专家更能带来良好的结果。91
4. 反多元主义：民粹主义与多元主义形成鲜明对比。民粹主义者通常将“人民”视为一个具有统一道德愿景的同质群体，拒绝承认其内部的意见分歧。这种观点认为，对公共利益只存在一种真实的代表，而这种代表由民粹主义运动忠实地体现出来。92

民粹主义议程与专家所提出的技术性、复杂性解决方案形成鲜明对比。民粹主义话语通常描绘一个共识的世界，主张以简单、务实的方案解决社会问题，推崇普通民众的智慧，而非腐败精英和官方专家那不可信赖的判断。

然而，民粹主义者并非对所有专业知识都持怀疑态度。尽管有“独立思考”和“自己拿主意”之类的说辞，民粹主义并不必然意味着真正的智识自主。正如艾伦·哈泽特（Allan Hazlett）所指出的，民粹主义者倾向于偏爱非主流或非传统的专家，而非主流专家（例如那些拥有高学历、使用专业术语的人）。这些另类专家可能包括非主流分析人士、阴谋论者、“离经叛道”的学者、民粹主义政治人物，以及其他挑战既定叙事的人士。⁹³

民粹主义认识论的兴起对既有的民主制度和规范构成了重大挑战。它通过削弱人们对传统信息来源的信任，使基于证据的政策制定和治理变得复杂化。此外，民粹主义叙事往往难以容纳民主社会所赖以维系的多元主义。那种认为存在一个拥有单一、可辨识意志的统一“人民”的信念，与任何社会群体内部意见和利益多元的现实格格不入。然而，必须指出的是，民粹主义对专业知识的批评并非全无道理。它们提出了关于专业知识与民主决策之间关系的重要问题，并凸显了

我们的知识生产机构亟需提升透明度和问责制。

有趣的是，认知民主（epistemic democracy）的支持者对技术专家知识持有一种相关的怀疑态度。如第二章所述，认知民主论者认为，普通公民的集体智慧往往胜过一小群专家的判断。这种观点强调，通过民主程序汇集多元视角、地方性知识以及分散的信息，能够为复杂的社会问题提供更有效的解决方案。尽管单个公民可能缺乏专家所具备的专业知识，但他们的集体经验和理解却能提供技术官僚可能忽视的关键洞见。

与民粹主义者不同，认识论民主主义者并不否认专业技术知识的存在。然而，这些理论家在批判集中化专业知识这一概念上与民粹主义者立场一致，他们提出了一种替代模式，即利用广大公众所拥有的分散知识与判断力来指导政治决策。

最后，民粹主义认识论与弗里德曼一样，对专业性知识持怀疑态度（见第6.3节）。然而，弗里德曼的观点与民粹主义视角之间存在关键差异。民

粹主义认识论通常假定，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可以通过常识或诉诸普通民众的智慧而被发现。相比之下，弗里德曼认为，现代社会问题过于复杂，无论是专家还是普通公众，都无法可靠地加以解决。他承认专家知识的局限性，但并未陷入这样一种陷阱，即认为常识或大众智慧可以轻易填补这一空白。因此，弗里德曼的观点既批判了技术官僚的过度自信，也批判了民粹主义的过度简化。

8A 证言的党派认识论

正如前文所述，技术知识与规范性考量之间可能存在不可分割性，这或许可以解释或合理化人们对依赖专家所持的某些犹豫态度。如果事实与价值不可避免地交织在一起，那么我们或许希望在听从专家意见之前，确保他们与我们拥有共同的利益和价值观。正如安德森（Anderson）所指出的：“科学家在这些价值判断上并无特殊专长。在一个民主社会中，普通民众有权批评科学理论未能纳入某些价值——或纳入了错误的价值。”⁹⁴

但我们如何察觉专家证言者的价值观呢？尼尔·利维（Neil Levy）认为，我们依赖善意（benevolence）和能力（competence）的线索来区分可信与不可信的证言者。⁹⁵ 尽管我们可能不会质疑科学家或经济学家的能力，但我们可能认为他们在善意方面的线索不足，从而更倾向于认为他们与我们价值观和利益不一致。正如利维所指出的：“当科学被政治化时，表达科学共识本身可能就会被争议某一方的人视为缺乏善意的信号，从而导致他们拒绝接受该证言。”⁹⁶ 当专家未能满足善意线索时，专家意见与公众意见之间就会出现一种可预测且理性的差距。利维声称，这有助于解释专家与公众观点之间的分歧，尤其是在特定议题上，保守派人士对科学的信任度较低。在他看来，当我们认为专家与我们价值观不一致时，对专家的不信任可以是理性的。

马克西姆·勒普特雷（Maxime Lepoutre）对专家不信任现象提出了类似的解释。⁹⁷ 他承认，群体忠诚会影响我们对技术性、描述性问题的判断。他也承认，这看起来是非理性

的：政治并不能决定事实！然而，勒普特雷认为，这种表面上教条的行为实际上可能是认识论上负责任的。其核心观点在于，规范性关切可能与评估科学主张的真伪相关。

勒普特雷借鉴了科学哲学领域的发展来支持这一观点。关于价值观在科学中所起作用的一种论证始于这样一个观察：证据往往不足以确定理论的选择——多种信念和假说都与同一组证据相容。因此，我们需要诉诸其他因素来决定相信并主张哪一个理论或假说。为了决定采纳哪个理论或假说，科学家必须诉诸非认知价值，包括道德价值和政治价值。认知价值（如经验适当性、预测精确性、内部一致性以及解释力）常常不足以确定对证据应采取的恰当回应。

来自归纳风险的论证同样促使我们诉诸非认知因素。要判断证据是否足以接受某个假说，我们必须考虑犯错的代价。正如理查德·鲁德纳（Richard Rudner）所指出的：“我们关于证据的决定，以及关于‘多强才算足够强’的判断，将取决于在通常的伦理意义上，接受或拒斥该假说时犯错的重要

性。”⁹⁹ 例如，要接受一种含有潜在致命成分的药物是安全的，所需要的证据和信心程度，远高于判断一台自动售货机是否准确地发放商品。其原因显而易见：前一种情况中犯错的代价要严重得多。为了确定我们是否拥有充分的证据来合理地断言某个假说，科学家必须权衡假阳性（在假说为假时断言其为真）与假阴性（在假说为真时未能断言其为真）的代价。非认知因素将影响我们对“充分证据”所设定的阈值。

举例来说，假设科学家萨姆正在决定是否断言：“人为导致的气候变化是真实存在的。”她必须高度重视认识论因素，但也应考虑非认识论因素。这些因素包括：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假设气候变化确实存在），可能造成的环境破坏；以及如果我们采取行动（而气候变化实际上并不存在），环境法规可能带来的有害经济影响。正如勒普特所指出的：

如果她更重视前者，她可能会认为假阳性比假阴性更可取，因此在断言〔气候变化正在发生〕

时，会采用比持有相反价值观时更低的认识论标准。100

无论如何，山姆的判断不仅会受到认识论因素的影响，还会受到道德和政治因素的影响。

如果一位听众认为萨姆未能恰当地权衡这些价值，那么他就有理由不信任她的主张。例如，假设比尔来自一个就业机会稀缺的农村社区，而环境保护措施会威胁到他所在地区的就业岗位。对他而言，误报（false positive）的代价非常高。因此，他会采用比萨姆更高的认知标准。这正是党派立场（partisanship）发挥作用之处。如果萨姆是一位居住在沿海大城市的自由派人士，那么比尔可能会

（或许正确地）认为，萨姆对气候变化对农村社区就业创造所造成的影响不够敏感。因此，他判断萨姆的证据门槛过低，从而不接受她的证言。用利维（Levy）的术语来说，科学家萨姆可能通过了能力（competence）的检验，却未能通过善意

（benevolence）的检验；因此，比尔理性地保留了信任。

如果这个说法是正确的，那么价值观在评估专家判断中就起着关键作用。即使我们都认同谁掌握了更多相关的技术性事实知识，我们仍可能在谁拥有正确的价值观这一点上存在分歧。

8.1 党派认识论是理性的吗？

规范性判断与技术性判断之间的相互作用，催生了对党派认识论（partisan epistemology）的辩护。根据这一观点，在评估专家以及更广义上的证言者时，依赖党派价值观在认识论上可以是负责任的。这种辩护假定政治派别反映了一人的规范性立场，即其价值观或视角。¹⁰¹ 由于规范性承诺会影响说话者相信和断言的意愿，该观点主张，我们在决定是否遵从某位说话者时，应考虑其党派身份。这种方法或许有助于解释——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合理化——专家意见与公众意见之间的党派分歧。例如，共和党人可能不信任气候科学家，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专家属于自由派，未能展现出善意的信号；同样，民主党人可能对经济学家持怀疑态度，当这些经济学家被视为更偏保守派时。

在其他地方，我们（作者）各自都对“依赖党派立场通常在认识论上是理性的”这一观点表示过怀疑。¹⁰² 我们持怀疑态度的原因，正如沃斯尼普

（Worsnip）所精辟总结的那样：

若要合理地无视某人的证言，就不能仅仅认为此人不可信，而必须有充分的理由如此认为。仅仅持有一种认为所有专家都带有偏见的理论……并不足以构成理性地拒绝遵从他们意见的依据；必须有充分的证据来支持该理论。

103

换句话说，仅仅因为某人被假定的身份而认为其存在偏见，并不足以成为驳回其证词的理由。人们还需要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此类偏见确实在起作用。然而，人们也可能错误地假定价值观正在不当影响专家的判断。

为避免此类误判，个人若要基于党派立场合理地拒斥专家证言，必须满足特定标准。第一，规范性考量对证言者认识论标准的影响，相对于认识论价值的影响而言，不得微不足道。第二，证言者的规范性承诺必须与听者

的规范性承诺存在实质性差异。第三，听者不得对证言者的规范性关切产生误解。第四，听者必须了解这些规范性关切对证言者认识论标准所产生的影响（即，他们能对由证言者的道德与政治承诺所导致的规范性盲点作出恰当推断）。第五，听者必须基于所有这些考量来决定信任任何人。最后，听者自身的规范性关切不得严重偏离正轨。¹⁰⁴

普通公民通常极不可能满足这些条件。听众在多大程度上能准确把握作证者规范性承诺的内容？听众又在多大程度上了解作证者认识论价值观的严格程度？很可能的是，听众往往对某些技术性证据过于抗拒，而对另一些则抗拒不足。因此，仅基于专家的身份或其被假定的价值观就拒斥专家证言，通常是不理性的，并且忽视了评估其主张实质内容的重要性。

9 独立思考的危险

近年来，“自己做研究”（Do Your Own Research，简称DYOR）这一

劝诫获得了显著关注，尤其是在围绕有争议的社会和政治议题的网络讨论与辩论中。这一趋势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可被视为对社会机构信任度下降的回应。根据盖洛普（Gallup）的民调数据，美国民众对主要机构的平均信任度已大幅下降，从1979年的48%降至2022年的仅27%。¹⁰⁵ 这种信任危机波及多个领域，包括政府、媒体、科学机构和教育机构。随着人们对传统信息来源和专家权威的信任逐渐减弱，个体越来越多地转向其他获取知识的途径。“自己做研究”的心态正是这一转变的自然结果，鼓励人们绕过制度性的信息守门人，直接寻求信息。

纵观历史，许多著名思想家都强调了独立思考的重要性。约翰·洛克在其《人类理解论》中警告人们不要将权威视为知识的来源，并将其列为错误信念的主要来源之一。¹⁰⁶ 勒内·笛卡尔主张只应相信我们能够清晰直觉或确定推导出的东西，而非依赖他人的思想。¹⁰⁷ 伊曼努尔·康德为启蒙运动发出的号召是“Sapere aude!”（敢于运用你自己的理性！）。他敦促人

们摆脱“不成熟”状态——他将这种状态定义为在没有他人指导的情况下无法运用自身理解力。¹⁰⁸ 这些思想体现了对智识自主、自立和理性思维的深切推崇，而这些价值观一直是西方哲学传统的核心。

智识自主性是一种备受尊崇的理想。一些思想家认为，我们必须独立思考才能获得理解。¹⁰⁹ 虽然接受专家证言可能是通往真理的可靠途径，但它可能会阻碍我们对重要议题形成自己的理解。例如，艾莉森·希尔斯（Alison Hills）主张，仅凭证言来形成自己的道德信念在智识上是错误的或次优的，因为这与真正的道德理解不相容。¹¹⁰ 要理解某事，我们必须亲自把握其中的理由——我们不能仅仅被告知该相信什么。另有学者声称，一般而言，理解无法通过证言获得。¹¹¹ 因此，自己动手做研究是有价值的，因为它能提升你的理解力。

然而，问题在于，智识上的自主性是一条不可靠且充满风险的求知途径。¹¹² 尽管独立思考是一种值得赞赏的理想，但个体往往缺乏有效开展自主探究所必需的能力。例如，研究表明，

初学者往往很快对自己的判断变得过度自信。¹¹³（这被称为“新手泡沫”。）探究者倾向于过分倚重轶事或个人经验，同时低估专家证言和汇总数据的重要性。此外，人们倾向于以带有偏见的方式获取信息，有选择性地搜寻那些符合自己既有信念和愿望的内容（参见第五章）。若缺乏适当指导，许多个体便无法获得无偏见的信息，从而使自行开展研究的过程在认识论上充满风险。

尽管存在这些风险，在民主制度中培养独立思考仍具有重要价值。在集体决策的情境下，个体基于自身判断而非依赖专家意见，可能在认识论上更有益。例如，如果一个由大量个体组成的群体，每个个体具有中等程度的准确性（例如，55%的正确概率），当他们依据自己的判断进行投票时，多数人的决定反而可能比所有人都听从某位准确性更高的专家（例如，70%的正确概率）时更有可能正确。

¹¹⁴ 这是认识论民主理论中一个已被充分证实的结论（参见第二章）。然而，这一结论也揭示了个体认识论理性与集体认识论理性之间潜在的张

力：对个体而言，遵从专家意见看似理性，却可能削弱集体决策所具有的认识论优势。因此，有必要赋能公民，使其能够形成自己的观点，并有勇气运用自身的理解力。

10摘要

奥里吉（Origgi）写道：“政治认识论的核心问题在于，试图界定认知劳动在两种权威之间公平分配的原则：认知权威与政治权威。”¹¹⁵ 这一紧张关系由来已久：一方面，专业知识对于知情治理往往至关重要；另一方面，对专家的依赖似乎又与民主理念中公民平等和国家中立的原则相冲突。近期公众对专家和机构信任度的下降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动态关系。那些拒斥既有知识来源的民粹主义认识论的兴起，对循证政策制定构成了重大挑战。与此同时，这些反精英情绪也可能反映出公众对专家知识与公共价值观之间脱节的合理关切。

对于这些挑战，并不存在简单的解决方案。诸如提倡分工，或将专家视为

顾问而非权威等提议，虽提供了有前景的方向，但仍面临理论和实践上的障碍。确定专业知识在民主制度中的恰当角色是一项复杂的任务，需要认识论学者和政治理论家共同作出贡献。

关于专业知识在民主制度中应扮演何种恰当角色的持续争论，指向了有关民主制度本身性质与正当性的更深层次问题。如果民主制度难以有效运用专家知识或作出明智决策，我们是否应考虑其他治理模式？抑或民主制度能否在保留其核心民主价值的同时，通过改革更好地整合专业知识？在下一章中，我们将探讨若干针对民主制度“重新思考”的激进建议，以回应其面临的认识论挑战。这包括审视“知识精英统治”（epistocracy，即由具备知识者统治）以及“抽签遴选”（sortition，即由随机选出的公民进行统治）等主张。通过对这些替代方案的批判性评估，我们能够更深入地理解民主治理在面对复杂政策挑战的时代所具有的局限性及其持久价值。

注释

1. Eyal 2019; Nichols 2017。
2. Emmons 等, 2023; Fattal, 2024。
3. Flew 2021; Millar 2023。
4. 富勒2006年: 348页。
5. 赫兹2013年: 81页。
6. Brennan2023。
7. Majid2023。
8. 爱德曼信任研究所 2024; Majid 2023。
9. 爱德曼信任研究所2024年。
10. 皮尤研究中心 2023 年。
11. 皮尤研究中心2023年。
12. Stanovich2021b。
13. 皮尤研究中心2019b。
14. 皮尤研究中心, 2023年; 斯特吉斯等, 2021年。
15. 皮尤研究中心2023年。
16. 托克维尔 [1835] 2008年版: 第48页。
17. 托克维尔 [1835] 2008年版: 第48页。
18. 托克维尔 [1835] 2008年版: 第48页。

19. 托克维尔 [1835] 2008年版：第49页。
20. Nichols2017： 30。
21. Nichols2017： 30。
22. 乌尔比纳蒂2014： 83。
23. Origgi2015： 160。
24. 特纳2001年。
25. 弗里德曼1990年： 第65页。
26. Hardwig 1985； Nguyen 2022； O'Neill 2002。
27. Christiano 2012； Collins 和 Evans 2002, 2007； Kitcheer 2001。
28. Kitcheer 2011： 21。
29. 柯林斯和埃文斯， 2002年： 第276页。
30. Christiano2012： 51。
31. MacMullen2020： 99。
32. 参见安德森 2011： 146。
33. Bohman 2000； Christiano 2012。
34. 道指2017年。
35. MacMullen2020： 99。
36. Lackey2018。
37. 埃斯特伦德2008年： 第40页。
38. Origgi2015： 164。

39. Grundmann 2025; Moore 2017; Worsnip 即将出版。
40. Goldman 2018; Grundmann 2025。
41. Goldman 2018: 4。
42. Grundmann 2025。
43. Goldman 2018: 4。
44. Constantin and Grundmann 2020; Origgi 2015。
45. 沃斯尼普即将推出。
46. 安德森 2011: 145。
47. 特纳 2001 年: 第 146 页。
48. 柏拉图 1997 年版: 170e。
49. 柏拉图 1997 年版: 171c。
50. Goldman 2001; Grundmann 2025。
51. Guerrero 2017: 162。
52. Guerrero 2017: 176。
53. Grundmann 2025。
54. Ballantyne 2019a。
55. Goldman 2001: 95。
56. Goldman 2001: 106, 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57. Grundmann 2025。
58. Friedman 2019: 61。
59. Brennan 2020; Guerrero 2017; Lane 2014。

60. Guerrero2017。
61. Anderson2011。
62. Guerrero2017。
63. Goldman2001。
64. Anderson2011。
65. Guerrero2020。
66. Lamb 2020; Talisse
2009a。
67. 罗尔斯1993： 383。
68. Kaye2015： 319。
69. McGrath2008。
70. 埃斯特伦德2008年： 30–31
页。
71. 埃斯特伦德2008年： 第40
页，强调为笔者所加。
72. Viehoff2016： 406。
73. 埃斯特伦德1993年： 第88
页。
74. Lamb2020： 922。
75. 埃斯特伦德1997年： 第183
页。
76. Hazlett 2016; van Wiet-
marschen 2019。
77. Christiano 2012; Lippmann
[1922] 1998; Pamuk
2021。

78. Douglas 2009; Longino 1990。
79. Pamuk2021: 47。
80. 特纳2001年: 第127页。
81. Friedman2019: 5。
82. Friedman2019: 5。
83. 弗里德曼2019年: 38。
84. 弗里德曼2019年: 46页。
85. 弗里德曼2019年: 51–57页。
86. 李普曼 ([1922] 1998) 。
87. 李普曼 ([1922] 1998) : 381–384。
88. Rosenfeld 2019: 101–102。
89. Vallier2020。
90. Müller2016。
91. Hazlett 2022; Müller 2016; Nichols 2017。
92. Hazlett 2022; Müller 2016。
93. Hazlett2022: 98。
94. 安德森2011年: 第146页。
95. Levy 2019, 2022a。
96. Levy2019: 314。
97. 勒普特尔2020年: 第63–64页。

98. Douglas 2009; Lakatos 1970。
99. Rudner 1953: 2; 另见 Douglas 2009。
100. Lepoutre 2020: 90。
101. Rini 2017: 52; Levy 2019: 322; Brinkmann 2022。
102. Hannon 2022b; Woodard 即将出版。
103. 沃斯尼普即将推出。
104. Hannon 2022b: 14。
105. Ballantyne 等, 2022 年。
106. 洛克 [1690] 1997年版, 第四卷, 第十七章, 第19节, 第60页。
107. 笛卡尔 [1637] 1998年。
108. 康德 [1741] 1991年。
109. Levy 2022b; Matheson 2022。
110. Hills 2009。
111. 普里查德 2016; 扎格泽布斯基 2007。
112. Levy 2022b; Matheson 2022。
113. Ballantyne 等, 2022 年。
114. 古丁与斯皮克曼, 2018年。

更多资源

- 安德森，伊丽莎白（2011）。《民主、公共政策与公众对科学证言的评估》。《知识论》8.2，第144–164页。
- 克里斯蒂亚诺，托马斯（2012）。《专家与公民之间的理性审议》。载于约翰·帕金森与简·曼斯布里奇编，《审议系统：大规模的审议民主》。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第27–51页。
- 道格拉斯，希瑟（2009）。《科学、政策与价值无涉的理想》。匹兹堡：匹兹堡大学出版社。
- 戈德曼，阿尔文（2001）。《专家：你该信任哪些人？》，《哲学与现象学研究》63.1，第85–110页。
- 格伦德曼，托马斯（2025）。《专家知识》，载于詹妮弗·拉基与艾丹·麦格林主编：《牛津

社会认识论手册》。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

- 摩尔，阿尔弗雷德（2017）。《批判性精英主义：协商、民主与专业知识问题》。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
- 帕慕克，泽内普（2021）。《政治与专业知识：如何在民主社会中运用科学》。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 特纳，斯蒂芬（2001）。《专家的问题何在？》，《科学的社会研究》31卷第1期，第123–149页。
- 伍德沃德，艾莉丝（即将出版）。《党派顺从有何不妥？》，载《牛津认识论研究》第8卷。塔玛尔·萨博·詹德勒、约翰·霍桑、朱莉安·钟与亚历克斯·沃斯尼普编。牛津大学出版社。
- 沃斯尼普，亚历克斯（即将出版）。“对专家的遵从。”《认识论指南》（第三版）。乔纳森·丹西、欧内斯特·索萨、马蒂亚斯·斯托普与库尔特·西尔万编。威利-布莱克威尔出版社。

10 重新思考民主

DOI:10.4324/9781003089483-11

民主通常比我们尝试过的其他制度表现得更好。但我们尝试过的其他制度都很糟糕，因此这个标准并不高。——杰森·布伦南，
《民主之辩》

引言

在世界各地，民主常被视为治理的黄金标准。它代表着一种集体努力，旨在以反映人民意愿的方式塑造我们的未来，确保每个人的声音都能被听见，每一张选票都能产生影响。然而，这一崇高愿景正面临诸多挑战。公众的无知阻碍了选民做出明智决策的能力；党派偏见扭曲了公民对现实的认知；两极分化侵蚀了合作与妥协所必需的相互理解；人们对专家、政治人物以及彼此的信任正在下降。民主本身正陷入危机——至少我们不断被告知如此。

鉴于这些挑战，重新思考民主的未来，乃至更激进地构想全新的治理模式，变得至关重要。本章将探讨两种广泛的方式来“重新思考”民主，以应对其所声称的缺陷。

首先，我们考虑一些提议，这些提议主张将权力从普通公民手中转移给那些被认为更有能力的人。我们将这种方法称为**民主悲观主义**。悲观主义者认为，民主制度存在固有的局限性，无法通过改革或创新得到充分解决。他们主张，民主的本质——强调平等参与和多数决原则——本身就必然导致糟糕的政策决策。尽管对民主的悲观态度有多种形式，但我们的关注点将集中在**知识精英统治**

（epistocracy）上——这是一种政治影响力与个人知识或能力成正比的制度。

在考察了支持与反对知识精英统治

（epistocracy）的论点之后，我们将转向一些旨在将权力重新交还给普通公民、增强其集体自治机会的提案。我们将这种方法称为“民主乐观主义”

（democratic optimism）。乐观主义者承认现代民主制度存在诸多缺

陷；然而，他们试图运用民主的规范性标准（例如平等参与、审议和自治），构想出新的制度安排，以更好地实现这些标准。其目标在于将民主的核心原则与关于“共同治理”之新理念相协调。我们鼓励读者将这些构想视为开启更广泛讨论的起点，而非确定无疑的解决方案，以共同探讨民主制度可能的演进方向。

1 动机性的认识精英统治

在《反对民主》一书中，杰森·布伦南批评民主制度存在系统性缺陷，认为它助长了无知、非理性以及对抗性的部落主义。他声称，知情的公民反而容易受到无能多数群体一时兴起的摆布。尽管布伦南认同知识论工具主义的观点，即政治制度应以产生明智决策为目标（参见第二章），但他认为民主制度未能实现这一目标。相反，他主张“知识精英统治”（epistocracy），认为政治决策权应仅限于具备必要知识或能力的人。

尽管布伦南是最近且最直言不讳的贤能政治（epistocracy）倡导者，但这一理念远非新颖。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描绘了一个由少数精英而非多数民众治理的理想社会。他设想了一个由哲人王组成的统治阶级，他们致力于追求正义与公共利益。虽然如今很少有人赞同柏拉图那种极端的构想，但“由具备知识者执政”这一理念却具有直观的吸引力。毕竟，没人愿意搭乘由未经训练的飞行员驾驶的飞机，那么我们为何要接受由无知者做出的政治决策呢？

精英统治（Epistocracy）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与柏拉图所构想的由少数精英统治的乌托邦不同，它们不必是僵化或等级森严的。¹ 例如，精英统治可以将投票权限于那些通过能力测试的人（第2.1节），给予受教育程度更高者更多投票权（第2.2节），或通过抽签选出一小群选民，并赋予他们胜任投票所需的技能（第2.3节）。其他模式包括授权一个智者委员会否决质量低劣的民主决策（见第2.4节），或汇总选民的“开明偏好”

（见第2.5节）。我们将在下文讨论这些可能性。

根据大卫·埃斯特伦德（David Estlund）的观点，精英统治（epistocracy）的主张依赖于以下三个信条：

1. 真理原则：至少某些政治问题存在正确答案。
2. 知识信条：有些人比其他人更了解这些真理。
3. 权威原则：知识较多者应拥有对知识较少者的政治权威。

真理原则本身具有独立的合理性。正如第1章和第2章所讨论的，很难坚持认为政治领域中不存在更好或更差的决策，或者关于政治事务根本不存在任何真理。如果你否认真理原则，那么你就无法断言任何人在其政治观点或决策上是错误的。你还必须相信，关于社会应当如何行动，不存在任何真理。这些推论似乎难以令人信服。因此，许多人愿意接受真理原则。

知识原则又如何呢？是否有些人比其他人拥有更好的政治判断力？苏格拉底明确拒绝了这一观点。他认为并不

存在相关意义上的专家，因此精英统治（epistocracy）所隐含的威权主义倾向并不值得我们担忧。一些当代学者也持苏格拉底式的怀疑态度。例如，杰弗里·弗里德曼（Jeffrey Friedman）和保罗·冈恩（Paul Gunn）指出，我们几乎没有理由认为所谓的专家（例如拥有社会科学知识的人）具备足够的知识，能够避免犯下与选民所犯同样严重的错误。³ 朱利安·赖斯（Julian Reiss）也持类似立场。他说：“根本不存在所谓更优越的政治判断力。”⁴

正如第九章所讨论的，任何被提出的“政治专家”例子都可能引发争议。然而，这并不必然构成否定优越政治判断力存在的理由。正如埃斯特隆德

（Estlund）所指出的，知识原则“并未声称人们会普遍同意谁是谁更优秀的认知者；它仅仅断言这样的人是存在的，而非任意两个人都会就他们是谁达成一致。”⁵ 若要否定知识原则，就必须主张：无论接受多少训练或掌握多少专业知识，都无法帮助任何人对经济、环境政策和外交事务等复杂而专业的领域做出更优的判断。这种说

法似乎过于极端。因此，我们可以谨慎地承认，某些人在做出政治决策方面确实优于他人，即使人们对于究竟谁是这些更优秀者存在合理的分歧。

权威原则又如何呢？那些拥有更多知识或更好判断力的人是否应当拥有更大的政治权威？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持肯定态度：他们认为知识能够证成权力。⁶然而，埃斯特伦德（Estlund）主张我们应当拒斥权威原则，因为它犯了“专家/老板谬误”（expert/boss fallacy），即错误地假定某人一旦拥有认知权威（epistemic authority），也就同时拥有政治权威。⁷埃斯特伦德声称，这种推论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合法的政治权威需要一种能够被所有合理观点所接受的证成。⁸然而，关于谁有资格被视为专家，人们存在合理的分歧。正如埃斯特伦德所言：“没有任何一位知识拥有者足够‘可知’，以至于能被所有理性公民所接受。”⁹

总之，我们可以承认存在政治真理，且有些人知晓这些真理。然而，关于谁是这些专家，人们会有合理的分歧。若无法就谁有资格被视为专家达

成一致，那么任何人都不能以智慧为基础合法地进行统治。因此，据埃斯特隆德（Estlund）所言，我们必须拒斥权威原则。

布伦南同意“权威原则”是错误的，但他否认精英统治（epistocracy）依赖于该原则。相反，他表示精英统治需要以下的反权威原则：

反权威原则 当某些公民在政治上道德上不合理、无知或无能时，这就构成了不赋予他们对他人政治权威的理由。¹⁰

与规定拥有权力之标准的权威原则不同，反权威原则阐明了禁止或限制他人权力的理由。精英治国论者（epistocrat）无需主张专家应当成为上司；他们只需坚持认为，无能者不应掌权即可。

这一回应虽具前景，却引发了一些问题：我们如何识别那些无能者？又由谁来决定评判标准？知识精英统治（epistocracy）体系会是什么样子？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探讨五种知识精英统治模式，每种模式都提出

了不同的方法，以提升知识更丰富或能力更强者在政治上的权力。

2 实践中的精英统治

精英统治在实践中会是什么样子？精英统治论者面临的最紧迫挑战之一是如何实施他们的制度。精英统治论者已考虑了若干选项：能力测试、复数投票制、选举权抽签制、精英否决权以及开明偏好投票制。每种方案各有优劣。下文将逐一讨论每种模式的具体细节及其潜在缺陷，随后在第3节转向对精英统治的一般性反对意见。

2.1 选民资格考试

人们普遍认为普选权是公正的。它体现了民主理想，即政府应属于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然而，布伦南认为，普选权是不公正的，因为它侵犯了我们拥有一个称职选民群体的权利。他提议以一种“温和的智识统治”

（moderate epistocracy）取代普选制，在这种制度下，投票权仅限于那些展现出足够政治能力的公民。¹¹

布伦南主张限制选举权的核心论点基于以下原则：

能力原则 若因一个无能或道德上不合理之审议机构所作的决定，或因以无能且道德上不合理之方式所作的决定，而通过武力及武力威胁剥夺公民之生命、自由或财产，或显著改变其人生前景，则此乃不公正之举。¹²

能力原则是反权威信条的一种形式：它指出，每个人都有权不被无能或不合理之人所统治。

在捍卫这一原则时，布伦南指出：“强迫我接受一名无能外科医生的手术，或强迫我与一名无能的船长一同航行，都是错误的。”同理，强迫我“服从无能选民所作的决定”也是错误的。¹³ 那些对他人行使权力的人必须具备相应的能力；若不具备，则不应拥有支配他人的权力。

基于能力剥夺公民选举权的想法可能令人不安。然而，所有现代民主国家实际上都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了知识精英统治（epistocracy）。试想，儿童被系统性地排除在选民群体之

外，正是因为他们被认为不具备治理资格。¹⁴ 因此，我们实际上已经默认，某种形式的能力对于负责任地参与民主进程至关重要。

有限选举权在实践中如何运作？布伦南建议设立一项选民资格考试，用以筛除那些无知或信息错误的公民。通过考试者将证明自己对所投票的政策、候选人和议题具备足够的了解。在这一模式下，知识精英统治（epistocracy）保留了代议制政府以及现代民主制度的许多特征，但有一个关键区别：投票权必须通过努力获得，而非自动保障。

选民能力考试不必过于严苛。它可以设计为仅排除信息最匮乏的10%人口。通过设定较低的门槛，我们既能允许大多数人投票，又只排除最缺乏了解的群体。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担忧普遍无知现象的人，门槛也可以设得更高一些。例如，该考试可以设计成只有人口中知识最渊博的10%才能通过，从而确保只有最具知识的人拥有投票权。

我们如何确定谁才算具备知识？确定考试内容本身就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布伦南（Brennan）建议，在美国，我们可以采用“美国国家选举研究”（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 Studies）中的问题，或社会科学中常用的标准政治知识测试题。我们也可以要求选民通过公民入籍考试、解答逻辑或数学谜题，或者在地图上至少识别出世界上50%的国家。¹⁵ 尽管这些方法并未直接测试相关的政治知识，但人们假定在这些测试中取得高分与选民的胜任能力存在相关性。或者，我们也可以直接测试相关的政治知识。例如，我们可以提出有关候选人背景、主要议题以及候选人对这些议题立场的问题。

2.1.1 对选民资格考试的异议

选民能力考试面临若干挑战。我们将在此聚焦其中两点。首先，可能无法设计出一种能够有效测试所需知识的考试。正如第四章关于选民无知问题所讨论的，何为相关知识本身存在合理争议。为克服这一难题，我们或许可以将制定选民资格考试的任务委托

给一个由政治知识专家组成的委员会。但这只是将问题推高了一个层次：我们现在必须弄清楚如何遴选这些专家。¹⁶ 另一种选择是允许普通公民通过民主方式决定何为政治能力。¹⁷ 然而，这种做法的风险在于，它依赖的仍是同样缺乏充分信息的选民来界定能力标准，这可能过于乐观。

其次，选民资格考试会引发人们对偏见、滥用权力和制度被操控的担忧。任何选民资格考试的设立都涉及对“何为合格投票所必需的知识”作出判断。这些判断具有高度主观性，并可能受到当权者偏见的影响。这可能导致考试偏向于优势群体的利益、价值观和观点，系统性地损害特定人群的权益，从而破坏公平平等代表的原则。事实上，历史上选民资格考试曾被用来剥夺某些群体（如少数族裔或社会经济地位较低者）的选举权。

此外，特殊利益集团可能会对负责设计和管理考试的机构施加影响。他们可能游说要求在考试中纳入或排除某些主题、观点或视角，从而按照自身利益塑造选民群体。这些团体还可能主张修改考试的评分体系、及格分数

线，甚至考试的频率和可及性，而所有这些改动都可能有利于特定人群。此类担忧可能会削弱限制选举权制度在公众心目中的合法性。

我们在第3节中回到对合理分歧、滥用和非法性等问题的关切。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针对特定认知精英统治体系所提出的许多担忧具有普遍性，但理解这些担忧如何适用于每一种体系仍是有价值的。

2.2 复数投票

另一种精英统治形式是复数投票制。

¹⁸ 在这一制度下，并非限制选举权，而是向受教育程度较高者额外分配投票权，而受教育程度最低者则每人仅限一票。约翰·斯图尔特·密尔曾倡导这一制度。他认为，尽管每个人都应在政治过程中拥有发言权，但并非每个人都应拥有同等的发言权；那些拥有更多知识或更高教育水平的人应被赋予额外的投票权。（值得注意的是，密尔认为文盲、缺乏基本数学能力者以及接受公共福利救济者不应拥

有投票权，但这一点我们暂且搁置不论。)

密尔为复数投票制提出了若干理由。

¹⁹ 首先，他声称公众的无知会导致不良的政策后果。例如，他推测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可能会选出支持短期经济政策的代表，比如对富人征收过高的税收，从而危及经济稳定。复数投票制旨在作为一种防范机制，以避免此类缺乏充分信息的投票行为。

其次，密尔认为复数投票制将对国民教育产生积极影响。他主张，平等投票会对“选民的思想产生不良影响”，因为它助长了一种错误观念，即无知与有知的意见具有同等价值。²⁰他担心，这可能导致选民产生自满情绪，阻碍他们追求教育或自我提升。相比之下，复数投票制将在象征意义上强调教育的重要性，为智力发展提供明确的激励。

第三，密尔认为，与复数投票制相比，平等投票是不公正的。他断言：“当所有人都拥有投票权时，无论在原则上还是事实上，都必须采取某种方式，赋予受过更多教育的选民的投票

以更大的权重。”²¹ 在密尔看来，给予无知者与博学者的意见同等权重是不公正的。正如不平等地对待平等者是不公正的，将不平等者视为平等者同样也是不公正的。

但密尔为何认为几乎每个人都应至少拥有一票？为何不将选举权限制在受过教育的人群之中？密尔给出了若干理由。首先，他强调普选权具有积极的教育作用。他认为，参与选举过程能够教育公民，增进他们对公共事务的理解，并激发其对国家政策与治理的兴趣。²² 其次，普选权扩大了影响公共决策的经验、观点和关切的来源范围，从而使政策更能准确反映全体人民的共同需求与集体智慧。正如密尔在1866年的一次议会演讲中所言：“每个阶层都了解一些其他阶层所不太知晓的事情，每个阶层也都有或多或少属于自身的特殊利益，而对其利益最有效的保障莫过于由其自身来维护。”²³

复数投票制，如同选民资格考试一样，引发了关于实施方式的实际问题：我们应依据何种标准来决定谁获得更多投票权？密尔提出，受教育程

度较高者——例如拥有大学学位的人——应获得额外的投票权。埃斯特伦德将这一观点称为“学识统治”

（scholocracy）。除了教育程度之外，密尔还倾向于将某些职业作为更高智力水平的替代指标。例如，他认为技术工人或许应比非技术工人获得更多投票权，而担任监督职务者则应获得更多。密尔还认为，那些需要长期心智训练的专业人士——如律师、医生、神职人员和公职人员——应获得最多的投票权。

除了职业和教育之外，密尔指出，一个有效的复数投票制度应包含一系列考试。这使得那些没有正式教育资历的人也能证明自己值得获得额外的投票权。密尔并非希望利用考试来限制投票权，而是希望将其作为一种机制，用以授予更多投票权。

一种复数投票制度融合了柏拉图对民主的怀疑与亚里士多德对大众智慧的信心（参见第二章）。与柏拉图一样，密尔强调少数人的更高智慧；与亚里士多德一样，密尔也认同多元视角对于政治决策具有宝贵价值。²⁶ 他的复数投票制度试图在普选权这一民

主原则与实现有效治理的目标之间取得平衡。

2.2.1 对复数投票制的反对意见

尽管存在支持复数投票制的论点，但该制度并非没有重大挑战。在此，我们探讨反对这一制度的六个论点。

首先，我们可以质疑“受教育程度更高的选民会做出更明智的选择”这一假设。正如第五章所讨论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往往具有强烈的党派偏见，这可能会扭曲其政治判断。同样，威廉·罗布森（William Robson）认为，高等教育与政治敏锐度之间并无关联，并指出：“大学选民权并未显示出大学毕业生比其他任何选区的选民更具智慧或判断力。”²⁷ 密尔（Mill）几乎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来支持“受教育程度更高的选民更有可能出于公共利益投票”这一主张。

第二，受过教育的社会群体可能不成比例地具有某些认知上不利的特征，从而抵消教育带来的益处。正如埃斯特隆德（Estlund）所指出的，高水平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集中于某些种

族、阶级以及（过去）特定性别的人群中。如果我们采用一种主要从特定人口统计背景中挑选人员的标准，即便选民怀有良好意图，这也可能导致集体决策产生偏倚。这可能会损害决策的质量。我们将在第3.3节中再次讨论这一异议。

第三，我们可以质疑密尔那种乐观的信念，即复数投票制将显著促进公民教育。尽管密尔以此作为推行复数投票制的动因，但他并未为此假设提供多少证据。复数投票制或许非但不能鼓励公民成为更开明的政治参与者，反而可能产生相反的效果：那些感到自身影响力被削弱的人可能会彻底退出政治参与。

第四，复数投票制有可能加剧社会分裂与不满情绪，从而损害政治稳定。通过将公民划分为不同类别的选民，复数投票制可能加深社会裂痕，并在那些被认为不够资格获得多票的人群中滋生怨恨。这可能激化社会冲突，破坏民主治理所必需的社会凝聚力。

第五，制定公平且客观的标准来授予额外投票权充满困难。密尔建议以教育程度作为标准，例如给予大学毕业生额外的投票权。然而，这一标准极具争议。如前所述，长期以来，高等教育在性别、种族、阶级、宗教及其他因素划分的群体之间分配极不均衡。因此，依据教育程度分配投票权可能会加剧现有的社会、经济和教育不平等。此外，究竟何种教育水平才算“足够”，或哪些职业应获得更多投票权，也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

最后，如果选民认为该制度不公平，或偏袒某些群体，那么对民主机构的信任以及对民选政府合法性的认可可能会削弱。这种信任的丧失可能损害民主制度的整体健康与稳定。

2.3 选举权抽彩

一种替代普选制且无需能力考试的方案是“选举权抽签制”。³⁰ 在该制度下，选举周期照常进行，但没有任何公民自动拥有投票权。相反，投票权仅限于随机选出的一组公民，他们将

获得更强的激励和更多机会去获取相关信息。

该方法由克劳迪奥·洛佩斯-格雷拉（Claudio López-Guerra）提出，采用两阶段程序来分配投票权。在第一阶段，每次选举前通过抽签方式缩小合格选民的范围，仅留下随机选出的一部分人拥有投票资格。这一过程被称为“排除性抽签”（exclusionary sortition），用于决定哪些人将无权参与下一次选举。根据该模型，大多数选民被系统性地剥夺了选举权，仅剩下一小部分“预选民”参与选举。这种抽签在每次选举前都会重复进行。

然而，通过抽签被选中并不自动赋予投票权。³¹ 这些预先选出的选民被认为并不比普通大众更具能力。为了获得投票权，他们必须首先参与一个能力培养过程，以接受教育，从而做出更明智的决策。这是赋权抽签的第二阶段。

这一能力建设过程受到詹姆斯·费什金（James Fishkin）“审议式民意调查”（deliberative polls）的启发。³² 这类调查旨在通过向公众提供必要的信

息、时间以及有利于深思熟虑的环境，从而提升公共意见的质量。在该制度下，选民将在选举前一至两周聚集在一起，获得简报材料、专家访谈机会以及深入讨论的平台。他们将参加候选人和政策团队的演讲与辩论，并可就关键政策议题直接与专家互动。这一阶段旨在确保所有参与者——无论其初始知识水平如何——在投票前达到更高的能力水平。

该制度具有若干潜在优势。首先，与复数投票制类似，它激励选民获取更多信息。通过放大每张选票的影响力，并要求选民完成一个能力培养过程，抽签赋权机制鼓励选民收集更多信息，并为此提供了充分的机会。其次，与选民资格考试不同，它尊重政治平等的理想，给予每位公民同等的入选机会。³³ 由于剥夺选举权是随机进行的，因此不会基于知识水平或其他任何因素进行歧视。这样一来，它便避免了埃斯特兰德（Estlund）所担忧的“令人反感的比较”——即基于不恰当标准（包括能力）对人们做出不公正或不公平的评判。³⁴

2.3.1 对赋权抽签的异议

选举权抽签制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构想，但仍有许多细节需要厘清。预先选民的随机样本规模应有多大？将采用何种随机方法？能力培养过程具体会如何进行？由谁来决定选民需要了解选票上选项的哪些内容？参与是否具有强制性？尽管这些问题都很重要，我们将暂且搁置，转而聚焦于对选举权抽签制的三项主要反对意见。

首先，人们怀疑仅凭一两周的讨论和陈述，是否足以让选民充分了解政治议程中除极小一部分议题之外的其他问题。正如伊利亚·索明（Ilya Som-in）所指出的那样，现代政府的规模之庞大、结构之复杂以及管辖范围之广泛，使得选民即使经过短暂的学习和能力培养，也很难（即便不是完全不可能）获得充分的信息。³⁶

第二，选举权抽签制度可能会助长公众的无知。密尔曾著名地指出，普选权具有教育作用，因为它激励公民主动了解政治议题。然而，那些被排除在投票之外的人却几乎没有动力去学习政治事务。尽管理性无知理论认

为，由于个人选票的影响微乎其微，选民缺乏充分了解政治信息的动机，但若通过抽签制度剥夺大多数人的选举权，则可能进一步削弱政治参与所带来的“提升与高尚化影响”，因为“他们的决定无关紧要”。³⁷

第三，与普选制相比，赋权抽签制度更不容易被视为公平或合法。³⁸ 在赋权抽签制度下，公民可能会质疑政治进程是否被操纵或扭曲，以偏向某些特定结果。这种怀疑源于该制度采用了一种透明度较低的方式来决定谁拥有投票权。用于随机抽选的技术对大多数人而言难以理解。此外，设计能力培养过程的人有充分的机会使该过程产生偏倚。例如，设计者必须决定讨论哪些议题、邀请哪些专家发言，以及制定讨论规则。由于选民群体的投票偏好会经常性地——甚至可能显著地——偏离全体民众的偏好，这种对合法性的担忧进一步加剧。事实上，这种偏离正是该制度设计所预期的。³⁹ 我们将在第2.5节重新探讨此类偏离是否值得我们担忧。

2.4 贤能否决权

另一种选择是混合制度：普选制辅以知识精英否决权。⁴⁰ 在这一制度下，所有公民拥有平等的投票权，法律通过正常的民主程序获得通过。然而，一个知识精英委员会有权审查并可能否决由民选机构通过的立法。尽管该知识精英委员会无权制定法律或任命任何官员，但它可以废除法律。

否决委员会在一个原本民主的体系内充当保障机制，其成员因其专业知识而被遴选，并被授予阻止立法的权力。该委员会的宗旨是防止那些考虑不周、基于错误信息或可能损害公共利益的政策获得通过。其基本假设是，拥有更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人更有能力评估拟议立法的优点与弊端。

对于该提案的具体细节，有许多可能的填充方式。⁴¹ 例如，该体系可以包含一个单一的委员会，也可以包含在不同政府层级运作的多个委员会。委员会成员资格可以授予任何通过一系列严格能力考试的公民，也可以从符合高标准能力要求的公民群体中随机遴选。若要推翻民主立法，委员会可

以要求简单多数票，也可以要求超级多数票。

布伦南指出，这一制度“可能比有限选举权或复数投票制的认识论精英统治更具感知上的合法性。”⁴² 该制度赋予每个人投票权，尊重了“人民治理”的民主理想。与复数投票制不同，它尊重了民主的基本价值，即每个人的声音具有同等价值。此外，它还为制度提供了一种有益的制衡机制：通过赋予一个知识型机构否决那些虽受民众欢迎但具有破坏性的决策的权力，有助于确保公众舆论的短期波动不会导致有害的立法。

2.4.1 对知识精英否决权的异议

然而，知识精英否决权面临着一些人们所熟知的反对意见。首先，知识精英委员会的成员将如何遴选尚不清楚。应采用何种标准或资格条件？又如何确保这些标准在应用过程中的公平性？精英主义倾向以及排斥多元观点的风险是一个重大关切。鉴于人们对何为相关专业知识存在合理的分歧，任何设立此类委员会的方法都可能引发争议。

第二，专家们可能会优先考虑自身利益或组织严密的利益集团的利益，而非公共利益。无法保证一小群专家能够免受政治压力的影响，更令人担忧的是，他们还将脱离民主问责机制。因此，他们几乎没有动力去帮助那些刻意被排除在控制权之外的民众。历史表明，小型精英群体往往以有利于自身而非整个社会的方式进行统治。

43

第三，与此相关的是，尚不清楚知识精英理事会的成员将如何被问责，尤其是当他们基于专业知识而非通过选举产生时。这加剧了人们的担忧：该理事会可能沦为固化特定精英阶层利益的工具。若缺乏明确的问责机制，理事会就有可能以一种脱离公众关切与利益的自主性运作。

2.5 启蒙偏好投票

想象一下，你遇到了一个比你聪明得多的自己。这个人与你在各个方面都完全相同（例如外貌、职业、教育程度、收入和宗教信仰），只是他/她拥有更多的知识。因此，你们的政治观

点有所不同。例如，你认为政府在对外援助上的支出太多，但这个更了解自己的自己却认为支出太少；你认为应该对企业加强监管，而这个更了解自己的自己却认为应该减少监管。即便你不同意他/她的政治观点，你是否仍希望这个更了解自己的自己代替你投票？

一种激进的建议是，选举结果不应由公众实际的投票偏好来决定，而应由公众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本应持有的偏好来决定。布伦南将这种做法称为“开明偏好投票”。根据这一理论，应通过一个统计模型来处理全民普选的选票，该模型旨在估算公众在充分了解政治相关议题的情况下会持有怎样的政治偏好。其目标是估算出一个在人口统计特征上完全相同的公众群体，若其政治知识更为丰富，将会表达出何种意愿。

这听起来或许像是科幻小说。然而，几十年来，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一直在运用统计方法估算知识对政治偏好的影响。⁴⁶ 所涉及的统计建模相当复杂，但其基本思路却很直接。首先，开展一项调查，追踪公民的政治偏

好、人口统计特征以及基本客观政治知识的水平。一旦收集到这些数据，便可用来估算一个完全知情选民群体的偏好，同时控制种族、性别、收入、地域及其他人口统计变量等因素。控制这些变量至关重要，因为它使我们能够确信，偏好的任何变化都应归因于知识水平，而非种族或收入等其他因素。这种方法使我们能够推断出：像你这样的人——但拥有更多知识——会持有什么样的偏好。

在这一制度中，选举结果并非由“原始”选票决定，而是基于假设所有选民都充分知情的情况下本应出现的结果。重要的是反事实选民群体的意见，而非实际选民群体的意见。例如，如果实际公众支持候选人A，但“开明”公众支持候选人B，那么当选的就是候选人B。⁴⁷

这一投票制度具有若干优势。首先，它允许每位公民（包括儿童）投票，从而避免了因限制选举权而引发的反对意见。其次，它平等分配政治权力。尽管每位选民都必须参加一项基础政治知识测验，但该制度并不会将更多票数分配给信息更充分者，也不

会赋予知识最渊博者否决权。第三，启蒙偏好投票（enlightened preference voting）不要求任何人将自己的政治判断权让渡给他人，而是运用社会科学方法来确定我们自身理想的偏好。第四，它消除了识别谁是专家的必要性，从而避免了潜在的争议。最后，这一制度并不要求我们“培养更优秀的选民”⁴⁸——我们无需设法通过教育来提升民众的政治能力，而只需对某人完全知情状态下的反事实自我进行建模即可。

2.5.1 对开明偏好投票的异议

尽管有这些优势，开明偏好投票仍依赖于若干值得质疑的假设，并采用了极易出错的社会科学方法。下文我们将探讨该制度面临的五个挑战。

首先，用于评估政治知识的测试是否恰当？该制度的支持者推荐一种“公民式”知识测试，通常包括有关政策议题、政府结构、公职人员职责以及政治意识形态的问题。⁴⁹ 然而，这些主题相当晦涩，可能与做出明智的政治选择并无关联。因此，我们或许可以质疑：在此模型中所谓的“充分知

情”，是否在哲学上有意义、在政治上相关地对应于真正意义上的知情。

其次，由“开明偏好”主导的政府为操纵和滥用留下了大量空间。⁵⁰试想，共和党人往往在某些类型的问题上比民主党人答得更正确。如果由共和党人执政，他们就可以确保这些问题出现在测试中，并赋予其很高的权重。他们可以通过修改测试内容或评分方式来实现这一点。这样一来，就可能显得更多共和党人是“充分知情”的。

第三，由谁来决定人口统计类别应如何划分？一个具备“开明投票”（enlightened voting）功能的系统，本应预测选民群体在获得更充分信息的情况下会想要什么。为此，该模型必须考虑可能影响选民态度和偏好的各种变量，例如教育程度、收入、年龄、党派倾向、种族、性别、婚姻状况、职业、宗教信仰、是否拥有住房、是否为人父母、财务状况以及居住地等。如果我们不对其中任何一个变量加以控制，模型就无法说明“与相关群体类似的选民”在信息更充分时会想要什么，而只能反映出“获得更多信息”这一因素的平均效应。然而，我们

有理由担忧：如果以不同的方式划分人口统计类别，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果。

第四，我们是否应该被强迫去做那个拥有更多信息的“自我”会做的事？试想以下情景：你疯狂地爱着杰西，但你那个“开明的自我”却更愿意与杰米结婚。那么，你是否应该被强迫去娶（嫁）杰米，尽管你本人更想娶（嫁）杰西？这似乎不应该！同理，你那个拥有更多信息的“自我”可能更倾向于投票给惠特莫尔，而你当前的偏好却是布莱克伍德。那么，你投给布莱克伍德的票，是否应该被算作投给惠特莫尔的票呢？

在一个“开明”的投票制度中，你投给某位候选人的选票实际上可能被算作其对手的选票。这意味着，社会大多数人都可能投票支持布莱克伍德

（Blackwood），但最终当选的却是惠特莫尔（Whitmore）。在这一制度下，“人民”并不能如愿以偿。相反，执政群体是由实际选民群体通过统计方法推导出的一个假想选民群体。正如布伦南（Brennan）所承认的那样：“在开明偏好投票制度中，他

们〔人民〕并非真正地自我统治。相反，是一种被建构或模拟出来的公众在统治真实的公众。”⁵¹ 我们是由我们反事实的自我所统治的。

最后，这一系统可能会无意中助长公众的无知。如果我们的选举选择是通过一个估算我们“知情偏好”的模型进行过滤的，那么公民还有什么动力去主动获取知识呢？克里斯托弗·阿尔斯特罗姆-维杰（Kristoffer Ahlstrom-Vij）回应道：“在当前的选举制度下，我们显然缺乏激励自己获取信息的动力。”⁵² 然而，情况可能会变得更糟，进一步加剧公众的无知：那些原本消息灵通的人可能会失去继续保持知情的动力，而信息匮乏者则可能变得更加无知。

3 对知识精英统治制的一般性反对意见

精英统治论（epistocracy）的核心在于我们可称之为“工具主义假设”的观点。该假设认为，政治制度仅凭其工具性理由便可得到连贯的辩护或批

评。正如布伦南（Brennan）所写道：

民主不过是一把锤子……当我说民主是一把锤子时，我的意思是它只是一种达成目的的手段，而非目的本身。我将论证，民主本身并非内在公正的。它不能以程序主义的理由获得正当性。民主所具有的任何价值，纯粹是工具性的。⁵³

如果这种纯粹工具性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民主就不存在程序性或内在的正当性。政治制度应仅以其绩效来加以评判。

精英统治（Epistocracy）可以在工具性与非工具性两个层面上受到质疑。工具性批评认为，精英统治会导致不良后果，这些后果可能是认识论层面的，也可能是非认识论层面的。其中，工具性—认识论批评或许最为雄心勃勃，因为它试图在精英统治自身的论域内击败它，即证明精英统治在认识论上劣于民主制。⁵⁴ 其他批评者则承认，精英统治在认识论层面上可能确实优于民主制，但他们主张，精

英统治出于非认识论的原因而在工具性上是糟糕的。例如，它可能会为政府滥用权力或政治不稳定铺平道路。

55

相比之下，非工具主义者认为精英统治（epistocracy）在本质上就是不公正的。⁵⁶ 他们拒斥工具主义的假设，即政治制度应仅根据其结果来评价。相反，他们强调政治程序必须体现公平、平等和尊重等道德价值（参见第二章第二节）。对非工具主义者而言，这些程序性美德为偏好民主而非精英统治提供了有力的理由。在本节中，我们将考察对精英统治的工具主义与非工具主义两种批评。

3.1 合理分歧异议

为了放大有能力者的声音，我们首先需要明确什么是能力，然后了解如何识别谁是有能力的人。然而，正如我们所见，这两个问题上很可能存在合理的分歧。

精英治国论者认为，政治能力要求具备良好的推理能力、对时事的了解以及社会科学知识。⁵⁷ 这一观点虽属

实，却并不十分有用。我们如何准确衡量“良好的推理能力”？又需要何种类型的“社会科学知识”才算是必要或充分的？我们或许可以采用标准化测试或其他类似指标，但这些指标可能无法全面反映个人的推理能力、知识水平，或其将此类推理与知识运用于复杂政治情境的能力。此外，政治能力理应还包括关于哪些政策可以被正当实施的道德知识，然而对于何种道德观点是正确的，人们存在合理的分歧。

要识别具备政治能力的人，我们还必须弄清楚谁有道德行动的动机。一个拥有政治能力所需知识的人，仍可能以不道德或腐败的方式投票。然而，评估个人是否有道德投票的动机并非易事。正如布莱恩·科格尔曼（Brian Kogelmann）所指出的，我们不能简单地问：“你是否希望做正确的事？”或“你是否总是努力公正行事？”，因为无论人们的真实倾向如何，他们都会回答“是”。⁵⁸

总之，关于谁拥有更优越的政治判断力，人们会有合理的分歧。正如托马斯·克里斯蒂亚诺所言：“从平等主义

的立场来看，不存在一种公共的方式来证明某人在能力上的优越性，从而令所有公民信服。”⁵⁹ 埃斯特伦德同样指出：“任何被提名为此类专家的特定个人或群体，都会引发争议。”⁶⁰ 这种合理分歧的存在可能会阻碍对知识精英统治（epistocracy）的论证。问题并不在于不存在更好或更差的判断，而在于任何用于识别最有能力者的标准都将是可争议的。

3.2 贤能政体极易被滥用

精英统治（Epistocratic）的权力结构本身就带有被滥用和操纵的风险。

⁶¹ 尤其是用于判定谁“有知识”或“有资格”投票或担任公职的主观标准，可能被利用来排斥和压迫他人。历史提供了鲜明的警示：看似中立的标准如何被武器化，以剥夺特定群体的选举权。例如，在美国南方吉姆·克劳

（Jim Crow）时代实施的识字测试，表面上是为了确保只有知情且负责任的公民才能投票；实际上，这些测试却是蓄意设计用来阻止非裔美国人投票的。其目的在于以“胜任治理”为幌子，通过系统性地排斥边缘化群体，

以维持并强化既有优势群体的统治地位。鉴于历史先例，我们有充分理由怀疑，限制选举权及其他精英统治制度可能会被恶意实施。

对此，布伦南辩称，这些测试是以恶意实施的。他写道：“政府过去曾以知识精英统治（epistocracy）的伪装来掩盖其种族主义，这一事实并不能说明知识精英统治的考试本身具有内在的可谴责性。”⁶² 他进一步指出，所有政治理念——包括民主在内——都曾遭到严重滥用。民主统治的真实历史充满了有害的剥夺选举权的实例。因此，布伦南认为，仅因其最恶劣的表现形式就摒弃一种理想，是错误的做法。倘若我们以民主的失败或那些自称民主却腐败的政权为标准来评判民主，那么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彻底否定民主。

然而，这一回应可能低估了精英统治（epistocratic）体系固有的风险。即使以善意实施，用于判定谁属于“知识型”选民的精英统治标准，其设计本身也难免带有固有偏见，这些偏见可能源于设计者自身的文化、教育和社会背景。此外，历史表明，一旦建立起

某种排斥机制，掌权者便可能利用该机制来维持并巩固其控制。塞缪尔·巴格（Samuel Bagg）警告称，精英统治“更有可能导致不受约束的威权主义或暴政”。这是因为政治“才能”或“能力”这一标准本身具有内在模糊性，赋予了掌权者极大的自由裁量空间。他们可以利用这种模糊性，逐步将权力天平向自身倾斜，“在各级任命支持其派系利益的干部，并替换掉那些不支持者。”⁶³

3.3 人口统计学异议

对知识精英统治（epistocracy）最常见的反对意见之一是人口结构异议（the demographic objection）。这一异议最初由埃斯特伦德（Eskold）提出，其主张是：基于知识或能力分配政治权力的制度，有可能导致缺乏代表性的治理。以下是布伦南（Brennan）对此的解释：

人口统计学异议 大多数精英统治（epistocratic）制度赋予知识更丰富的公民比知识较少的公民更大的政治权力。然而，对基本政

治知识的调查一再发现，政治知识在不同人口群体中的分布并不均等。某些人口群体，尤其是处于优势地位的群体，往往比其他处于劣势地位的群体拥有更多的政治知识。具体而言，白人通常比黑人了解得更多，富人比穷人了解得更多，就业者比失业者了解得更多，男性比女性了解得更多。因此，精英统治下的选民群体往往会比民主制度下的选民群体更偏向白人、更富有、就业状况更好，也更偏向男性。正因如此，精英统治是不公正的。⁶⁴

布伦南指出了人口学异议的两种版本。“不公平版本”认为，知识精英统治制度会偏袒某些群体而忽视其他群体，这本质上是不公平的。“不良后果版本”则认为，通过赋予某些人群比其他人更多的权力，知识精英统治将导致不良后果。这些观点可概括如下：

不公平版本 在大多数（即使不是全部）社会中，教育和机会的分配都是不平等的。这通常导致不同性别、种族、阶级和族群之间在政治知识上存在巨大差距。因

此，若以知识为基础来分配政治权力，就会将这些本已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成员排除在外。这是不公正的。

糟糕结果版本 受过教育者被系统地过度代表，可能导致政策偏向优势群体，而忽视或边缘化弱势群体。受过教育的选民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往往与教育程度较低者大相径庭。因此，他们可能无法理解社会其他群体所面临的挑战，从而导致糟糕的政治决策。

布伦南回应了人口统计学异议的两种版本。关于不公平版本，他承认某些处于不利地位且历史上遭受压迫的少数群体可能会因取消资格而受到不成比例的影响。然而，他辩称：“这种取消资格反映并源于一种更深层的不公正，但这并不意味着取消资格本身就是不公正的。”⁶⁵ 为支持这一观点，布伦南举了一个类比：我们要求人们必须拥有医学学位才能成为外科医生；然而，由于成长环境不利，某些历史上受压迫群体的成员可能没有同等机会进入医学院。但医学学位这一

要求本身并非不公正；真正的不公正在于机会获取的不平等。⁶⁶

针对“糟糕结果”版本，布伦南提出了两个论点。首先，他表示，这一反对意见错误地假定选民会基于自身或群体利益来投票。布伦南认为：“大多数选民投票时所依据的是他们所认为的国家公共利益。”⁶⁷他援引政治学研究指出，人们倾向于“社会取向式”

（sociotropically）投票，即为他们所相信的公共利益而投票，这恰恰是因为“个人选票的分量微乎其微”。⁶⁸其次，布伦南质疑了这样一种假设，即弱势群体知道如何投票才能保护自身利益。他提出，来自弱势群体的公民比掌握权力的人更不可能有效维护自身利益。

然而，这些论点是可以受到批评的。第一点——关于社会取向投票（sociotropic voting）——可以从两个方面提出质疑。首先，即使人们投票时出于他们所认为的公共利益，这也并不能保证他们会投出好的选票。大量关于认知偏误的文献表明，尽管人们怀有最良好的意愿，却仍会经常以自我或群体利益为导向行事（参见第五

章)。其次，如果如布伦南（Brennan）所言，人们之所以避免自私投票，是因为他们意识到个人选票的影响微乎其微，那么增加少数人（受过教育者、特权阶层）的政治权力，只会使受过教育的精英阶层更有可能出于自私动机投票。

布伦南的第二个论点也同样值得质疑。例如，认为奴隶或父权制度下的女性在维护自身利益方面不如其“主人”有效，这种说法似乎难以令人信服。正如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提醒我们的那样：“人类经验的记录明确地……反驳了这样一种观点，即总体而言，任何相当比例的成年人的福祉或利益可以安全地托付给他人。”⁶⁹此外，正如立场认识论者所指出的，处于特权地位的人往往缺乏必要的知识、动机和公正性，无法识别并解决边缘群体所面临的问题。⁷⁰

3.3.1 选择偏差的异议

对精英统治（epistocracy）的人口统计学异议可以扩展为一种更普遍的“选择偏差”异议。这一异议挑战了精英统治体系的核心假设：即具备政治能力

的选民平均而言比普通选民更有可能做出正确的投票选择。肖恩·英格汉姆（Sean Ingham）和大卫·威恩斯（David Wiens）在近期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促成政治能力的因素——例如社会、经济或文化优势——也可能同时带来某些特质，从而降低做出正确政治选择的可能性。⁷¹ 因此，那些使某些个体得以培养政治能力的条件（如财富、教育或特定社会网络的接触机会）可能也与带有偏见的投票决策相关联。

举例来说，考虑一种基于政治知识的能力衡量标准，例如对候选人政策立场的熟悉程度。那些更有可能获得这种能力的人，可能属于重视政治意识的富裕社交圈。然而，这些人的观点也可能受到其优越背景的塑造，从而可能导致他们误解或低估其他群体的利益。因此，基于可观察能力的选拔过程存在偏见，间接偏向于某些特质，而这些特质可能会降低为公共利益投票的可能性。

这种选择偏差对精英统治（epistocracy）构成了严峻挑战。如果具备能力的选民系统性地受到某些

特质的影响，而这些特质又使其更不可能正确投票，那么我们就不能假定精英统治制度会持续优于民主制度。

英格汉姆（Ingham）和维恩斯

（Wiens）认为，这种偏差不仅限于种族或阶级等简单的人口统计变量，还涵盖更微妙的因素，例如意识形态动机或社会归属。他们通过关注人们最初为何获得政治能力，以及获得这种能力的路径如何系统性地影响投票行为、从而削弱政治可靠性，从而将这一担忧普遍化。因此，我们几乎没有理由相信，一个基于能力筛选出的选民群体平均而言比民主制度下的选民更有可能正确投票。

布伦南正确地指出，有两种精英统治形式似乎能够规避最初的人口统计学异议：选举权抽签制（见第2.3节）和启蒙偏好投票制（见第2.5节）。⁷³ 选举权抽签制通过随机选择选民，从而规避了这一问题，所形成的选民群体在人口统计学上与全体选民无异，但比普选制度下的选民更具信息优势。⁷⁴ 同时，启蒙偏好投票制度则通过两种方式规避人口统计学异议：第一，它并未将任何人排除在投票之

外，也未赋予某些人比其他人更多的政治权力；第二，它模拟了人们在充分信息条件下会持有的偏好，理论上消除了不同人口群体在现实知识水平上的差异。

然而，这些方案并未摆脱更为普遍的选择偏差（selection bias）质疑。首先，正如英格汉姆（Ingham）和威恩斯（Wiens）所指出的，开明偏好投票（enlightened preference voting）只有在“所有同时影响投票行为和能力获取的潜在混杂因素均可被观测到”（例如种族、性别和阶级）的情况下，才能避免这一质疑。⁷⁵ 如果存在不可观测的因素同时影响投票行为 and 能力的获取，那么模拟选民群体中普通成员正确投票的概率，可能低于民主选民中的普通成员。其次，正如布伦南（Brennan）所理解的那样，选举权抽签制度（the enfranchisement lottery）涉及剥夺那些未能通过能力测试的“预选民”（pre-voters）的选举权。（这一特征在洛佩兹-格雷拉（Lopez-Guerra）最初的构想中并不存在。）然而，我们很容易设想，即使所有预选民都接受了

能力培养训练，来自某些职业或阶级背景的人在这些测试中仍会表现得更好。问题在于，他们的社会背景可能引入偏见，从而降低他们投票支持最佳选项的可能性。⁷⁶ 简言之，那些看似规避了人口统计学质疑的认识论精英主义（epistocratic）方案，实际上未能逃脱更为普遍的选择偏差质疑。

3.4 政治不稳定与合法性缺失

鉴于许多选民具有高度的党派倾向、认识论上的非理性以及信息匮乏，任何遴选知识精英统治（epistocratic）机构的方法都可能被视为带有偏见。正如罗伯特·塔利斯（Robert Talisse）所言：“任何在认识论上负责任地遴选知识精英统治机构的做法，在大多数公民看来……要么是被操纵以偏袒他们的敌人，要么是天赐良机以压迫他们的敌人。”⁷⁷ 这种看法可能导致抵制、缺乏民众认可，并最终引发对该制度合法性的质疑，无论该遴选机制实际上多么公平或有效。

对此，布伦南指出，人们对感知到的合法性缺失的担忧可能被夸大了，尤

其是在长期来看。他认为，人们通常会接受自己成长于其中的政治体制的合法性，无论这些体制是财阀统治、民主制还是共产主义体制。⁷⁸ 长期处于某一特定体制之中并受其社会化，往往会使其正常化，从而使公民视其为合法。然而，向知识精英统治（epistocracy）体制的过渡仍可能充满挑战。这一转变要求对政治合法性的观念及其赋予方式作出根本性改变，可能导致初期阶段的不稳定和抵制，直到新的规范被社会充分吸纳并接受为止。

即使从长远来看，知识精英政体（epistocracies）在存在深刻分歧的多元社会中实现稳定仍可能面临重大障碍。尽管有能力的决策或许能趋近于公共利益，但公民可能并不承认这些决策者本身的合法性。⁷⁹ 当大量人口被排除在直接政治参与之外时，这一挑战便会出现，他们可能认为知识精英治理损害了自身的自主性与平等地位。此外，即便是具备知识和能力的公民是否会支持知识精英政体，也值得怀疑。正如科拉多·富马加利（Corrado Fumagalli）所指出的：

“学界对知识精英政体的大量批评本身就证明，具备政治能力的公民可能会拒绝那些赋予政治知识人士更大话语权的决策形式。”⁸⁰

3.5 如果民主制度无能，为何它却能取得成功？

对民主的批评常常基于这样一种说法：民主“往往导致无能的决策。”⁸¹布伦南更进一步，认为民主治理存在严重缺陷，以至于侵犯了人们享有称职政府的基本权利。然而，总体而言，民主国家的生活环境通常优于非民主国家。与君主制、寡头制和独裁制相比，民主制度具有以下优势：

- 它们防止了大规模饥荒。
- 他们通常给予公民更多的自由。
- 他们不太可能出现重大的政策灾难。
- 他们通常避免彼此之间发动战争。
- 他们不会对自己的公民进行大规模屠杀。
- 它们往往更加繁荣与和平。

- 他们更有可能保护公民和经济自由。82

这引发了一个关键问题：如果民主制度真的如此缺陷重重，那它为何还能带来如此积极的成果？

这些事实并不能证明民主制度毫无缺陷，甚至也不能证明它是最有效的制度。正如布伦南提醒我们的那样：“我们发动不义战争；我们将数万亿美元浪费在无效的项目上，却未能将资金投入真正有效的项目；我们制造并延续不公；我们遗弃穷人；我们践踏公民和经济自由。”⁸³然而，民主制度所带来的益处应当促使我们审慎反思，而非轻率地呼吁以其他政治制度取而代之。

在全球范围内，无论其初始教育水平如何，将工人、妇女和少数群体纳入决策过程始终改善了他们的处境。即便面对那些声称在为公共利益组织社会方面拥有更优越知识的富有白人男性，这种情况依然发生。此外，世界上几乎所有最富裕的国家都实行近乎普选的民主政体。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这些政府变得更加民主，它们也更

加尊重族裔和宗教少数群体的公民与政治权利。与此同时，它们的经济也变得更加繁荣。尽管民主与这些益处之间的确切因果关系尚存争议，但二者之间显著的相关性足以让我们对过快放弃民主持谨慎态度。

鉴于精英统治（epistocracy）的局限性与风险，我们有必要考虑一些替代性改革方案，这些方案旨在改善民主制度，而非放弃民主。在下一节中，我们将探讨完全采用抽签制（lotto-cratic）的政府体系提案。在某些方面，这些提案比精英统治体系更为温和，因为它们仍然保留了民主制度的核心原则。然而，在主张最大限度地减少甚至彻底废除投票、政党与选举方面，它们至少同样激进，甚至可能更为激进。与精英统治提案类似，抽签制体系的动因也源于对当代民主制度在认知层面的担忧，包括非理性、偏见和部落主义等问题。

4 抽签制的理由

民主通常与投票和选举联系在一起。但从历史角度看，民主与抽签（随机遴选）的关系比与选举更为密切。在古雅典，许多公职是通过抽签产生的，因为选举被视为贵族制的做法。亚里士多德指出：“以抽签方式任命官吏被认为是民主的，而以选举方式任命则被视为寡头政治的。”⁸⁵近两千年之后，孟德斯鸠也理所当然地将抽签与民主联系在一起。⁸⁶这种方法基于这样一种信念：所有公民都有平等的任职权利，而随机遴选比选举更为公正，因为选举往往偏向富人或人脉广泛者。

本章余下部分聚焦于两项近期提出的在民主制度中引入抽签制的方案：亚历山大·格雷罗（Alexander Guerrero）的“抽签制”（lottocracy）与埃莱娜·兰德莫尔（Hélène Landemore）的“开放民主”（open democracy）。我们之所以聚焦于这些完全基于抽签的制度，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诸如咨询小组之类较为温和的抽签制提案，能否克服选举民主所面

临的认知功能失调，实属可疑。若要解决无知、非理性与极化等问题，并避免党派性、选举及金钱对政治的扭曲影响，我们就必须认真考虑一个大胆的构想：民主制度可以无需选举、政客与政党。其次，正如格雷罗所指出的，将完全以抽签产生的机构取代现有立法机构作为一种思想实验加以探讨，有助于更清晰地凸显抽签制相较于选举制的优势与劣势。87

4.1 抽签制

鉴于当代选举制度所面临的认识论问题，格雷罗建议我们重新构想民主，不再将其等同于选举代议制民主。他并非主张放弃民主——即由人民平等治理的理念，而是提出一种抽签制

（lottocratic）体系，以克服选举代议制政府所存在的“认识论病理”。88

格雷罗的抽签式立法机构的主要特征包括：

1. 单一议题：在抽签制（lottocratic）体系中，将不再设立一个单一的通才型立法机构，而是设立多个单一议题的立法机

构，每个机构专注于一个政策领域或子领域（例如农业、移民、医疗保健和教育）。

2. 抽签遴选：每一届单一议题立法机构的成员均从相关政治管辖区中通过抽签方式选出。
3. 学习阶段：在每次决策会议期间，单一议题立法机构的成员会听取相关专家和利益相关方就该议题发表的意见。
4. 社区参与：每个单一议题立法机构的成员都专门安排时间与公众进行讨论和磋商，包括受拟议行动影响的活动人士和利益相关者。
5. 直接立法：每个单一议题立法机构的成员均具备直接实施政策的能力，或在获得共同授权的前提下，与其他单一议题立法机构协作实施政策。⁸⁹

这些单一议题、通过抽签选出的立法机构被称为“SILLs”。

格雷罗设想将设立大约20个不同的SILL（特定议题立法团），每个SILL专注于一个特定的政策领域，例如农业与营养、教育、能源、卫生、交

通、军事与国防、环境保护、市场监管、贸易、移民以及工作场所安全。这一SILL网络将负责制定大部分法律和政策。每个SILL将由300名成员组成，成员通过抽签方式从相关政治管辖区内选出。他们的任期为三年，任期交错安排，每年有100名新成员加入，以确保持续不断的更新循环。担任SILL成员并非法律强制义务，但参与的经济激励将十分丰厚。此外，还将采取相应措施，以兼顾成员的家庭和工作责任，包括提供搬迁费用补贴和法律保障，确保个人在履职期间不会在职业上受到不利影响。

薪资将取决于SILL成员在其任职期间避免与利益相关方进行任何被禁止的互动。他们还必须在任职前后均不得接受金钱或其他形式的利益，并将通过持续监督以确保其遵守规定。最后，还将设立某种机制，对行为不当者予以罢免，包括无故缺席会议、醉酒出席以及擅自发言等情况。90

每个SILL每年将召开两次立法会议，每次会议的结构大致如下：首先，SILL将通过议程设定程序决定下一次会议的议程。其次，进入学习阶段，

SILL将就议程上的每一项议题听取专家意见。（同时还还将有一个程序，用于确定谁可被视为专家，以及邀请哪些专家发言。）第三，SILL成员将开始制定并决定立法提案。这一过程很可能包括与非成员的磋商，此举主要服务于两个目标：一是向非成员普及当前议题和建议内容，二是从更广泛的社区收集见解。随后，SILL成员将共同起草提案，并对提案进行表决。

4.2 抽签制的认识论优势

为何认为这种抽签制系统在认识论上优于选举民主？格雷罗指出了六大优势。⁹²

首先，抽签制体系能更好地应对公众无知的问题。设立单一议题的立法机构显著降低了参与者所需承担的知识负担，因为他们只需专注于一个主题领域，从而能够做出更为明智的决策。此外，学习阶段也确保了参与者在作出决策之前充分掌握相关议题。

第二，抽签制（lottocracy）可减轻利益集团俘获的风险。SILL成员通过随机遴选产生，消除了影响力渗透的

一条主要渠道，因为强势利益集团无法操纵选举过程来决定人选。此外，由于不存在竞选活动，SILL成员无需寻求资金支持。再者，向SILL成员提供高薪（并规定若受外部利益影响则取消该薪酬），会显著缩小愿意以稳定丰厚收入为代价去换取不确定贿赂的人群范围。最后，SILL成员定期轮换，使得维持对系统的影响力变得困难，因为需要不断对新成员进行投入；而在传统体制下，长期任职的官员则更容易被收买。

第三，抽签制消除了助长短期偏好的选举激励。在这一制度下，由于个体是通过抽签而非选举产生的，他们摆脱了寻求连任的压力以及急于为自身行动邀功的需要。相反，他们可以专注于决策的长期影响，而不受短期内争取选民支持这一需求的干扰。这或许有助于应对气候变化等长期性问题。

第四，抽签选出的代表有机会对议题进行更深入、更持久的参与，这削弱了纯粹诉诸情感的呼吁和操纵性言辞的效果。该制度通过提供充足的空间以供深思熟虑的审议，旨在推动那些

基于全面理解与理性辩论所作出的决策。

第五，抽签制（lottocratic）体系降低了群体归属感和社会身份影响政治思维的倾向。通过取消选举，政治关注点从候选人个人特质和“我们对抗他们”的心态，转向实质性的政策议题，从而营造出一个极化程度更低、更具合作性的政治环境。通过聚焦于单一议题的立法机构，抽签制还使得治理方式更加细致入微，更容易找到共识，且不会让高度分裂性的话题垄断公众注意力。这种结构鼓励协作，减少部落主义，从而提升政治讨论的质量。

第六，抽签制通过从管辖区域内随机遴选成员，提升了立法机构的描述性代表性。这确保了立法议会比仅由那些能够成功开展竞选活动的人组成的机构，更能准确反映该辖区在意识形态、人口结构和社会经济方面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带来了更丰富的观点与经验，从而提高了决策的认知质量。

4.3 对抽签制的反对意见

在概述了格雷罗的抽签制体系及其优点之后，我们现在转向它所面临的一些挑战。

首先，抽签制度引发了对能力的担忧。我们真的能将立法职责托付给随机选出的一群公民吗？民选官员通常具备（或被认为具备）特定的政治、法律或政策专业知识。他们的职业背景、教育经历和职业发展轨迹本应使他们为应对治理的复杂性做好准备，从而能够做出明智的决策。而普通公民则没有接受过此类训练。

对此，格雷罗（Guerrero）提出了一些缓解这些担忧的机制，例如设定最低教育要求以及加强公共教育。然而，这些措施可能不足以确保决策机构整体具备制定和实施有效立法的能力。缺乏政治经验的公民可能需要接受大量培训，才能胜任制定和评估立法所涉及的复杂、开放且紧密关联的任务。⁹³ 另一方面，任何旨在解决这些关于能力不足之担忧的拟议机制，都可能面临第3.1节所述的“合理分

歧” (reasonable disagreement) 异议。

其次，抽签制 (lottocracy) 难以应对胜任决策所必需的复杂权衡。几乎每一项政策方案都需争夺有限的资源；因此，我们必须在相互竞争的议题之间权衡财政取舍。然而，格雷罗 (Guerrero) 所构想的抽签制体系却是围绕单一议题立法机构 (single-issue legislatures) 组织的。其结果可能是过于缺乏协调，难以有效运作。立法活动无法被整齐地限制在彼此孤立的领域内。若公民在不了解预算影响的情况下，如何能做出理性的政策决策，这一点尚不明确。例如，正如汤姆·马尔莱森 (Tom Malleson) 所问：“如果不知道相关的权衡取舍，[普通公民]如何能理性地判断，究竟是提供费用高昂的公共托儿中心更好，还是提供低廉的税收抵免以部分支持家庭自行照看子女更好？”⁹⁴ 如果单一议题立法机构 (SILLs) 无法权衡其议程之外其他议题所受的政策后果，这将严重阻碍有效的审议与决策。

第三，抽签制（lottocracy）在维持政策的共时性与历时性连贯性方面面临实际挑战。例如，当某一议题涉及两个或更多立法政策领域时，我们应如何处理？我们是否应允许两个单议题立法机构（SILLs）合并，以应对特定的政策挑战？正如丹尼尔·赫顿·费里斯（Daniel Hutton Ferris）所警告的那样：“使用多个单议题立法机构很可能导致政策缺乏连贯性。”⁹⁵

第四，专家识别的问题再次浮现。必须存在一个程序，允许某人以专家身份向SILL发言。然而，格雷罗对于这些专家应如何遴选却着墨甚少。他写道：“专业知识可依据高级学位、多年专业经验、来自具有国家或国际认证资质机构的正式专业资格、在独立同行评审期刊上发表的研究成果等标准予以认可。”⁹⁶ 然而，正如第九章所讨论的，这些所提出的启发式标准面临诸多挑战。

第五，存在精英俘获的问题。尽管格雷罗（Guerrero）认为抽签制（lottocracy）降低了利益集团俘获的风险，但批评者指出，在抽签制体系下，这一问题实际上可能更加严重。

例如，抽签制体系可能会遭遇“旋转门问题”。正如迪米特里·兰达（Dimitri Landa）和瑞安·佩夫尼克（Ryan Pevnick）所指出的，抽签产生的代表知道无论其表现如何，下一任期都不会继续任职。这使得他们比民选官员拥有更大的自由度，可以将自身的立法影响力“出售”给出价最高者。⁹⁷ 实施问责可能十分困难，尤其是当代表们获得的是隐性的、且几乎无法证实的互惠回报（例如高薪职位机会）时。

格雷罗意识到这些挑战。在他新近出版的著作《抽签制：无需选举的民主》（Lottocracy: Democracy Without Elections）中，他试图回应有关公民能力、预算权衡、政策连贯性、专家甄别以及精英俘获等一系列质疑。例如，他质疑了当前由民选产生的通才型立法机构能够提供显著政策连贯性的假设，同时指出抽签制体系可避免因选举周期所导致的政策剧烈波动。⁹⁸ 他还建议设立一个专门的预算大会（Budget Assembly），其功能类似于通才型立法机构中的拨款与预算委员会，以解决资源分配方面

的担忧。⁹⁹尽管我们在此无法详尽探讨他的各项回应，但仍鼓励读者查阅其著作，以全面了解他对抽签制的辩护。

4.4 开放民主

在她最近的著作中，兰德莫尔提出了一种名为“开放民主”的革命性民主模式。与格雷罗的抽签制体系类似，开放民主废除了代议制民主中人们熟悉的制度，如议会、政党与选举。在开放民主中，占据政治权力中心的是普通公民，而非精英阶层。

兰德莫尔提出，我们应以抽签制微型公议机构（lottocratic mini-publics）取代投票与选举，即由随机选出的民众代表整个社群并为其作出决策。领导职务不再通过选举职业政客担任，而是采用类似陪审员义务的方式进行分配。定期地，个人会被随机选中加入立法机构，履行其公民职责。在任期内，他们与其他成员协作，共同处理公共事务并引导国家发展方向。任期结束后，他们便回归日常生活与本职工作。

开放民主在实践中会是什么样子？开放民主的核心制度特征是“开放型微型公众”（open mini-public），兰德莫尔（Landemore）将其描述为：

一个规模庞大、用途广泛、随机选出的群体，人数大约在150至1000人之间，为制定议程和立法之目的而聚集在一起，并持续较长时间（至少几天，长则可达数年），并通过众包平台和审议论坛（包括其他微型公众群体）与更广泛的民众相连接。

该立法议会将处于一个由其他微型公众群体构成的网络中心，其中一些聚焦于单一议题，另一些则具有综合性，且在不同层级上运作。所有微型公众群体均由随机选出的公民组成，而非民选代表。

为何要采用随机抽选？这是为了确保代表群体真正成为整个社会的缩影，而非主要由企业游说者、富裕人士或其他精英群体所主导。据称，这类议事团体将“精确地以微型形式再现广大民众的整体面貌。”¹⁰¹ 根据兰德莫尔（Landemore）的观点，这些微型公

众团体还将“通过公民倡议、提请复决权，以及一个永久性的在线众包与审议平台，向更广泛的公众开放意见输入。”¹⁰²

兰德莫尔（Landemore）的开放民主与格雷罗（Guerrero）的抽签制

（lottocracy）体系有何不同？兰德莫尔倾向于设立一个集中化、职能全面的立法议会，而非格雷罗所主张的众多单一议题的微型公众团体。这一偏好源于“有必要处理相互关联的议题，以制定出一套连贯的法律与政策。”¹⁰³ 因此，兰德莫尔的模式或许能够避免格雷罗体系中可能出现的政策不一致问题。此外，开放民主通过众包反馈和偶尔举行的全民公投纳入更多公众意见，使那些当前未参与治理的民众不会感到被排斥。相比之下，格雷罗的抽签制可能为公民提供的政治参与机会较少。

正如兰德莫尔（Landemore）所强调的，开放民主（open democracy）并不等同于直接民主（direct democracy）。直接民主的问题在于规模：普通公民无法同时有效地进行审议；审议只有在小规模群体中才可行。因

此，为了维持一种真正具有审议性质的民主形式，代表制是必要的。尽管开放民主是一种代表制民主，但它既不是一种“精英”统治形式，也不依赖选举。开放民主的核心理念是公民代表制，即“普通公民代表其他公民。”¹⁰⁴

为什么要废除选举？兰德莫尔

（Landemore）指出，当前民主危机的根源在于代议制民主设计中的一个核心缺陷：选举代表制。她认为，选举本质上偏袒富有者、受过良好教育者和富有魅力者，并基于种族和性别给予某些人不公平的优势。这种“寡头偏向”意味着普通公民经常被排除在立法过程之外，从而违背了包容性和平等等核心民主价值观。¹⁰⁵

这些歧视性影响也带来了认知层面的代价。这一观点源自兰德莫尔

（Landemore）为民主所提出的认知论论证（参见第二章），该论证认为，多数人的统治在认知上往往优于少数人的统治。具体而言，认知多样性的缺乏会阻碍群体的集体智慧。¹⁰⁶因此，由于缺乏多样性，选举产生的议会其认知潜力将受到限制。（这呼

应了格雷罗 [Guerrero] 的担忧。) 相比之下，开放民主更有可能识别问题并制定解决方案，因为其包容性促进了更高认知多样性。

此外，选举导致党派政治，从而扼杀了有效的审议。¹⁰⁷正如第五至第八章所讨论的，党派忠诚常常盖过对不同观点的开放性探讨。当个人在情感上认同某个政治“阵营”时，他们更倾向于无视或低估对立一方的观点，无论这些观点本身是否合理。因此，党派政治削弱了批判性思维和理性辩论的能力，因为对政党的忠诚变得比探求真理更为重要。据兰德莫尔 (Landemore) 所言，选举制度的这些固有缺陷要求我们对民主制度的运作方式进行深刻的反思。

开放民主 (open democracy) 能够克服这些局限。首先，它通过将更多决策权交还给人民，更忠实地体现了人民统治的理想。其次，它扩大了公民的参与范围，借助集体智慧作出更加明智的决策。第三，由于不存在党派偏见，审议过程不会被党派忠诚所蒙蔽，从而促进富有成效的讨论。最后，开放民主较少受到选举所固有的

寡头或贵族倾向的影响，而这种倾向据称正是近年来民主衰败的原因之一。¹⁰⁸

4.5 对开放民主制的异议

开放民主提出了若干重要问题：如果公民并非经由选举产生为代表，他们是否算得上真正的民主代表？政治平等是否仅仅源于拥有平等的政治权力机会？抽签产生的机构是否足以对公众负责？开放民主是否对公民要求过高？这些问题既重要又引人入胜，兰德莫尔（Landemore）试图对它们作出回应。¹⁰⁹ 在此，我们将特别聚焦于开放民主所面临的认识论挑战。

4.5.1 普通公民是否无能？

一种常见的反对意见是，在一个高度复杂的世界中，让普通公民更多地接触我们的核心政治机构是不明智的。批评者认为，与其赋予普通公民更多权力，不如推动更高的专业化程度和劳动分工，以应对日益增长的复杂性。¹¹⁰

兰德莫尔对此担忧提出了三点回应。首先，如第二章所述，在适当条件下，有理由相信一大群非专家群体能够比专家群体做出更明智的决策。¹¹¹因此，让普通公民参与决策未必会导致糟糕的政策制定。其次，向政治“业余人士”开放民主并不意味着边缘化专家和专业人士；相反，这意味着将其角色转变为顾问而非主要决策者，遵循“让专家随时待命，而非高高在上”的原则。第三，在面对高度复杂且对有效解决方案存在极大不确定性的局面时，最可取的做法很可能是平等且包容地分配权力，以最大限度地提高我们获得正确视角、信息和想法的机会。¹¹²

然而，人们可能会担心，随机挑选公民组成一个完全通才型的立法机构，会对被选中的公民提出不合理的认知要求。¹¹³ 由于这些公民通常仅任职数年，期望他们在从医疗保健、农业到教育和移民等广泛政策领域内都发展出足够的专业知识，可能是不现实的。相比之下，格雷罗（Guerrero）所提出的单一议题立法机构则设定了远为宽松的期望。通过聚焦于单一政

策领域，并辅以专家证词的支持，公民可以缩小其职责范围，从而进行更加集中且富有见地的审议。

4.5.2 如果数量胜过能力，为何还要使用微型公众？

根据布伦南（Brennan）的观点，兰德莫尔（Landemore）对开放民主（open democracy）的辩护令人双重困惑。¹¹⁴ 首先，兰德莫尔通过援引大规模群体的集体智慧来捍卫民主。她并不认同那些批评民主的观点——即选民的无知与非理性会导致糟糕的政治结果。然而，若要从工具性角度为开放民主辩护，她就必须承认现有的代议制民主存在缺陷，从而导致其表现不佳。但这样一来，兰德莫尔就很难再断言普选制民主优于所有知识精英统治（epistocratic）的替代方案（参见第二章）。其次，兰德莫尔所提出的开放民主模式涉及随机挑选一小群公民来做出政治决策。但如果正如她所声称的“数量胜过能力”，那么我们为何还要将自己局限于人数极少的微型公众（mini-publics）呢？

针对第二个反对意见，兰德莫尔（Landemore）可以辩称，布伦南（Brennan）误解了这一问题。虽然“人多智广”胜过“人少智寡”，但这并不意味着普选制下的选举民主就比由微型公众（mini-publics）构成的开放民主更为明智。在选举民主制度下，一个多元且庞大的公民群体在投票时可能比一小群所谓的专家做出更明智的决定。然而，选举民主的一个固有特征是：除了投票之外，大多数政治决策实际上主要掌握在少数精英代表手中。这些代表或许比普通公民拥有更多的政治知识，但他们并非一个多元化的群体。因此，民选代表所做出的决策容易出现认知上的缺陷。

4.6 对抽签制系统的普遍反对意见

最后，我们考虑对抽签制（lottocratic）体系的两种普遍性质疑。尽管我们在此聚焦于格雷罗（Guerrero）和兰德莫尔（Landemore）的论述，但这些担忧适用于任何主张以小型审议机构取代选举和政党的制度提案。

4.6.1 公众无知

由微型公众团体（mini-publics）或SILLs构成的制度可能会无意中助长普通公众的无知，因为它们实际上消除了大众的参与和审议。¹¹⁵ 在格雷罗（Guerrero）的抽签制民主（lotto-cracacy）和兰德莫尔（Landemore）的开放民主（open democracy）中，所有民主工作都由一个小群体承担，这导致民众参与程度甚至低于选举民主。这种安排可能会削弱广大公民参与政治的积极性。即使设立大量微型公众团体或SILLs，由于现代政治议题的庞杂性，大多数公民在任何特定时刻都无法积极参与其中。参与微型公众团体的机会可能十分稀少，对个人而言，一生中或许仅有寥寥数次，甚至一次都没有。因此，政治可能无法在大多数公民的日常生活中占据持续而稳固的位置。相比之下，党派归属感和定期投票则为公民提供了日常参与政治的切身利益，激励他们保持对政治的关注与投入。

话虽如此，与选举民主相比，公众的无知对这类抽签制（lottocratic）体系而言可能不那么令人担忧。微型公

众（mini-publics）的结构确保了实际做出决策的人（即抽签产生的代表）具备足够的知识。虽然未直接参与决策的普通公民可能缺乏相关知识，但这并不必然影响政治决策的质量。微型公众和SILLs（抽签产生的立法机构）中的审议过程经过精心设计，为参与者提供专家见解、多元视角，以及充足的反思与讨论时间。这一过程将参与者从“无知的公众”转变为信息充分的议事群体成员。相比之下，在选举民主制度中，公众的无知可能造成严重危害，因为选民确实会（而且的确）基于无知做出具有权威性的决策。

4.6.2 盲目遵从的问题

抽签制微型公众（lottocratic mini-publics）和SILLs的一个关键吸引力在于，它们既能促进高质量的审议（一种认知维度），又能作为更大人口的“镜像”，构成一种微观缩影（一种民主维度）。¹¹⁶ 然而，抽签制体系也受到批评，因其绕过了公民群体的实际信念与态度。据克里斯蒂娜·拉丰特（Cristina Lafont）所言，抽签制

体系之所以存在问题，是因为它要求广大民众盲目服从微型公众的成员，而这与自治这一民主理想相悖。¹¹⁷

公民为何必须盲目服从微型公众

（mini-publics）和SILLs？在抽签民主（lottocratic）体制下，一个随机选出的群体被赋予权力，为其余公民做出决策。因此，广大公众被排除在政治决策过程之外。此外，公众并无特别理由假定这些审议机构内部多数人所支持的决策会与全体公民的判断相一致。¹¹⁸ 因此，普通民众无法认同他们所受其约束的制度、法律和政策，也无法将其视为自身所认可的东西。¹¹⁹

为何认为这些抽签制机构所作的决定不会反映更广泛民众的价值观呢？拉丰特（Lafont）指出，尽管微型公众（mini-publics）和SILLs（通过抽签遴选的立法机构）旨在通过随机遴选实现代表性，但其审议过程的设计却旨在将普通公民的意见转化为抽签制代表的“审慎判断”（considered judgments）。因此，这些制度中的参与者将不再“镜像”反映广大公众的偏好或价值观。这种转变虽有助于形

成更明智的决策，却引发了关于微型公众和SILLs产出之合法性及其能否真正代表公众意愿的问题。根据拉丰特的观点，公民的意见与他们所受约束的法律和政策之间将出现脱节或错位。

拉丰特（Lafont）还关注抽签式审议机构所作决策的民主合法性问题。由于这些机构的参与者并非民选代表，他们对广大民众的问责性有限。相比之下，在选举制度中，代表对其选民负有直接责任；他们的决策可受到审查，若其行为与公众意愿不符，可在随后的选举中被追责。这确保了那些直接承担立法职责的人能够恰当地关注其所声称代表的公民的关切。尽管公民必须将政治决策权让渡给精英政治人物，但他们无需盲目服从。相反，他们在将政治决策权委托给他人的同时，仍保有某种能力，以确保政策与其价值观保持一致。

最后，假设一个政治共同体仅通过绕过其公民的信念与态度就能达成更好的结果，这种想法或许过于天真。如果将决策权直接赋予微型公众（mini-publics），而将广大民众排除在外，

这将阻碍我们改变民众的心智与观念，无法促使公民转变视角，从而认同那些基于更充分理由所支持的政策。¹²⁰ 因此，即使微型公众产生了“正确”的结果，它们仍可能因未能说服公民相信这些决策的合理性而“将公民抛在身后”。其结果是，我们可能会频繁看到这样的情形：微型公众内部多数人支持的决策，却遭到更广泛公众多数的反对。这种脱节可能导致频繁的自下而上的挑战，进而可能阻碍微型公众的立法工作，并动摇整个政治体系的稳定。

总之，抽签制（lottocratic）体系可能与自治这一民主理想相冲突，因为它们要求公民盲目地服从他人的判断。此外，它们在“少数人”的深思熟虑之判断与“多数人”的意见之间造成了一种持续的脱节。这种错位可能会损害抽签制体系在公众眼中的合法性与稳定性：公民可能会日益质疑那些看似未能反映其价值观或愿望的决策的权威性与相关性。话虽如此，上述担忧仅适用于立法权完全归属于抽选议院的抽签制体系，例如格雷罗（Guerrero）的抽签制和兰德莫尔

（Landemore）的开放民主制。这些批评并不适用于将微型公众（mini-publics）用作咨询角色的情形。当微型公众被用于促进公共辩论而非“绕过”公共辩论时，它们能够切实地丰富民主进程。¹²¹

5摘要

本章探讨了两种对民主进行“重新思考”的广泛路径。首先，我们考察了知识精英统治（epistocracy）的主张，并概述了若干种可能的知识精英治理模式。随后，我们转向那些旨在改进而非抛弃民主的提案，例如抽签制民主（lottocracy）和开放民主（open democracy）。尽管这些重新思考民主的路径存在显著差异，但它们都共享一个共同目标：相较于当代选举民主制，减少无知和非理性选民在政治中的影响力。

本章所讨论的提案是激进的、有争议的，且尚未完全成熟。它们之所以激进，是因为实施这些提案将要求对现有政治结构进行重大变革。它们之所

以有争议，是因为其所依赖的理论和经验假设尚未获得普遍认可。而它们之所以不完整，是因为其激进性和争议性需要比单章篇幅更为全面的探讨。本章的目的并非主张放弃选举民主而转而采纳这些替代方案，而是要表达并论证有必要对这些构想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我们必须对这样一种可能性持开放态度：要应对现代民主所面临的道德与认知问题，或许需要进行激进的政治改革。

如今，许多政治理论家都认为，评估政治制度的一项关键标准在于其认知有效性。然而，有诸多理由表明，当代民主制度在这方面表现不佳，深陷偏见、无知、非理性与部落主义的困境之中。因此，作为政治认识论学者，我们面临着一个至关重要的抉择：要么对民主制度持开放态度，重新构想其形态，要么重新审视认识论在证成政治制度中的作用。

注释

1. Brennan2016a: 15。

2. 埃斯特伦德2008年：第30页。
3. Friedman 2019; Gunn 2019。
4. Reiss2019。
5. Estlund2008。
6. 柏拉图（1997年版）中的《克里托篇》47c9-47d2、《拉凯斯篇》184e8-184e9、《高尔吉亚篇》463d1-465e1，以及《理想国》第一卷341c4-342e11。
7. Estlund2008：3。
8. 埃斯特伦德2008年：第33页。
9. 埃斯特伦德1993年：第71页。
10. Brennan 2011：713；Brennan 2016a：17。
11. Brennan2011：700。
12. Brennan 2011：704。
13. Brennan2011：700。
14. Dahl1989：56。
15. Brennan2016a：211-212。
16. Somin2023：292。
17. Brennan2016a：224-226。

18. Harwood 1998; Mill [1861] 2015; Mulligan 2018。
19. Miller 2015。
20. 密尔 [1861] 2015: 296。
21. 密尔 [1859] 1977: 324。
22. 密尔 [1861] 2015: 286。
23. 密尔 [1866] 1988年。
24. 埃斯特伦德 2003年: 第54页。
25. 密尔 (1859) 1977年版: 第324–325页。
26. 埃斯特伦德 2003年: 第57页。
27. Robson 1959: 76。
28. 埃斯特伦德 2008年: 第215页。
29. Arneson 1993。
30. López-Guerra 2011, 2014。
31. López-Guerra 2014: 4。
32. Ackerman 和 Fishkin 2004; Fishkin 2009。
33. Manin 1997。
34. 埃斯特伦德 2008年: 第33–36页。
35. López-Guerra 2014: 24。
36. Somin 2016。
37. 密尔 [1861] 2015: 286。

38. López-Guerra 2011: 222–224。
39. López-Guerra 2011: 216。
40. Brennan2016a: 215–220。
41. Brennan2016a: 215。
42. Brennan2016a: 218。
43. Somin2023。
44. Brennan2021b。
45. Ahlstrom-Vij 2022; Brennan 2021b。
46. Althaus 2003; Caplan 2007。
47. Ahlstrom-Vij 2022; Brennan 2016a: 221; Brennan 2021a: 380; Brennan 和 Landemore 2022: 100–101。
48. 布伦南和兰德莫尔, 2022年: 第102页。
49. Ahlstrom-Vij 2022: 91。
50. Somin 2019: 33; 参见 Brennan 和 Landemore 2022: 104–107 的回应尝试。
51. 布伦南和兰德莫尔, 2022年: 第102页。

52. Ahlstrom-Vij 2022: 第104页, 注释17。
53. Brennan2016a: 11, 14。
54. Landemore 2012a。
55. Bagg 2018; Talisse 2019。
56. Estlund2008。
57. Brennan 2016a; Gibbons 2022; Gunn 2019; Kogelmann 2023。
58. Kogelmann2023: 504。
59. Christiano2008: 118。
60. 埃斯特伦德2008年: 第36页。
61. Bagg 2018; Benson 2024; Klocksien 2019; Somin 2023。
62. Brennan 2016a: 223–224; 另见 Dahl 1989: 52。
63. Bagg2018: 896。
64. Brennan2018: 52。
65. Brennan2011: 720。
66. Brennan2011: 720。
67. Brennan2016a: 227。
68. Brennan2019: 11。
69. Dahl1989: 103。
70. Medina2013: 35–36。
71. 英格汉姆和维恩斯, 2021年。

72. 英格汉姆和维恩斯 2021: 331。
73. Brennan2018。
74. López-Guerra 2014: 4。
75. 英格汉姆和维恩斯2021: 343。
76. 英格汉姆和威恩斯, 2021年: 第345页。
77. Talisse2022: 23。
78. Brennan2019: 7。
79. Fumagalli2022。
80. Fumagalli2022: 102。
81. Brennan2016a: 142。
82. Halperin 等, 2010; Schultz 和 Weingast, 2003; Sen, 1999; Somin, 2016: 9。
83. 布伦南和兰德莫尔, 2022年: 第119页。
84. Klocksien2019: 34。
85. 亚里士多德2017年版: 1294b。
86. 孟德斯鸠 [1748] 1989年版: 第二卷, 第2章。
87. Guerrero2014: 155。
88. Guerrero 2014, 2021a, b.

89. Guerrero 2021b: 169–170; Guerrero 2021a: 426。
90. Guerrero2021b: 171。
91. Guerrero2021b: 172。
92. 格雷罗2021b: 172–178。
93. Bagg2024: 93。
94. Malleson2018: 411。
95. HuttonFerris2023: 8。
96. Guerrero2021b: 171。
97. 兰达和佩夫尼克 2021: 55–59。
98. 格雷罗2024: 251–254。
99. 格雷罗2024: 254–256。
100. Landemore2020: 13。
101. 亚当斯 [1776] 1980年。
102. Landemore 2020: 218。
103. Landemore 2020: 80, 注1。
104. Warren2013: 269。
105. Landemore 2020: 76。
106. Landemore 2012a: 3; Landemore 2020: 25, 220。
107. Landemore2020: 26。
108. Landemore 2020: 220。

109. Landemore 2020: 81、91–92、98–104、206。
110. 兰德莫尔2020: 191–192。
111. Goodin 和 Spiekermann 2018; Landemore 2012a。
112. 布伦南和兰德莫尔, 2022年: 第191–192页。
113. Guerrero2024: 144。
114. 布伦南和兰德莫尔, 2022年: 第269–271页。
115. Elliott2023: 195。
116. Fishkin 2009, 2018; Goodin 和 Dryzek 2006。
117. Lafont2020。
118. Lafont2020: 116。
119. Lafont2020: 3。
120. Lafont2020: 30。
121. Lafont 2020; Rummens 和 Geenens 2023。

更多资源

- 阿克曼, 布鲁斯 与 詹姆斯·S·菲什金 (2008) 。《审议日》。纽黑文: 耶鲁大学出版社。

- 布伦南，杰森（2016）。《反对民主》。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 布伦南，杰森 与 埃莱娜·朗德莫尔（2022）。《民主之辩：我们需要更多还是更少？》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
- 埃斯特伦德，大卫（2003）。《为何不实行知识精英统治？》，载于《欲望、身份与存在：纪念T. M. 彭纳文集》，娜奥米·雷肖特科与特里·彭纳编，基洛纳：学术印刷与出版公司，第53-69页。
- 格雷罗，亚历山大（2024）。《抽签制：无选举的民主》。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
- 冈恩，保罗（2019）。《反对知识精英统治》。《批判评论》31.1，第26-82页。
- 拉丰特，克里斯蒂娜（2020）。《没有捷径的民主》。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
- 兰德莫尔，埃莱娜（2020）。《开放民主：为二十一世纪重

塑人民统治》。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 López-Guerra, Claudio (2011)。“选举权抽签制”。《政治、哲学与经济学》10.2，第211–233页。

参考文献

- Abramowitz, Alan I. 与 Kyle L. Saunders (2008)。《两极分化是一种迷思吗？》，《政治学杂志》70.2，第542–555页。
- Abramowitz, Alan I. 和 Steven W. Webster (2018)。《负面党派认同：为何美国人厌恶政党却表现得像狂热的党派分子》。《政治心理学》39，第119–135页。
- 阿亨，克里斯托弗·H. (1975)。《大众政治态度与调查回应》。《美国政治科学评论》，第69卷第4期，第1218–1231页。

- 阿亨，克里斯托弗·H. 与拉里·M. 巴特尔斯（2016）。《现实主义者的民主》。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 阿克曼，布鲁斯 与 詹姆斯·S·菲什金（2004）。《审议日》。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
- 亚当斯，大卫·M.（2005）。《知晓分歧何时深刻》。《非形式逻辑》25.1，第65–77页。
- 亚当斯，约翰（[1776] 1980）。《关于政府的思考》。载《约翰·亚当斯文集》。罗伯特·J·泰勒、玛丽-乔·克莱因和格雷格·L·林特编。第4卷，1775年5月至1776年8月。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第86–93页。
- 阿多诺，T. W.、E. 弗伦克尔-布伦斯维克、D. J. 莱文森和R. N. 桑福德（1950）。《权威人格》。纽约：哈珀与罗出版社。
- Ahlstrom-Vij, Kristoffer（2012）。《为何协商民主

（依然）站不住脚》。《公共事务季刊》26.3，第199–220页。

- Ahlstrom-Vij, Kristoffer
（2022）。“模型化民主之辩。”《知识论》（Episteme）第19卷第1期，第89–110页。
- 艾金，斯科特·F.（2018）。《深层分歧、黑暗启蒙与“红色药丸”的修辞》。《应用哲学杂志》36.3，第420–435页。
- Alesina, Alberto、Armando Miano 和 Stefanie Stantcheva（2020）。“现实的极化”。《美国经济学会论文与会议录》第110卷，第324–328页。
- Allcott, Hunt、Luca Braghieri、Stefan Eichmeyer 和 Matthew Gentzkow（2020）。“社交媒体的福利效应。”《美国经济评论》110.3，第629–676页。
- 阿尔马格罗，曼努埃尔（2023）。《政治极化：激进主义与免疫信念》。《哲学与

社会批判》49卷第3期，第309–331页。

- 阿尔托斯，斯科特·L。
（2003）。《民主政治中的集体偏好：民意调查与人民意志》。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
- 安塞尔，亚伦（2017）。《公共非理性：关于政治分歧的论文》。博士论文。杜克大学。
网址：<https://hdl.handle.net/10161/16353>。
- 安塞尔，亚伦（2019）。《不合理多元主义的事实》。《美国哲学协会期刊》5.4，第410–428页。
- 安德森，伊丽莎白（2006）。《民主的认识论》。《知识》3.1，第8–22页。
- 安德森，伊丽莎白（2008）。《民主的认识论辩护：大卫·埃斯特伦德的民主权威》。《认识论》5.1，第129–139页。
- 安德森，伊丽莎白（2010）。《融合的必要性》。新泽西州

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 安德森，伊丽莎白（2011）。《民主、公共政策与公众对科学证言的评估》。《知识论》8.2，第144-164页。
- 阿肯诺，凯文 和 马丁·约翰逊（2013）。《改变想法还是更换频道？选择时代中的党派新闻》。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 阿伦特，汉娜 编。（[1968] 1977）。《真理与政治》。载于《过去与未来之间：政治思想的八次练习》。企鹅出版社，第227-264页。
- 亚里士多德（2017）。《政治学》。C. D. C. 里夫译。印第安纳波利斯：哈克特出版社。
- 阿内森，理查德·J.（1993）。《国家层面与工作场所层面的民主权利》。载于《民主的理念》，约翰·E·罗默、大卫·科普与珍·汉普顿编。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第118-148页。
- 阿内森，理查德·J.（2009）。“所谓参与民主决策的权利”。

载于《当代政治哲学论辩》，
托马斯·克里斯蒂亚诺与约翰·克
里斯特曼编，威利-布莱克威尔
出版社，第197–212页。

- 阿什沃思，斯科特（2012）。
《选举问责：近期的理论与实
证研究》。《政治学年度评
论》15.1，第183–201页。
- 培根，弗朗西斯（[1620]
1939）。《新工具》。载于
《从培根到密尔的英国哲学
家》，E. A. 伯特编。纽约：兰
登书屋，第24–123页。
- 巴格，塞缪尔（2018）。《大
众的力量：回应民主的证成挑
战》。《美国政治科学评论》
112.4，第891–904页。
- 巴格，塞缪尔（2024）。《抽
签作为反腐败机制：民众监督
以对抗精英俘获》。《美国政
治科学杂志》68.1，第93–
105页。
- 鲍尔，詹姆斯（2018）。《后
真相：胡说八道如何征服世
界》。赫尔：比特贝克出版
社。

- 巴兰坦，内森（2016）。《言语分歧与哲学怀疑论》。《澳大拉西亚哲学杂志》94.4，第752–765页。
- 巴拉尼恩，内森（2019a）。《认知越界》。《心灵》128卷第510期，第367–395页。
- 巴兰坦，内森（2019b）。《认识我们的局限》。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
- Ballantyne, Nathan、Jared B. Celniker 和 David Dunning（2022）。《“自己做研究”》。《社会认识论》38.3，第302–317页。
- 巴伯，本杰明（2003）。《强势民主：新时代的参与式政治》。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
- 巴伯，迈克尔 与 诺兰·麦卡蒂（2015）。《极化的成因与后果》。载于《美国政治极化的解决方案》，纳撒尼尔·佩西利编。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第15–58页。
- Barberá, Pablo、John T. Jost、Jonathan Nagler、

Joshua A. Tucker 和 Richard Bonneau (2015)。《从左到右发推：在线政治传播是否不止是一个回音室？》，《心理科学》26.10，第1531–1542页。

- Baron, Jonathan 和 John T. Jost (2019)。《错误的对等：美国的自由派与保守派是否同样存在偏见？》，《心理科学视角》14.2，第292–303页。
- 巴特尔斯，拉里·M. (2016)。《不平等的民主：新镀金时代的政治经济学》。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 比尔博姆，埃里克 (2012)。《以我们之名：民主的伦理》。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 比尔博姆，埃里克 与 瑞安·W·戴维斯 (2021)。《对公民的煤气灯操纵》。《美国政治科学杂志》67.4，第867–879页。

- 贝格比，恩德雷（2022）。
《从信念极化到回音室：一种合理化解释》。《知识论》（Episteme），第1–21页。
- 本哈比卜，塞拉（1996）。
《民主与差异：对政治边界的争论》。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 贝内特，迈克尔（ms）。“中立的工具主义：为认识论民主提供动因。”未发表手稿。
- 贝内特，斯蒂芬·厄尔（2003）。《公众对政治的无知是否微不足道？》，《批判评论》15.3–4，第307–337页。
- 本森，乔纳森（2024）。《智能民主：回应新民主怀疑论》。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
- Berinsky, A. J. (2018)。“说出相信谎言的真相？关于表达性调查回答有限普遍性的证据。”《政治学杂志》80，第211–224页。
- Berntzen, Lars Erik、Haylee Kelsall 和 Eelco Harteveld

(2023)。《情感极化的后果：英国与挪威的回避、不容忍及对暴力的支持》。《欧洲政治研究杂志》63.3，第927-949页。

- 毕晓普，比尔（2008）。《大分化：志同道合的美国人扎堆为何让我们分裂》。霍顿·米夫林·哈考特出版社。
- 布莱克本，西蒙（1984）。《传播话语：语言哲学基础》。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
- 布莱克本，西蒙（2018）。《论真理》。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
- 布莱克本，西蒙（2019）。《在后真相时代，我们该如何教授客观性？》《新政治家》。2019年2月18日。网址：<https://www.newstatesman.com/politics/2019/02/how-can-we-teach-objectivity-in-a-post-truth-era>。
- 布莱克斯通，威廉（[1768] 1979）。《论私法上的侵权行为

为》。第3卷。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 布卢姆，保罗（2015）。《科学信念不同于宗教信念》。2015年11月24日。网址：<https://www.theatlantic.com/science/archive/2015/11/why-scientific-faith-isnt-the-same-as-religious-faith/417357/>。
- 布卢姆，保罗（2016）。《反对共情：理性同情的理由》。纽约：埃科图书公司。
- 博曼，詹姆斯（1996）。《公共审议：多元主义、复杂性与民主》。剑桥：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
- 博曼，詹姆斯（2000）。《民主话语中的劳动分工：媒体、专家与协商民主》。载于西蒙娜·钱伯斯与安妮·科斯坦主编，《协商、民主与媒体》。拉纳姆：罗曼与利特尔菲尔德出版社，第47-64页。
- 博曼，詹姆斯（2007）。《政治传播与多样性的认识论价值：媒介社会中的审议与正当

化》。《传播理论》17.4, 第348–355页。

- 博尔托洛蒂, 丽莎 (2015)。《非理性》。剑桥: 政体出版社。
- Boxell, Levi、Matthew Gentzkow 和 Jesse M. Shapiro (2017)。《互联网是否导致政治极化? 来自人口统计学的证据》。工作论文第w23258号。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网址: <https://ssrn.com/abstract=2937528>。
- Boxell, Levi、Matthew Gentzkow 和 Jesse M. Shapiro (2022)。“情感极化的跨国趋势”。《经济学与统计学评论》, 106 卷第 2 期, 第 557–565 页。
- 布伦南, 杰弗里与艾伦·哈姆林 (1998)。《表达性投票与选举均衡》。《公共选择》95卷1–2期, 第149–175页。
- 布伦南, 杰弗里与洛伦·洛马斯基 (1993)。《民主与决策:

选举偏好的纯粹理论》。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

- 布伦南，杰森（2011）。《选民胜任权》。《哲学季刊》61卷，第245期，第700–724页。
- 布伦南，杰森（2012）。《投票的伦理》。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 布伦南，杰森（2016a）。《反对民主》。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 布伦南，杰森（2016b）。《特朗普获胜是因为选民真的无知》。2016年11月10日。网址：<https://foreign-policy.com/2016/11/10/the-dance-of-the-dunces-trump-clinton-election-republican-democrat/>。
- 布伦南，杰森（2018）。《对知识精英统治的人口统计学反驳是否成立？》，《公共事务》24.1，第53–71页。
- 布伦南，杰森（2019）。《给予知识精英统治以公正的听

证》。《探究》65.1，第35–49页。

- 布伦南，杰森（2021a）。

《公共理性自由主义是否建立在一个错误之上？民主的信念与认识论问题》。载于《政治认识论》，伊丽莎白·埃登伯格与迈克尔·汉农编。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

- 布伦南，杰森（2021b）。

《为知识精英统治辩护：开明偏好投票》。载于《劳特利奇政治认识论手册》，迈克尔·汉农与耶罗恩·德里德主编。伦敦：劳特利奇出版社，第374–383页。

- 布伦南，杰森 与 埃莱娜·朗德莫尔（2022）。《民主之辩：我们需要更多还是更少？》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

- 布伦南，约翰尼（2020）。

《初学者能否相信自己有能力选择可靠的专家？（谨慎）乐观的理由》。《社会认识论》34卷第3期，第227–240页。

- 布伦南，梅根（2023）。《美国民众对媒体的信心降至与

2016年持平的历史最低水平》。2023年10月19日。网址：<https://news.gallup.com/poll/512861/media-confidence-matches-2016-record-low.aspx>。

- 布莱特，利亚姆·科菲（2019）。《罗伯特·E·古丁与凯·斯皮克曼的〈民主的认识论理论〉》，《经济学与哲学》，35卷第3期，第563–568页。
- Bright Line Watch（2020年）。Bright Line Watch 调查第12轮数据集。网址：http://brightlinewatch.org/wp-content/uploads/2019/11/Public_Wave12.csv。
- 布林克曼，马蒂亚斯（2022）。《为非理想政治顺从辩护》。《知识论》19.2，第264–285页。
- 布朗卡诺-贝罗卡尔，费尔南多与J. 亚当·卡特（2021）。《群体极化的哲学：认识论、

形而上学与心理学》。纽约：劳特利奇出版社。

- 布鲁克斯，大卫（2020）。《共和党思想的腐化》。《纽约时报》，2020年11月26日。网址：<https://www.nytimes.com/2020/11/26/opinion/republican-disinformation.html>。
- Bullock, John G., Alan S. Gerber, Seth J. Hill 和 Gregory A. Huber（2015）。《政治事实信念中的党派偏见》。《政治科学季刊》第10卷第4期，第519–578页。
- 伯恩斯坦，尤金 与 阿米尔·维诺库尔（1977）。《说服性论证与社会比较作为态度极化的决定因素》。《实验社会心理学杂志》13.4，第315–332页。
- Caenegem, R. C. van（1987）。《法官、立法者与教授：欧洲法律史论集》。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

- 坎贝尔，安格斯；菲利普·E·康弗斯；沃伦·E·米勒；唐纳德·E·斯托克斯（1960）。《美国选民》。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 坎贝尔，大卫·E.（2006）。《我们为何投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 坎贝尔，詹姆斯·E.（2018）。《两极分化：理解一个分裂的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 卡普兰，布莱恩（2007）。《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糟糕的政策》。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 卡普兰，布莱恩（2012）。《理性选民的神话与政治理论》。载于《集体智慧：原理与机制》，埃莱娜·兰德莫尔与乔恩·埃爾斯特编。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第319–337页。
- 卡佩伦，赫尔曼 与 约翰·霍桑（2009）。《相对主义与单子

真》。约翰·霍桑 编。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

- Carl, Noah、Nathan Cofnas 与 Michael A. Woodley of Menie (2016) 。《科学素养、对科学的乐观态度与保守主义》。《人格与个体差异》第94卷，第299-302页。
- 卡罗瑟斯，托马斯 与 安德鲁·奥多诺霍 (2019) 。《分裂的民主：政治极化的全球挑战》。华盛顿特区：布鲁金斯学会出版社。
- 钱伯斯，西蒙娜 (2017) 。
《在系统性协商民主方法中平衡认知质量与平等参与》。
《社会认识论》31卷第3期，
第266-276页。
- 克里斯滕森，大卫 (2007) 。
《分歧的认识论：好消息》。
《哲学评论》116.2，第187-217页。
- 克里斯蒂亚诺，托马斯 (1996) 。《多数人的统治：民主理论中的根本问题》。纽约：阿瓦隆出版公司。

- 克里斯蒂亚诺，托马斯
(2008)。《平等的宪法：民主权威及其限度》。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
- 克里斯蒂亚诺，托马斯
(2012)。《专家与公民之间的理性审议》。载于约翰·帕金森与简·曼斯布里奇编，《审议系统：大规模的审议民主》。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第27-51页。
- Cialdini, Robert B.
(1993)。《影响力：说服的心理学》。纽约：Morrow出版社。
- 科恩，杰弗里·L. (2003)。
《党派胜于政策：群体影响对政治信念的主导作用》。《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85卷第5期，第808-822页。
- 科恩，约书亚 (1986)。《民主的一种认识论构想》。《伦理学》97.1，第26-38页。
- 科恩，约书亚 (1989)。《协商与民主合法性》。载于《良善政体：国家的规范分析》，艾伦·哈姆林与菲利普·佩蒂特

编。牛津：布莱克韦尔出版社，第17-34页。

- 科恩，约书亚（1996）。《协商民主中的程序与实质》。载于塞拉·本哈比卜（Seyla Benhabib）编，《政治边界的争辩》。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第95-119页。
- 科恩，约书亚（2009）。《真理与公共理性》。《哲学与公共事务》37.1，第2-42页。
- 科恩，L. J.（1992）。《论信念与接受》。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
- 柯林斯，哈里与罗伯特·埃文斯（2007）。《重思专长》。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 柯林斯，哈里·M. 与罗伯特·埃文斯（2002）。《科学学的第三次浪潮：专长与经验研究》。《科学的社会研究》32卷第2期，第235-296页。
- Constantin, Jan 和 Thomas Grundmann（2020）。《认知权威：通过来源敏感的击败

实现的优先性》。《综合》
197.9，第4109–4130页。

- 康弗斯，菲利普·E. (1964)。
《大众公众中信念体系的本质》。载于戴维·E. 阿普特编，
《意识形态及其不满》。纽约：自由出版社，第206–261
页。
- 康弗斯，菲利普·E. (1990)。
《大众代表与信息分布》。载
于《信息与民主进程》，约翰
·A·费雷约翰与詹姆斯·H·库克林
斯基编。尚佩恩：伊利诺伊大
学出版社。
- 康威三世 (Conway III)、卢
西安·吉迪恩 (Lucian
Gideon)、劳拉·珍妮尔·戈尼
克 (Laura Janelle Gor-
nick)、香农·C·豪克 (Shan-
non C. Houck)、克里斯托弗·
安德森 (Christopher Ander-
son)、詹妮弗·斯托克特
(Jennifer Stockert)、黛安
娜·塞索姆斯 (Diana
Sessoms) 和凯文·麦丘 (Kev-
in McCue) (2016)。《保
守派真的比自由派更简单化思

维吗？复杂思维的领域特异性》。《政治心理学》（Political Psychology）37卷第6期，第777–798页。

- Conway III, Lucian Gideon、Shannon C. Houck、Laura Janelle Gornick 和 Meredith A. Repke（2018）。《寻找尼斯湖水怪：美国的左翼威权主义》。《政治心理学》39.5，第1049–1067页。
- Corner, John（2017）。《假新闻、后真相与媒介—政治变迁》。《媒介、文化与社会》29.7，第1100–1107页。
- 克劳福德，贾勒特·T. 与 简·M. 皮兰斯基（2014）。《政治不容忍：左与右》。《政治心理学》35.6，第841–851页。
- 达尔，罗伯特·A.（1971）。《多元政体：参与与反对》。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
- 达尔，罗伯特·A.（1989）。《民主及其批评者》。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
- 戴维斯，埃文（2017）。《后真相：胡扯的巅峰以及我们能

做些什么》。伦敦：利特尔-布朗出版社。

- 德里德，耶罗恩（2021）。
《深层分歧与政治极化》。载于《政治认识论》，伊丽莎白·埃登伯格与迈克尔·汉农编。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第226–243页。
- 迪里，伊恩·J.、G·大卫·巴蒂和凯瑟琳·R·盖尔（2008年）。
《聪明的孩子成长为开明的成人》。《心理科学》19卷第1期，第1–6页。
- Delli Carpini, Michael X. 与 Scott Keeter（1996）。《美国人对政治的了解及其重要性》。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
- 德尔森，芬努尔（2024）。
《主题间极化》。《美国哲学季刊》61.1，第45–58页。
- 德佩（Deppe），克里斯滕·D.（Kristen D.）、冈萨雷斯（Gonzalez），弗兰克·J.（Frank J.）、尼曼（Neiman），杰米·L.（Jayme L.）、雅各布斯（Jacobs），

卡莉 (Carly)、帕尔克 (Pahlke)、杰克逊 (Jackson)、史密斯 (Smith)、凯文·B. (Kevin B.) 和希宾 (Hibbing)、约翰·R. (John R.) (2015)。《反思型自由派与直觉型保守派：认知反思测试与意识形态探析》。《判断与决策》(Judgment and Decision Making) 10.4, 第 314–331 页。

- 笛卡尔，勒内 ([1637] 1998)。《方法论》。唐纳德·A·克雷斯译。印第安纳州印第安纳波利斯：哈克特出版社。
- 杜威，约翰 ([1927] 2012)。《公众及其问题：一项政治探究的论文》。宾夕法尼亚州大学公园：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出版社。
- 迪马乔，保罗、约翰·埃文斯和贝瑟尼·布赖森 (1996年)。《美国人的社会态度是否变得更加两极分化？》，《美国社会学杂志》第102卷第3期，第 690–755 页。

- Ditto, Peter H., Brittany S. Liu, Brittany S. Liu, Cory J. Clark, Sean P. Wojcik, Eric E. Chen, Rebecca H. Grady, Jared B. Celniker 和 Joanne F. Zinger (2019) 。《至少偏见是两党共有的：自由派与保守派党派偏见的元分析比较》。《心理科学视角》14.2, 第273–291页。
- Ditto, Peter H. 和 David F. Lopez (1992) 。《动机性怀疑：对偏好与非偏好结论采用不同的决策标准》。《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63.4, 第568页。
- 多斯特, 凯文 (2023) 。《理性极化》。《哲学评论》132.3, 第355–458页。
- 道格拉斯, 希瑟 (2009) 。《科学、政策与无价值理想》。匹兹堡：匹兹堡大学出版社。
- 道, 希拉 (2017年) 。《人们已经受够了专家》。新经济思维研究所。网址：<https://www.ineteconomics.org/per->

spectives/blog/people-have-had-enough-of-experts。

- 唐斯，安东尼（1957）。《民主的经济理论》。纽约：哈珀与罗出版社。
- Druckman, James N. 与 Mary C. McGrath（2019）。《气候变化偏好形成中动机性推理的证据》。《自然·气候变化》9.2，第111–119页。
- Druckman, James N.、Samara Klar、Yanna Krupnikov、Matthew Levendusky 和 John Barry Ryan（2022）。“（误）估情感极化”。《政治学杂志》84.2，第1106–1117页。
- 德拉蒙德，凯特琳 与 巴鲁克·菲施霍夫（2017）。《科学素养和教育水平更高的人对有争议的科学话题持有更加两极分化的观点》。《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114卷第36期，第9587–9592页。
- 德雷泽克，约翰（1990）。《话语民主》。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

- 达菲，博比（2018）。《认知的陷阱：为何我们几乎对所有事情都判断错误》。伦敦：大西洋图书公司。
- 邓宁，大卫（2014）。《我们都是自信的傻瓜》。《太平洋标准》。2014年10月27日。2017年6月14日更新。网址：<https://psmag.com/social-justice/confident-idiot-92793>。
- 埃贝林，马丁（2017）。《调和式民主：从协商走向一种关于分歧的新政治》。伦敦：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
- 爱德曼信任研究所（2024）。《2024年爱德曼信任晴雨表：全球报告》。网址：<https://www.edelman.com/trust/2024/trust-barometer>。
- 伊丽莎白·埃登伯格与迈克尔·汉农 编。（2021）。《政治认识论》。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
- 埃尔加，亚当（2007）。《反思与分歧》。《Nous》41.3，第478–502页。

- 埃尔金斯，杰里米（2012）。
《论真理的实践》。载于《真理与民主》。杰里米·埃尔金斯与安德鲁·诺里斯编。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第19-53页。
- 埃利奥特，凯文·J.（2023）。
《为忙碌人士准备的民主》。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 埃蒙斯，卡桑德拉、查德·维克里和埃丽卡·谢因（2023）。
《民主与信任危机》。网址：
<https://foreignpolicy.com/sponsored/democracy-and-the-crisis-of-trust/>。
- 伊诺克，大卫（2017）。《政治哲学与认识论：以公共理性为例》。载于《牛津政治哲学研究》，第3卷。大卫·索贝尔、彼得·瓦伦泰恩与史蒂文·沃尔编，第132-165页。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
- 爱泼斯坦，里德·J.（2022）。
《随着对美国政府的信任减弱，许多选民希望颠覆现有体制》。《纽约时报》，2022年7月13日。网址：<https://>

www.nytimes.com/
2022/07/13/us/politics/
government-trust-voting-
poll.html。

- 埃尔曼、伊娃与尼古拉斯·默勒（2016）。《为何民主不能以认识论原则为基础》。《社会理论与实践》42.3，第449–473页。
- 埃斯特伦德，大卫（1993）。《让真理为民主保驾护航》。载于大卫·科普、珍·汉普顿与约翰·E·罗默编，《民主的理念》。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第71–100页。
- 埃斯特伦德，大卫（1997）。《超越公平与协商：民主权威的认识论维度》。载于詹姆斯·博曼与威廉·雷格编，《协商民主：理性与政治论文集》。剑桥：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第173–204页。
- 埃斯特伦德，大卫（1998）。《合理性的封闭性：为何政治自由主义必须承认真理》。《伦理学》108.2，第252–275页。

- 埃斯特伦德，大卫（2003）。《为何不实行知识精英统治？》，载于《欲望、身份与存在：献给T. M. 彭纳的论文集》，娜奥米·雷肖特科与特里·彭纳编，基洛纳：学术印刷与出版公司，第53-69页。
- 埃斯特伦德，大卫（2008）。《民主权威：一种哲学框架》。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 埃斯特伦德，大卫 与 海伦·兰德莫尔（2018）。《民主审议的认识论价值》。载于安德烈·贝希蒂格、约翰·S·德雷泽克、简·曼斯布里奇 与 马克·沃伦编，《牛津审议民主手册》。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第113-131页。
- 埃亚尔，吉尔（2019）。《专业知识的危机》。剑桥：波利蒂出版社。
- Fahey, James J. (2023)。《大谎言：美国的表达性回应与错误认知》。《实验政治科学杂志》10.2，第267-278页。

- 范特尔，杰里米（2018）。
《开放心智的局限》。牛津：
牛津大学出版社。
- 法里斯、罗伯特、哈尔·罗伯
茨、布鲁斯·埃特林、妮基·布拉
萨、伊桑·祖克曼和约查伊·本克
勒（2017）。《党派性、宣传
与虚假信息：在线媒体与2016
年美国总统大选》。伯克曼·克
莱因中心研究出版物第6号，第
1-140页。
- 法塔尔，伊莎贝尔（2024）。
《美国为何不再信任专家》。
《大西洋月刊》，2024年3月
22日。网址：[https://
www.theatlantic.com/news-
letters/archive/2024/03/
when-experts-fail/
677867/](https://www.theatlantic.com/news-letters/archive/2024/03/when-experts-fail/677867/)。
- 费伦，詹姆斯·D.（1998）。
《协商即讨论》。载于乔恩·埃
尔斯特编：《协商民主》。剑
桥：剑桥大学出版社，第44-
68页。
- 费尔德曼，理查德（2005）。
《深度分歧、理性解决与批判

性思维》。《非形式逻辑》
25.1，第12-23页。

- 费尔德曼，理查德（2007）。
《合理的宗教分歧》。载于
《无神论哲学家：关于无神论
与世俗生活的沉思》，路易丝·
安东尼编。牛津：牛津大学出
版社，第194-214页。
- 费雷约翰，约翰（1990）。
《信息与选举过程》。载于
《信息与民主进程》，约翰·费
雷约翰与詹姆斯·库克林斯基
编。尚普兰：伊利诺伊大学出
版社。
- 费斯廷格，利昂（1957）。
《认知失调理论》。斯坦福：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 菲奥里娜、莫里斯·P.、塞缪尔
·A. 艾布拉姆斯和杰里米·C. 波
普（2008）。《美国公众的极
化：误解与误读》。《政治学
杂志》70卷第2期，第556-
560页。
- 费什金，詹姆斯·S.（2009）。
《当人民发声：协商民主与公
众咨询》。牛津：牛津大学出
版社。

- 菲什金，詹姆斯·S. (2018) 。
《当人民在思考时的民主：通过公共审议重振我们的政治》。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
- 弗莱舍尔，约翰和埃德·怀特 (2023年) 。“检方称，涉嫌密谋绑架密歇根州州长惠特默的男子意图发动内战。”美联社，2023年8月23日。网址：
<https://www.pbs.org/news-hour/nation/men-accused-in-plot-to-kidnap-michigan-gov-whitmer-wanted-to-start-a-civil-war-prosecutor-says>。
- 弗鲁，特里 (2021) 。《全球信任赤字失调：全球大流行时代信任问题的传播学视角》。《传播学刊》71卷第2期，第163–186页。
- 弗洛雷斯，卡罗琳娜 (2021) 。《他们全都愚蠢且非理性吗？》美国哲学协会博客。2021年3月24日。网址：
<https://blog.apaonline.org/>

2021/03/24/are-they-all-stupid-and-irrational/。

- 福杰林，罗伯特（1985）。《深层分歧的逻辑》。《非形式逻辑》7.1，第3–11页。
- 福柯，米歇尔（[1981] 2014）。《作恶与说真话：忏悔在司法中的功能》。斯蒂芬·W·索耶译。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 法兰克福，哈里·G.（2005）。《论胡扯》。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 弗里克，米兰达（2007）。《认知不正义：权力与认知伦理》。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
- 弗里德曼，杰弗里（1998）。《公众无知与民主理论》。《批判评论》12，第397–411页。
- 弗里德曼，杰弗里（2005）。《波普尔、韦伯与哈耶克：无知的认识论与政治学》。《批判评论》17.1–2，第1–58页。

- 弗里德曼，杰弗里（2006）。《规范理论与实证理论中的民主能力：“大众公众信念体系的本质”被忽视的意涵》。《批判评论》18.1-3，第1-43页。
- 弗里德曼，杰弗里（2013年）。《无知，是的；理性，不。》《加图无界》。网址：<https://www.cato-unbound.org/2013/10/18/jeffrey-friedman/ignorance-yes-rational-no/>。
- 弗里德曼，杰弗里（2014）。《政治认识论》。《批判评论》26卷第1-2期，第i-xiv页。
- 弗里德曼，杰弗里（2019）。《无知识的权力：对技术官僚主义的批判》。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
- 弗里德曼，杰弗里（2021）。《政治非理性是一种迷思吗？》，载于《劳特利奇政治认识论手册》，迈克尔·汉农与耶罗恩·德里德主编。伦敦：劳特利奇出版社，第263-273页。

- 弗里德曼，理查德·B.
 (1990)。《论政治哲学中的权威概念》。载于约瑟夫·拉兹编，《权威》。牛津：布莱克韦尔出版社，第56-91页。
- 弗里默，杰里米·A.、琳达·J. 斯基特卡 and 马特·莫蒂尔
 (2017)。《自由派与保守派同样倾向于避免接触彼此的观点》。《实验社会心理学杂志》第72期，第1-12页。
- 弗莱，玛丽莲 (1983)。《现实的政治：女性主义理论论文集》。特鲁曼斯堡：交叉出版社。
- 弗尔斯泰因，迈克尔
 (2008)。《认识论民主与知识的社会性》。《认识论》第5卷第1期，第74-93页。
- 弗尔斯泰因，迈克尔
 (2021)。《无真理的民主认识论：杜威式进路》。《政治理性》第81卷第1期，第81-96页。
- 富勒，罗斯琳 (2019)。《为民主辩护》。剑桥：政体出版社。

- 富勒，史蒂夫（2006）。《专业知识的构成性社会特征》。载于《专业知识的哲学》，埃文·M·塞林格与罗伯特·P·克里兹编。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第342-357页。
- 富马加利，科拉多（2022）。《自由精英统治中的稳定性》。《社会认识论》37.1，第97-109页。
- 芬克豪泽，E.（2017）。《信念作为信号：信念的一种新功能》。《哲学心理学》30.6，第809-831页。
- 加尔斯顿，威廉·A.（2001）。《政治知识、政治参与与公民教育》。《政治学年度评论》第4卷第1期，第217-234页。
- 加尔斯顿，威廉·A.（2002）。《自由多元主义：价值多元论对政治理论与实践的意涵》。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
- 甘扎赫，约阿夫（2016）。《认知能力与政党认同：民主党人与共和党人之间并无显著差异》。《智力》第58卷，第18-21页。

- 加勒特、R·凯利、希拉·德维尔-格维尔兹曼、本杰明·K·约翰逊、亚里夫·茨法蒂、瑞秋·尼奥和艾森努尔·达尔（2014年）。《支持性与反态度信息接触对情感极化的影响》。
《人类传播研究》第40卷第3期，第309-332页。
- 高斯，杰拉尔德（1996）。
《证成自由主义：认识论与政治理论论稿》。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
- 高斯，杰拉尔德（2003）。
《当代自由主义理论：作为后启蒙计划的公共理性》。伦敦：SAGE出版社。
- 高斯，杰拉尔德（2011）。
《通过民主寻求真理（无论那是什么）：埃斯特伦德对有限认知主张的论证》，《伦理学》121卷第2期，第270-300页。
- 格尔费特，阿克塞尔（2011）。《谁是认知同行？》，《逻各斯与认识》2.4，第507-514页。

- 格尔曼，安德鲁、内特·西尔弗和亚伦·埃德林（2012）。
《你的选票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概率有多大？》，《经济探究》50.2，第321–326页。
- 格尔尔斯贝克，费利克斯（2018）。《何为民主可靠性？民主的认识论理论与合理分歧问题》。《国际社会与政治哲学评论》21卷第2期，第218–241页。
- 盖梯尔，埃德蒙（1963）。
《确证的真信念是知识吗？》，《分析》23.6，第121–123页。
- 吉本斯，亚当（2022）。《精英统治是否非理性？》，《伦理学与社会哲学杂志》21.2。
- 吉本斯，亚当（2023）。《政治无知既是理性的，也是激进的》。《综合》202.61，第1–22页。
- 吉洛维奇，托马斯（1993）。
《我们如何知道那些并不存在的事》。纽约：自由出版社。

- 戈德曼，阿尔文·I. (1986)。
《认识论与认知》。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
- 戈德曼，阿尔文·I. 编 (1999 年)。
《民主》。载于《社会世界中的知识》。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第315-348页。
- 戈德曼，阿尔文·I. (2001)。
《专家：该信任哪些人？》，
载《哲学与现象学研究》第63卷第1期，第85-110页。
- 戈德曼，阿尔文·I. (2018)。
《专家知识》。《拓扑学》37.1，第3-10页。
- 冈萨雷斯-里科伊，伊尼戈 (2012)。
《使民调去政治化：投票弃权与道德分歧》。
《政治学》32.1，第46-51页。
- 古丁，罗伯特·E. (2008)。
《创新民主：协商转向之后的民主理论与实践》。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
- 古丁，罗伯特·E. 与约翰·S. 德赖泽克 (2006)。
《协商的影响：微型公众的宏观政治吸

纳》。《政治与社会》34.2，第219-244页。

- 古丁，罗伯特·E. 与凯·斯皮克曼（2018）。《民主的认识论理论》。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
- 戈茨舍-阿斯特鲁普，奥卢夫（2021）。《通往暴力的路径：不确定性与黑暗世界观是否会增强参与政治暴力的意图？》，《恐怖主义与政治攻击行为科学》第13卷第2期，第142-159页。
- 格雷厄姆，杰西与乔纳森·海特（2010）。《超越信念：宗教将个体凝聚为道德共同体》。《人格与社会心理学评论》14.1，第140-150页。
- 格雷厄姆，马修·H. 与 奥默·亚伊尔（2023）。《表达性回应与对2020年选举舞弊的信念》。《政治行为》46，第1349-1374页。
- 格林，唐纳德·P.、布拉德利·帕尔姆奎斯特和埃里克·希克勒（2002）。《党派之心与思想：政党与选民的社会认

同》。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

- 格林，乔恩；贾里德·埃杰顿；丹尼尔·纳夫特尔；凯尔西·舒布；斯凯勒·小·克兰默

（2020）。《难以达成的共识：新冠疫情中精英沟通的极化现象》。《科学进展》6卷28期，第1–5页。

- 格里芬，克里斯托弗·G.

（2003）。《作为非工具性正义程序的民主》。《政治哲学杂志》11.1，第111–121页。

- 格伦德曼，托马斯（2025）。

《专家知识》，载于珍妮弗·拉基与艾丹·麦格林（编），《牛津社会认识论手册》，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

- 格雷罗，亚历山大（2010）。

《投票悖论与政治代表的伦理》。《哲学与公共事务》38卷第3期，第272–306页。

- 格雷罗，亚历山大（2014）。

《反对选举：抽签制的替代方案》。《哲学与公共事务》42卷第2期，第135–178页。

- 格雷罗，亚历山大（2017）。
《在一个专家的世界中与无知共存》。载于《道德与社会哲学视角下的无知》，里克·皮尔斯编。纽约：劳特利奇出版社，第156-185页。
- 格雷罗，亚历山大（2020）。
《一种政治专长理论》。载于《劳特利奇技能与专长哲学手册》，艾伦·弗里德兰与卡洛塔·帕韦塞编。伦敦：劳特利奇出版社，第445-459页。
- 格雷罗，亚历山大
（2021a）。《非选举式民主形式的认识论依据》。载于《劳特利奇政治认识论手册》，迈克尔·汉农与耶罗恩·德里德主编。伦敦：劳特利奇出版社，第419-429页。
- 格雷罗，亚历山大
（2021b）。《选举的认知病理与抽签制的认知前景》。载于伊丽莎白·埃登伯格与迈克尔·汉农编，《政治认识论》。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第166-192页。

- 格雷罗，亚历山大（2024）。《抽签制：无选举的民主》。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
- 冈恩，保罗（2019）。《反对知识精英统治》。《批判评论》31.1，第26–82页。
- 古特曼，艾米与丹尼斯·F·汤普森（1996）。《民主与分歧》。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
- 古特曼，艾米与丹尼斯·F·汤普森（2014）。《妥协的精神：为何治理需要它，而竞选却削弱它》。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 哈克，苏珊（2019）。《后“后真相”：我们到了吗？》，《理论》85卷第4期，第258–275页。
- 哈贝马斯，尤尔根（1996）。《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与民主的商谈理论之贡献》。威廉·雷格译。剑桥：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
- 海特，乔纳森（2012）。《正义之心：为何好人因政治与宗

教而分裂》。纽约：万神殿出版社。

- 哈尔松，比约恩·G.

(2019)。《政治分歧的认识论意义》。《哲学研究》176.8，第2187–2202页。

- 哈尔佩林，莫顿·H.、约瑟夫·T.·西格尔和迈克尔·M.·温斯坦

(2010)。《民主的优势：民主如何促进繁荣与和平》。纽约：劳特利奇出版社。

- 汉密尔顿，劳伦斯·C.

(2011)。《教育、政治与对气候变化的看法：交互效应的证据》。《气候变化》104卷第2期，第231–242页。

- 哈农，迈克尔 (2020)。《共情理解与协商民主》。《哲学与现象学研究》101.3，第591–611页。

- 汉农，迈克尔 (2022a)。

《有知识的选民是更好的选民吗？》，《政治、哲学与经济学》21.1，第29–54页。

- 汉农，迈克尔 (2022b)。

《公共话语及其问题》。《政

治、哲学与经济学》22.3，第336–356页。

- 汉农，迈克尔 与 杰罗恩·德里德（编）。（2021）。《劳特利奇政治认识论手册》。伦敦：劳特利奇出版社。
- 汉农，迈克尔与伊莉丝·伍德沃德（即将出版）。“认知规范性的建构。”《哲学议题》。
- 哈拉里，尤瓦尔·诺亚（2018）。《21世纪的21堂课》。以色列：斯皮格尔与格劳出版社、乔纳森·凯普出版社。
- 哈考特，伯纳德·E.（2021）。《后真相》。载于梅丽莎·施瓦茨伯格与菲利普·基彻编，《真理与证据》。纽约：纽约大学出版社，第147–175页。
- 哈丁，拉塞尔（2006）。《无知的民主》。《批判评论》第18期，第179–195页。
- 哈德维格，约翰（1985）。《认识论上的依赖》。《哲学杂志》82.7，第335–349页。
- 哈里斯，P.（2013年）。“调查显示：四分之一美国人认为

奥巴马可能是反基督者。”《卫报》，2013年4月2日。网址：<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3/apr/02/americans-obama-anti-christ-conspiracy-theories>。

- 哈伍德，罗宾（1998）。《为博士们投更多票》。《社会哲学杂志》29卷第3期，第129–141页。
- 哈斯托夫，阿尔伯特·H. 与哈德利·坎特里尔（1954）。《他们看到了一场比赛：一项案例研究》。《异常与社会心理学杂志》49.1，第129–134页。
- 哈兹利特，艾伦（2016）。《非顺从信念的社会价值》。《澳大拉西亚哲学杂志》94.1，第131–151页。
- 黑兹利特，艾伦（2022）。《民粹主义、专业知识与智识自主性》。载于《介入民粹主义：民主与智识美德》，迈克尔·C·伯豪与乔治·察基里季斯编，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第89–105页。

- 希利，安德鲁与尼尔·马尔霍特拉（2013）。《重新审视回溯性投票》。《政治学年度评论》16.1，第285–306页。
- 希利（Andrew J. Healy）、马尔霍特拉（Neil Malhotra）和莫贤贞（Cecilia Hyunjung Mo）（2010年）。《无关事件影响选民对政府绩效的评价》。《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107卷第29期，第12804–12809页。
- 赫伯特，鲍勃（2004年）。 “在缺乏事实的情况下投票。” 《纽约时报》，2004年11月8日。网址：<https://www.nytimes.com/2004/11/08/opinion/voting-without-the-facts.html>。
- 赫兹，诺里娜（2013）。《睁大双眼》。纽约：哈珀柯林斯出版社。
- 希尔，塞思·J.（2017）。《共同缓慢学习：关于政治事实的贝叶斯学习》。《政治学杂志》79卷第4期，第1403–1418页。

- 希尔斯，艾莉森（2009）。
《道德证言与道德认识论》。
《伦理学》120.1，第94-127
页。
- 希梅尔罗斯，斯塔凡
（2017）。《协商性公民论坛
中的话语质量——四项协商性
微型公众的比较》。《协商民
主期刊》13.1。[https://delib-
demjournal.org/article/id/
541/](https://delib-demjournal.org/article/id/541/)
- 希特林，保罗 与 纳杰娅·舒塔
瓦（2022）。《对政府的信
任》。2022年3月23日。网
址：[https://ourpublicser-
vice.org/publications/trust-
in-government/](https://ourpublicservice.org/publications/trust-in-government/)。
- 霍格，迈克尔·A. 与 多米尼克·
艾布拉姆斯（1988）。《社会
认同：群体间关系与群体过程
的社会心理学》。劳特利奇出
版社。
- Hong, Lu 和 Scott E. Page
（2004）。“多样化的解题群
体可胜过高能力解题群体。”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101

卷第46期，第16385–16389页。

- Huber, Gregory、Seth Hill 和 Gabriel Lenz (2012) 。《回溯性决策中的偏误来源：关于选民在约束现任官员方面局限性的实验证据》。《美国政治科学评论》106，第720–741页。
- Huddy, Leonie、Lilliana Mason 和 Lene Aarøe (2015) 。《表达性党派性：竞选参与、政治情感与党派认同》。《美国政治科学评论》109.1，第1–17页。
- 许默尔，迈克尔 (2013) 。《政治权威问题》。纽约：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
- 许默，迈克尔 (2016) 。《为何人们在政治问题上是非理性的》。载于《哲学、政治与经济学：文集》，乔纳森·阿诺马利、杰弗里·布伦南、迈克尔·C·芒格、杰弗里·赛尔-麦科德编。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第456–467页。

- 赫顿-费里斯， 丹尼尔
 (2023)。《抽签制还是票选
 制？民主、选举与随机遴
 选》。《欧洲政治理论杂
 志》。<https://journals.sagepub.com/doi/full/10.1177/14748851231220555>
- 英格汉姆， 肖恩 (2013)。
 《分歧与民主的认识论论
 证》。《政治、哲学与经济
 学》12.2，第136–155页。
- 英格汉姆， 肖恩与大卫·威恩斯
 (2021)。《对知识精英统治
 的人口学反驳：一种推广》。
 《哲学与公共事务》49卷第4
 期，第323–349页。
- 益普索 (2016)。《危险、认
 知与欧盟》。2016年6月9
 日。网址：<https://www.ipsos.com/en-uk/perils-perception-and-eu>。
- 艾扬格， 尚托 (2021)。《美
 国政治的极化》。载于《劳特
 利奇政治认识论手册》，迈克
 尔·汉农与耶罗恩·德里德主编。
 伦敦：劳特利奇出版社，第
 90–100页。

- Iyengar, Shanto 和 Kyu S. Hahn (2009)。《红色媒体，蓝色媒体：媒体使用中意识形态选择性的证据》。《传播学刊》59.1，第19–39页。
- Iyengar, Shanto 和 Masha Krupenkin (2018)。《党派情感的强化》。《政治心理学》39，第201–218页。
- Iyengar, Shanto、Gaurav Sood 和 Yphtach Lelkes (2012)。《情感而非意识形态：极化的社会认同视角》。《舆论季刊》76.3，第405–431页。
- 詹姆斯，威廉 ([1876] 1979)。《信仰的意志及其他通俗哲学论文》。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
- Jern, Alan Kai-min K. Chang 和 Charles Kemp (2014)。《信念极化并非总是非理性的》。《心理学评论》121.2，第206–224页。
- 乔希，赫里希凯什 (2020)。《你事事都正确的概率有多大？对现代党派主义的认识论

挑战》。《政治、哲学与经济学》19.1，第36–61页。

- 乔斯林，马克·R. 与唐纳德·P. 海德-马克尔（2014）。《谁最了解？教育、党派性与争议性事实》。《政治与政策》42卷第6期，第919–947页。
- 乔斯特，约翰·T.（2017）。《意识形态的不对称性与政治心理学的本质》。《政治心理学》38卷第2期，第167–208页。
- 乔斯特，约翰·T. 与大卫·M. 阿莫迪奥（2012）。《作为动机性社会认知的政治意识形态：行为与神经科学证据》。《动机与情绪》36.1，第55–64页。
- Jost, John T.、Jack Glaser、Arie W. Kruglanski 和 Frank J. Sulloway（2003）。《作为动机性社会认知的政治保守主义》。《心理学公报》129.3，第339–375页。
- Jost, John T.、Chadly Stern、Nicholas O. Rule 和 Joanna Sterling（2017）。《恐惧的

政治：存在动机是否存在意识形态不对称？》，《社会认知》35.4，第324-353页。

- 卡汉，丹·M. (2013)。《意识形态、动机性推理与认知反思》。《判断与决策》8.4，第407-424页。
- 卡汉，丹·M. (2014)。《让气候科学传播基于证据：彻头彻尾》。载于德塞蕾·克劳与麦克斯韦尔·T·博伊科夫编，《文化、政治与气候变化》。伦敦：劳特利奇出版社，第203-220页。
- 卡汉，丹·M. (2015)。《政治动机推理范式》。《社会与行为科学新兴趋势》，第1-16页。
- 卡汉，丹·M. (2017a)。《误解、错误信息与身份保护性认知的逻辑》。SSRN电子期刊。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2973067
- 卡汉，丹·M. (2017b)。《不准确认知的表达理性》。《行

为与脑科学》40，第26-28页。

- 卡汉 (Dan M. Kahan)、霍夫曼 (David A. Hoffman)、布拉曼 (Donald Braman)、埃文斯 (Danieli Evans) 和拉赫林斯基 (Jeffrey J. Rachlinski) (2012)。《“他们看到的是一场抗议”：认知非自由主义与言论一行为区分》。《斯坦福法律评论》，第64卷，第851-906页。
- Kahan, Dan M.、Ellen Peters、Erica Cantrell Dawson 和 Paul Slovic (2017)。《动机性数字素养与开明的自治》。《行为公共政策》1.1，第54-86页。
- Kahan, Dan M.、Ellen Peters、Maggie Wittlin、Paul Slovic、Lisa Larrimore Ouellette、Donald Braman 和 Gregory Mandel (2012)。《科学素养与计算能力对感知气候变化风险的极化影响》。《自然·气候变化》2，第732-735页。

- 凯撒家庭基金会（2013年）。《2013年美国人对美国在全球卫生中作用的调查》。2013年11月7日。网址：<https://www.kff.org/global-health-policy/poll-finding/2013-survey-of-americans-on-the-u-s-role-in-global-health/>。
- 角谷美智子（2019）。《真相之死：特朗普时代虚假现象笔记》。纽约：皇冠出版社。
- Kalmoe, Nathan P. 与 Lilliana Mason（2019年）。“致命的大规模党派性：普遍性、相关因素与选举情境。”国家首都地区政治科学协会美国政治会议。https://www.dannyhayes.org/uploads/6/9/8/5/69858539/kalmoe___mason_ncapsa_2019_-_lethal_partisanship_-_final_lmedit.pdf
- 卡尔莫，内森·P. 与莉莉安娜·梅森（2022）。《美国极端党派主义：暴力敌意的图谱、成因

及其对民主的后果》。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 康德，伊曼努尔（[1741] 1991）。《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载于《政治著作集》。H. S. 赖斯编，H. B. 尼斯贝特译。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第54–60页。
- 卡普兰，马蒂（2013）。《有史以来最令人沮丧的大脑发现》。《赫芬顿邮报》，2013年9月16日。网址：https://www.huffpost.com/entry/most-depressing-brain-fin_b_3932273。
- 卡佩尔，克莱门斯（2012）。《深层分歧的问题》。《哲学学科》22.2，第7–25页。
- 凯伊，西蒙·T.（2015）。《无知之下的民主：质疑政治中对知识的崇拜》。《批判评论》27卷，第3–4期，第316–337页。
- 基恩，约翰（2018）。《后真相政治及其解药为何并非仅仅是“事实核查”与真相》。《对话》。2018年3月23日。

- 凯利, 杰米·特伦斯
(2012)。《构建民主：民主理论的行为主义路径》。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 凯利, 托马斯 (2005)。《分歧的认识论意义》。载于《认识论牛津研究》，第1卷。塔玛尔·萨博·詹德勒与约翰·霍桑编。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第167–196页。
- 凯利, 托马斯 (2008)。《分歧、教条主义与信念极化》。《哲学杂志》105.10，第611–633页。
- 凯尔森, 汉斯 (1955)。《民主的基础》。《伦理学》66卷第1期，第2部分：民主的基础，第1–101页。
- Kemmelmeier, Markus
(2008)。“政治取向与认知能力之间是否存在关联？两项研究对三种假设的检验。”《人格与个体差异》45.8，第767–772页。
- Khanna, Kabir 和 Gaurav Sood (2018)。《事实学习

研究中的动机性回应》。《政治行为》40.1，第79-101页。

- Kinder, Donald R. 与 Nathan P. Kalmoe (2017)。《既非自由派亦非保守派：美国公众的意识形态天真》。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 金尼，大卫 与 利亚姆·科菲·布莱特 (2021)。《风险规避与精英群体的无知》。《哲学与现象学研究》106.1，第35-57页。
- 基切尔，菲利普 (2001)。《科学、真理与民主》。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
- 基切尔，菲利普 (2011)。《民主社会中的科学》。布法罗：普罗米修斯出版社。
- 克莱因，以斯拉 (2014)。《政治如何让我们变愚蠢》。Vox.com。网址：<https://www.vox.com/2014/4/6/5556462/brain-dead-how-politics-makes-us-stupid>。

- 克莱因，以斯拉（2020）。
《我们为何两极分化》。纽约：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
- 克勒珀，大卫（2023年）。
“美国人指责新闻媒体加剧国家分裂：美联社—NORC民调。”
美联社，2023年5月1日。网址：<https://apnews.com/article/poll-misinformation-polarization-coronavirus-media-d56a25fd8df-d9abe1389b56d7e82b873>。
- 克洛克西姆，贾斯汀（2019）。《精英统治制是披着狼皮的狼》。《伦理学杂志》23.1，第19–36页。
- 科格尔曼，布莱恩（2023）。《寻找知识精英》。《知识论》20.2，第497–512页。
- 科尔贝尔，马克斯（2004）。《无错分歧》。《亚里士多德学会会刊》104.1，第53–73页。
- 科洛德尼，尼科（2014）。《无人统治之一：什么证成了民主？》，《哲学与公共事

务》42卷第3期，第195-229页。

- 科恩布利斯，希拉里
(2010)。《面对争议的信念》。载于《分歧》，理查德·费尔德曼与泰德·A·沃菲尔德编。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第29-52页。
- 克赖斯，丹尼尔与香农·C·麦格雷戈 (2023)。《一篇综述与激辩：论极化与平台》。《新媒体与社会》，第26卷第1期，第556-579页。
- 库克林斯基，詹姆斯·H。
(2001)。《公民与政治：政治心理学的视角》。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
- Kull, S., C. Ramsay, S. Subias 和 E. Lewis (2004)。
《布什与克里支持者各自不同的现实》。国际政策态度项目。网址：<https://hdl.handle.net/1903/10533>。
- 昆达，齐娃 (1990)。《动机性推理之辩》。《心理学公报》108期，第480-498页。

- 莱基，詹妮弗（2018）。《专家与同行分歧》。载于《知识、信念与上帝：宗教认识论的新见解》，马修·A·本顿、约翰·霍桑与达尼·拉比诺维茨编。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第228-245页。
- 拉丰特，克里斯蒂娜（2020）。《没有捷径的民主》。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
- 拉卡托斯，伊姆雷（1970）。《证伪与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载于《批判与知识的增长》，伊姆雷·拉卡托斯与艾伦·马斯格雷夫编。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第91-196页。
- 兰姆，罗伯特（2020）。《政治哲学与专长的本质》。《国际社会与政治哲学评论》23.7，第910-930页。
- Lamm, Helmut 和 David G. Myers（1978）。《群体引发的态度与行为极化》。《实验社会心理学进展》第11卷，爱思唯尔出版社，第145-195页。

- 兰达，迪米特里与瑞安·佩夫尼克（2021）。《随机抽选能否治愈选举代表制的弊病？》，《政治哲学杂志》29卷第1期，第46–72页。
- 兰德莫尔，埃莱娜（2012a）。《民主理性：政治、集体智慧与多数统治》。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 兰德莫尔，埃莱娜（2012b）。《为何众人比少数人更聪明，以及为何这很重要》。《公共审议杂志》8.1，第1–12页。
- 兰德莫尔，埃莱娜（2017）。《超越分歧的事实？协商民主中的认识论转向》。《社会认识论》31卷第3期，第277–295页。
- 兰德莫尔，埃莱娜（2020）。《开放民主：为二十一世纪重塑人民统治》。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 莱恩，梅丽莎（2013）。《统治的主张：论诸众》。载于《剑桥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指南》，M. 德劳里耶与P. 德斯特雷主编。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第247-274页。

- 莱恩，梅丽莎（2014）。《当专家也不确定时：科学知识与民主判断的伦理》。《知识论》11.1，第97-118页。
- 兰格，加里。（2010）。《我所相信的》。网址：<https://blogs.abcnews.com/thenumbers/2010/08/this-i-believe.html>（访问日期：2013年8月12日）。
- 拉莫尔，查尔斯（1994）。《多元主义与合理的分歧》。《社会哲学与政策》11.1，第61-79页。
- 拉文、霍华德·G.、克里斯托弗·D. 约翰斯顿和马尔科·R. 斯滕贝亨。（2012）。《矛盾的党派人士：批判性忠诚如何促进民主》。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
- Leigh, Andrew（2009）。“世界经济是否左右各国大选？”《牛津经济学与统计学通报》71.2，第163-181页。

- 伦茨, 加布里埃尔·S.
(2013)。《追随领袖? 选民如何回应政客的政策与表现》。芝加哥: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 勒普特尔, 马克西姆
(2020)。《民主群体认知》。《哲学与公共事务》48卷第1期, 第40-78页。
- 利文达斯基, 马修 (2009)。
《党派分化: 自由派如何成为民主党人, 保守派如何成为共和党人》。芝加哥: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 Levendusky, Matthew
(2013)。《为何党派媒体会使观众极化? 》, 《美国政治科学杂志》57.3, 第611-623页。
- Levy, Neil (2019)。《对否认主义的应有尊重: 解释普通人对既定科学发现的拒斥》。
《综合》(Synthese)
196.1, 第313-327页。
- 利维, 尼尔 (2021)
- 利维, 尼尔 (2022)

- Levy, Neil (2022b) 。《“自己去研究吧！”》，《综合》200.5，第1–19页。
- Lewandowsky, Stephan 和 Klaus Oberauer (2016) 。《对科学的动机性拒斥》。《心理科学新方向》25.4，第217–222页。
- 林德格伦，詹姆斯·T. (2014) 。《谁相信占星术是科学的？》西北大学公共法律研究论文。
- 李普曼，沃尔特 ([1922] 1998) 。《公众舆论》。新不伦瑞克：Transaction出版社。
- List, Christian 和 Robert E. Goodin (2001) 。“认识论民主：对孔多塞陪审团定理的推广。”《政治哲学杂志》9.3，第277–306页。
- 利韦廖，费德丽卡 (2015) 。《合理性的认识论维度》。《哲学与社会批判》41.6，第517–535页。
- 洛克，约翰 ([1690] 1997) 。《人类理解论》。罗杰·伍尔豪斯编。企鹅出版社。

- 洛克, 约翰 ([1706] 1996)。《教育漫话》与《理解力指导散论》。鲁思·格兰特与内森·塔尔科夫 编。印第安纳波利斯: 哈克特出版公司。
- 隆吉诺, 海伦·E. (1990)。《作为社会知识的科学: 科学探究中的价值与客观性》。新泽西州普林斯顿: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 López-Guerra, Claudio (2011)。“选举权抽签制”。《政治、哲学与经济学》10.2, 第211–233页。
- 洛佩斯-格雷拉, 克劳迪奥 (2014)。《民主与剥夺选举权: 选举排斥的道德性》。牛津: 牛津大学出版社。
- Lord, Charles G.、Lee Ross 和 Mark R. Lepper (1979)。《偏向性同化与态度极化: 先前理论对后续所考虑证据的影响》。《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37, 第2098–2109页。
- 卢皮亚, 亚瑟 (2006)。《精英主义如何削弱选民能力研

究》。《批判评论》18.1-3，第217-232页。

- 卢皮亚，阿瑟（2016）。《无知：为何人们对政治似乎知之甚少，以及我们能做些什么》。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
- 林奇，迈克尔·P.（2005）。《忠于生活：为何真理至关重要》。剑桥：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
- 林奇，迈克尔·P.（2010）。《认识论循环与认识论分歧》。载于《社会认识论》，阿德里安·哈多克、艾伦·米勒与邓肯·普里查德编。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第262-277页。
- 林奇，迈克尔·P.（2012）。《为理性而赞》。剑桥：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
- 林奇，迈克尔·P.（2016）。《铁锹翻转之后：分歧、第一原则与认识论契约论》。《怀疑论研究国际期刊》6.2-3，第248-259页。
- 林奇，迈克尔·P.（2021）。《真理的价值》。《波士顿评

论》，2021年3月1日。网址：<https://www.bostonreview.net/articles/the-value-of-truth/>。

- 麦克唐纳，玛格丽特（1946）。《自然权利》。《亚里士多德学会会刊》第47卷，第225–250页。
- 麦克马伦，伊恩（2020）。《什么是“后事实”政治？》，《政治哲学杂志》28.1，第97–116页。
- 麦迪逊，詹姆斯（[1822] 2013）。《詹姆斯·麦迪逊致威廉·T·巴里，1822年8月4日》。载《詹姆斯·麦迪逊文集·退隐时期卷》，第2卷，1820年2月1日至1823年2月26日。大卫·B·马特恩、J·C·A·斯塔格、玛丽·帕克·约翰逊与安妮·曼德维尔·科洛尼编。夏洛茨维尔：弗吉尼亚大学出版社，第555–558页。
- Majid, Aisha（2023）。《爱德曼调查显示：英国媒体信任度上升，但仍处于全球最低水平之一》。2023年1月18日。

网址：<https://pressgazette.co.uk/media-audience-and-business-data/trust-media-increase-uk-us-edelman/>。

- Malka, Ariel 和 Mark Adelman (2023)。《表达性调查回应：对证据及其对美国民主影响的深入审视》。《政治学视角》21.4，第1198–1209页。
- 马尔莱森，汤姆 (2018)。《民主应通过选举还是抽签运作？》，《政治与社会》46.3，第401–417页。
- 曼德尔鲍姆，埃里克 (2019)。《贝叶斯主义的困境：心理免疫系统导论》。《心灵与语言》34.2，第141–157页。
- 马南，伯纳德 (1987)。《论合法性与政治审议》。埃莉·斯坦与简·曼斯布里奇译。《政治理论》15.3，第338–368页。
- 马南，伯纳德 (1997)。《代议制政府的原则》。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

- 曼斯布里奇，简（1999）。
《论参与使公民更优秀的观念》。载于斯蒂芬·埃尔金与卡罗尔·索尔坦编：《公民能力与民主制度》。大学公园：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出版社，第291-325页。
- Martherus, James L.、Andres G. Martinez、Paul K. Piff 和 Alexander G. Theodoridis
（2021）。《党派动物？极端党派极化与非人化》。《政治行为》43，第517-540页。
- 马蒂，何塞·路易斯
（2006）。《为协商民主的知识论构想辩护》。载于《协商民主及其不满》，何塞·路易斯·马蒂与萨曼莎·贝松编。奥尔德肖特：阿什盖特出版社，第27-56页。
- 梅森，莉莉安娜（2015）。
《“我虽不同意，但心怀敬意”：党派分化对社会极化与议题极化的差异化影响》。《美国政治科学杂志》第59卷第1期，第128-145页。

- 梅森，莉莉安娜（2016）。
《一种跨群体的平静：社会分类如何驱动情感极化》。《公众舆论季刊》80（增刊1），第351–377页。
- 梅森，莉莉安娜（2018）。
《不文明的共识：政治如何成为我们的身份认同》。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 梅森，莉莉安娜 与 朱莉·弗龙斯基（2018）。《一个部落凝聚众人：我们的社会群体归属如何强化党派认同》。《政治心理学》第39卷，第257–277页。
- 马西森，乔纳森（2022）。
《为何要独立思考？》，《知识论》21.1，第320–338页。
- 麦卡蒂，诺兰（2019）。《极化：每个人都需要了解的知识》。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
- 麦卡蒂、诺兰、基思·T·普尔和霍华德·罗森塔尔（2016）。
《两极分化的美国：意识形态与不平等财富之舞》。剑桥：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

- 麦考伊，詹妮弗（2019）。
《极化损害民主与社会》。
《和平进展》第36期，第1-6
页。[https://www.icip.cat/
perlapau/en/article/polariz-
ation-harms-democracy-and-
society/](https://www.icip.cat/perlapau/en/article/polarization-harms-democracy-and-society/)
- 麦科伊，詹妮弗 与 穆拉特·索
默（2019）。《迈向一种有害
极化的理论及其对民主的损
害：比较证据与可能的补救措
施》。《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
院年鉴》681.1，第234-271
页。
- McCoy, Jennifer、Tahmina
Rahman 和 Murat Somer
（2018）。《极化与全球民主
危机：民主政体中的共同模
式、动态机制及有害后果》。
《美国行为科学家》62.1，第
16-42页。
- 麦格拉思，莎拉（2008）。
《道德分歧与道德专长》。
《牛津元伦理学研究》第3卷，
第87期，第87-108页。
- 麦肯纳，罗宾（2021）。《不
对称的非理性：难道只有别人

愚蠢吗？》，载于迈克尔·汉农与耶罗恩·德里德主编：《劳特利奇政治认识论手册》。伦敦：劳特利奇出版社，第285–295页。

- 梅迪纳，何塞（2013）。《抵抗的认识论》。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
- Mercier, Hugo 和 Hélène Landemore（2012）。《推理是为了论证：理解审议的成功与失败》。《政治心理学》33.2，第243–258页。
- 梅西耶，雨果与丹·斯佩贝尔（2017）。《理性的谜题》。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
- 默克利，埃里克与多米尼克·A·斯特库拉（2018）。《政党精英还是人为制造的怀疑？气候变化极化的信息语境》。《科学传播》40.2，第258–274页。
- 梅辛、所罗门与肖恩·J·韦斯特伍德（2014）。《社交媒体时代的“选择性接触”：在线选择新闻时，推荐信息胜过党派来

源归属》。《传播研究》41卷第8期，第1042-1063页。

- 密尔，约翰·斯图尔特
(1838)。《边沁》。网址：
[https://
www.laits.utexas.edu/polthe-
ory/jsmill/diss-disc/
bentham/
bentham.s02.html](https://www.laits.utexas.edu/poltheory/jsmill/diss-disc/bentham/bentham.s02.html)。
- 密尔，约翰·斯图尔特 ([1859]
1977)。《关于议会改革的思
考》。载于《约翰·斯图尔特·密
尔文集》，约翰·M·罗布森编。
多伦多：多伦多大学出版社，
第311-340页。
- 密尔，约翰·斯图尔特 ([1866]
1988)。《人民代表权
[2]》。载《约翰·斯图尔特·密
尔文集》第28卷——《公共与
议会演讲集（第一部分）：
1850年11月至1868年11
月》。约翰·M·罗布森与布鲁斯
·L·金泽编。多伦多：多伦多大
学出版社；伦敦：劳特利奇与
凯根·保罗出版社，第58-68
页。

- 密尔，约翰·斯图尔特（[1859] 2001）。《论自由》。基奇纳：巴托什图书公司。
- 密尔，约翰·斯图尔特（[1861] 2015）。《代议制政府论》。载于《论自由、功利主义及其他论文》。马克·菲尔普与弗雷德里克·罗森编。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第179–405页。
- 米勒，博伊德（2023）。《党派认识论与错置的信任》。
《认识论》（Episteme），第1–21页。
- 米勒，戴尔·E.（2015）。《多元投票在密尔代议制政府观念中的地位》。《政治评论》77.3，第399–423页。
- 米勒，乔安妮·M.、凯尔·L. 桑德斯和克里斯蒂娜·E. 法哈特（2016）。《阴谋论认同作为动机性推理：政治知识与信任的调节作用》。《美国政治科学杂志》60卷第4期，第824–844页。
- 米莉斯，史蒂文（2016）。
《对话的邀请：在政治中重拾理性》。《纽约时报》，2016

年2月2日。网址：<https://www.nytimes.com/2016/02/02/opinion/invitation-to-a-dialogue-reclaim-reason-in-politics.html>。

- 米尔斯，查尔斯·W。
(2007)。《白人无知》。载于《种族与无知的认识论》，香农·沙利文与南希·图安娜编。奥尔巴尼：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第11–38页。
- Min, John B. (2016)。《政治有时必须做对：对缪尔黑德的回应》。《批判评论：政治与社会期刊》28.3–4，第404–411页。
- Min, John B. 与 James K. Wong (2018)。《协商民主的认识论路径》。《哲学指南针》13.6。
- 米萨克，谢丽尔 (2002)。《真理、政治与道德：实用主义与审议》。伦敦：劳特利奇出版社。
- 米萨克，谢丽尔 (2004)。《让分歧变得重要：实用主义

与协商民主》。《思辨哲学杂志》18.1，第9-22页。

- Misak, Cheryl 与 Robert B. Talisse (2014)。《实用主义认识论与民主理论：对埃里克·麦吉尔弗雷的回应》。《政治哲学杂志》22.3，第366-376页。
- 孟德斯鸠，查尔斯·德 ([1748] 1989)。《论法的精神》。安妮·M·科勒、巴西亚·卡罗琳·米勒与哈罗德·塞缪尔·斯通 编。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
- 摩尔，阿尔弗雷德 (2017)。《批判性精英主义：协商、民主与专业知识问题》。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
- 穆芙，尚塔尔 (2000)。《民主的悖论》。纽约：Verso出版社。
- 缪尔黑德，拉塞尔 (2014)。《把事情做对的政治》。《批判评论》26卷第1-2期，第115-128页。
- 米勒，扬-维尔纳 (2016)。《什么是民粹主义？》企鹅出版社。

- 穆里根, 托马斯 (2018) 。
《二十一世纪的复数投票制》。《哲学季刊》68卷第271期, 第286–306页。
- 穆茨, 黛安娜·C. (2006) 。
《倾听另一方的声音: 协商民主与参与式民主》。剑桥: 剑桥大学出版社。
- 迈尔斯, 戴维·G. 与赫尔穆特·拉姆 (1976) 。《群体极化现象》。《心理学公报》83.4, 第602页。
- 纽曼, W·拉塞尔 (1986) 。
《大众政治的悖论: 美国选民的知识与意见》。剑桥: 哈佛大学出版社。
- 《新科学家》 (2017) 。“知识哲学家们, 你们的时代已经到来。”《新科学家》, 2017年3月29日。网址: <https://www.newscientist.com/article/mg23431194-000-philosophers-of-knowledge-your-time-has-come/>。
- 阮, C. 姿 (2020a) 。《回音室与认知泡沫》。《知识论》17.2, 第141–161页。

- 阮, C. 姿 (2020b)。《游戏：作为艺术的能动性》。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
- 阮, C. 氏 (2022)。《透明即监控》。《哲学与现象学研究》105.2, 第331–361页。
- 尼科尔斯, 汤姆 (2017)。
《专业知识的消亡：对既定知识的攻击及其重要性》。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
- 尼克尔森, 雷蒙德·S.
(1998)。《确认偏误：一种以多种面貌普遍存在的现象》。《普通心理学评论》2.2, 第175–220页。
- 尼诺, 卡洛斯·圣地亚哥
(1996)。《协商民主的宪法》。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
- 诺德布兰特, 玛丽亚
(2021)。《数字时代的情感极化：检验社交媒体与用户对异己政党情感之间关系的方向》。《新媒介与社会》25.1, 第3392–3411页。
- Nyce, Caroline Mimbs
(2020)。《大西洋月刊每日

通讯：我们对巴拉克·奥巴马的专访》。《大西洋月刊》，2020年11月16日。网址：<https://www.theatlantic.com/newsletters/archive/2020/11/why-obama-fears-for-our-democracy/617121/>。

- 奥尼尔，奥诺拉（2002）。《信任问题》。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
- 奥巴马，米歇尔（2018年）。前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在拉斯维加斯。网址：<https://www.c-span.org/video/?451860-1/lady-michelle-obama-las-vegas>。
- 奥尔松，埃里克·J.（2008）。《知识、真理与胡扯：对法兰克福的反思》。《中西部哲学研究》32.1，第94–110页。
- 奥里吉，格洛丽亚（2015）。《何以为专家而使人信之？迈向一种专长的政治认识论》。《人类·心灵：哲学研究期刊》8.28，第159–168页。

- Oster, Emily、Ira Shoulson 和 E. Ray Dorsey (2013)。“最优预期与有限的医学检测：来自亨廷顿病的证据。”《美国经济评论》103.2，第804-830页。
- 佩奇，本杰明·I. 与罗伯特·Y. 沙皮罗 (1992)。《理性的公众：美国人政策偏好的五十年趋势》。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 佩奇，斯科特·E. (2008)。
《差异：多样性如何造就更优秀的群体、企业、学校和社会》。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 帕慕克，泽内普 (2020)。
《评〈民主的认识论理论〉》，载《政治学视野》第18卷第2期，第597-599页。
- 帕慕克，泽内普 (2021)。
《政治与专业知识：如何在民主社会中运用科学》。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 帕皮诺，大卫 (2013)。《信念并无规范》。载于T. 陈编，

《信念之目的》。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

- 保罗、克里斯托弗和米里亚姆·马修斯（2016年）。《俄罗斯“虚假信息喷射”宣传模式》。兰德公司2.7，第1-10页。
- 彭尼库克，戈登 与 大卫·G·兰德（2017）。《谁会相信假新闻？分析性思维、动机性推理、政治意识形态与胡说接受度的作用》。《SSRN电子期刊》88.2，第1-63页。
- 彭尼库克、戈登，乔纳森·麦克弗特雷斯，本斯·巴戈，以及大卫·G·兰德（2022）。《加拿大、英国和美国民众对新冠肺炎的信念：对政治极化与动机性推理的一项新颖检验》。《人格与社会心理学通报》48卷第5期，第750-765页。
- 珀金斯、大卫·N.、马丁·法拉迪和布莱恩·布希（1991年）。《日常推理与智力的根源》。载于《非形式推理与教育》，乔尔·R. 沃斯、大卫·N. 珀金斯和朱迪思·W. 西格尔编，劳特利奇出版社，第83-105页。

- 彼得，法比耶娜（2008）。
《纯粹的认识论程序主义》。
《认识》5.1，第33–55页。
- 彼得，法比安妮（2009）。
《民主合法性》。伦敦：劳特利奇出版社。
- 彼得，法比安妮（2012）。
《协商的程序性认识价值》。
《综合》190.7，第1253–1266页。
- 彼得，法比耶娜（2013）。
《政治自由主义的认识论基础》。《道德哲学杂志》10.5，第598–620页。
- 彼得，法比安妮（2016）。
《民主的认识论境况》。载于《群体的认识论生活：论集体认识论的论文集》。迈克尔·布拉迪与米兰达·弗里克主编。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
- 彼得，法比安妮（2023）。
《政治合法性的基础》。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
- 佩蒂特，菲利普（2012）。
《论人民的条件：一种共和主义的民主理论与模式》。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

- 皮尤研究中心（2012a）。大多数人表示他们已经对候选人了解得足够多了。皮尤研究中心。网址：<https://www.pewresearch.org/politics/2012/07/24/most-say-they-already-know-enough-about-the-candidates/>。
- 皮尤研究中心（2012b）。《公众对政党的了解程度》。皮尤研究中心。网址：<https://www.pewresearch.org/politics/2012/04/11/what-the-public-knows-about-the-political-parties/>。
- 皮尤研究中心（2013）。《公众在文字、图片、地图和图表方面的认知》。皮尤研究中心。网址：<https://www.pewresearch.org/politics/2013/09/05/what-the-public-knows-in-words-pictures-maps-and-graphs/>。
- 皮尤研究中心（2014）。《美国公众的政治极化》。皮尤研究中心。网址：<https://www.pewresearch.org/polit->

ics/2014/06/12/political-polarization-in-the-american-public/。

- 皮尤研究中心（2015）。《公众认知图解：图片、文字、地图与图表》。皮尤研究中心。网址：<https://www.pewresearch.org/politics/2015/04/28/what-the-public-knows-in-pictures-words-maps-and-graphs/>。
- 皮尤研究中心（2016）。《2016年的党派分歧与政治敌意》。皮尤研究中心。网址：<https://www.pewresearch.org/politics/2016/06/22/partisanship-and-political-animosity-in-2016/>。
- 皮尤研究中心（2019a）。党派对立：更激烈、更个人化。网址：<https://www.pewresearch.org/politics/2019/10/10/partisan-antipathy-more-intense-more-personal/>。

- 皮尤研究中心（2019b）。
《美国人对科学专家的信任与不信任》。皮尤研究中心。网址：<https://www.pewresearch.org/science/2019/08/02/trust-and-mis-trust-in-americans-views-of-scientific-experts/>。
- 皮尤研究中心（2021年）。
《媒体信任度的党派分歧扩大，主要由共和党人信任度下降所致》。皮尤研究中心。网址：<https://www.pewresearch.org/short-reads/2021/08/30/partisan-divides-in-media-trust-widened-driven-by-a-decline-among-republicans/>。
- 皮尤研究中心（2023年）。
《美国人对科学家的信任度及对科学的积极看法持续下降》。皮尤研究中心。网址：<https://www.pewresearch.org/science/2023/11/14/americans-trust-in-scientists-positive->

views-of-science-continue-to-decline/。

- 皮奇，布莱恩和莱昂·德·孔塞普西翁（2020年）。“警方称丹佛在两场对立抗议活动中发生致命枪击事件。”《纽约时报》，2020年10月10日。网址：<https://www.nytimes.com/2020/10/10/us/Denver-shooting-protest.html>。
- 品特，哈罗德（2005）。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讲。网址：<https://www.nobelprize.org/prizes/literature/2005/pinter/lecture/>。
- 柏拉图（1997）。《柏拉图全集》。约翰·M·库珀 编。印第安纳波利斯：哈克特出版社。
- 柏拉图（2004）。《理想国》。C. D. C. 里夫译。第3版。印第安纳波利斯：哈克特出版公司。
- 波普金，塞缪尔（1991）。《理性选民》。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 波普金，塞缪尔与迈克尔·A·迪莫克（1999）。《政治知识与公民能力》。载于《公民能力与民主制度》，斯蒂芬·埃尔金与卡罗尔·索尔坦编。大学公园：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出版社，第117-146页。
- 波斯纳，理查德·A.（2003）。《法律、实用主义与民主》。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
- 普赖尔，马库斯（2007）。《后广播时代的民主：媒体选择如何加剧政治参与的不平等并使选举两极分化》。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
- 普赖尔，马尔库斯（2013）。《媒体与政治极化》。《政治学年度评论》第16卷，第101-127页。
- 普赖尔、马尔库斯、高拉夫·苏德与卡比尔·坎纳（2015年）。《你不可能是认真的：准确性激励对经济感知报告中党派偏见的影响》。《政治科学季刊》第10卷第4期，第489-518页。

- 普里查德，邓肯（2016）。
《亲见其事：知觉知识、理解与理智自主》。《知识论》13.1，第29–42页。
- 普罗宁，艾米丽；林丹尼尔·Y.；罗斯，李（2002）。《偏见盲点：对自身与他人偏见的感知》。《人格与社会心理学通报》28.3，第369–381页。
- 普罗佐罗夫，谢尔盖（2019）。《为何存在真理？后真相政治时代的福柯》。
《星座》26.1，第18–30页。
- 奎因，W. V. O.（1969）。
《自然类》。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 拉纳利，克里斯（2018）。
《什么是深层分歧？》，载
《拓扑学》40.5，第983–998页。
- 拉斯穆森报告（2016）。选民仍然相信自己的选票。2016年9月7日。拉斯穆森报告。网址：https://www.rasmussen-reports.com/public_content/politics/general_politics/august_2016/

voters_still_believe_in_their_vote
fullbrowser。

- 罗尔斯，约翰（1993）。《政治自由主义》。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
- 罗尔斯，约翰（1997）。《公共理性理念重探》。《芝加哥大学法律评论》64.3，第765–807页。
- 拉兹，约瑟夫（1990）。《直面多样性：论认知节制之案例》。《哲学与公共事务》19.1，第3–46页。
- 雷德劳斯克，大卫·P.（2002）。《热认知还是冷静思虑？检验动机性推理对政治决策的影响》。《政治学杂志》64卷第4期，第1021–1044页。
- 赖斯，朱利安（2019）。《专业知识、共识与社会科学事实的本质，或：反对知识精英统治》。《社会认识论》33卷第2期，第183–192页。
- 里格斯，韦恩·D.（2003）。《平衡我们的认知目标》。

《Nous》 37.2, 第342–352页。

- 里克尔，威廉（1982）。《自由主义对民粹主义：民主理论与社会选择理论的对峙》。纽约：W. H. 弗里曼出版社。
- 里尼，雷吉娜（2017）。《假新闻与党派认识论》。《肯尼迪伦理学研究所期刊》 27卷增刊2，第43–64页。
- 里尼，雷吉娜（2021）。《武器化的怀疑主义》。载于《政治认识论》，伊丽莎白·埃登伯格与迈克尔·汉农编。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第31–48页。
- 罗伯茨，大卫（2017）。《美国正面临一场认识论危机》。2017年11月2日。网址：<https://www.vox.com/policy-and-politics/2017/11/2/16588964/america-epistemic-crisis>。
- 罗布森，威廉·A.（1959）。《教育与民主》。《政治季刊》 30卷第1期，第67–78页。

- Roccas, Sonia 和 Marilyn B. Brewer (2002)。“社会认同复杂性。”《人格与社会心理学评论》6.2, 第88-106页。
- 罗戈夫斯基, 乔恩·C. 与约瑟夫·L. 桑德兰 (2016)。《意识形态如何加剧情感极化》。《政治行为》第38卷, 第485-508页。
- 罗蒂, 理查德 (2000)。《普遍性与真理》。载于《罗蒂及其批评者》, 罗伯特·布兰顿编。牛津: 威利-布莱克威尔出版社, 第1-30页。
- Rose, David、Wesley Buckwalter 和 John Turri (2014)。《当言语胜于行动: 妄想、信念与断言的力量》。《澳大拉西亚哲学杂志》92.4, 第683-700页。
- 罗森伯格, 保罗 (2023)。《美国真正的症结并非政治“两极分化”: 其中一极远比另一极糟糕得多》。《沙龙》(Salon), 2023年4月29日。网址: <https://www.salon.com/>

2023/04/29/political-polarization-isnt-the-real-problem-in-america-one-pole-is-a-lot-worse-than-the-other/。

- 罗森菲尔德，索菲娅（2019）。《民主与真理：一部简史》。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
- Ross Arguedas, Amy、C. Robertson、Richard Fletcher 和 R. Nielsen（2022）。《回音室、过滤气泡与极化：文献综述》。路透新闻研究所。网址：<https://doi.org/10.60625/RISJ-ETXJ-7K60>。
- 卢梭，让-雅克（1762年〔1968年〕）。《社会契约论》。企鹅出版社。
- 鲁德纳，理查德（1953）。《科学家作为科学家作出价值判断》。《科学哲学》20，第1–6页。
- Rummens, Stefan 和 Raf Geenens（2023）。《抽签制与民主制》。《共和》（Res Publica），第1–19页。ht-

[tps://doi.org/10.1007/s11158-023-09648-6](https://doi.org/10.1007/s11158-023-09648-6)。

- 罗素，伯特兰（[1928] 2004）。《怀疑论集》。伦敦：劳特利奇出版社。
- 萨马尔日亚，哈娜 与 夸西姆·卡萨姆（编）（2023）。《民主的认识论》。纽约：劳特利奇出版社。
- Schaefer, Alexander 和 Robert Weston Siscoe（2020）。《“不融贯但合理：为政治自由主义中的真理节制辩护”》，载《社会理论与实践》，第573–603页。
- Schaffner, Brian F. 和 Samantha Luks（2018）。《是错误信息还是表达性回应？就职典礼人群规模能告诉我们调查中政治错误信息的来源》。《公众舆论季刊》82.1，第135–147页。
- Schoon, Ingrid、Helen Cheng、Catharine R. Gale、G. David Batty 和 Ian J. Deary（2010）。《社会地位、认知能力与教育程度作为自由社会

态度和政治信任的预测因素》。《智力》38卷第1期，第144–150页。

- 施罗德，彼得（2012年）。《国会山报民调：可能投票者更倾向于降低个人和企业税率》。《国会山报》，2012年2月27日。网址：<https://thehill.com/polls/106999-hill-poll-likely-voters-prefer-lower-individual-business-tax-rates/>。
- Schultz, Kenneth A. 与 Barry R. Weingast（2003）。《民主优势：国际竞争中金融实力的制度基础》。《国际组织》57.1，第3–42页。
- 熊彼特，约瑟夫·A（[1942] 2013）。《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纽约：劳特利奇出版社。
- 施维茨盖贝尔，埃里克（2001）。《介于相信之间》。《哲学季刊》51卷第202期，第76–82页。
- 施维茨盖贝尔，埃里克（2010）。《违背我们所宣称

的信念而行动，或当下判断与倾向性信念之间的鸿沟》。

《太平洋哲学季刊》91.4，第531–553页。

- Sears, David O. 与 Jonathan L. Freedman (1967)。《选择性接触信息：一项批判性综述》。《舆论季刊》31，第194–213页。
- 森，阿马蒂亚 (1999)。《以自由看待发展》。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
- Shah, Nishi (2003)：《真理如何支配信念》，载《哲学评论》第112卷第4期，第447–482页。
- 夏皮罗，伊恩 (1996)。《民主的位置》。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
- 夏洛特，塔莉 (2017)。《影响力思维：大脑揭示我们改变他人的力量》。纽约：亨利·霍尔特公司。
- 申克曼，里克 (2008)。《我们到底有多愚蠢？直面美国选民的真相》。纽约：基础图书公司。

- 舍默，迈克尔（2011）。《相信的大脑》。纽约：时代图书公司。
- 西姆勒，凯文与罗宾·汉森（2017）。《脑中的大象：日常生活中的隐藏动机》。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
- 辛格，丹尼尔·J.、亚伦·布拉姆森、帕特里克·格里姆、贝内特·霍尔曼、郑珍、凯伦·科瓦卡、阿妮卡·兰吉纳尼和威廉·J. 伯杰（2018）。《理性的社会与政治极化》。《哲学研究》176.9，第2243–2267页。
- 辛诺特-阿姆斯特朗，沃尔特（2018）。《重新思考：如何推理与论证》。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
- 斯凯利，杰弗里与霍莉·冯（2022年）。《十分之三的美国人将政治极化列为国家面临的首要问题之一》。FiveThirtyEight。2022年6月14日。网址：<https://fivethirtyeight.com/features/3-in-10-americans-named-political-polarization-as-a>

top-issue-facing-the-country/。

- 斯洛曼，史蒂文 与 菲利普·费恩巴赫（2017）。《知识的错觉》。帕纳麦克米伦出版社。
- 斯迈利，玛丽昂（1999）。《民主公民身份：一个能力问题？》，《良善社会》5.3，第50–51页。
- 斯奈德曼，保罗·M.、菲利普·E. 泰特洛克与劳伦·埃尔姆斯（2001）。《公众舆论与民主政治：非态度问题与政治判断的社会建构》。载于詹姆斯·H. 库克林斯基编，《公民与政治：政治心理学的视角》。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第254–288页。
- 索明，伊利亚（2004）。《当无知并非福气：政治无知如何威胁民主》。卡托研究所：政策分析第525号。2004年9月22日。网址：<https://www.cato.org/policy-analysis/when-ignorance-isnt-bliss-how-political-ignorance-threatens-democracy>。

- 索明，伊利亚（2006）。《关于无知的知识：政治信息研究的新方向》。《批判评论》第18卷第1-3期，“政治知识”专题研讨会，第255-278页。
- 索明，伊利亚（2009）。《书评：乔赛亚·奥伯，《民主与知识：古典雅典的创新与学习》》，《伦理学》119.3，第585-590页。
- 索明，伊利亚（2013）。《为何（大多数）政治无知是理性的，以及为何这很重要：对杰弗里·弗里德曼的回应》。《卡托无界》。网址：<https://www.cato-unbound.org/2013/10/22/ilya-somin/why-most-political-ignorance-rational-why-it-matters-reply-jeffrey-friedman>。
- 索明，伊利亚（2015）。《关于政治无知的持续争论：对批评者的回应》。《批判评论》27卷第3-4期，第380-414页。
- 索明，伊利亚（2016）。《民主与政治无知：为何小政府更

明智》。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 索明，伊利亚（2019）。《知识精英统治的承诺与危险》。《探究》65.1，第27–34页。
- 索明，伊利亚（2023）。《政治无知问题的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解决方案》。载于《民主的认识论》，哈娜·萨马尔日亚与卡西姆·卡萨姆编，劳特利奇出版社，第15章，第287–315页。
- Stagnaro, Michael N., Ben M. Tappin 和 David G. Rand（2023）。《在美国大规模概率样本中，数值能力与政治动机性推理之间无关联》。《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120卷第32期，e2301491120。
- 斯坦诺维奇，基思·E.（2021a）。《分裂我们的偏见：确认偏误的科学 with 政治》。剑桥：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
- 斯坦诺维奇，基思·E.（2021b）。《将非理性归咎于对手的非理性尝试》。载于

《劳特利奇政治认识论手册》，迈克尔·汉农与耶罗恩·德里德主编。伦敦：劳特利奇出版社，第274-284页。

- 斯特宾，苏珊（1939）。《有目的地思考》。伦敦：企鹅图书。
- Sturgis, Patrick、Ian Brunton-Smith 和 Jonathan Jackson（2021）。“对科学的信任、社会共识与疫苗信心。”《自然·人类行为》5，第1528-1534页。
- 桑斯坦，卡斯·R.（2000）。《协商困境？为何群体会走向极端》。《耶鲁法律杂志》110卷第1期，第71-119页。网址：<https://www.jstor.org/stable/797587>。
- 桑斯坦，卡斯·R.（2002）。《群体极化的法则》。《政治哲学杂志》10.2，第175-195页。
- 桑斯坦，卡斯·R.（2009）。《共和网2.0》。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 桑斯坦，卡斯·R. (2017)。
《#共和国：社交媒体时代的分裂民主》。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 桑斯坦，卡斯·R. (2019)。
《从众：社会影响的力量》。纽约：纽约大学出版社。
- 苏罗维茨基，詹姆斯
(2004)。《群体的智慧：为何众人比少数人更聪明，以及集体智慧如何塑造商业、经济、社会与国家》。纽约：双日出版社。
- 斯沃利克，米兰·W.
(2019)。《极化与民主》。
《民主杂志》第30卷，第20–32页。
- 塔伯，查尔斯·S. 与米尔顿·洛奇
(2006)。《政治信念评估中的动机性怀疑》。《美国政治科学杂志》50.3，第755–769页。
- 塔利斯，罗伯特·B.
(2009a)。《民主与道德冲突》。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

- 塔利斯，罗伯特·B.
 (2009b)。《常识认识论与民主的证成》。载于《真理重要吗？民主与公共空间》，拉夫·赫嫩斯与罗纳德·廷内费尔特编，荷兰施普林格出版社，第41–54页。
- 塔利斯，罗伯特·B.
 (2014)。《实用主义政治哲学》。《哲学指南针》9.2，第123–130页。
- 塔利斯，罗伯特·B.
 (2019)。《过度民主：为何我们必须将政治置于其应有位置》。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
- 塔利斯，罗伯特·B.
 (2022)。《流氓之患》。
 《探究》65.1，第15–26页。
- Tappin, Ben M., Gordon Pennycook 和 David G. Rand
 (2020a)。《贝叶斯还是有偏见？分析性思维与政治信念更新》。《认知》204期，第104375页。
- Tappin, Ben M., Gordon Pennycook 与 David G. Rand

(2020b)。《清晰思考政治动机推理的因果推断：为何典型研究设计常削弱因果推断》。《行为科学新见》34，第81–87页。

- 泰特洛克，菲利普·E.

(1983)。《认知风格与政治意识形态》。《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45.1，第118页。

- 泰特洛克，菲利普·E.

(1984)。《英国下议院中的认知风格与政治信念体系》。

《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46卷第2期，第365页。

- 修昔底德（1974）。《伯罗奔尼撒战争史》。M. I. 芬利 编，雷克斯·沃纳 译。企鹅出版社。

- 托克维尔，亚历克西·德

([1835] 2008)。《论美国的民主》选篇。戈达德译。罗克维尔：怀尔赛德出版社。

- Torcal, Mariano 和 Zoe A. Thomson (2023)。《西班牙的社会信任与情感极化 (2014–19) 》。《选举研究》81，第102582页。

- 塔克，理查德（2008）。《搭便车》。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
- 特纳，斯蒂芬（2001）。《专家的问题何在？》，《科学的社会研究》31卷第1期，第123-149页。<https://doi.org/10.1177/03063120103100100>
- 泰勒，汤姆·R.（1994）。
《在多元中治理：公平决策程序对政府合法性的影响》。
《法律与社会评论》28.4，第809-832页。
- 泰勒，汤姆·R.（2000）。
《社会正义：结果与程序》。
《国际心理学杂志》35卷第2期，第117-125页。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1）。
《信息自由：知情权》。网址：<https://uncaccoalition.org/resources/access-to-info/freedom-of-information-the-right-to-know-unesco.pdf>。
- 乌尔比纳蒂，娜迪亚（2014）。《民主的扭曲：意

见、真理与人民》。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

- 厄里克·M·乌斯拉纳 (Eric M. Uslaner) (2015年)。《国会两极分化与政治信任》 (“Congressional Polarization and Political Trust”)，载于《论坛》 (The Forum) 第13卷第3期，柏林：德古意特出版社 (De Gruyter)，第361–373页。
- 瓦伦蒂尼，劳拉 (2012)。《正义、分歧与民主》。《英国政治科学杂志》43.1，第177–199页。
- 瓦利尔，凯文 (2020)。《两极分化时代的信任》。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
- 范·英瓦根，彼得 (2010)。《我们是对的。他们是错的。》载于《分歧》，理查德·费尔德曼与泰德·A·沃菲尔德编。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第10–28页。
- VanLeeuwen, Neil (2014)。《宗教信念并非事

实性信念》。《认知》

133.3, 第698–715页。

- van Wietmarschen, Han (2019)。《政治证言》。《政治、哲学与经济学》18.1, 第23–45页。
- Viehoff, Daniel (2014)。《民主平等与政治权威》。《哲学与公共事务》42.4, 第337–375页。
- Viehoff, Daniel (2016)。“权威与专长”。《政治哲学杂志》24.4, 第406–426页。
- 伏尔泰 ([1766] 1929)。《伏尔泰哲学辞典》。H. I. 沃尔夫 编。纽约：阿尔弗雷德·A·克诺夫出版社。
- 沃尔德伦, 杰里米 (1999)。《法律与分歧》。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
- 沃伦, 马克 (2013)。《公民代表》。载于《代表制：选举及其超越》，杰克·H·纳格尔与罗杰斯·M·史密斯编。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 第269–294页。

- 韦瑟罗尔，詹姆斯·欧文 与 凯琳·奥康纳（2021）。《内生性认识论派系化》。《综合》198卷第25期，第6179–6200页。
- 韦伯斯特，史蒂文·W.（2018）。《美国选民中的愤怒情绪与对政府信任的下降》。《政治行为》40，第933–964页。
- Westwood, Sean J., Justin Grimmer, Matthew Tyler 和 Clayton Nall（2022）。《当前研究高估了美国人对政治暴力的支持》。《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119卷第12期，e2116870119。
- 威廉姆斯，伯纳德（1973）。《决定相信》。载于《自我的问题：1956–1972年哲学论文集》。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第136–151页。
- 威廉姆斯，伯纳德（2002）。《真理与真诚》。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 威廉姆斯，丹尼尔
 (2021a)。《动机性无知、
 理性与民主政治》。《综合》
 198.8，第7807–7827页。
- 威廉姆斯，丹尼尔
 (2021b)。《社会适应性信
 念》。《心灵与语言》36.3，
 第333–354页。
- 威廉姆斯，丹尼尔 (2023)。
 《党派动机性推理之辩》。
 《综合》202.3。
- 威尔逊，蒂莫西·D. 与南希·布
 雷克 (1994年)。《心理污染
 与心理修正：判断与评价中的
 非意愿影响》。《心理学公
 报》116卷第1期，第117页。
- 伍德沃德，伊莉丝 (即将出
 版)。《党派性顺从有何不
 妥？》，载《牛津认识论研
 究》第8卷。塔玛尔·萨博·根德
 勒、约翰·霍桑、朱莉安·钟、亚
 历克斯·沃斯尼普编。牛津：牛
 津大学出版社。
- 沃斯尼普，亚历克斯 (即将出
 版)。《对专家的遵从》。载
 于《认识论指南》 (第三
 版)。乔纳森·丹西、欧内斯特·

索萨、马蒂亚斯·斯托普与库尔特·西尔万 编。牛津：威利-布莱克威尔出版社。

- Yarchi, Moran、Christian Baden 和 Neta Kligler-Vilenchik (2021) 。《数字领域的政治极化：社交媒体上互动性、立场性与情感性极化的跨平台、历时分析》。《政治传播》38.1-2，第98-139页。
- 杨，艾里斯·玛丽恩
(1997) 。《差异作为民主交流的资源》。载于詹姆斯·博曼与威廉·雷格编，《协商民主：理性与政治论文集》。剑桥：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第383-406页。
- 杨，艾里斯·玛丽恩
(2002) 。《包容与民主》。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
- 扎格泽布斯基，琳达
(2007) 。《伦理利己主义与认知利己主义及自主性理想》。《知识：社会认识论期刊》4.3，第252-263页。

- 扎勒，约翰（1992）。《大众舆论的本质与起源》。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
- 扎勒，约翰与斯坦利·费尔德曼（1992）。《调查回应的简单理论：回答问题与揭示偏好之辨》。《美国政治科学杂志》36.3，第579–616页。
- 茹拉夫斯卡娅、叶卡捷琳娜，玛丽亚·彼得罗娃和鲁本·埃尼科洛波夫（2020）。“互联网与社交媒体的政治效应。”《经济学年度评论》第12卷，第415–438页。

索引

- 问责制
8,11,17,19,23,27,41,90–91,94,116,184,238,247,294,31
- 阿亨，克里斯托弗 164, 194
- 阿克曼，布鲁斯128
- 聚合式民主47,54–62,77
- 安塞尔，亚伦 187, 188, 190, 191, 193

- 安德森, 伊丽莎白
51, 58, 63, 88, 257, 261, 270
- 阿伦特, 汉娜 2, 7, 15, 20,
24–27
- 亚里士多德 40, 43–44, 55,
289, 305
- 权威: 认识论的 4, 16, 59,
76–77, 251, 254–256, 275,
284 政治的 4, 31, 50, 85, 89,
263, 275, 283–284 实践的
253–254
- 权威困境 74–77, 79, 86, 89,
91, 95, 97
- 权威原则 第283–285条
- 巴特尔斯, 拉里 106, 164,
194
- 信念: 信念的目标 9, 93, 156,
162–163, 168 集群信念 105,
188, 194–195, 197, 205,
225, 233–235 善变的信念
(脆弱的信念) 175, 177–
180 构成身份的信念 (珍视的
信念) 126, 139, 143 政治信
念 9–10, 12, 15, 105–107,
126, 138, 145, 147–150,
156, 162–180, 193, 232 宗

- 教信念 20, 168-169 社会适应性信念 164-171, 179-180
- 偏见 54, 60, 63, 65, 136-156, 163-167, 193-194, 204-206, 217, 230-235, 246, 248, 260, 273, 275, 281, 289-290, 302-303, 313
 - 布莱克本, 西蒙 28, 33, 35
 - 布卢姆, 保罗 165, 169-170
 - 布伦南, 杰森 54, 61, 89, 105, 107, 115, 122, 135, 145, 194, 281-282, 284-286, 296-297, 299-305, 314-315
 - 判断的负担 (罗尔斯) 30, 202
 - 卡普兰, 布莱恩 56, 106, 146, 148
 - 认知主义 32, 83
 - 科恩, 杰弗里 140
 - 科恩, 约书亚 48, 51
 - 硬币抛掷类比 46-47
 - 能力 41, 44, 57-58, 60, 77, 84, 114-115, 256-260, 270, 272, 275, 282, 285-287,

291–293, 298, 302–305,
309–311, 314

- 孔多塞陪审团定理56–59
- 确认偏误（参见偏误）
- 阴谋论^{1–3, 6, 15, 145, 152, 269}
- 康弗斯，菲利普 173–176,
214
- 信念： 政治方面 170–171,
179–180, 191 宗教方面
168–170
- 达尔，罗伯特 178,301
- 尊重（deference） 59, 106,
246, 250–257, 260–261,
270–273, 316–318
- 审议日第128天
- 协商民主47–51, 54, 58–65,
79–82, 90–92, 128, 184,
199, 207, 291
- 杜威，约翰 51–52, 92, 96–
97
- 分歧： 深度分歧 195–200 事
实性分歧 23–24, 143, 149,
171–172, 184, 190–192,
265 道德分歧（价值分歧）
20, 23, 137–138, 184, 189–
197, 202, 270–273 合理分歧

- 19–20, 31, 46, 79, 86–87, 91, 184
- 不信任 149, 221, 224, 237, 240, 246–249, 267–268, 270–272
- 多样性胜过能力定理 59–62
- 回音室 1–3、15、57、64、149–150、218–221
- 认识论民主 6, 8, 36, 40–44, 51–67, 73–76, 79–80, 84–98, 269
- 认识论危机 1–2, 6, 15
- 知识精英统治 (epistocracy) 43, 53, 61, 77–78, 84, 86, 89, 282–305 选举权抽签制 (enfranchisement lottery) 290–292, 302–303 开明偏好投票制 (enlightened preference voting) 294–297, 302–303 知识精英否决权 (epistocratic veto) 292–293 复数投票制 (plural voting) 287–291, 293 限制选举权 (restricted suffrage) 285–287, 293, 299

- 平等 4, 36, 40, 42, 44-46, 48-50, 78, 89, 94-95, 189, 250-251
- 埃斯特伦德, 大卫: 30-32、45-46、49、51、59、64、74、78、80、84-90、95、254、263-264、283-284、289、291、298-299
- 专家/老板谬误254, 283-284
- 专业知识
2,4,8,31,43,56,59,62,75,106,1276 识别专业知识 257-261
规范性 252,262-265 对专业知识的怀疑 245-251,261-270 技术性 253,262,265-267,269
- 表达性回应171-173, 175, 180, 186, 191
- 事实真理与理性真理25-27
- 假新闻1-3,15,23,35-36,218,293
- 费什金, 詹姆斯 128, 291
- 福杰林, 罗伯特 197-199
- 民主的民间理论161-162, 176, 180

- 福柯，米歇尔 2-3, 21-22, 265
- 弗里德曼，杰弗里 124, 156, 251, 260, 265-267, 270, 283
- 芬克豪泽，埃里克 166
- 格雷罗，亚历杭德罗 119, 258, 261, 306-315, 318
- 汉农，迈克尔 96, 98
- 许默尔，迈克尔 65, 108, 143, 188
- 意识形态的纯真 107, 173-176, 214
- 意识形态 148, 151-153, 173-174, 193, 213-214, 233
- 无知 2, 5, 9, 11, 34, 42-43, 66, 73-74, 99, 102-130 彻底无知 123-125 理性无知 9, 117-125, 127-128, 147-148, 292 策略性无知 125-128
- 英格汉姆，肖恩 59, 77, 302-303

- 工具主义 42-45, 53, 74, 77-79
- 乔希, 赫里希凯什 234-235
- 卡汉, 丹 127, 136, 153
- 卡尔莫, 内森 173-174, 214, 236
- 金德, 唐纳德 173-174, 214
- 知识, 政治 30-31, 99, 106-115, 118, 142-143, 286-287, 294-295, 300 另见 能力; 无知
- 拉丰特, 克里斯蒂娜 316-317
- 兰德莫尔, 埃莱娜 48, 51-52, 54, 59-62, 85, 88-89, 95, 306, 311-315, 318
- 合法性 4-5, 8, 18-19, 28, 31, 36, 42-53, 68, 75-78, 84-93, 198, 221, 248-249, 257, 262, 284, 287, 290, 292-293, 303-304, 317-318
- 利维, 尼尔 106, 177
- 李普曼, 沃尔特 104, 267
- 抽签制 11, 306-312, 315, 318
- 卢皮亚, 亚瑟 109, 112, 190

- 林奇, 迈克尔 15, 195, 198–190
- 马基雅维利, 尼科洛15
- 梅森, 莉莉安娜214,224,236
- 梅西耶, 雨果81,141
- 小型公众群体81–83, 311–312, 314–318
- 密尔, 约翰·斯图尔特
2,4,41,51,63,79,95,115,129,13290,292
- 米萨克, 谢丽尔 51, 92–94, 96
- 聚合的奇迹55,62,147
- 虚假信息见假新闻
- 动机性推理见偏见
- 穆芙, 尚塔尔 183, 188, 201
- 阮氏清 50,221
- 非认知主义 28–30, 186
- 奥巴马, 巴拉克
1,15,124,171,186
- 开放民主 11, 306, 311–315, 318
- 奥里吉, 格洛丽亚 250, 254, 276

- 奥威尔, 乔治 15, 21, 24
- 党派媒体 10, 219–222
- 党派性 10, 143, 177, 193, 215, 223–225, 236, 248, 272–273 表达性理论 119, 176 党派认识论 140–143, 164, 193–198, 265, 270–273 党派偏见 见偏见
- 说服 10, 43, 197–199
- 彼得, 法比耶娜 49, 74–75, 77–78, 89–92
- 柏拉图 2, 4, 7, 15, 23, 26, 31–32, 42–44, 54, 73, 88, 121, 185, 207, 257, 284, 289
- 多元主义 20, 200, 263, 268–269
- 极化: 情感极化 213–216, 218–219, 222, 224, 235–238 信念极化 217–219, 227–228, 230–232 精英极化 194, 212, 223, 237, 317 群体极化 212, 215–218, 225–230, 232 意识形态极化 194, 213–216, 218, 224, 233 议

题极化 213-214 大众极化

179, 194, 223, 237

- 民粹主义267-269
- 后真相3,8,15,33-36
- 实用主义侵入120
- 实用主义16,92-98
- 程序主义42,45-51,53,74,78,116 认知程序主义74,78,86-92
- 公共理性20-21
- 理性 9-10, 64-65, 74, 92, 94, 98, 106, 113, 116-130, 135-137 认知理性与工具理性 144-146 理性的非理性 144-149 理性的无知 见 无知
- 罗尔斯, 约翰 2,7,19-21,30,48,61,184,189,190,200-201,263
- 合理的分歧5-6, 20, 46, 76, 79-80, 86-87, 91, 200-204, 264, 284, 293, 298, 310
- 回顾性投票 112-114
- 罗蒂, 理查德30
- 罗森菲尔德, 索菲亚 267-268
- 捷径 (启发法) 111-114

- signaling 162, 166, 169, 171
- 社会认同理论 193–195, 224–225
- 社交媒体
2, 11, 15, 24, 36, 56, 218, 220–222
- 索明, 伊利亚 33, 54, 108–109, 112, 114, 116, 120, 122, 124–125, 130, 146, 292
- 排序 223–225
- 抽签制 11, 276, 291, 305–306 另见 抽签民主制与开放民主
- 斯珀伯, 丹 81, 141
- 桑斯坦, 卡斯 216, 219–220, 226, 228, 240
- 塔利斯, 罗伯特 49, 51, 92–94, 96, 189, 200, 225–227, 263, 303
- 技术官僚统治 246, 266–270
- 托克维尔, 亚历克西·德
2, 249–250
- 特朗普, 唐纳德
2, 12, 104, 144, 151, 171

- 信任： 信任危机 1-2, 245-249 政治信任 1-2, 19, 25, 184, 235-237, 249, 268-269 社会信任 64-65, 149-151, 235-237 对专家的信任 1-2, 15, 247-254, 261-267, 270-272 对媒体的信任 1-2, 25, 249
- 理解 9, 52, 96-98, 274-275
- 乌尔比纳蒂， 纳迪亚 47,250
- 范·吕文， 尼尔 168-169
- 维恩斯， 大卫 302-303
- 威廉姆斯， 伯纳德 18,34
- 威廉姆斯， 丹尼尔 126-127, 150
- 扎勒， 约翰 109, 174-176

目录

1. [封面](#)
2. [背书页](#)
3. [半标题](#)

4. [标题页](#)
5. [版权页](#)
6. [献词页](#)
7. [目录](#)
8. [致谢](#)
9. [引言](#)
10. [1 真理与政治](#)
11. [2 认识论民主](#)
12. [3 重新审视认识论民主](#)
13. [4 政治无知](#)
14. [5 非理性与偏见](#)
15. [6 政治信仰](#)
16. [7 政治分歧](#)
17. [8 极化与党派之争](#)
18. [9 信任与专业能力](#)
19. [10 重新思考民主](#)
20. [参考文献](#)
21. [索引](#)

地标

1. [封面](#)
2. [背书页](#)
3. [半标题](#)
4. [标题页](#)

5. [版权页](#)
6. [献词页](#)
7. [目录](#)
8. [致谢](#)
9. [正文内容](#)
10. [参考文献](#)
11. [索引](#)